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工农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工农革命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工农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三卷　工农革命

主　编： 张　皓　蒋凤国

副主编： 黄少群　刘少军

编　者： 金薇薇　郑玉涛　刘皓月　陈学忠　杨　华　刘　莎　姜雪松　姜　宏　王帮阁　段德春　徐　行　徐文长　袁　冰　袁忠才　贾　刚　董一臻　贾泽贵　高　强　高　波　柳　辉　唐启燕　郭庆辉　郭忠军　郭景龙　郭德宏　萧　龙　萧朝东　黄　石　黄喜兵　黄宗斌　黄仲红　黄　明　曹克然　曹　霞　曹学繁　崔云飞　章兴超　康志强　康　健　阎师承　蒋建鸿　董兰英　梁思浩　崔　巍　张文刚　戚　峰　穆春叶

统　稿： 黄少群　刘少军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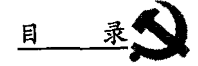
第三章　中共六大召开和白区工作恢复

第四章　各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第五章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大转移

第六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继续长征

第七章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 巩固西北根据地



第十章　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与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十一章　一二·九运动爆发与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兴起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

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和“分共”，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原因上来讲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势力强大，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及国际革命形势进入低潮期而导致的；主观上来说，由于当时共产党尚且处于幼年期，而且群众普遍革命理论实践水平不高，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领导以及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指导也存在着一定的失误。在大革命遭受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国民党背叛国共合作，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此时中国革命何去何从，对于共产党以及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来说，都是前所未遇的难题。

首先，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阵营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有了显著变化。“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①。

国民党南京政权成立后，对内实行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新旧军阀混战，对工农阶级的压迫愈演愈烈。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以买办资产

阶级为主体的江浙财阀，先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帮助蒋介石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许多都是地主出身，而更多的官吏更是成为了新兴的地主。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各派系、新旧军阀间斗争不断。全国各个派系的军阀都凭借着自己掌握的军队争权夺利。尤其是蒋、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几大派系之间矛盾更为突出。1927年7月以后，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和广西、广东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晋系军阀阎锡山割据山西，冯玉祥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奉系军阀张作霖仍占据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集中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军阀之间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暂时联合，同样原因又相互大打出手。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②]事实正是如此，当四派联合攻下北京、天津，打垮奉系军阀之后，接连发生了蒋冯、蒋桂、蒋与阎冯桂之间的大战，连年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实际上变成了代表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利益的政党，他们不再致力于同共产党结成同盟，结束中国军阀内乱的局面，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除掉共产党上面，妄图将国民党树立成为中国唯一执政党，进而独掌政权。早在“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即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表示抗议，主张掌握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罗亦农等联合给中央写信，提出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应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召集因“马日事变”而被迫出走的湖南同志开会时，毛泽东就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主张。针对陈独秀要求解散工农武装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从后来的革命实践也可看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以保存革命力量的路线，是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的。在汪精卫公开反共叛变革命，形势紧急的情况下，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多次提出，党要整军经武，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武装工农兵集中工农武装，以



便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这些观点反映了紧急形势下，党内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新认识。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时曾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南京政府建立后，他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对外实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并发起一场同国外列强“改定新约”的运动，采取了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这实际上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了。这一切都说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转到反革命的阵营中去，共产党不应对其继续抱有依靠和联合革命的幻想。对待国民党的反革命屠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去反抗。

国民党在建立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极力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一旦政权稍有稳定时，便培植和发展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软弱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寄希望于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有个别人物在南京政府内部任职，但只是点缀并未掌握党政实权。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而离开了革命。因此随着国民党真面目的逐渐暴露，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失望和不满与日俱增，为日后同国民党的决裂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部分软弱分子已经不能够继续作为革命力量留在革命阵营中，反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中只有少数坚定革命信念的小资产阶级继续坚持革命，并在中国革命最危难的时刻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其次，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残酷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国民党一方面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消灭异己；与此同时，又通过建立和运用各种反动法律条文、特务组织和保甲制度，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不断强化其法西斯专制统治。此时，反革命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各地工会、农会、妇女、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和进步团体被解散和取缔；人民的革命活动被镇压，民主权利被剥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共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更是最大的犯罪。”[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骨干、群众领袖、学生代表，以及党外革命人士被关押，甚

至被屠杀，党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罗亦农等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英勇牺牲。

在反动势力的摧残下，工人阶级的罢工逐年减少，城市工人运动的高潮暂时过去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进攻的性质转到防御的性质。各地革命工会和农会等组织被查禁，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的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从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虽然发动和领导了有34万余工人参加的47次罢工，但是只有少数几次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归于失败。拥有近1 000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许多县区，虽先后爆发多次农民武装起义，但多数以失败告终。

在残酷的革命局面下，党内部分人在政治倾向、思想意识上陷入混乱甚至退缩的状态，严重的消极情绪弥漫于党内。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悲观分子，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坚定信念继续斗争。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正是在此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的，如年逾半百的资深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叶剑英等，都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大革命紧急时刻，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革命的倾向，并提出制定武装行动纲领的正确主张。当面对夏斗寅、杨森反共，带领叛军讨伐武汉政府时，蔡和森、李立三即提议以暴动对付暴动，认为如果武汉部队、冯玉祥部队同蒋介石部队共同北伐，那么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共产党之日，我们只有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大声疾呼：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党中央即刻检查自己的实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斗争中积蓄力量。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纷纷



起来要求拥有土地的时候，右倾错误主义者压制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抹煞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同盟军的关系。因此，大革命失败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挽救、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唯一希望之所在。

总之，在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光辉旗帜。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④许多共产党人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信念。大革命紧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内部就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党的前进方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是当时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唯一选择，这就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政策转变做好了思想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联合，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激化。所以中国有继续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深厚，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重新到来。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⑤

注释：

①④《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02 页，第 937 页。

②⑤《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7 页，第 76 ~77 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7 页。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再思考

国民革命的前中期，在共产国际的方针指导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并出师北伐。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共产国际对农民和土地问题、对待国民党态度以及军事问题方面制订了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形式的决定，促使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土地革命发展趋势以及武装斗争的对象方式产生深入思考，并酝酿着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思想。

共产国际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一味依靠国民党搞革命，因此对共产党下达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保持国共联盟，把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军事工作和农村工作转向党务工作和政府工作方面，即使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应仅做政治工作，甚至把共产党力量从军队中撤出来，完全放弃了武装。共产国际的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共产党制定的有关革命的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国共合作的初期，共产国际已看到国民党右派反共、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害，提出了打击右派，扩大左派，团结中派的策略。由于错把蒋介石看作是可以“左转”的、可依靠的中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待蒋介石的态度是以团结拉拢为主。为维护统一战线，孤立右派的反共倾向，共产国际提出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左派作出某些让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这实际上是向实权派即蒋介石让步。知道北伐前，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仍是不惜向新老右派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在国民党内只联合不斗争，来维护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同右派的“团结”和“统一”。

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发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革命的倾向，提出应“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①]并发出通告向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发起反击。而且第一次东征之后，中共中央也看到蒋介石动摇的一面，他畏惧民众运动并对共产党加以限制。国民党二大前夕，周恩来与



陈延年、鲍罗廷提出应该“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结果在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下，形成了右派势力扩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经过中山舰事变，整理党务案之后，共产国际还是毫无警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向国民党右派、中派作出重大让步。甚至北伐时，当加仑向张国焘问及对待蒋介石的政策时，张国焘提出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直到国民党三大前，共产党对待蒋介石的方针还是不明确的，更谈不上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再攻击了，这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长了其地位的提高。

从国共合作之日起，共产国际便积极帮助国民党开办军事学校，训练军队并资助大量武器弹药，以扩大国民党影响。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关注还集中在巩固国民军上面，虽然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道路”[②]，但这里的武装力量指的是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革命军。1926 年 11 月 30 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上作的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提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③]他这里提到的革命军队是指国民革命军，并没有要求共产党建立自己掌握的武装，仅要求共产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学习研究军事。1926 年 12 月 16 日，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虽然提出军事问题，看到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认为共产党不必另外组建工农武装，有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就够了，共产党只需在其中加强政治工作。由于没有掌握武装，在面对国内外敌人联合进攻的情况下，共产党面临覆灭的危险。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国民革命的前中期，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中作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和群众运动。然而，在国民党新老右派残酷进攻情况下，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加深，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努力下，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 1925 年 11 月成立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共产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拉拢军阀部队。共产党也初步意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把工人纠察队看作反帝先锋，提出要武装工人阶级。1926 年 7 月 12 日至 18 日，第四届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

的决议。虽然决议提出党要通过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提掌握军队的任务，仍把注意力放在组织群众运动上面。

中国革命应向着土地革命的方向发展，这一革命任务最早也是由共产国际根据在各国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共产党指出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的斗争方向。1926 年 3 月 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指出，中国革命应向着土地革命的方向发展，为了真正的推进革命的胜利，必须唤起全体农民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中去，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是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命运攸关的基本问题”④，“农民问题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⑤《提纲》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把土地国有化作为土地纲领，即没收大面积的私有土地，制定土地革命策略应根据各地经济政治特点。同时把农民所理解的切身政治经济要求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者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反对军阀和封建官吏等中国革命共同的敌人。但对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和开展土地革命，共产国际没能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要求共产党依靠广州国民政府贯彻土地革命措施，实行自上而下的土地革命。

1926 年冬至 1927 年春，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依靠手中的权力，大量收编军阀部队，发展个人势力。此时帝国主义为了破坏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公然对中国人民进行武力威胁，同时英美日等方面加紧了对蒋介石的拉拢，企图分化革命阵营。1927 年 3 月，蒋介石由江西东下，沿途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革命事件，如，三六事件、九江惨案、三·二三事件等。这些事实都表明蒋介石已开始与帝国主义合谋反共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趋势也有所觉察，曾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加强军队工作、大力武装工农、积极开展群众运动以挽救革命、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右派。但这时共产国际扔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还不打算同国民党右派决裂，仍只停留于孤立、揭露和利用右派的政策，即使决裂在所难免，仍希望利用蒋介石进行北伐，试图拉住蒋介石。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即开始实施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秘密下达“清党”命令，4 月 12 日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于深知武力的重要性，蒋介石首先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这次政变表明蒋介石已经公开的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他在表面



上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国革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机，形势变化之快，大出共产国际的预料。

1927 年 4 月，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就针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问题展开过争论。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和所应采取的策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的火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和中国革命的各种各样敌人作斗争的中心。"[⑥]作为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的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在目前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开展群众运动，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加速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武装工人和农民，争取国民党党员，用一切力量加强共产党。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策略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放弃孤立、揭露和利用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政策，把驱逐、斗争和从政治上消灭右派的方针提上了议事日程。4 月 14 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以及随后发布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明，都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指出"铲除蒋介石主义的根株，这在国民革命发展中的最近阶段上，要算是主要的工作。"[⑦]共产国际宣布蒋介石既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

虽然共产国际明确了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但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土地革命问题上又使自己处于两难选择境况中。1927 年 5 月 24 日，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中多次强调，"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热烈称赞"中国正在经历着的土地革命，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⑧]同时，他也多次强调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必须通过武汉政府开展农民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斯大林以前是过于看重蒋介石的势力，现在是过于看重汪精卫的势力。以前是迟迟不愿意同蒋介石决裂导致了四·一二事变的发生，现在是不愿同汪精卫势力决裂，一切立足点在于依靠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导致革命势力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下。1927 年 5 月末，共产国际向中国国内发来了五月指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一方面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另方面又希望由武汉政府来发动土地革命，要把土地革命限制在武汉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能有任何过火行为。这个指示的基本思想就是希望通过挽救武汉国民政府来挽救大革命，这实际上都是基于共产国际对于武汉国民党和政府性质的错误判断。

在建立革命军队问题上，共产国际陷入误区。1927 年 5 月 30 日，共产

国际在第八次执委会上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应建立绝对忠诚的革命部队，不是说要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而是建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军队，以保护武汉政府。共产国际一方面强调建立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组成的可靠的新军，另一方面又规定它的任务和职责是“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⑨

在大革命紧急时期，为了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并确定共产党在大革命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大会对于无产阶级应当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纵观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之处。其中在大革命的初、中期正确的指导主要表现在：首先确立了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促成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以及认识到无产阶级自主领导的必要性；其次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分析正确，及时提出了土地革命的目标，为混乱中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加强了工农武装力量以及积极为中国革命争取国际援助；再次协助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促进北伐的胜利进军。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也存在不少失误之处，这对大革命的失败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首先、对国民党性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右倾，这主要表现在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革命热情，低估了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主张辅佐国民党的左派力量进行革命；其次、在建立革命军队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方向性的错误，虽然热烈赞颂土地革命，但同时却要求依靠国民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忽视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再次、对中国当时的积极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过于公式化、定型化。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拿不出一个解决中国时局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背景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②③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140页，第181页，第151页。

④王进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年第6期，第24页。

⑥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6页。

⑦《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⑧⑨《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260页，第240页。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政策的转变

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处处迁就退让，要求搞好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这助长了武汉政府的反动势力，而宁汉合流又加快了分共的步伐，让整个形势更加恶化。1927 年 6 月 8 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够坚决，要中共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局势将会变得不可收拾。7 月 8 日共产国际又致电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①，但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不要退出国民党，留在国民党内，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机关坚决斗争。在中国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对中国政策的转变集中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由之前的依靠武汉政府领导土地革命改变为由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土地革命；由联合资产阶级，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改变为反对资产阶级，退出武汉政府；由反对建立苏维埃改变为赞同建立苏维埃。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军队不可靠，看到军事将领和军官公开转到反革命阵营，并宣布与农民为敌。因此，共产国际改变了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政策，提出以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有的这些都清楚表明，自从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开始酝酿着重大的转变。

1927 年 7 月中旬，共产国际作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即“七月决议”。对紧张的革命局势下中共的政策和策略做了规定，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土地革命。共产国际主张“展开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鉴于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建立战斗的不合法的党的机关。共产国际确立了从武装国民党军队转变为“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的方针。③这样土地革命就开始置于革



命的武装保护之下，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初步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共产国际还严厉地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纠正中央的错误，主张“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各项指示。”④尽管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转变为时已晚，未能挽救中国大革命，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为当时混乱中的共产党指出了今后革命的大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方针提供了指导。

在共产国际提出土地革命的方向后，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自从五卅运动之后，工人、农民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也提到：“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⑤陈独秀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如此才能够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⑥

毛泽东在党内比较早的关注农民问题，他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是比较深刻和清醒的。1926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对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农民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部就不会根本倒塌。”⑦1926 年下半年起，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在全国掀起。1927 年初毛泽东在调查了湖南地区的农民运动之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强调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驳斥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革命的同志都应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毛泽东还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农民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党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及时转变政策，做出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决定提供了思想和认识基础。大革命紧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内部开始独立思考党的前进方向。提出许多可贵的正确主张，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政策转变做好了思想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四·一二政变发生不久，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即对当时革命形势及共产党前进方向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五大期间，瞿秋白公开发表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系统的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劳动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8]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平民怎样取得武力，瞿秋白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办法。他的文章虽然在五大散发，但并没有引起注意。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积极支持农民土地革命，掌握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势力，这是共产党内部长期争论所形成的一项积极的成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在许克祥叛变后，蔡和森提出关于湖南、湖北的决议案，其中要求：“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绝对的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并提出“土地没收，并立乡村自治政权”[9]，发展工农武力，等等。

6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北伐问题的会上，蔡和森提出：“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10]，两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应在那里经营自己的根据地。可是当时党内主导政策是东征，因此根本没有采纳蔡和森的意见。当面对夏斗寅、杨森反共，带领叛军讨伐武汉政府时，蔡和森、李立三即提议以暴动对付暴动。蔡和森认为如果武汉部队、冯玉祥部队同蒋介石部队共同北伐，那么“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 C. P. 之日”，我们只有进攻才有出路。“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令”，“同时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揭破他们的假面具”。[11]在第三次政治局会议上，蔡和森进一步提出应当丢掉对汪精卫、唐生智的幻想，团结群众及国民党左派，公开反对汪精卫、谭延闿、冯玉祥、唐生智及朱培德。6月25日，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大声疾呼：“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他建议党中央即刻检查自己的实力，作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他还多次主张号召工农、武装工农，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蔡和森等这一提议一度为中央通过，并得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坚决支持，曾派出数十名军事干部赴



江西、湖南等地，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许克祥。后来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犹豫，这一计划被最终取消。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以看出，在革命紧急时刻，共产党部分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革命的倾向，并提出制定武装行动纲领的正确主张。他们从血的经验教训中已经强烈意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建立一支在自己直接领导下的、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国民党反动军队一旦叛变，就无力组织抵抗，就将失去生存的权利。

所有这些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不仅不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所接受，相反，他仍坚持执行其右倾错误路线，于6月30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强行通过了向国民党右派全面妥协的国共合作关系的十一条。声称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的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显然，只有排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领导，武装暴动才有可能。

为了挽救革命，保存革命力量，适应新形势开展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1927年7月12日，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提议让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而为了不致引起陈独秀的怀疑，故又提出让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和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陈独秀拒不服从这一决定，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通过了共产党退出武汉政府的声明，并于次日在报纸上公布于众，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这是共产党在大革命最后阶段带有转折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变化，这为共产党最终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在临时中央的有力领导下，共产党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决议，及时的调整了政策。临时中央13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揭露了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集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支持右派军官屠杀工农群众的反动政策，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任务，并命令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并号召工农革命兵士跟着共产党奋

斗到底。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发动南昌起义，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并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宣言实际上展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始改变了一味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

临时中央成立后，于7月20日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通告着重强调了武装的重要性，"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12]特别是在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到处屠杀农民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武装是现阶段农民运动的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通告》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种种办法，并提出如果存在不下去就"上山"的设想。

五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从7月13日至26日，连续召开会议。期间，汪精卫于15日公开"分共"，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叛变革命。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

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根据周恩来对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分析和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在九江举行会议后的建议，通过了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的决议和计划。7月27日正式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负责领导武装暴动。当时在第二方面军中，中国共产党掌握着以叶挺为副军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以贺龙为军长的第二十军，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这些部队以"东征讨蒋"为名，驻扎在九江、南昌地区。

二、决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为此，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到上述四省去指导秋收暴动。

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这些正确的决策和措施，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奠定了开创中国革命新时期的良好基础。

注释：

①马贵凡译：《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第76页。

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页。

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④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苏联《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

⑤《李大钊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页。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版，第176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

⑧《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⑨⑩《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第97页。

⑪《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⑫《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7页。

九江会议确定武装反抗的行动方针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撕下“革命左派”的伪装，公开提出“分共”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迅速做出了用武装斗争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决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根据前一阶段的形势和众多重要人物的政治表现，一度有过争取在北伐战争中表现较“左”的将领张发奎的设想。当时张发奎统率的第二方面军因执行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命令，正好部署在南浔铁路沿线。正是这一背景下，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建议，党中央有依靠张发奎为领袖、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打算。之所以要回粤徐图发展，是由于共产党曾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已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以广东为例（一）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二）工农运动之核心；（三）财政之丰裕；（四）交通之灵便等等，因决定以军队夺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是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在广州起义，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7 月 16 日，党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做好接应张发奎军的准备：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现已抵江西。须有政治上军事上种种准备，假使张军来时，即有援助。为此，中共领导机关一方面派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马回岭一带的第二十五师中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实地考察形势，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形势在急剧变化。7 月 15 日，汪精卫已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张发奎的态度向右转，高唱拥汪，并表示对共产党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张发奎能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去，直接影响到回粤计划的实行。针对这一情况，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对张发奎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努力争取张发奎共同回粤，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另一方面，临时中央政治局也预见到与张发奎分离已不可避免，在 7 月 18 日前后，又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



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就是认为共产党应独立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形势的发展正如临时中央政治局所预见到的那样：20 日，形势越发紧张，张发奎尚未到达九江，而且态度更加右倾，并听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7 月 22 日，周恩来到武昌，找到张发奎作了最后的谈判，张发奎态度依然右倾。于是，中央抛弃了依靠张发奎回粤的政策，改为独立的军事行动。上述可见，临时中央政治局对张发奎的统战工作，既注意团结，又坚持斗争，能合作则合作，不合则分，不抱幻想，两手准备。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开始成熟的表现。

共产党在争取张发奎的同时，也做争取贺龙的工作。1926 年 6 月，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独立十五师，因北伐河南，作战成功，被武汉政府擢升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这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引起了各方面的注目，并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取的对象。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首脑人物如唐生智、张发奎等，都想牢牢地抓住这支部队。南京方面的蒋介石通过关系向贺龙提出，只要拥护蒋介石，立即可委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贺龙不为所动。共产党则通过共产党员周逸群、叶挺争取和改造这支军队。周逸群在独立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时，就通过工作关系与贺龙朝夕相处，畅谈形势，指明前途，对贺龙影响很大。1927 年 6 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贺龙时，也做了他的工作。关于这次会见，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时，汪精卫正在策划宁汉合流。面对武汉三镇的刀光剑影，面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淋漓鲜血，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贺龙的心里更明白了。就在这时，周恩来前来会见贺龙，分析了当前政局，讲述了共产党对政局的主张，征求贺龙对回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意见。贺龙的思想豁然开朗，通过黑暗看到了光明。尽管明知前进道路上充满艰险，但他决不回头。他激动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到底。"[①]贺龙正是周恩来点的将，为使用叶挺、贺龙部队，举行南昌暴动打下了基础。至今，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还保存着贺龙这样的回忆记录："周恩来同志郑重向我宣布：前敌委员会决定任命你为此次起义的总指挥。我当时一听，感激万分。党这样信任我，我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紧紧地握着周恩来同志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从这以后，贺龙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部队进行武装暴动的思想发动工作。"大约是 7 月 17 日或 18 日，贺军长

来到黄石港……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他针对部队思想动态，说明宁汉合流的情况，愤怒斥责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出卖革命。他最后表示，不管武汉方面如何，我们仍然继续东征（讨蒋）。他命令全军立即开拨向九江进发。”

7月18日，共产党曾在武汉召开会议，对军队的行动问题做好了研究。会后，周恩来同志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等组织前敌军委，立即去九江，协同叶挺等人负责主持军队及党的指挥，做好执行中央命令的准备。聂荣臻回忆说：“举行南昌起义，是中央7月中旬在武汉开会决定的。当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位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发动，要听中央的命令”。此时，军队因讨蒋任务全集中九江。聂荣臻同志接着回忆说：“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有驻在南浔路马回岭的第四军的二十五师。还有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刚从鄂东开到九江。”[②]此时，由于汪精卫公开反共，武汉形势紧张，党的许多领导先后到达九江。他们有的是借叶挺、贺龙部队作掩护，由武汉转南浔潜伏工作；有的则是隐蔽在叶挺部队内，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据当时任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朱其华回忆：许多方面的要人到了九江。除了代英、语罕住在我们一起外，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李立三……彭湃等等都来了，于是九江的空气也紧张起来了。这么一大批重要人物集中到九江，是很不寻常的。而且多在7月19日前到达，说明在这之前，中央有重大决定，要在九江酝酿了一个重大行动。

李立三、邓中夏奉中共中央命令于19日动身离开武汉到了九江，于20日召开了第一次九江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等。会上大家反映张发奎态度日益犹豫和右倾，依靠他为领袖回广东的行动很难成功；退一步讲，即使能够联络张发奎回广东，下一步张发奎与汪精卫妥协，共产党势必又一次成为牺牲品。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决定一个独立的军事行动，即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来领导武装起义。会议决定将党所掌握的部队赶快集中到南昌，争取贺龙领



导的第二十军一起行动，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此次暴动的纲领，会议确定：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反对武汉政府，还是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行。成立革命委员会，用国民党中委联名名义宣布。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便是最早提出在南昌起义的由来。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将大家的意见报告中央。会议结束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同已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瞿秋白完全同意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意见。李立三、邓中夏得知瞿秋白即将去中央参加紧急会议，便委托瞿代表九江同志向中央汇报，请中央尽快批准。

1927 年 7 月，汪精卫到庐山企图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扣押，并命令贺、叶两部集中于德安，以便反动军队合围聚歼。这个阴谋被叶剑英所察觉，他立即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在甘棠湖的小船上同贺龙、叶挺商讨对策。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称为小船会议也叫“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并且对暴动的决策有重要作用。

7 月中下旬，贺龙领导的 20 军和叶挺领导的 11 军二十四师，因“东征讨蒋”集结在九江和南浔路一带。两支部队高涨的革命情绪，震惊了汪精卫和张发奎。他们当时在武汉就想除掉共产党控制的这两支军队。7 月 28 日，汪精卫和张发奎上了庐山。早在他们没有动身前，就通知了包括朱培德、张发奎、金汉鼎、黄实、朱晖日、黄琪翔等，准备召开反共阴谋解除叶、贺兵权的庐山会议。李立三报告中提到：“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的……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红，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并命令叶、贺部队集中到德安待命。[3]7 月 23 日，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立即来到贺龙驻地，把共产党计划举行起义一事告诉他，并征询贺龙意见。贺龙反应热烈，这使在九江的同志放心不少。当时，叶挺、贺龙本人还不十分了解汪精卫召开庐山会议玩的是什么把戏。因为张发奎通知他俩上山开会的内容是讨论堂而皇之的“东征”问题。但是，敌人的阴谋被在张发奎部下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当时，叶剑英还未暴露身份，未引起张发奎的怀疑。每当历史的重大关头，他总是临危不惧，设法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他当机立断，设法把敌人的阴谋及时通知了叶挺和贺龙同志。7 月 25 日，叶挺、贺龙、叶剑英、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廖乾吾（四军

政治部主任）等五人在九江租了一条小船，假装游山玩水，在烟水亭（黄琪翔的临时司令部）所在的甘棠湖上，轻轻地荡着浆，秘密地商量着军机大事。贺龙回忆说：在小船上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贺龙叶挺决定不去庐山，也不理睬张发奎要部队集结德安的命令，立即将部队直开南昌及其附近地区。这就是八一起义史上有名的“小划子会议”

7月23日当晚，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开会，并急电李立三下山来开会，这便是第二次九江会议。会议讨论第一次九江会议来不及研究的几个议题，进一步研究了组织南昌暴动的问题。首先会议讨论最紧迫的军事部署，提出把军队在28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并急电报告中央，请求批准。24日第二次九江会议继续进行，此时李立三也接到通知从山上返回九江，参加会议。大家对头天晚上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没有不同意见；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的最高机关，反对蒋汪的宁汉政府和实行劳动保护法为起义的目的。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4]中共中央对于没收大地主土地要不要列入政纲的问题，会上谭平山和邓中夏认为：如果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可能会惹起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其他同志反对他们的意见，结果引起激烈争论，决定报告中央征求意见，会议暂时对此没有做出结论。这次会议的作用，主要是加快了南昌暴动的准备工作，并具体研究了暴动的政治纲领和暴动的日期。

在九江会议期间，早已在庐山疗养的政治局常委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邀请在浔中央委员上山汇报南昌暴动的酝酿情况，从而举行了庐山会议。庐山会议的参加人员有鲍罗廷、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林伯渠、叶挺、彭湃、聂荣臻、郭亮等九人。会议研究了南昌暴动问题，作出了同意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在得知了瞿秋白转达的李立三等同志提出在南浔线一带起义的意见后，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都赞成这个意见，开始具体准备起义的各项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并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会议之后，周恩来当晚离开



武汉，赶赴九江，担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

7月26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最新的任命和精神到达九江，马上召集九江的同志开会，这便是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完全同意举行起义的指示；随后转达了中央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的主张，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从而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平息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此问题的争论。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军事准备计划，并决定由邓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武汉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同时就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等事宜作了具体部署，并请罗米纳兹将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电告莫斯科，请莫斯科给予指示。从此，南昌暴动就由酝酿发动转入组织实施阶段。

当时，国民党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空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六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第六、第九军各一部，加上留守机关，共一万余人。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能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第十师第三十团也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全部，新从鄂东开到九江；驻在南浔铁路马回岭车站的属于第四军由周士第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这是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南昌方面有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武汉方面有卢德明等率领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也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这样算来，中国共产党能掌握的总兵力有三万余人，形势对起义有利。

从7月25日起，第十一、第二十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建制下的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及贺龙第二十军，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与第九军副军长、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会合，准备起事，发动武装反抗。因为贺龙方面兵力最多，故贺龙任各军之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起义部队中的一个团2 000多人坐在大校场操场上，而他们的隔壁，

就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主力团第七十九团。31 日，叶挺部第七十二团三营开到了南昌东门附近——这个营房里，驻着敌人一个团部、一个营部、7 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三营大胆地开进到敌军团部的门口，“借用”敌人营房前面的空地露营。浑然不知的敌军参谋甚至给了他们可以进出营房的口令。两支即将交火的部队，一个在营房里，一个在营房外，相隔不过数十米。31 日夜，布置好起义的朱德在城西嘉宾楼宴请朱培德手下的军官，其中就有驻守大校场的团长。喝完酒，打麻将，直到起义的消息走漏。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⑤]瞿秋白等临时中央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南昌起义问题，针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认为这无异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而现在即使是在汉口也能见到必有胜利的机会，于是主张坚决发动起义。7 月 26 日共产国际又发来电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于是经过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急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追上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然而，张国焘对起义计划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去，瞿秋白对其开展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⑥]

7 月 30 日晨，张国焘抵达南昌江西大旅社，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张国焘、谭平山、叶挺和周逸群。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俨然成了会议的主持者。张国焘先是解释了自己的来意。他先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说 25 日汉口中央会议决定在南昌发动暴动，并派周恩来为书记组成前敌委员会来组织领导。不料周恩来刚走，26 日罗米纳兹又带来共产国际的电文，要暴动之事谨慎为之，不可草率；否则不如将张发奎军中的共产党员撤出，派往农村；为暴动筹措的经费一时无着。参加会议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对于在南昌与张发奎决裂持有异议，认为还是拉上张发奎较为稳妥，这样回广东的把握更大。由于有了上述的新精神，中央便派他来紧急追赶周恩来。张国焘是赶来阻止起义的——远在万里外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冒险。箭在弦上，怎能不发？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李立三、叶挺、谭平山等人多是支持尽快在南昌暴动的，他们认为：“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这时谁能担保成功？让张发



奎在这个时候"同意"，岂不是与虎谋皮？会场的气氛格外紧张。其实，无论是罗米纳兹，还是加伦，在汉口会议上对是否举行暴动都是模棱两可未表态。张国焘这时提议共产国际电报要求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暴动。按加伦将军的意见，看可否将暴动再推迟，这倒是说明了他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就是不赞成暴动。

见张国焘又把共产国际和加伦将军抬出来当做帽子压人，周恩来再也忍不住了。他愤怒地打断张国焘：你今天说的，与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完全相反，我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主持这个暴动，现在共产国际和中央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实在是不能负责了！接着，使众人惊讶的是，一向对人温和的周恩来还拍了桌子。20 多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也说过：拍桌子这个动作，是我平生中仅有的一次。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共产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由于张国焘不明确表态同意南昌暴动，全天的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张国焘虽然只是一个人，但他有着中央特派代表的特殊身份，不能以表决的简单多数决定。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此时，传来了汪精卫、张发奎即将于 8 月 1 日赶到南昌的消息——是否起义，已再无讨论的必要，汪、张联手反共已成定局。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周恩来与贺龙、叶挺商量，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 8 月 1 日凌晨 4 时举行起义。由于叛徒的告密，贺龙与周恩来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注释：

①廖汉生：《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回忆贺龙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1 月版，第 32 页。

②聂荣臻：《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05 页。

③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8 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19 页。

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7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 页。

⑥《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 51 页。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大革命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南昌起义正是在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党以武力挽救革命失败尝试的开端，八一南昌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军队两万余人，向南昌发起进攻。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由于布置周密，对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团约一万人进行了突然的打击，仅五个小时就全部解决了战斗。至拂晓，全歼守军3 000余人，占领南昌城，缴获各种枪5 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清晨，当各家店铺卸下门板准备开张时，人们才发现南昌城头已经飘扬起鲜红的旗帜。满城都贴了标语，写着“工农兵大团结”、“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8月1日上午，前委派聂荣臻到马回岭车站部署第二十五师起义。当日中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三个营和第七十四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把张发奎的追击部队缴械后，开到南昌与主力会合。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被敌军阻挡，未能按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后来分别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



达等七人组成主席团。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九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第十一军（辖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十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辖第一、第二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同时以宋庆龄等人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已经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8 月 2 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的胜利极大的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立即部署联合向起义军发动疯狂反扑。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此时，叶剑英为确保起义军顺利撤出南昌城，他建议张发奎不要派兵夹击起义部队，而应跟随起义军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的旗号夺占广东地盘。张发奎觉得有利可图，便采纳了这个建议。正是叶剑英的这个建议，为南昌起义部队迅速撤离南昌，赢得了宝贵时间。但是起义军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被迫全部撤离南昌城，孤立南下。

8 月 3 日至 6 日，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起义前的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今寻乌）进入广东省，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先攻占东江地区，占领出海口，争取国际援助，尔后再重新举行北伐。起义军退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一边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动众，这就为起义军之后的失利埋下了隐患。在向广东进军途中，由于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加之天气炎热，南下路途遥远，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当起义部队行进至进贤县时，起义军左翼总指挥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8 月 7 日起义军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 1.3 万人。起义军在临川休息 3 天，继续南进。

8 月 25 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 9 000 余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又调黄绍竑部 9 000 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并于 26 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起义军又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部队，激战至 30 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 6 000 余人，缴获枪 2 500 余支。起义军伤亡近 2 000 人。9 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 月 22 日，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前委决定由朱德率部留守阻敌，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率领起义军主力部队继续南下广东。23 日起义军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 8 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二十五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 3 个师 1.5 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即令第二十军新建第三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起义军集中主力 6 500 余人迎击东进之敌。

9 月 28 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附近地区同东进之敌遭遇。将敌击溃后，起义军继续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少数部队留守潮安、汕头。此时，薛岳率部协同陈济棠所部在汤坑汾水村试图阻击起义军。两军相遇，双方再次展开激战。起义部队奋勇作战，至 30 日，将薛岳部四个团击溃，并迅速包围了薛岳的师指挥部，眼看就要全歼薛岳部队。千钧一发之际，起义军中一名营长欧震叛变，率部在阵前倒戈，致使汤坑之战起义军失利，起义军伤亡 2 000 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

10 月 3 日，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董朗率领下，于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安、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并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对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简单总结，大家正在表态时，哨兵发现敌人，于是会议草草结束，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 3 人搭上一条小船，艰难地漂到了香港，他们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起义军余



部 1 300 余人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驻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 月 5 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安、汕头撤出的第三师一部会合。10 月中旬，朱德、陈毅率起义军约 800 人，从福建武平退入赣南到达安远天心圩。当时，起义部队思想混乱，离队的越来越多，形势异常严峻。于是，朱德在天心圩召集军人大会，他镇定地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天心圩整顿，对稳定起义部队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 1928 年 4 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1933 年 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6 月 30 日的建议，决定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 月 1 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值得一提的是，从南昌起义部队中走出了一大批后来的重要人民解放军将帅。在 1955 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中，有八位元帅、四位大将都与南昌起义密切相关，这还不算未被授予军衔的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其中，在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在南昌亲自指挥起义作战的就有三位：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指挥部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8 月 2 日拂晓从马回岭赶回南昌的有两位：前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8 月 10 日，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陈毅，从九江赶上了起义部队。起义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的还有两位———叶剑英和徐向前。起义前，徐向前没能和党组织联系上；起义爆发后，徐向前悄悄离开九江，寻找党组织去了。从南昌起义中走出的 4 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和张云逸。他们不但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传播革命的火种，而且也是这支起义部队以至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基础。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南昌起义虽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发动的武装起义，但却是以武装力量坚持革命的尝试。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正式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重要性在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南昌起义明确了中国工人阶级应独立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在工农群众中广泛的宣传了武装革命、特别是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的道理，而且经过了起义的锻炼，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及运动战的经验。南昌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经过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斗争过程中逐步解决的。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历史意义重大，但同时，这次起义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那就是起义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就地发动群众，与群众结合，取得群众的支持，开展土地革命。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经转到反革命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重新进行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的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革命战争。1927 年 10 月 24 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中，在谈到叶挺、贺龙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时指出，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所谓暴动，变成单纯的军事行动。后来，周恩来在评价南昌起义的时候也提到：“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①]这样就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此前，中国共产党只有过参加北伐战争，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的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在共产国际运动史上，也不曾有过先夺取农村的先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对于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当时共产党虽然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发动了武装暴动，但是，还不懂得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下，如何正确的开展武装斗争，这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和积累。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73 页。



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南昌起义在实践上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正式确立是在八七会议上。这个方针并不是八七会议首先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批判中国党内有人担心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会削弱反帝统一战线的观点。斯大林也说过：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中国共产党应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因此党的五大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推进到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但陈独秀拒绝执行。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确定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督促和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共产国际号召中国共产党要采取种种办法，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并立即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制定新的政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实现中国革命策略转变，共产国际决定派罗米那兹前往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驻中国代表的工作。1927年7月23日，罗米那兹到达汉口。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助手，25岁的德国人诺伊曼。

1927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原总书记陈独秀辞职躲进秘密寓所，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已到南昌组织暴动，已转入地下的中央机关由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主持。面对国民党开始“清共”屠杀，此前习惯于国共合作的一些

共产党组织和党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为统一全党思想，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确定新方针。刚刚在西北被冯玉祥部“礼送出境”的邓小平，此时回到武汉中央秘密机关，马上被留下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呆了六天，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的会址选在苏联已交还中国的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41号这幢银灰色西式小楼，是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机关，国际代表也住在这里。此刻能联系到的党中央委员和各地代表都得到通知，根据邓小平的布置，武汉代表自己在天黑后单独前往，外地来的代表则找到联络站，再由交通员隔段时间带一人进入小楼。会期原定于7月28日，因代表多来不及赶到，推迟到8月3日。届时来的人仍不多，只好再推。主持者又要求进屋的人散会前不得出去，以防备有人变节告密。刚成立的中央特科组织队员化装成摊贩在街上监视动静，室内也时刻做好接到警报便从后门转移的准备。到了8月7日，实在不能再等了，会议正式开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记录由国际代表带走，因此躲过了白色恐怖洗劫在莫斯科留存下来，1957年送回北京。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三项议程：一、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二、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三、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他阐述了召开紧急会议的必要性以及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及在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中放弃领导权的错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同时又不适当地认为共产党人现在仍不应退出国民党。接着罗米纳兹又就会前和瞿秋白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要求坚决纠正共产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

随后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主题报告。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强调当前党的任务是要独立地领导工农革命，发动农民暴动，创造革命军队。报告还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汪精卫派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赞成我们的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总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追认批准了7月29日已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会议决定撤销陈独秀党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成。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莫斯科新的指令中称，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是因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为此，苏兆征、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出身者当选政治局委员。而历史证明，向忠发、顾顺章二人品质不好且不具备领导才干。这种只讲出身，盲目强调工人当领导的“唯成分论”在党内兴起后，长期为害不浅。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湘赣边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鉴于秘密工作将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形式，议决案提出：现时组织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

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同时注意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八七会议后，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农民部拟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根据罗米那兹的意见，决定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一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基本方针。按照中共中央 1927 年 7 月 20 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指出：“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①]与此同时，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帮助下，把土地革命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确定了党的武装暴动的总政策。罗米纳兹批评了陈独秀等人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认为在大革命后期，如果能坚持党的独立性、正确领导农民运动的话，就不会遭受大革命的失败。在他的帮助下，会议在《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规定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把这些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佃户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②]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八七会议对武装斗争高度重视，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会议总结了大革命中共产党不注重掌握武装的教训：一直以来党的指导机关只是和国民党将领办外交，“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③]罗米纳兹重申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张，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



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正是由于对共产党过去在武装问题上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才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方针。八七会议肯定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需要靠土地革命来支援武装斗争的策略。会议明确提出：共产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工人运动应准备响应农民暴动，并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共产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重大飞跃。

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不仅指出，正确处理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关系，是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北伐战争中十分突出而重要的问题；同时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是没有能够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只着重于民众运动，不争取和掌握军队，使革命的民众运动没有保障，革命的武装必须与广大的民众相结合，要使武装成为民众的武装，民众成为武装的民众，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第一，国民党问题。毛泽东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作主人而是去做客人的错误。正是陈独秀没有当主人的决心，到了大革命后期，他拱手把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奉送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从而葬送了大革命。第二，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视而不见，且还处处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打击他们，不准他们革命，也不准基层党组织革命。第三，军事问题。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和根本的道路。毛泽东批评陈独秀不懂枪杆子的重要性，“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

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非常注意军事，“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④]这句话后来发展成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后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以上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垮台了。”[⑤]毛泽东以上论断是对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特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失误的概括，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第四，组织问题。毛泽东批评陈独秀在党内推行家长制统治，完全不倾听广大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甚至连其他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也不虚心听取。他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的发言，主要论述是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导方针，这个发言实际上成为八七会议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八七会议是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展、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从而表明共产党不仅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合，这就给全党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方向。在革命的形势下中共中央采取暴动是正确的。只有这一政策，才能将共产党从危亡的情势下挽救出来，保存并发展革命力量，才能使工农革命群众有新的出路。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从崩坏状态中脱离出来，此后一切革命活动均是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主线展开。从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转变到同他们公开决裂；从执行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转变为坚决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从忽视武装斗争，转变为发动工农群众，确定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用暴动政策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从忽视农民土地问题，转变到把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中心问题。

但是，八七会议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纳兹“左”倾错误观点与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



端民主化状态。”[⑥]在对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根据各地区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来组织正确的反攻和组织有计划有阵地的策略上必要的退却，以保存革命阵地，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助长了盲目发动城市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因为瞿秋白反对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八七会议选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但他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这是他后来盲动错误的根源。会议还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功绩和不足，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切的联系。

注释:

①②③④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第 39 页，第 34 页，第 58 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44 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59 ~ 960 页。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便决定首先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这些有雄厚农民运动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其内容是：抗租抗税、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而在这些边界地区能够发起革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边界地区比较贫穷，人多地少，受各阶级剥削严重，在这里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军阀间的斗争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利于发展革命的力量。自此，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带领革命力量初步开始转移了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转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便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促进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方针的进一步完善。

1927 年 7 月中旬，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断然作出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武装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临时中央于 7 月 20 日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聚集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通告着重强调了武装的重要性，"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须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①]特别是在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到处屠杀农民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武装是现阶段农民运动的"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通告》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种种办法，并提出如果存在不下去就上山的设想。1927 年 8 月 3 日临时中央印发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进一步指出在四省实施秋收暴动的必要性，规定了暴动的战略，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且要求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八七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做出了实施秋收起义的决定："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



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而实施这一任务，必须“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来武装农民。”[②]毛泽东向党中央写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秋收暴动应打起共产党自己的旗帜。在八七会议讨论到秋收起义打什么旗帜的问题时，毛泽东就曾指出：“国民党的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在秋收起义中要鲜明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了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③]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回到湖南，肩负三项任务：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湖南秋收暴动。8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彭公达任书记。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上述各县工农起义，并在长沙工人起义接应下，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夺取长沙。会议决定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的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包括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新兵组建的），属军阀张发奎部下，它一开始就在我党秘密领导之下，团主要领导人都系中共党员，其部队成分多为党组织秘密输送的中共党、团骨干，农运积极分子，对党忠实可靠，是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工农义勇队，还有一部分是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自卫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 000人。由于当时参加起义的三支部队随时都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追剿”的危险，于是派员赴南昌请示中共江西省委，省委派干部仝仁赶到修水和铜鼓，组织协调部队整编。8月22日，三支部队负责人在修水山口举行了整编会议，史称“山口会议”。会议决定，三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设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滞留在鄂南一带原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四团。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群众支持起义军。同时，将原警卫团改编为师属第一团，团长由钟文璋兼任。将驻安源的几支武装队伍编为第二团，团长王兴亚。将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师属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将平江工农义勇队分补一、三团。并成立了以师团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师委会。为加强基层领导，将原警卫团五连

（干部连）解散，分到各连队担任连排长和政工职务。为加强第三团，又调一团伍中豪营长及其部属一部充实第三团。整编后，为缓和与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便于筹措军需，对外暂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并假造花名册，派宛希先去朱培德处联系，同时又派吴会治去湖北向党中央报告，并请求指示。部队就地休整，积极准备执行上级新指示。“山口会议”的整编，形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雏形。余洒度根据师委会决定，命令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抓紧时间设计工农革命军军旗样式。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终于设计出了军旗样式：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嵌交叉的镰刀斧头，表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旗幅的白布条上竖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8 月 30 日，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来到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与会者有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工农义勇队党代表潘心源，中共安源市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兼安源农民自卫队队长王兴亚等人。会议成立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暴动领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并指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领导秋收起义，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会议确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举行暴动。潘心源详细报告了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果断决定以驻修水、铜鼓的这个师为基础，分三路向长沙进军。第一路，以安源工人矿井队为主力，夺取矿警武装，然后进攻萍乡、醴陵，向长沙进军；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形成包围长沙之势。此后，便分头到各部开展工作，毛泽东到铜鼓，指挥第三路行动。

毛泽东在安源的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后，便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护送，直奔铜鼓县城。然而，就在他们由浏阳进入江西铜鼓，到达边界的一个小山村时，被一伙团防队员抓住并扣留。当然，敌人将他们只作为一般嫌疑分子押往铜鼓县城。当走到铜鼓一个叫排埠的小山村时，毛泽东急中生智，从衣袋里拿出四块银元塞给他身边的团防队员。那团防队员见到毛泽东手中的银元，就用眼睛示意毛泽东可以往旁边的山上跑。毛泽东明白了那团



丁的意图，便拔腿往山上跑去。一直见毛泽东已跑进树林子了，那团丁才和其他两人追了上去。毛泽东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多的草，一直躲到日落。毛泽东没有到过铜鼓，不知道到县城的路，只得慢慢走下山。这时，遇到一个打柴回家的农民告诉毛泽东：这就是铜鼓的地界了，叫月形湾。随后就带着毛泽东到了山脚的吴家祠堂，给他买了一双草鞋，并安排他的住宿和晚饭。第二天，送毛泽东到了铜鼓县城。直到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才派人找当地地下党打听到这个打柴人的名字叫陈帷德。陈帷德后来参加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一封信，称其为“救命恩人”。

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毛泽东曾作《西江月·秋收暴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秋收起义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9日清晨，驻修水县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官兵，全副武装来到县城紫花墩操场集合。接着，甘特吾率领配合军事行动的20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押着八个五花大绑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首恶分子来到操场。随后，修水县党组织负责人樊策安率领农会、工会负责人以及数千群众簇拥着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的招牌，敲锣打鼓进入了会场。队伍集合完毕之后，余洒度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庄严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誓师起义。宣布起义的口号是：“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接着，举行了授旗仪式。余洒度将工农革命军军旗，庄重地授予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余洒度带领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四团在修水吹响了革命的号角，高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旗，第二团、第三团在安源、铜鼓亦打响了暴动的枪声。三支起义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10日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汇合，攻克了敌盘踞的朱陂厂，在渣津河滩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在进攻长寿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三团从铜鼓出发攻克浏阳白沙、东门。虽然起义军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是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加上群众

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一团在平江长寿街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打击。14 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毛泽东果断地率领部队避开敌人主力，于 15 日回师铜鼓排埠，等候一团前来会师。15 日晚，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

9 月 19 日，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苏先骏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第一次聚集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商讨起义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会上，毛泽东通报了第一、三团的情况，又得知第二团几乎全军覆没，只剩几十号人不知去向的情报，提议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退往湘南。文家市会师制定与实施的转兵决策，把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相结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端。共产党从此把工作重心由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20 日拂晓，起义军将士 1 500 余人，来到里仁学校操场集合。毛泽东向全体官兵宣布了前敌委员会改变起义军行动方向的决定。军号声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卢德铭的率领下，高举军旗，向湘南转移。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部队中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工农革命军于 24 日傍晚抵达芦溪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启程朝莲花进发。因担任后卫的第三团走错了路，待听到号声调转行军方向时，遭遇从萍乡赶来的江西军阀朱培德所属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追击。芦溪一战使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人枪 300 多。总指挥卢德铭在阻击敌人掩护我军撤离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此时，起义军缺乏弹药，没有给养，指战员伤病残增多，军中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

9 月 29 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着重解决了有关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整顿部队，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二是确定落脚点，建立根据地。起义以来的 20 天时间里，部队从 5 000 多人锐减到不足 1 000 人。鉴于部队人员锐减，原有编制有名无实，前委决定对保留下来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



代表制度，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使工农革命军面貌焕然一新，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立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的途中，逐步确定以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立足点。10月初到达茅坪，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茨坪，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插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进攻长沙，现在看来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得到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援，并且战术上实行分兵，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结果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各个击破，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秋收起义开始时虽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遭遇挫折后，毛泽东适时主张放弃攻打长沙，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在敌人控制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正确的判断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敌我力量的分布，以及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我们不应留恋大城市、交通要道，而是应该及时退却。由于情况的变化，共产党方面不再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国民党反动派拥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而应该退到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利用井冈山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位置，去当红色武装的“山大王”，与群众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政策好，纪律好，群众就会拥护我们，那时，我们一呼，群众就会响应。这个思路可以看成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萌芽，当时称就地革命、就地退却。这是有计划的，积极地包含另一阶段的进攻在内的战略退却，是为了开始准备另一阶段的进攻。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把起义队伍带到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在攻占大城市遭到挫折后，初步把武装斗争的方向从进攻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完善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这是中国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南昌起义在实践上开始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八七会议在政策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武装斗争的形式虽然明确，但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在哪里，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新课题。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

薄弱的农村进军，开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使贯彻总方针中的实践内容最终得以完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共产党在革命紧急关头，使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的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势力，是共产党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起点。武装斗争找到了主攻方向，八七会议确立的总方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84～187 页，第 225 页。

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00 页。



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为打击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9月中旬，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乘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第八路军在广东省东江地区进攻南昌起义军之际，从南昌进至广州，同桂系军阀李济琛争夺广东地盘。张发奎初到广州时，为稳定其统治，曾一度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企图获得广州工人阶级和市民的支持。中共广东省委适时地识破和揭露了张发奎的欺骗政策，并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农会并进行各种斗争，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在广州市，有组织的工人纷纷驱逐国民党派到工会的改组委员，选举自己的工会委员，并为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斗争。10月14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两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在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所恢复与发展。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广东东江等地区农民，在9月发动了秋收抗租暴动。10月7日至17日，中共海陆丰县委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民赤卫军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一度占领县城。10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由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

余部编成）和海丰、陆丰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两县全境，并建立了两县的苏维埃政府。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省东江地区，准备再行北伐。八七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方针。8 月 20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准备在广州市和广东省各地发动工人、农民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各地区党组织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10 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得知叶贺军队失败后，写信给广东省委，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分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①]这可以说是酝酿广州暴动的第一阶段。11 月以后，“左”倾思想在中共中央中有了发展。11 月中旬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当时的形势是：“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工农民众的斗争，“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内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②]

属于粤系的军阀张发奎在广州站稳脚跟后，于 11 月 17 日用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李济琛驻广州的机关、部队，向西江、北江扩展，夺取了广东政权。李济琛为了夺回在广东失去的地盘，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反扑。李济琛所属之黄绍竑部集结在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准备从西面进攻广州；陈铭枢部则由东江地区向广州推进。张发奎亦急忙将其第四军主力调往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一部调往广州以东之石龙地区。李福林第五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此时，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样，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四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二师第三团、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广州市内兵力空虚。另外，第五军军部和少数部队驻守在珠江南岸。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仅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但是，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尚未大规模爆发，张发奎的部队仍驻守在广州外围，这无疑将对起义构成严重的



威胁。

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③]11 月 25 日，广东省委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要“利用两派军阀互相厮杀，内部互解（原文如此）之时，应扩大各地工农暴动，以联合各地零碎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并“使各方都与广州中心联合”。[④]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11 月 26 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广州政权。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七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四军教导团系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叶剑英曾兼任团长。为保护和发展这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叶剑英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团共 1 000 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12 月 5 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说：“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6 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 12 月 12 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前夕，当时驻留广州的教导团等革命力量已引起敌人的怀疑，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如不迅速采取行动革命力量就有被解散或消灭的危险，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 11 日凌晨举行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 3 时，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

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共5 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 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一个步兵团打垮，俘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三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两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除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四军第十二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 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有关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爆发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这与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形势估计错误，和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起义发动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四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钟寺第五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第七十八团，驻东江地区的第二十五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一师第一、第二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1日起义当晚，叶挺即提出乘粤军主力没回到广州前，把部队撤出广州。可这个建议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他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12日，张发奎所部三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的优势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



州，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 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领导人有董朗、叶庸、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 000余人。

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一次英勇反击。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以工人和军队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尝试，表现了共产党人不屈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勇敢地坚持革命，决不放弃的精神，起义冲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营垒，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创建新型人民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建立的一个完全新型的革命政权，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消灭反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有化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了革命人民愿望的革命政纲。广州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为后来新型的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广州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举行的工农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起，联合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但是，经过国民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的转变，到广州起义时已经出现了工农红军。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英勇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也在艰辛地探索着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都是在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当时的秋收起义还没有见最后分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没有完全形成。广州起义的局部性胜利和最后失败，为中国革命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广州后，共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5 700多人。许多走避不及和不愿离开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被逮捕、严刑拷打、枪杀、活埋。实践

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夺取中心城市作为革命目标结果只能导致失败。

注释：

①③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3页，第22页，第29～30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38页。



全国各地武装斗争的相继爆发

八七会议后，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起义，琼崖起义等等。这表明武装反抗是符合广大人民要求的，革命的力量是反革命军事镇压不了的。这些起义一部分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或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很快失败，但仍有一部分坚持下来，主要位于数省边界，距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山区。起义部队在农村中灵活机动的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在湖北，武装起义先后在沔阳（今仙桃市）、公安、蒲圻（今赤壁市）、咸宁、枣阳、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7年11月由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麻城等地区领导的起义。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曹学楷任政府主席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随后，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起义军委保存革命里来那个，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广东，先后爆发了海陆丰及琼崖地区（今属海南省）的武装起义。从1927年9月到10月底，海丰、陆丰及附近地区爆发两次武装起义。10月底开始的起义，是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在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的，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东江特委书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11月中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区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彭湃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推翻旧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形成了包括海丰、陆丰全县和惠阳、紫金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琼崖地区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共琼崖

特委书记杨善集及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下，从 1927 年 9 月开始在定安、琼山、万宁、陵水、乐会（今属琼海县）、文昌、琼东、儋县、临高等地先后发动的。起义后，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1928 年 2 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8 月中旬，成立以王文明为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区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在江西，先后爆发了吉安县东固及万安、泰和、永丰等县的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赖经邦等在东固秘密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军，并在中共赣西特委指导下，于 1927 年 11 月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东龙区委，扩大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以东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 2 0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15 万。从 1928 年 9 月到 1929 年初，分别成立以李文林、段月泉为团长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从而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万安武装起义是 1927 年 11 月在曾天宇、张世熙领导下举行的，起义农民曾四次攻打县城，于 1928 年 1 月 8 日占领县城。第二天成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但是起义在反动派的疯狂反攻下宣告失败，曾天宇牺牲，部分起义军转入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

八七会议后，除了湖北、广东、江西等省以外，其他省市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陕北清涧起义，1927 年 10 月由唐澍、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直隶玉田起义，1927 年 10 月下旬由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领导；确山刘店山起义，1927 年 11 月 1 日由中共豫南特委驻马店办事处负责人李明岐、马尚德（杨靖宇）等领导。

从 1927 年 11 月到 1928 年夏，这半年时间里，共产党在湘南、湘西福建等地又领导了多次起义。1928 年 1 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起义。之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同时先后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和横峰县委。1928 年 5 月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弋阳县召开，成立了弋阳苏维埃政府，随后横峰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由于之后遭到优势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起义军转战到弋阳、横峰北部的丁山（磨盘山）地区坚持斗争。

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他们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从粤北转战湘南，在湘南特委和当地农民军配合下，打败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队，攻占宜章。之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均在武装



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起义军占领湘南十多个县后，广泛发动当地工农群众力量，建立革命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工农革命军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但是由于湖南省委、湖南特委执行错误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在3、4月间，湖南、广东两省国民党军队联合向起义军发起反攻，起义部队被迫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

1928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周逸群、贺龙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游击战争。途经洪湖将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领导的洪湖农民起义三支游击队共500余人集中，组成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造成了洪湖地区的革命局面。随后，周逸群、贺龙到湘鄂边，利用贺龙旧部，于1928年3月在桑植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占领桑植县城，建立革命政权，成立中共桑植县委。4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桑植县城，周逸群转战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等地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

1928年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人领导当地农民发动起义后，撤离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3月至6月期间，闽西党组织发动多次农民起义，包括中共龙岩、永定等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先后在龙岩和后田，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和上杭的蛟洋等地领导起义。随后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以及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这些斗争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4月底，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军队由潼关开往华县。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的直接组织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起义。6月，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1928年7月22日，在共产党员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下，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贺国中也先后率部参加起义。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起义。7月24日，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任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7月30日，起义军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湘鄂赣边。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界发展，并寻机与毛泽东等率领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部队联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部留在平江、浏阳一

带坚持游击战争。

1927 年下半年至 1928 年上半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湖南醴陵农民起义，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县、南康、信丰、寻乌、兴国等地领导的农民起义，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在南通、海门、如皋、靖江、泰兴等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等等。这些起义大部分没有取得成功，只有少数起义，由于客观条件具备，领导者比较善于抓住有利战机，做出正确决断最终取得预期效果。而失败的原因大多因为事前没做好充分准备，没有依靠当地群众力量，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主观上决策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一味地进攻，最后遭到挫折。

这一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多是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革命高潮理论指导下组织发起的，虽然这一阶段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但是并不意味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从全局来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力量还很薄弱，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相比较还处于劣势，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但是经过这些起义，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转战到那些国民党势力薄弱，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农村去，才能保留革命的力量，以待日后发起反击。各地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力量，就地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左”倾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八七会议正式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这对于回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坚持革命斗争，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八七会议没能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组织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相反，却把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作为基本工作。在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中，都是通过城市暴动为起点来推进革命的。南昌起义是从城市开始的。秋收起义本来是以农民为主、结合农村秋收发动的，但是，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却认为“长沙暴动是秋收暴动的起点”，要求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中央仍要求省委“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等等。广州起义则是典型的按照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以工人和士兵为主的城市武装起义。中央十分重视这次起义，“深信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广州暴动的胜利预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之胜利。”①

当时的中共中央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反而错误的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革命一发动，全国就胜利，单纯依靠工农就能打下天下。这样，党内“左”倾情绪逐渐滋长起来。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一味的要求各地发起武装起义，过早的把革命力量暴露在反动势力面前，在反动势力远远超过革命力量的形势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到1927年底，“左”倾盲动错误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城市暴动推向了高峰。

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使共产党人能够在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参加长驱直入、攻打大城市的北伐战争，并在上海发动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即使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依照俄国十月革命宣传——组织——暴动三个阶段发展的理论来进行。根据这种理论，共产党在当时的主要方针是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待时机成

熟，再举行武装起义。由此，党只注重于群众运动，而忽视对军权的争取，结果，国民党一反动，大革命就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党虽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开始独立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如何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上，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摆脱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仍然在党中央处于支配地位。主要表现在：在新形势下，主张以城市武装暴动为总暴动的起点，城市工人暴动是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没有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发动农民，以农村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等等。

1927 年 10 月下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爆发了宁汉战争。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宣言中提到，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应当会和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11 月 1 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大的暴动政策》。通告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涨中。当时的中央并没有考虑到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区别哪些地方有条件发动武装起义，哪些地方只能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革命意愿，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国民党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以震动全国。并且声言：如果认为不可轻举盲动，想多保存党的力量，“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发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②]通告认为，在全国混战的局面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及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观上由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通告指出，共产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士兵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只有各地努力发动群众，方能会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这时的中央领导人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全国起义，就能像十月革命那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共产党内出现的这种“左”倾领导情绪，是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密不可分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到达中国后，积极宣扬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



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影响很大。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当做了革命对象。罗米纳兹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就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认为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倒向反革命营垒，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限。

1927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错误在一段时间内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在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共产党急需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武装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革命形势、性质和对象，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策略。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刚有了初步的结合，共产党不知道走自己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走上了"左"倾盲动的革命道路。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会议一方面正确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③]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会议接受罗米纳兹的"左"倾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正处于低潮期，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通知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目前的中国的现状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

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④]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提议，片面的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

这次扩大会议在肯定八七会议以来共产党在组织上的进步的同时，还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指出这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策源地。为此，议决案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绝大多数，要求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在一些共产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而反动势力拥有强大武力的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如无锡暴动、宜兴暴动等，使共产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大多很快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巨大的损失。

从 1927 年的 12 月份开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各地联合暴动难以实现，于是便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发起暴动，并停止了原计划发起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一定程度上的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损失，对“左”倾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此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从思想根源处认识到“左”倾错误，也就不可能纠正全局性的错误策略。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反动势力不可能建立长期稳定的统治，而革命群众也不可能放弃斗争。在反动势力远远超过革命力量的形势下，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进入低潮期，革命潮流并不是在一直高涨中。那么，为什么在革命形势进入低潮时，而共产党内却出现“左”



倾盲动错误呢？在当时斗争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能够积极坚持武装反抗是极其不容易的。但他们刚刚发起武装斗争，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愤怒使得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害怕受到批判，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独立领导革命的经验，容易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当做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革命者内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他们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判断，更不用说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盲动政策发起的武装暴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此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1928 年 2 月下旬，在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的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米纳兹所谓“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同年 4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在革命已经处于低潮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主要的中心城市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所控制。那些没有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地方，革命起义也比较难以组织和长期存在下去。而在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山区，特别是那些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曾经传播过革命火种的地方，仍有共产党人活动的余地。这是的活动不可能再采取北伐战争的那种形式，不可能是夺取中心城市和主要地区，一下子在全国造成革命声势。这时需要的是退却到农村地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火种。农民是有革命要求的，但是农民的力量比较分散，把他们组织发动起来进行革命并不容易。但只要时刻依靠当地的群众，执行正确的政策，革命力量在许多

地方时能够生存并逐步发展的。如果不坚决的走这条路，革命就会失败，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注释：

①《广州起义》资料选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8 页、第 210 页。

②③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41 页，第 446 页，第 373 页。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历史意义

总方针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继续斗争的目标。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是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斗争的结果，同时又是共产党在失败面前高举的一面鲜明的旗帜，不仅鼓舞全党和革命群众振作起来，继续斗争，而且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为全党树立起一面旗帜，用行动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不仅要坚持革命，而且还为全党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内容和主要形式，使革命有了可遵循的依据。

总方针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对象。大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国民党各派性质认识不清，把蒋介石看成中派，极力拉拢，企图使其向左转，把汪精卫看成左派，在其不断暴露反动面目情况下，仍然保持同其集团的联合，幻想通过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对反动派认识不清是我党在大革命中惨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党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八七会议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定，给全党树立起斗争的目标和对象。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所指出那样："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在革命危急关头，在全党面前确定革命的对象，号召全党和革命群众向敌人进行顽强反抗，应该是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革命能够坚持下去的前提。

历史证明，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在国内实行了一整套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总方针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恰恰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客观要

求。总方针打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共产党开始把武装斗争、把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作为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主要组织形式，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中国革命正是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取得完全胜利的。总方针还把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武装斗争有了全新的内容，有了不可缺少的力量之源，土地革命有了武装斗争的可靠保障。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成为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主题，除了抗战时期外，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活动始终围绕此主题展开，形成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实现了中国革命阶段、内容和形式的转变。八七会议正式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由此，中国革命由大革命的失败发展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新阶段，开始了长期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时期。随着革命阶段的转变，革命内容及斗争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共产党成立后，虽然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人农民运动，开展减租、分田等斗争，但还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和核心内容。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面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确保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才能使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的政权得到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总方针的提出是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的重要转折点，这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又适应了斗争实际的需要。

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主要从事民众运动，在国共合作情况下帮助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八七会议正式做出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定，武装斗争成为共产党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

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起点，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从贯彻实行这个总方针开始的，在贯彻总方针的实践过程中，对总方针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革命道路



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贯彻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奋起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区、县级苏维埃政；创建工农革命军；开展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赣西、赣南、宁冈、永新等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形成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紧密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共产党将各地割据的局面向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局面发展，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武装起义、创建根据地及领导土地革命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条道路成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三大起义揭开了新形势下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但是如何继续革命？如何进行武装斗争？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是走新型革命道路的重要开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实践中得到全面展开。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山之前，湘赣边界人民就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赣西农民自卫军仍然战斗在湘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7 年 10 月 3 日，工农革命军从三湾来到江西宁冈县古城，当天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共 60 余人。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会议着重讨论和决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明确了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力量和土客籍群众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工农革命军中进一步贯彻三湾改编的精神。古城会议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会后，毛泽东于 10 月 6 日在宁冈大仓村和袁文才接触并建立联系后，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打游击。不久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一些党员军事干部到袁部帮助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10 月底，毛泽东会见王佐，部队进抵茨坪，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队伍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毛泽东“引兵井冈”决策的确立，创造了罗霄山脉中段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实现了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



移，使一再受挫的革命力量找到了正确发展的方向。工农革命军在酃县、遂川等地转战后，返回井冈山，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大陇一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以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是因为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建立过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由于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处，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因此毛泽东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坚决为建立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而奋斗。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大致分两个阶段：

初创阶段。1927 年 10 月到 1928 年 2 月间，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率领下到达井冈山地区以后，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的战争爆发，当地军阀部队纷纷北调，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国民党军以及驻防江西的国民党军朱培德部都忙于军阀混战，井冈山地区兵力空虚。革命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以宁冈为大本营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根据前委扩大会议的指示，革命军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地区就地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暴动，建立小块根据地，争取创立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政权。根据地的创建工作首先从建立工农政权着手。1927 年 11 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尽快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因为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只剩下一些避难散居的党员，而没有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开创革命根据地的。1927 年 11 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共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和县委，谭震林任主席，并组织了群众武装赤卫队。1928 年 1 月 4 日，工农革命军又一举攻占遂川县城，并分兵发动群众，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组织了县赤卫队。为了加强共产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经过三个月

的工作，边界党的组织逐步的健全起来了。到了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都建立了中共县委，发展了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县工农政府，并组织了群众武装赤卫队，有的县已经开始进行土地革命。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前委十分注重领导军事斗争，重视军队的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1927年底，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执行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以及游击作战方针。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毛泽东又总结了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前委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湘赣边界建立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这些地方武装不仅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而且是正规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部队此时共产党力量分布只是在零散的农村阵地，力量还很薄弱，区域还不连贯，远远构不成对国民党反动派占据的中心城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军队必须将武装斗争和做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在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一带，逐步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中心稳固在湘赣边界，成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有力威胁，同时达到了密切军民关系、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目的。这样，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1928年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



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1927 年冬到 1928 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1928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 11 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 12 月 31 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4 月 20 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4 月 24 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

发展阶段。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一万余人，在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接应下，陆续转战至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的队伍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而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师后，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领的部队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 月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三个师一个教导

大队。5 月 4 日，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庆典和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经全军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全军统一实行三湾改编提出的建军制度，执行“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的胜利会师，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条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政治、军事路线，将建军、建党和联合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革命的军队也将斗争、做群众工作和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结合起来。在这一时期，井冈山成了促进中国革命胜利的各项政策的试验基地，为成功的革命经验向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推广，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备他日发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反攻，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此，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武装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斗争一幕一幕展开。

这次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大革命时期战功卓著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参加这次会师的谭震林回忆：“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①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②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成功实践。对此，邓小平作了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结果。“上山”是中国革命遭到残酷的镇压，革命者面临斩尽杀绝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中国革命，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伟大尝试；“上山”突破了苏联“城市中心论”模式，使一再受挫的革命力量找到了正确发展的方向；“上山”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光辉起点。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聚集革命力量的主阵地。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统治期间，井冈山群众接纳了红军，使之生存、发展、壮大。井冈山聚集了



秋收起义、八一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分力量，聚集了湘南暴动的农军和平江起义的部队，聚集了万安暴动、醴陵暴动和萍西暴动的部分力量。众多革命力量聚集井冈，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丰富经验，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提出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关于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原则；关于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理论，这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党史资料通讯》1981 年第 21 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81 页。

三打永新城和四次反“进剿”

红四军成立后，由于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后，国民党曾以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再加上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这极大震慑了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急调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多次“进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坚决的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的局面，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聚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散兵力，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格局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在作战方面，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地指导作用。

江西国民党当局对井冈山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十分震惊，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第一次“进剿”。1928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在遂川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及万安、遂川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1 月 18 日，第二十七师以第八十团和第七十九团 1 个营由吉安进抵泰和，对万安起义军实施“进剿”。第七十九团另 1 个营经永新推进到宁冈县城新城会同宁冈靖卫团对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实施“进剿”。毛泽东得知第二十七师“进剿”情况后，于 2 月 4 日，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由遂川返回井冈山，进行反“进剿”准备。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鉴于新城为井冈山北大门，



国民党军控制该城后，对井冈山造成很大威胁，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新城国民党军。17日夜，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在毛泽东率领下分两路向新城奔袭。18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赤卫队配合下，第1团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新城守军发起突然攻击；第二团埋伏于城西门外上、下曲石村。经数小时激战，工农革命军突破东门后，守军全线动摇，纷纷从西门逃跑。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追出西门，与埋伏在上、下曲石村的第二团一起，将溃军全歼于西门外水田里，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此次反“进剿”，毛泽东运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率领工农革命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团1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敌约300人，击破了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这次胜利，从作战指导上说，在于周密准备，正确地把握战机，按照敌情、地形的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战法，并做到密切协同，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4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1928年4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开始行动。在部队到达遂川黄坳时，与调动中的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后卫遭遇。红四军前卫部队当即对敌发起猛烈冲击，敌军溃逃五斗江。朱德、王尔琢在查明敌军第八十一团向拿山调动的情况与企图后，决定放弃前出遂川的原定计划，由王尔琢率第二十八团立即向五斗江追击，先歼灭逃敌，再迂回拿山；朱德率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和第十二师直插拿山，配合第二十八团歼灭进至拿山的敌军第八十一团主力，尔后，直奔永新

城；袭占该城后，再与位于宁冈的第十一师主力第三十一团一起，合击敌军第七十九团主力于龙源口，打破敌之第二次“进剿”。在红军第二十八团追击到五斗江的当天晚上，溃敌已逃往拿山，与主力汇为一股。王尔琢考虑到逃敌与主力会合后，向五斗江反扑的可能性很大，遂命令部队在黎明前就地做好打敌反扑的战斗准备。翌日晨，敌军第八十一团果然进犯五斗江，当即遭到第二十八团的打击，一部被歼，大部由拿山向永新城方向败退。第二十八团追至拿山时，朱德也率部赶到拿山。为不失战机，朱德命令第二十八团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立即向永新城追击。由于红军行动神速，再歼敌第八十一团后卫一部，继而进攻永新城，将敌第七十九团第三营击溃，一举占领永新城，缴枪300支。此时，位于龙源口的敌第七十九团主力得悉上述战况后，慑于被歼，仓皇退向吉安。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还未部署完毕，就被红军打破了。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

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进剿”失败后，又于5月中旬，集中第二十七师及第七、第九师各1个团共5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指挥下，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红四军在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指挥下、运用“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主动撤出永新，第二十七师师部遂率第七十九团和第二十七团1个营进占该城，主力4个团南渡禾水，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1个营进抵永新西面小西江地区后，得悉进占永新的国民党军力量较弱，决定东进奔袭永新，首先消灭第二十七师师部，尔后协同在宁冈的部队击破国民党军的“进剿”。19日，红四军主力向永新奔袭途中，在草市坳与由永新城西进澧田的第七十九团遭遇，朱德当机立断，指挥红二十八团1个营从正面进攻，两个营从侧面攻击，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迂回其侧后，前后夹攻，经近两个小时激战，全歼第七十九团。接着，红四军主力出敌不



意，攻进永新城，再歼第二十七师师部和第二十七团1个营，击伤杨如轩。进犯龙源口地区的国民党军4个团闻讯仓皇向，安撤退。此次反“进剿”，红军战略对头、指挥果断，红四军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1个团另1个营，缴获山炮2门、追击炮7门、枪300余支（挺），取得第三次反“进剿”的胜利。

1928年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又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进剿”。1928年6月22日，进驻永新城的江西国民党军五个团在第九师师长杨池生指挥下，以2个团留守永新及其附近地区，以3个团分两路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分别经过新、老七溪岭合击宁冈，寻求红四军决战。湖南国民党军第八军第二师，也由平江调至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侧翼。据此，经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红四军撤出永新城，退至根据地中心区域宁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同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袭扰进犯永新之敌。由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在新、老七溪岭阻击国民党军，然后相继转入反攻，求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打破其“进剿”。由朱德率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1个营，在新七溪岭正面阻击江西敌军进入宁冈；由陈毅、王尔琢率第二十八团，经老七溪岭迂回敌后。

6月23日上午，红军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在新七溪岭击退国民党军左路一个团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则在迂回过程中在老七溪岭与敌遭遇，经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国民党军右路二个团发起多次攻击，直到下午才攻占了该制高点，随即乘胜向敌纵深追击，将敌一部歼灭，大部冲散，一举捣毁了敌设在白口的前方指挥部。转而向龙源口迂回，切断国民党军左路军的退路。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团等向左路国民党军1个团发起反击，将其击溃，并跟踪追至龙源口。随后，在第二十八团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将其全歼。接着，红军乘胜再占永新城。此次反进剿，红四军歼国民党军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近800支，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四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

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1]朱德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2]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击破了敌军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根据地区日益扩大。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为了统一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1928 年 5 月 20 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军队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扩大割据区域和采取波浪式推进等对敌斗争策略。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对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实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同时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解决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问题，克服地方主义等，加强了边界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4月至7月的各次胜利。

注释：

①《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②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击退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 1928 年 4 月间工作渐趋正常。5 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 5 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 6 月 16 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一、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二、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三、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 6 月 19 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6 月 26 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国民党统治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



力持异议。

1928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会后，毛泽东在 7 月 4 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龙源口战斗之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酝酿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联合“会剿”。1928 年 6 月底，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约定，于 7 月 7 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7 月 4 日，湘军第八军之第一、第二师提前出动，由茶陵、酃县进占宁冈砻市，接着进占新城并向永新进犯，红四军军委决定：以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地区相继打击由新城进占永新之敌；军部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威胁敌军后方，以调动进占永新之敌回援，然后集中力量打击即将来犯之赣敌。分两路迎击湘赣国民党军队，以打破敌人的“会剿”。7 月 13 日，红四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攻克酃县。14 日，进占永新的湘军果然撤回茶陵。红四军军委鉴于调动湘军回援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决定率部返回永新，会同第三十一团对“会剿”之

赣军作战。

这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的情况，不顾红四军军委、中共湘赣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决议，附和红军中部分宜章籍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鼓动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红四军军委对此也未能加以有力制止。1928 年 7 月 17 日，军部和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由酃县沔渡出发，开往湘南。在湘军撤回茶陵后，由吉安、安福地区来犯的赣军第三军 5 个团和第六军 6 个团于 7 月 15 日进占永新城。此时，毛泽东指挥第三十一团、永新赤卫队、暴动队，以四方游击的方式，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将敌军 11 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及其附近地区 15 公里内达 25 天之久。后来，赣军发现红军主力已去湘南，遂发起进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即从永新县城周围地区撤出，随后，赣军进占莲花、永冈。不久，赣军发生内讧，围攻井冈山根据地的第六军 6 个团仓皇退去，第三军 5 个团也退回永新城内。至此，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基本破产。

但是，冒进湘南的红军遭到较大损失，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摧残。冒进湘南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团，于 7 月 24 日进攻郴县，击溃国民党军第十六军 2 个团，黄昏遭其反扑，又被迫撤出郴县。此时，第二十九团官兵自由行动，跑回宜章家乡，军部遂率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余部百余人，向桂东转移。此次反"会剿"，湘南和湘赣边界两方面的失败，即"八月失败"，完全是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不察形势、分兵冒进的错误决策所致。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考虑到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并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难境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又难以对付国民党军新的进攻。决定由毛泽东率红军一部第三十一团去桂东迎还主力，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8 月 23 日，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在桂东与第二十八团会合，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返回井冈山根据地。

1928 年 8 月 30 日，湘赣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二次"会剿"。井冈山留守红军在群众支援下，凭险抵抗，打破敌人的"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1928 年 7 月 30 日晨，湘军第八军三个团由酃县出发，在赣军一部的策应下，向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发起进攻。黄洋界位于井冈山主峰北面，扼山险要道，为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 2 个连凭险据守，连续打退湘军多次猛烈进攻。下午，正当湘军重新组织进攻时，红军以仅有的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轰击其在源头的后续部队。湘军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山，害怕被歼，当夜撤回酃



县。赣军闻讯后，亦停止策应湘军的行动。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为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打破国民党军第二次“会剿”创造了条件。

8月23日，毛泽东率部在桂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并协力击退了湘军第三师的进攻。9月8日，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为恢复井冈山根据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仍然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对根据地威胁最大的进占宁冈、永新的第十四旅和进占遂川的独立第七师，并决定首先打击孤军冒进、战斗力较弱的独立第七师，以取得遂川，解决紧迫的经济困难问题。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9月13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10月1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

9月13日，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对遂川敌独立第七师的5个营发起突然而猛烈的进攻。敌军一部被歼，大部逃回赣州。9月24日，江西国民党军驻泰和之第二十一旅的1个团，配合败退的独立第七师反攻遂川。红四军避开敌之进攻锋芒，主动放弃遂川，撤回井冈山，准备打击已深入宁冈新城之敌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10月1日，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团在新城附近坳头陇一带设伏，消灭敌第二十七团出城活动的1个营后，立即进攻新城。敌二十七团弃城逃往永新。刚进入遂川的第二十一旅一个团也奉命出城增援。这样，遂川又只剩下战斗力较弱的独立第七师。红四军遂主动放弃新城，挥师南下，于10月13日向遂川发起进攻。敌独立第七师未敢交战，退回了赣州。这时，永新的第十四旅第二团却乘虚又进占宁冈新城。11月2日，驻泰和的敌军第二十一旅两个团和赣州独立第七师联合进犯遂川。红四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主动撤出遂川，转兵北上，并于11月9日对新城之敌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发起进攻，重创该敌于新和龙源口地区，次日进占永新城。敌军慌忙调第三十五旅一部向永新城反扑，红四军主动撤出永新城。至此，井冈山第二次反“会剿”胜利结束。

从9月上旬至1月上旬，红军利用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连打四仗，共俘国民党军营长以下约500人，缴枪450余支，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大部地区，扭转了“八月失败”的被动局面。这4仗是在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进行的，能取得重大胜利，主要是利用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利害不一致，行动不协调之弱点，集中兵力打击对我威胁最大的赣敌。同时，

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强击弱，牢牢抓住作战的主动权，忽南忽北，调动敌军，创造战机，各个击破，从而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120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1928年10月，为总结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的步云山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以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11月2日，特委和军委收到中共中央的6月4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信中肯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11月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管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①

注释：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一年多以来，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并且是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广。这都是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根据地的建立，在实践上解决了在大革命失败后，如何继续革命、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但是，必须看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开创性事业，认识不尽一致。当初对于把革命的主攻方向由中心城市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将队伍带上井冈山，共产党内非议颇多；跟随上井冈山的人，也有对红军能不能在山区站住脚持怀疑态度。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共产党内迫切需要对红色政权的存在问题，统一认识，坚定斗争方向。在贯彻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经过秋收起义以及井冈山的斗争，逐渐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革命道路，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1928 年 10 月 5 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它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1 月毛泽东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 1928 年 11 月 25 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即《井冈山的斗争》），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的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①]其内容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就当时的共产党来说，这是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广大农民的要求，只有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便是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和红军战争的胜利，便没有革命力量的壮大，就不能形成割据的局面，更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则是开展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战略阵地，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三者是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正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毛泽东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

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存在有两种产生红色政权的原因：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内部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若干小块区域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能够利用这种矛盾，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发生、存在和发展起来。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一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就是因为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解释的缘故。

第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之所以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于小块地区，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的。这样的政权能够首先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并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 1926 年和 1927 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总之，这些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与否，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能否长期存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②]武装，包括正式军队和地方武装两部分。地方武装赤卫队，只能对付地主武装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对付国民党的正规军，必须正式红军。因此，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是不能粉碎国民党正规军对根据地的反复"进剿"的，是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的。"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③]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就在于，有一支以南昌起义余部和前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编成的28团31团为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的建设，不断加强和完善军队的民主制度、政治教育制度、党代表制度等等，同时，不断总结战略战术，使红四军的战斗力不断提高并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复杂、艰苦、激烈的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这就要求：首先，共产党组织坚强有力；其次，政策要正确。毛泽东指出边界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④]。实践证明

这些政策是正确的。由于执行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因素，于是才有 1928 年 4 月至 7 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违背这些政策，就导致八月失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认识来源于实践。上述关于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原因的分析，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论。它的产生表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这个思想已经成为湘赣边界特委和军委的共识。在 1928 年 5 月和 10 月先后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 11 月 14 日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都把这一思想写进了决议案中。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的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井冈山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出于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做主的新政权。1928 年 1 月，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集中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井冈山地区带来崭新的面貌。广大劳动人民拥有了政治权利，土地革命使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生产积极性并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另外，通过革命政权实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同时支援了革命战争。

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缺乏必要的政权建设经验。八七会议后，共产党要求各地通过暴动建立的革命政权，都是苏维埃模式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毫无疑问也是同样的，这一模式的问题就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蒋介石集团并非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而是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表。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



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针对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要重视工农兵代表会。他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虽然普遍建立了，但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工农兵代表会。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同时封建时代独裁专断恶习的影响在群众中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不干净，因而也就不习惯新的民主制度。因此，要制定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加强代表会的建设。其次，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发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农民主政权思想，是对共产党正在探索中的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都为以后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1928 年6 月4 日，中共中央收到毛泽东5 月2 日信后于本日复函朱德、毛泽东并转前委诸同志，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割据的肯定和企望。从 1928 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

的文章。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广大革命者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可是井冈山这个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山区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对这个地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向南和向北也不易发展，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在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时，便逐渐清楚的暴露出来。

注释：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8 页，第 63 页，第 50 页，第 59 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41 页。



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平江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危机关头发动和领导的又一伟大壮举，沉重打击了当局的黑暗统治，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平江起义创建的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冲破敌人重重围堵，主力于1928年12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为人民军队创建发展增添了一支劲旅。平江起义部分部队由黄公略带领，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春，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建立了中共的秘密组织。4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由段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在第一团建立起了秘密党支部，彭德怀任书记。第一团党组织在士兵中建立起"秘密士兵会"，向广大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加强了士兵的团结。4月底，彭德怀曾召集当时在师随营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开会，决心创造条件，争取全师起义。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的成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6月中旬，独立第五师奉命由南（县）、华（容）、安（乡）开到平江接替闫仲儒旅"剿共"。平江处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具有革命斗争的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平江的工农运动就风起云涌，是全省有名的革命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临时政府和义勇军，与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彭德怀所率的第一团团部及第一、三营驻平江县城，第二营驻思村，第二团驻北乡，随营学校驻岳州。第一团到平江后，曾多次阻挡民团的残民行为。1928年7月17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受湖南省委的派遣，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达平江，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同独立第五师的一团副官、共产党员邓萍接上了关系，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关于准备在必要时举行起义的指示。7月中旬，敌人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营长黄公略

是共产党员，下令立即逮捕。18日中午，正在2营巡视的彭德怀得知华安特委机关被破获，黄公略以部队名义给共产党员开具的通行证落入敌手。彭德怀在返回县城时，又截获师长周磐发给副师长的密电，内容是立即逮捕共产党员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三人。在此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荣生、黄纯一、李灿、李力、李光等于18日晚7时开会，决定以闹饷为手段，在7月22日下午一点钟，乘敌午睡时举行起义。会上还作了如下的具体分工；滕代远负责政治工作及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工作，并负责筹组地方革命政府；邓萍负责有关起义的标语、口号、传单、布告的拟定和印刷等事宜，彭德怀则负责指挥消灭民团、清乡队、警察局等反动武装，控制县署，释放"犯人"，并解决师部等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派人通知驻嘉义镇的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嘱其以闹饷为借口，于22日上午同时起义；还派人到岳州给贺国中送信，要他立即将随营学校开来平江。7月20日晚，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再次召开会议，检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起义后立即打出镰刀斧头红旗，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实行党代表制。对于黄公略率第三团第三营于当日提前起义的突然情况，会议也进行了分析，认为该营属第三团的建制，不一定引起师部对一团的怀疑；同时，该营起义也可以起到扰乱第二、三团的作用；再者，改变第一团的起义计划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确定原定起义时间不变。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第一团在平江城举行起义，上午10时，彭德怀在团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之后，宣布实行士兵会章程，为工人农民服务。上午11时半，部队在城郊男子中学（原天岳书院）操场举行誓师大会。11时许，在盛暑烈日之下，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800勇士，全副武装，颈系红带，精神振奋，集合在平江县城东门外一营驻地——天岳书院操场上誓师起义。下午1时许，平江县城内军警官兵午睡正酣，800勇士越过浮桥，向县城发动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除了城内反动军警2 000多人的武装。李灿率领第一营向县政府、警察局、清乡队等处进击，活捉了伪县长、省清乡督察专员、警察局长、财政征收处主任等反动官吏。黄纯一率领第三营，缴了师特务连的械，副师长、师参谋长逃跑，训练处长躲入密室未被发现外，其余反动军官全部被俘。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整个县城。一举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五六百名政治犯，缴获步枪1 000余支、子弹100万发，活捉了作恶多端的县长刘作柱等反动分子



200多人。当日下午4时，第一团第二营从思村、安定桥一带驻地开回平江县城，参加了起义行列。23日，黄公略率第三团第三营前来会师，从嘉义行至距县城五里处的一个小镇休息时，黄只身到县城与彭德怀等商讨工作，不料该营在第九连连长的煽动下叛变南逃了。同一天，贺国中率领随营学校100多名师生从岳阳安全抵达平江城，与一团胜利会合。

7月24日上午，士兵委员会在团部召开联席会议，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共2 000余人，选出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邓萍任参谋长，滕代远为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下辖第一、四、七团，全军共2 500人。同时，建立了中共红五军委员会，邓萍为书记，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黄纯一、李灿、贺国中、李光、张荣生和贺夷等为委员。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为四团党代表，贺国中为7团党代表。同日上午，红五军军委与中共平江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行全县总暴动。还决定：以平江东乡的长寿街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部队整编后，第一、四、七团分别向平江的东、南、北三方发展，并与邻县邻省取得联系，建立湘鄂赣边界革命根据地，进而与红四军取得联系，以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24日下午，召开了有五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宣布红五军正式成立，宣布建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胡筠任主席，并处决了40余名反革命分子。29日，湖南省清乡督办署急调大军分数路进攻平江。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与国民党军激战终日。为保存革命力量，30日黄昏主动撤出平江，转战在湘赣边界地区。

平江起义成功地粉碎了平江的反动武装，沉重打击了湖南反动统治阶级，同时壮大了红军力量。起义后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平江起义的胜利，直接威胁着长沙、南昌、武汉等几个省城的反动统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如坐针毡，急忙调集重兵向起义部队围攻。面对十倍以上敌人的进攻，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与敌苦战一周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五军受挫，为保存实力，彭德怀遂决定挥师东进，向修水方向转移。于是，1928年7月底，起义部队撤出平江城，转战于平江、浏阳和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湖北的通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1928年8月6日，在王铁猛、樊万祥的引导下，万余武装农民配合红

五军从朱溪向修水县城出发。在马坳，彭德怀下达了攻城的作战命令，全军人马分三路合攻修城。一路由李灿带领，由擂鼓岭猛攻西门；一路由黄公略指挥，经西茗坑占领凤凰山制高点；一路由彭德怀、滕代远亲自率领直攻修城南门。红五军战士和暴动农民从西、南两地冲入城内，全歼敌一个正规营和修武铜靖卫大队计500余人，俘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红五军攻克修城后，协助修水县委加强了修水的党组织建设，成立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店员工人陈畴九任县苏主席，这是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建立的第二个县苏维埃政权，同时又是修水建立的首个县苏维埃政府。红五军首克修城，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立即调集力量组织湘鄂赣“三省会剿”。江西国民党政府派了20个团和2个宪兵营协同湖南国民党第二十三师朱耀华旅、第六师黄钟团、独立第五师第二训练处陈光中部第四、五、六团及第三十五军教导师驻浏阳之徐营和第五独立师第三团一、二营，分别从武宁、万载等方向共同“围剿”红五军。同时湖北方面也有国民党兵力从通城方向堵截红五军，国民党在通城、修水、铜鼓、平江等方面分别派驻重兵，实行层层包围，形成铁桶一般，妄图一举消灭红五军。

为保存有生力量，8月14日，红五军主动撤离修水县城，返回平江东乡，到达黄金洞一带，此时，部队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要求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并向浏阳、万载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与红四军会合。8月底，遵照湖南省委派一部向萍乡、安源与朱毛红军联络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带领部队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靠拢。国民党迅速调集陶广、王东原、朱耀华等部联合作战，前堵后追，红五军边打边走，沿着修铜边界盘旋游击。部队行至万载大桥时，由于叛徒出卖，遭敌朱耀华部伏击，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红五军为保存实力，被迫撤回纸坊、修水一带休整，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的计划未能成功。

红五军在避其强敌的同时，在游击中相机歼敌，在修水境内先后消灭了渣津、台庄、朱溪厂一带的敌人。9月底，红五军将山口、漫江等地的反动靖卫队全部消灭，并在渣津桂花桥头全歼国民党一个宪兵营。10月上中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转战修水台庄。1928年10月29日，由于在部分地区作战失利，部队减员较大急需要整顿，彭德怀、滕代远抓住红五军盘旋游击后难得的休整机会，在修水台庄大弯屋召开了湘鄂赣边区平、浏、修、铜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会议正式恢复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确定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等五人为特委常委，滕



代远任特委书记。

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工作，提出了反对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是当前党组织的一项紧迫的任务。会议强调，边区各县在党的领导下，应切实加快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施苏维埃政纲，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赤色革命武装，扩大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从平、浏、修、铜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编入红五军，以加强红五军的工农成分，壮大红军力量。会上“边特工作的方针，亦有相当的布置”，会议还指定了各县工作的中心区域，“如边特应以平、修、铜三县毗连的台庄为中心”等。台庄会议将红五军与平浏修铜赤卫队合编为红五军五个纵队，10 个大队和一个军直大队。由彭德怀、滕代远、李灿等率领四、五纵队，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向南突围，相机南下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其余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带领，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斗争。在一、二、三纵队的掩护下，四、五纵队“欲南先北”，迷惑敌人，顺利向南挺进。

台庄会议是红五军平江起义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恢复重建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确定了各县党的活动中心工作区和工作任务，对平江起义后的红五军适时地进行了整编，克服了部队中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密切了红五军和群众的联系。

11 月 14 日至 15 日，红四军召开第 6 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军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担任书记。11 月 20 日，红五军彭德怀部占领万载县城，补充给养，休整三天。红四军得知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的消息后，立即派何长工等组织了北路行动委员会，率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九都接应。12 月 11 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 700 多人，从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地区到达井冈山地区的宁冈新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14 日上午，两军在新城西门外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壮大了红军在湘赣边界的力量，为工农武装割据的进一步发展，坚持井冈山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红四军、红五军会师时，湘赣两省敌军再次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翌年 1 月下旬，井冈山失守。但革命者是杀不绝的，井冈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割据区域，逐步开创了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1930 年 2 月，二七联席会议召开，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从此，湘赣边界斗争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言："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①]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4 页。

柏露会议确定向赣南和闽西进军

红四、五军的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1928 年 11 月 7 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任副总指挥。1928 年 12 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会剿”总部在萍乡成立，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 1929 年 1 月 1 日纠集了六个旅十八个团三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同时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红四军不仅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经济十分困难，在此面临建军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 年 1 月 4 日至 7 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边界党、团特委及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县委、茶陵特别区委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六十多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面临国民党反动派大兵压境，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军事“会剿”的兵力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通过激烈的讨论和分析，会议决定在目前大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能单纯的消极防守，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攻势的防御”战略打击敌人。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

红五军主力和红三军第三十、三十二团（即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部）和莲花、遂川、酃县的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坚持斗争；茶陵、永新、宁冈三县赤卫队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突破敌人的包围，转到敌后，拖住敌人的尾巴盘旋作战。以解决根据地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以内线和外线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并在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时，袭击赣州或吉安。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以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

向赣南进军的意义，还在于赣南地区具有许多有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的条件。主要是：地域广大，有九连山、武夷山等作屏障；物产丰富，可以解决部队的给养；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方便，敌人调动兵力困难；敌人驻军力量较弱，战斗力不强；中共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东固、桥头小块红色割据区域，曾有七处（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信丰、于都、寻乌、兴国崇贤、安远）暴动，特别是有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在这里活动，可以互相支援与配合等等。柏露会议后，前委又先后在茨坪和下庄召开会议，讨论守山的具体问题，并对军队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整，加强了守山干部的力量，滕代远、宛希先加入特委常委；湖南省委特派员邓乾元为特委书记；红四军干部张子清任红五军参谋长，陈毅安任副参谋长；红四军28团党代表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和三十二团党代表；王佐升任三十二团团长。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 600多人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离开井冈山从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进军。红四军还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十大政纲》，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在国民党军尾追之下，红四军艰苦转战于赣南的遂川、上犹、崇义、信丰等十几个县。红四军出击赣南，调动了部分“会剿”敌军，减轻了井冈



山的军事压力，但是，红四军长途雪地行军，远离根据地，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群众的配合，消息闭塞，红四军处境非常困难。首战大庾失利后，再战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1929年2月10日到达瑞金大柏地地区，红四军激战近一昼夜，至11日下午，在这里毙伤尾追之敌刘士毅部二个团，俘800多人，缴枪800多支，取得了出击赣南以来第一个打胜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改变了红四军下山以来被动挨打局面，极大的鼓舞了红军官兵的士气。随后，红四军到达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李文林、段月泉等分别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得到物资给养补充。这期间，红军且战且退，十分艰苦，“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①

当红四军主力离山后，红五军和边界军民坚持与敌浴血奋战，但未能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26日，敌人开始向井冈山进攻。战斗一打响，湘敌就以猛烈的炮火向黄洋界和八面山进攻。守卫在黄洋界哨口的红五军第一大队、红四军三十二团一连和地方武装在李灿、徐彦刚的指挥下与敌鏖战三昼夜。最后，敌人买通一当地人带路，从侧后水沟爬上山，前后夹击，攻破黄洋界哨口。坐镇茨坪指挥的彭德怀立即带领身边仅有的一个排和一些轻伤员，力图收复哨口，未能成功。30日，桐木岭、八面山哨口先后失守。八面山哨口的工事全部被敌轰塌，只得用冰雪筑成防线守卫阵地，最后，100多名红军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接着，双马石、硃沙冲哨口失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彭德怀、滕代远根据特委、军委的决定：在军事方面五井如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经赣南与四军取联络。于是，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红五军600余人和地方武装1 000余人从井冈山的荆竹山开始突围，在遂川遭敌伏击，损失不小，五军仅300余人突出重围，原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展程被捕，被敌人杀害在遂川戴家铺。井冈山失守后，敌人对井冈山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提出了“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口号，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小井100多名重伤病员，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用机枪扫射惨杀在一块稻田里，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最小的才14岁。井冈山上的房屋全部被烧，五大哨口之内到处是断垣残壁，尸骨成堆，两千人口的地方，牺牲人数达千余。但是，井冈山军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就像彭德怀当时对官兵所说的：革命不要怕吃苦，不要怕牺牲。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举起红旗干到底。红五军离开井冈山后，留守在井冈山的军民在何长工、王佐、李灿等领导下，

转入深山坚持游击战争，不断袭击和骚扰敌人。当红四军到达东固时，得知红五军在边界失利，井冈山已被占领，原定“围魏救赵”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没能完全实现。针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反“会剿”宣告失败。

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湘赣边界特委遭到很大破坏，各县党的组织也不同程度受到损失。1929 年 2 月中旬，特委常委、巡视员宛希先在永新大湾召集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产生了以朱昌偕为书记的临时特委。此后，边界的各项工作逐步得到恢复。1929 年 2 月下旬，红四军主力离开赣南东固地区，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界进军。总的来说，闽西地区和赣南一样存在着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条件。闽西地处闽粤赣交界处，区域广大，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物产比较丰富，便于红军存在和发展；这里的反动军队，多系当地土著军阀，自成派系，矛盾重重，战斗力不强；闽西群众条件好，大革命失败后，多次爆发农民武装起义，有的已建立了游击根据地。3、4 月间，临时特委组建了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下辖两个营：第一营由王佐率领以大小五井为活动中心；第二营由李灿带领以九陇山为活动中心。独立团很快收复了井冈山大小五井山区，打败了茶陵、永新、酃县、宁冈四县反动武装对九陇山的进攻。

3 月中旬，红四军主力第一次进入福建省境内，游击到闽西长汀南部之四都，在这里适时地发起长岭寨战斗，一举歼灭了地方军阀势力郭凤鸣旅，乘胜攻占长汀城，并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之后，红四军即在长汀开展各项工作：没收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帮助工农成立工农会，成立长汀革命委员会，筹借军饷等等。总之，此战震慑了敌人，鼓舞了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1929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讨论了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和计划，并在会后将会议情况报告中共福建省委和党中央。关于全国范围内的一般计划，前委建议：“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前委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



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②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前委这时已开始把目光转向全国范围来审视红色割据的发展问题了；同时也表明，红军主力部队已决定不再返回井冈山，而要在赣南、闽西地区内创建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1929年4月1日，红四军按原定计划，离开长汀，返回赣南。当晚，毛泽东、朱德与率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在瑞金会合。在4日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根据国民党军阀蒋桂战争爆发、赣南广大地区基本上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有利形势，前委决定红五军返回井冈山地区，协同留在当地的红军恢复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在赣南的斗争相呼应。红四军主力三个纵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赣南地区分兵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和武装。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斗争和工作，红四军先后攻占了兴国和宁都县城，帮助兴国、雩都、宁都等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开辟的东固和桥头秘密苏区，已向兴国、宁都、瑞金、雩都之间的广大农村扩展。在赣西南各地暴动和小块红色割据的基础上，赣西南根据地辖30余县，辖区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江），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这样，赣南根据地开始初具规模。

4月，红四军由福建回师赣南，先后进占瑞金、雩都、宁都、兴国等县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初步打开了局面。中共福建省委报告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此次红军攻陷长汀，一战打死郭凤鸣，因此使闽西、闽南各小军阀恐慌到了极点。陈国辉、张贞、卢兴邦四出告急，声称会剿，实则不敢出兵。张贞参谋长应三山闻朱、毛没有来永定，他才收泪说：朱、毛已向东江发展，闽南荒废之区朱、毛不想来，我们不必十分害怕。至于闽西各县的豪绅地主，闻朱、毛到长汀，便四散搬家躲避，逃到漳、厦者甚多。”③

关于工农斗争与组织发展的情形，报告中说："长汀方面：在红军直接帮助之下，自不用说；上杭方面：北四区有二十余乡农民在党的领导及影响之下，起来肃清豪绅及反动派，成立红军。当红军出发截击反动驻军，有二千上下农民群众，执土枪参加，现在该区已先后成立乡苏维埃，实行分配土地，并由群众及红军发动别区农民群众斗争；永定方面：金丰农民群众于驻军走后，即与豪绅地主作武装斗争。溪南农众早就集中武装，恢复苏维埃的组织。龙岩方面：农众一闻朱、毛到汀，便摩拳擦掌准备武装斗争。又说：此次朱、毛红军来汀及各级党部的加紧工作，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工农会及党的发展甚快。长汀所成立许多农会，党亦有相当发展；上杭的农会恢复旧有组织外，还突增20余乡，致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武平方面，亦已由一区而发展至城区及西区；龙岩城市工作已比前进步，农会组织甚普遍，农民群众极愿效力农会，担任侦察及交通工作。"④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于2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写来的信，即"二月来信"。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在信中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以免惹敌人更多的注意。4月5日，红四军前委复信中央，指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前委还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造成闽西空虚的时机，决定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留在赣南，坚持斗争；红四军立即进入闽西，发展闽西的革命力量，创建闽西根据地。红四军主力部队进入闽西后，三打龙岩，攻占上杭，给闽西土著军阀和地主武装以严重打击，解放了闽西广大地区。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依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分析，确定了闽西有一个工农政权武装割据的前途。因此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其主要任务是：1. 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2. 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3. 实行土地革命；4. 建立苏维埃政权；5. 扩



大工农武装。而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⑤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之后，闽西掀起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的热潮，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1 月，罗炳辉率领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到 1930 年春，包括兴国、雩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邬、信丰、南康等闲的闽西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成等县的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 年 3 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任政府主席。据 1930 年 7 月 8 日—20 日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统计，当时闽西区辖上杭、龙岩、永定、连城、长汀、平和等六县苏维埃政权，并拥有龙岩、永定两座县城，共 130 余万人。后来又有所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从 1929 年初到 1930 年春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转战赣南、闽西广大地区，歼灭大量敌人；不仅壮大了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同时也积累了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进一步提高和加深了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促进中国革命高潮中作用的认识，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红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分别创建了赣南和闽西两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示范作用。

注释：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第 55 页，第 53 ~ 54 页。

③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3 页。

④《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 64 ~ 65 页。

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114 页。

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的发展。全国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到1930年3月，除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

湘赣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红五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进行井冈山保卫战。在优势敌人的四面包围下，红五军被迫突围，前往赣南与红四军会合。留在边界的工农武装力量在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等领导下，坚持与敌人斗争。5月，红五军重返湘赣边界，与地方革命武装一起开展武装割据。到1929年底，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泰和等县纷纷恢复和重建了革命政权。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成立，江西红军组成红六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在赣西革命根据地建立过程中，湘东各县革命斗争也有较大发展。击退国民党的第一、二次"围剿"之后，湘东和赣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0月，湘赣省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和以袁德生为主席的省苏维埃政府。至此湘赣根据地正式建立。

在湘鄂赣边界，1928年7月，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为湘鄂赣红军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打下了基础。10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两个纵队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余下的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苏区。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主力转往井冈山后，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部驻留在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到1929年四五月间，将割据区域扩大到浏阳、平江、铜鼓、修水、万载等县。8月，由湘赣边返回湘鄂赣苏区的彭德怀部红五军会合当地游击队黄公略部，共同开展边界的武装



斗争。到1930年的四五月间，红五军已发展到5 000余人，湘鄂赣根据地已经发展到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6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同鄂东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八军，何长工人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6月，彭德怀、滕代远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湖北大冶将红五军和红八军扩编成立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由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的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1931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袁德生任主席。

湘鄂西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贺龙、周逸群于1928年初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力量逐步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湘西各县的统一领导，决定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1928年7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为湘鄂西前委。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3月中共中央给他们写信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①6月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县、去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到1930年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并组成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全军团约一万人。随即，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逐步发展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它包括湘鄂边、洪湖、襄（阳）枣（阳）宜（城）、巴（东）兴（山）（秭）归四个地区。1930年9月，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位于武汉、沙市之间的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地理位置重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曾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6月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担任重建的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1929年2月，鄂西特委总结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运用灵活激动地游击战术，取得反

“清剿”的胜利，使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段德昌为师长的红军中央独立师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红六军成立后，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4月，建立管辖沔阳、潜江、监利、石首、华容、江陵六县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洪湖根据地。

此外，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和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建立起襄枣宜根据地和巴兴归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鄂豫皖根据地，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组成。1927年11月，鄂豫皖边区党组织领导人民举行了黄麻起义，建立鄂东军，成为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的先声。鄂东军于1928年初在黄陂县木兰山区改变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几个月后，开始创建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从1928年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第七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1928年10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组建鄂东特委，以王秀松为书记。10月，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向中央建议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建整个大别山区域的武装割据局面。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成立，徐朋人任书记。1929年5月初，鄂东特委派吴光浩等到商城南参与领导了商南起义。5月6日商南起义爆发。由起义武装组成的红三十二师打退反动武装的多次进攻，初步建立了豫东南根据地。

1929年秋，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准备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组织农民起义。11月8日，在六安县委领导下，舒传贤等在安徽六霍地区组织农民、士兵起义。1930年1月，成立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4月红三十三师在红三十二师的配合下，一度袭占英山，两次攻克霍山县城，初步建立皖西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鄂豫两省国民党军队发起对红三十一师和鄂豫边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红三十一师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打破敌人的“会剿”。接着，国民党军队又组织对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摧毁两个根据地。红三十一师和红三十二师紧密配合，接连粉碎敌人的两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929



年11月20日，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鄂豫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以徐朋人为书记的鄂豫边特委。12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以曹学楷为主席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和以徐向前为主席的鄂豫边军事委员会。至此，鄂豫边根据地形成。

这几次战斗，分别创立了红军，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1930年4月，三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2月和3月的指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并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6月，鄂豫皖边区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10月，由阳新地区北渡长江转战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这样，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这时，它拥有黄安、麻城等15个县苏维埃政权和游击根据地。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1927年底，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弋阳、横峰发动武装起义，在磨盘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临近各县发动起义，依靠群众物质，组成工农革命军，把物质斗争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结合起来，推动红色政权波浪式的向前发展，建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和赣东北根据地。1929年10月，在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召开第一届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8月，赣东北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信江苏维埃政府改为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这时，根据地拥有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乐平、万年、贵溪、余江、铅山、广丰、波阳、浮梁（景德镇）等十几个县，人口四十余万。1932年底，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

在广西西部，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龙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右江

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百色、恩隆、东兰、凤山、奉议、思林、果德、隆安、向都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同左江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 年 3 月下旬，在优势敌人进攻下，红八军遭到失败，左江革命根据地丧失。红八军余部转移至右江，与红七军会合编入红七军，合力经营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时，右江革命根据地拥有百色、东兰、凤山等 10 县苏维埃政权。

在广东东江地区，从 1929 年春开始，革命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3 月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共东江特委趁机把分散活动的革命武装集中起来，建立红四军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九、第四十九、第五十二团，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五华、丰顺、揭阳、交接的八乡山和潮阳、普宁、惠来交界的大南山等地区建立根据地。1930 年 5 月，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东江苏维埃政府。同时，红军各团编组成红十一军，主力达 3 000 多人，各种群众武装达两万人左右。在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广泛实行。

在海南岛，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地区后，坚持斗争。1929 年下半年成立琼崖临时特委，红军恢复发展为独立团。1930 年 4 月，召开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重新成立琼崖特委。利用军阀混战、海南兵力空虚时机，发动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并很快发展红军，扩大根据地。

在上述革命根据地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区域大，人口多，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根据地。此外，在广东东江、琼崖，江苏苏中，浙江南部，四川东部，陕西省等地活动的党组织也建立了红军和若干小块根据地或游击区。总的来说，在根据地内，一般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武装，开展了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同时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根据地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和胜利果实，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红军。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为红军作战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回旋余地。各革命根据地的做法，一般是从实际出发，在斗争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而创造出来的；有的也借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但是，各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都从不同方面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做出了贡献。

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也不断壮大，到 1930 年夏，全国主力红军已发展到约七万人，地方武装近三万人，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5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由各地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了红军的主要任务、



战略战术和发展方向、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以及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兵团。但是，这次会议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不正确的意见，对实践是有害的。如，会议提出要红军无条件扩大，在八月以前扩大到50万；要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提出红军战术的第一个要点便是集中进攻，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等等。

会后，各地红军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红军有：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第四、第六、第十二、第二十、第二十一和二十二军，湘鄂赣地区的第五、第八和第十六军，湘赣地区的独立师，赣东北地区的第十军，湘鄂西地区的第二、第六军，鄂豫皖地区的第一军，右江地区的第七军，东江地区的第十一军，浙南地区的第十三军，江苏中部地区的第十四军，琼崖地区的独立师，川东地区的川东游击军。总之，经过几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的锻炼和自身建设，红军部队党的领导、政治工作、组织编制、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发展和正规军团的建立，推动红军逐步实现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探索出了在大革命失败、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坚持革命、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以红军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红军为主要的组织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战略基地，逐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推进全国革命形势，进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注释：

①《中央给贺龙及前委诸同志的信》，1929年3月19日。

海陆丰井冈山等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的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凡是战争越激烈的时期，土地革命也应该相应的越扩大，为支援革命斗争，复兴革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湘赣边界的山村穷乡僻壤，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地主豪绅压迫剥削严重，人民生活困苦。因此，要唤起农民起来革命，必须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八七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作为新时期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但对怎样进行土地革命，并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地内大体可分三种阶级：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阶级（即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当时根据地的党组织实行的策略是：以贫雇农为基础，联合中农，争取富农，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各根据地在最初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发现了八七会议规定的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

政策很难实行。因为没有一个区分的标准，而且，南方农村中大地主很少，如果还执行小地主土地不没收的政策，则很多地方土地革命无法进行。

土地革命最早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1927 年 11 月，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1 月 13 日，在陆丰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没收土地案》，决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广大翻身农民把标志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烧毁。到 1928 年 1 月 14 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 47 118 张。到 2 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 80%，陆丰县占 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如，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没收一切土地，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提出“把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对资本家和地主不加区别，一律打倒；主张把一切反革命杀的干干净净，规定“不革命不得田”。不讲政策、四面出击的结果是树敌太多，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反而最终孤立了自己。

井冈山的土地革命最早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党代表工作大纲》中明确规定，党代表对民众的调查内容，在政治方面有六项，在经济方面有十四项，田地分配、地租、地价、工价都在调查之列。1927 年 11 月间，毛泽东经常在宁冈坝上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写下了《宁冈调查》一文。毛泽东还亲自到永新的塘边村作调查研究，并发展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永新调查》就是在这期间写下的。通过调查毛泽东基本掌握了边界的阶级和土地占有情况：各县占人口 5% 以下的地主占有土地都在 60% 以上，其中江西遂川县的土地最集中，达到 80% 是地主的，永新、茶陵、酃县等县的土地约 70% 是地主的。为了配合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开展的比较早，从 1927 年冬到 1928 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1928 年春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6 月以后才全面开展起来。1928 年 5 月至 7 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制订了具体的方针、政策。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会后，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政府中，成立土地委员会，发

动群众，普遍开始了分田运动。当时根据地党组织制定的具体规定主要有：1. 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山多田少的地方，就以 3、4 个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土地。2. 废除苛捐杂税，保护中小商人做买卖。3. 争取中间阶级，在土地改革中，中间阶级照样分田。根据地的分田运动先是从宁冈开始的。红四军也先后抽调了一批同志深入到宁冈的葛田、古城等地开展土地革命，随后向遂川、永新推广。到了 1928 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田。

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同时也缺乏土地革命的经验，根据地初期的土地革命多发生“左”的倾向。如：采取土地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办法，后又按照中央的指示，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这种办法体现了反封建的彻底性，但存在侵犯中农利益，使中间阶级受到损失的问题，结果导致中间阶级对立，根据地经济萧条的状况。暴动烧毁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杀尽土豪劣绅，这些严重妨碍了土地革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很快发现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种问题，改变了“左”的错误政策，提出要联合中农，区别对待富农使之中立，保护工商业，使得井冈山的土地革命得以顺利开展。1928 年 7 月，边界土地大部分已分配完毕，小部分尚在分配中。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根本问题，极大地调动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他们行动起来，组织赤卫队、暴动队、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协助红军开展工作，保卫胜利果实。正当根据地土地革命广泛开展之机，由于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导致了“八月失败”。豪绅地主大肆报复，土地重新被夺了回去。9 月以后，红军收复了根据地大片失地。在湘赣边界特委的指导下，各县以区为单位，对土地进行了一次复查，有的地方还重新分配了土地。

1928 年 10 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1928 年 12 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根据中央有关土地革命的精神，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成文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它为我党后来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更全面的土地法令奠定了基础。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 1927 年冬天到 1928 年冬天一整年



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但是受中央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问题的第三十七号通告的影响，而且缺乏实践经验，《井冈山土地法》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有三点：1. 在没收问题上，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公共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2.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规定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自己，农民只有使用权；3. 禁止土地买卖。后来在实践中，这些缺点都逐步得到了纠正。土地革命的实行，使根据地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广大农民从各方面开始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柏露会议以后，随着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得以迅速开展，1929 年 4 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7 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采用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在很短的时间内，闽西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等县纵横 300 多里的地区，解决了 50 多个区 500 多个乡的土地问题，使 60 多万人得到土地。但是，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探索上，还是经过了一些曲折。1929 年 6 月 7 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要求加紧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各根据地采取了没收富农土地、废除富农债务等政策。在土地所有权上，中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坚持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1930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批评一些地区实际上不开展分田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一要“分”，二要“快”；

批评一些地区按耕作能力和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做法，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会后，赣西南地区即全面开展分田运动。到 1930 年上半年，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吉水、兴国全县以及永丰、泰和、万安等县的部分地区都分配了土地。

到 1930 年秋以后，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修正土地政策，不仅没收、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更加明确，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1930 年 9 月，周恩来在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时指出：土地国有问题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不是目前需要的口号。还批评了在经济上没收富农土地，政治上杀尽富农的“左”的错误，指出这样做会动摇中农。六届三中全会后，各根据地开始纠正一些过左的政策和做法。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1930 年 10 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明确规定：土地不禁止买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区分中农与富农，保护中农利益，中农土地不动，对富农只没收所余出租的一部分土地。1931 年 2 月 8 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的第九号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是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首先，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1930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写道：农民分了田，分了山，取得了政权，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仍给他们留有生活的出路。这样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其次，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闽西根据地 1929 年分配土地后 1930 年早稻就获得好收成，龙岩、连城的产量比上年增加两成。第三，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苛捐杂税废除后，农民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枷



锁。第四，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的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他们通过土地革命感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了广大贫苦老百姓谋利益的，因而积极的从事各项与革命相关的工作，参加红军支援前线。这样就使得红军战争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不改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统治者对待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土地纲领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他们有的口头上讲"耕者有其田"，但没有真正实行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制定和执行了革命的土地纲领，真正的从农民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发动土地革命，使农民分清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两种政权的优劣，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自然存在着目光狭窄，行动散漫等弱点，也需要一个教育和改造的过程。但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是许多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比拟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动摇性，中国革命仍能得以坚持和发展，关键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开展了土地革命的结果。

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争论

在一年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围绕着对时局估量、红军的行动方针、根据地建设、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红四军七大前后，共产党内和部分领导者在认识上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和争论。通过这些争论，特别是通过实践检验对争论的正确解决，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党对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论的形成，并提高了共产党内首先是红四军前委和军内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认识。这也是一年来艰苦转战的重大收获。

这场争论，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正是这场争论，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才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争论的缘起是前委和军委运作中的关系协调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维护前委代表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争论的结果是中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妥善正确地处理了"朱毛之争"，维护了党内团结和党内和谐，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

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的争论，起源是当时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由于特殊时期为提高决策效率而取消军委引起的。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内就设有前委和军委，前委是中央任命的。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①，即前委管辖特委及军委，地方管特委，军队管军委。中央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是红军和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构。2月初，毛泽东在寻乌罗福嶂大山召开了一次前委会，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现在军情紧急，部队实行改制，军事行动由前委拍板，暂时撤销军委。朱德表示同意，陈毅也赞成。于是，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③。这一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部队改制、军委撤销以后，红军提高了战斗力，很快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实现了东固会师，然后首战长岭寨，击毙郭凤鸣。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

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却逐渐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单纯军事



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的错误思想。红四军自下山以后，连续作战，且频遭强敌追击，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影响制约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另外，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在半年内被遣返了 7 000 余人，离开井冈山后死伤惨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作出结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团结。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 年 4 月 3 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 1929 年 2 月 7 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 月 5 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三是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出现分歧。罗福嶂会议后，由于取消了军委，领导人分工不尽合理，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工作重心移至军务，过问军务过多，军长朱德觉得有碍司令部工作，认为毛有"家长制"，主张恢复军委；毛泽东因此认为党内现发生些毛病，觉得军长久屈欲伸，有与党争权之嫌。红四军领导层有这种歧见，且愈来愈深。

四是刘安恭的到来引发了党内纷争。1929 年 5 月初，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参加过南昌起义，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后来又留学苏联学习军事。当时部队很崇尚在苏联留学军事的专家，又是中央军委派来的，朱、毛、陈根据军中情况，决定恢复军委，安排刘安恭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俨然成了朱毛红军的三把手，位居陈毅之前。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他一上任就召开了临时军委会议，没邀请前委书记毛泽东参会，而且作出一个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

他事。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刘安恭的意图显然是要架空前委，排斥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他还搞宗派活动，渲染红军中有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对中央派，制造朱毛对立的舆论。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引起部队官兵中极大的思想混乱。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朱毛之争"。

1929 年 5 月底，为了消除混乱，统一认识，确定军队的领导机制，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永定湖雷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并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毛泽东认为：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当前军队战斗频繁且经常转移，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机构，在前委下"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因此主张撤销军委。毛的意见得到了林彪、江华、谭震林等人的支持。而军委书记刘安恭却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④]。刘的意见得到了军长朱德等的支持。争论结果，双方未能取得共识。毛泽东觉得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同志没有同意。湖雷会议开到深夜，不欢而散。

1929 年 6 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观点的一套，因而坚持要"分权"。这就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前委于 1929 年 6 月 8 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以及相反的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白砂会议前，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一是劝毛不要辞职，要和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二是指责军长存有封建关系、政客手段。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四点书面意见：1. "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领导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 根本分歧在前委和军委"；3. "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的问题"；4. "前委在组织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完全做不起来"[⑤]。



白砂会议争论的焦点仍是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林彪等主张撤销，朱德、刘安恭等主张保留。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刘安恭肆意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与会同志的态度，仍同湖雷会议一样。最后，会议愈争愈烈，毛泽东再次愤而提出辞职，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⑥。鉴于毛的坚决态度，会议就军委的设置举行表决，41 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 36 票对 5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被免除，调任红二纵队司令员。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白砂会议虽然解决了争论的焦点问题，但红四军党内仍不平静。刘安恭不满，到处游说。毛泽东认为在组织指导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不了，执意不肯收回辞职意见。为维系前委工作运转，前委遂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要求毛、朱各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以统一认识。

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的主要思想和核心观点是：1. "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2. "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3. "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4. "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毛泽东由此认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信的最后，毛泽东解释了辞职的理由："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或休息一个时期"⑦。

6 月 15 日，朱德也发表《给林彪的信》一文，表示了三点不同看法：1. 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说我代表军官要争自由，与党分权，我不能接受；2. 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3. 毛泽东强调党员的自由要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为却是自由的，不服从中央调动。毛、朱的文章，都刊

登在红四军当月出版的第三期《前委通讯》上。

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令人忧心的结局。在毛、朱的公开文章发给全军将士讨论的基础上，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大会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总结了红四军建立一年来的工作；二、对过去四军党内争论的若干问题作了结论；三、选举了新的前委会。大会原定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但是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指导思想也存在着缺点，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就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的倾向。

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认为流寇思想不是事实，主张集权制领导原则是一种家长制倾向。在会上，朱毛之间发生了争论。陈毅以团结为重，做了必要的斡旋、调解。他诙谐地说："你们朱毛两个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之间，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会议对毛泽东、朱德、刘安恭、林彪都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表示说："会上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说，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8]

代表大会开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样，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并使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发展。



决议案在“总批评”中认为：“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出现严重争论，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代表大会为此决定：“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决议案结尾提出了“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去”等口号⑨。大会最后在中央并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前委委员。但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以多数票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前委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请求和他的身体状况，同意毛泽东到闽西上杭蛟洋村红军医院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由于认识不一致，会议没有结果。许多人对共产党和红军目前现状不满，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

红四军党的七大是红军创建初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存在严重错误。这次大会充分肯定了1928年5月以来红四军创建两年来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明确肯定了前委在井冈山时期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政策以及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若干缺点和问题，对四军党内长期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原则上正确的结论，对争论双方不正确的意见提出中肯的有说服力的批评。大会的主要缺点是：不承认四军党内存在流寇思想；对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具体措施，以及组织处理过于简单。客观上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特别是在未报中央批准之前就擅自改选红四军前委，致使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使前委顿失领导中心。

红四军党内发生的这场争论，并非偶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根本原因在于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所致。争论的性质既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是什么个人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传统观点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建设中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当然也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这场争论的双方，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致

华中局电文中所说："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10]。在红军初创时期，共产党人及革命士兵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难以避免的。

注释：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②《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③④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77页，第276页第276页。

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⑦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5页。

⑧《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71年10月下旬，内存文献资料。

⑨《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1929年6月22日于龙岩，内存档案文献资料。

⑩毛泽东：《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1944年3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4页。



打破国民党队闽西根据地的三省“会剿”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 600余人向赣南、闽西挺进。3月至6月间，红四军势如破竹，取得二次入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先后在长汀、龙岩消灭福建省军阀郭凤鸣、陈国辉部后，初步形成了以龙岩、上杭、永定为中心区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如火如荼。6月16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决定调动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红色根据地和红四军发动大规模“会剿”。于是电令赣军金汉鼎部集结于瑞金、长汀，闽军张贞部向龙岩、连城推进，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集结于上杭、永定，限6月30日攻占上述指定目的地。6月30日，又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省兵力均归其指挥。各路“会剿”总兵力达13个团又2个营，约二万余人，以赣省为主力，以闽粤为堵截，妄图一举扑灭闽西革命火种。

面对数倍强敌的围困，如何粉碎敌人“会剿”的军事计划，成为摆在红四军新一任前敌委员会面前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7月8日，红四军前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初步提出打破一面找出路的“七月分兵”计划。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上杭、长汀、连城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决定全军四个纵队全留在闽西内线，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区域，以破“会剿”。但敌情随后却发生了不利于红四军的重大变化。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来势凶猛。赣军金汉鼎第十二师两个旅四个团占领长汀；粤军蒋光鼐第七旅两个团和第八旅第十五团，逼进上杭、永定；闽军张贞、林知渊六个团又两个营分二路向龙岩压进。一路由张贞部从南靖猛扑漳平、龙岩，另一路由林知渊部从安溪进攻漳平。国民党闽军这两路的战略目标是在一星期之内攻占龙岩。

为了商讨应急之策，7 月 29 日，朱德、陈毅火速从连城新泉赶到上杭蛟洋文昌阁，会同正在参加中共闽西“一大”的毛泽东、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一起，商讨应变退敌之策。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召开了前委紧急会议，改变原来的军事计划，决定红四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第四纵队留守闽西，缩小目标，一路由第一、二、三纵队离开闽西，向闽中出击，分散敌人力量。会议同时确定陈毅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暂由朱德代理，毛泽东则转移到乡间养病，继续指导闽西特委地方工作。

红四军前委的“七月分兵”游击作战计划与中共福建省委的意见也是基本吻合的。然而，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却略有变动。第二纵队于 8 月 1 日离开连城姑田，向龙岩白沙集结，朱德率第三纵队从龙岩龙门出发，于 8 月 2 日到达白沙与第二纵队会合。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却因遇汀江水上涨，过江迟缓，未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只好仍留在闽西，会合第四纵队与敌周旋。于是，朱德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实施分兵游击的具体方案，决定二、三纵队和军部向漳平开，一纵队（包括四纵队）留在闽西散开。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为减少。朱德之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向宁洋县进发，以消灭弱敌张贞部有生力量，扩大赤色区域为战略目标，开始了出击闽中的军事行动。8 月 3 日，红四军军部和二、三纵队近 3 000 将士从龙岩白沙出发，向宁洋县边境疾速前进。部队经过一天急行军，经罗畲、邹家山、罗坑，当晚就抵达赤水，宿营一夜。8 月 4 日，经过宁洋县的员当，几乎未遇国民党军队的抵抗，红军就兵不血刃地顺利夺取宁洋县城。

8 月 7 日凌晨，东方破晓，红军离开双洋，沿双洋溪分兵两路挥师南下漳平县城。一路由朱德亲率军部和二、三纵队主力沿双洋镇的溪口、十一湖，经南洋乡的公馆、北寮村、梧溪头、溪东坂、南洋村、党口村、暖洲村等地，主要军事任务是由西北向东南沿途消灭敢于阻拦之敌，并主攻漳平县城。另一路由二纵队一部佯攻新桥镇，在完成牵制新桥之敌的任务后，约定与朱德所率的一路红军于 8 月 8 日上午汇合于漳平城关。朱德所率这一路红军在 8 月 7 日冒雨疾行，傍晚迅速集结于南洋乡的南洋村、党口村、暖洲村一带。8 月 8 日，强攻军事要地罗溪渡口。当时，漳平城关的守敌不仅有陈祖康部的数百名反动民团，还有从龙岩败退下来的原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残部陈佩玉、王怀英正规军两个营，约 500 多人，陈祖康以福建



（龙）岩（漳）平宁（洋）剿抚特派员的身份坐镇指挥负隅顽抗。敌营长陈佩玉、王怀英派兵扼守罗溪口东岸，控制船只，企图阻挠红四军前进的步伐。部分已强渡后的红军随即展开猛烈攻击，东岸陈、王敌军阵脚顿时大乱，纷纷丢盔弃甲，往漳平县城方向败逃。红军势如破竹，一举击溃守敌。之后，红军又分兵二队，合围漳平城。另一路的二纵一部经新桥武陵坑、双溪村外双溪口一线向新桥方向佯动时，受到陈祖康的结拜兄弟陈明康的反动民团设障阻击，不得不与陈明康部交战一番。为了按预定的计划，合兵漳平城关，该路红军在完成牵制任务后，迅速摆脱敌人纠缠，沿双洋的十一湖，南洋的公馆、北寮村、梧溪村、南洋村，和平的和春村、和平村一线南下，于当日中午迟延抵达漳平城关与朱德这路红军汇合。

为了打破“会剿”，完成战略任务，8 月 15 日，红四军前委开会部署跳出外线，出击闽中的大田、德化等县的具体行动。8 月 17 日至 19 日，红四军分两批离开漳平城关，分别由溪南镇小潭和芦芝乡圆潭二路进发，溯溪南溪奔袭溪南墟。18 日，先头部队攻下了溪南东湖山的两个民团炮楼。19 日，朱德率红四军前委机关到达溪南。20 日红军离开溪南镇经象湖镇的扬美、灶头，吾祠乡的内林、彭炉、彭溪、留地洋、厚德等地，进入闽中地境。

红军迅速占领漳平，出击闽中的军事行动，大大出乎敌人意料，完全打乱了敌“会剿”计划，国民党当局惊慌不已，极度害怕红色赤潮遍及闽中，紧急调整“会剿”兵力部署。刚刚跨进龙岩县城的张贞部杨逢年，不得不全部调至龙岩北境扼守，安徽芜湖的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也火急调往漳州协同助剿。林知渊指挥的福建第二路“会剿”部队，原计划从泉州入安溪之后再入漳平进攻闽西，当得知红四军已攻克漳平，出击闽中后，张贞只好命令部属张汝匡旅尾随红军跟踪监视，不敢轻举妄动。红军的果断出击，牵制和调动了“会剿”之敌，迫使敌穷于应付，从而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出击闽中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行动，主要表现在：一是闽中一带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薄弱，民众纷纷躲避红军，红军无法买到大米，只能以番薯野菜勉强充饥；二是路险峻岭，且正值盛夏酷热，疫病流行，红军体力难以支撑，给部队机动行动造成很大困难；三是敌情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敌军分由德化、安溪、华安等处向红四军进攻，尾随的张汝匡旅两个团分别占领了漳平县城和溪南，形成了前围后堵的夹击之势。鉴于敌情变化和我军在闽中处境困难的实情，中共闽西特委写信给红四军前委指出：闽中山势险阻，防守不便，又无群众基础，如果红四军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

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因此，特委致函建议前委再调红四军回闽西，在漳平一带工作。红四军前委运筹帷幄，决定回师闽西。

8月28日红四军从永春县一都、福鼎出发，急行军进入漳平境内象湖镇的半华、土坑至杨美村夜宿。次日拂晓，红军兵分两路，从溪南的南柄和象湖抄小路包围溪南圩。象湖寺庙的和尚与杨美放木排的农民还自告奋勇地为红军作向导。红军从溪南村后面的打鼓岭突袭敌阵，敌人措手不及，慌忙夺路而逃，全线崩溃。红军一举占领溪南圩后，又一鼓作气地乘胜追击30余里，在溪南下林击毙一名敌团副。溪南战役全歼张汝匡旅一个团，毙敌数百人，俘敌2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溪南战役成为红四军入闽后的七大战役之一，其光辉战例永载史册。

溪南战役结束当日即8月28日，红军不畏疲劳、连续作战，经溪南上坂，小潭，和平的菁坑直接奔袭漳平城关。8月29日凌晨，红军向城关外围的东山塔、佛仔隔和桂林的白岭的敌阵发起凌厉攻势。敌人慌忙抵挡一日，纷纷败下阵来，向漳平的永福方向逃窜。8月30日上午，红四军第二次攻克漳平城关，歼灭张汝匡旅一个团，俘敌100余人，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彻底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阴谋，8月31日，红四军分兵两路，乘胜追袭逃往永福的残敌。一路从桂林出发，经桂林的黄祠越三重岭至永福的同春；另一路由菁城的顶郊出发，取道桂林的高明越关东岭达永福的盖德洋。两路红军在永福的文星合兵后向永福圩进军。正在永福苟延残喘的残敌及永福反动民团根本无法想像红军会如此神速，猝不及防，溃不成军。9月1日上午，红军长驱直入，攻占了永福，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张汝匡旅残部和永福反动民团的一部分。

朱德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进军漳平、出击闽中，到奉命回师龙岩，前后37天，艰辛行程500多公里，历经连城、龙岩、漳平、大田、永春两个县（市）的广大城乡区域。其中，在漳平境内革命活动28天，足迹遍及13个乡镇，一百余个村庄，影响极其深远，其重要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评述如下：

出击闽中，充分体现了“党指挥枪”的重大原则。从1929年9月29日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出击闽中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原则的充分体现。首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多次讨论破敌之策。1929年7月初，红四军前委根据当时形势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巩固红色区域



割据和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军事计划，正确提出敌来当破一面找出路的“七月分兵”计划。7 月 29 日，当敌情骤变时，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等在上杭蛟洋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红四军一路留闽西，一路离开闽西、分兵游击破“会剿”的具体方案。其次，福建省委的意见与红四军前委会议的决定是基本一致的。蛟洋会议后，红四军前委派陈毅、邓子恢到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福建省委连续复函同意“七月分兵”计划。再次，当红四军在 1929 年 8 月中下旬游击闽中的大田、永春受挫时，闽西特委致信给红四军前委，建议红四军调回闽西。红四军前委接信后，客观分析实际情况，决定回师漳平，返回闽西。所以，出击闽中的整体部署，是红四军前委、福建省委、闽西特委集体智慧的结晶。

出击闽中，集中贯彻了红军在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国游击战争的指导艺术，首屈一指要推毛泽东。从率领井冈山不足千人的起义队伍开辟井冈山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到 1937 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面对强敌，充分显示了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高超游击战争艺术。朱德虽然是打破“会剿”的具体指挥者和实施者，但破“会剿”的“七月分兵”计划却不折不扣地贯彻了毛泽东始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出击闽中，为闽西苏区的存在、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有利的军事条件。由于红四军分兵从闽中外线和闽西内线牵制和打击敌人，闽粤赣三省敌人内部又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不敢贸然深入闽西红色区域。尤其在红四军二、三纵队取得攻占宁洋，二克漳平的胜利以后，出现了张贞已败，赣军不来，粤军陈维远只得回去的局面。这样，喧嚣一时的闽粤赣三省“会剿”，在红四军和闽西人民的阻击下宣告破产。击退国民党三省“会剿”以后，闽西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红军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也为尔后形成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革命基础。出击闽中，极大地促成漳平红色割据形势的蓬勃发展，并扩大了在穷苦百姓中的影响。朱德在漳平进行革命活动 28 天期间，高度重视地方党组织、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的建设。

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提出

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能否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生存，很容易受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共产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的问题。“九月来信”是共产党早期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落选后，随即离开部队，来到闽西蛟洋、苏家坡、牯扑等地，一边养病、隐居、读书，一边做点地方工作。1929 年 7 月底，中央指令红四军派人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在蛟洋前委紧急会议上，陈毅征得毛泽东、朱德同意，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陈毅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政，毛泽东坚辞不受。于是，前委指定朱德代理前委书记。在毛泽东去闽西养病、陈毅去上海开会期间，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取得胜利，收复龙岩，攻占上杭，并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前委不健全，缺乏必要的准备，会议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后来，红四军主力又冒进东江，攻打梅县，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时，军中郭化若、彭祜、罗荣桓、张恨秋等基层指挥员纷纷致信毛泽东，强烈要求毛回军主政。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政治小鬼”，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①陈毅在上海期间，撰写并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的报告》等。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立即察觉到红四军领导层内部分歧的严重性。8 月 13 日，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信中对这次大会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的原则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解决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的，并经周恩来审定过的。中央九月来信正确、稳妥地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加强和改进红四军中党与军队的建设，具有极为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九月来信详细分析了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论述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总结了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指出：红四军两年来完成的任务，“在全国政治局势有极大影响”；红军的继续发展，“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指示信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指示信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红军中如何开展党的工作中明确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③；对于红军中错误观念，指示信要求“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指出，“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等，“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指示信还指出了代表会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主要是：第一，“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指示信对“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也提出了批评。指示信要求“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④]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对“朱毛问题”的裁决，简言之归结两句话：一是“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二是“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中共中央九月指示信具有重要意义，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为红四军党内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以及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虽然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

1929 年 10 月 22 日，陈毅携带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随后，陈毅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蛟洋苏家坡给毛泽东，并致信毛泽东，诚请毛泽东回军主政，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⑤]11 月 18 日，红四军抵达上杭官庄，23 日攻占长汀。毛泽东在苏家坡收到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亲笔信后，非常欣慰，即于 11 月 26 日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回到前委领导岗位。11 月 28 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中央：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2 月初，红四军进驻连



城新泉。毛泽东偕同朱德、陈毅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新泉整训”。随后，部队进驻上杭古田，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了各种调查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胜利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古田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共产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纠正错误思想，制定了建军原则，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其中核心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来信精神。古田会议的亮点是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其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古田会议是红军初创时期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从此，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党和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军队建设方面，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所谓政治建军，决议从“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出发，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若不注重政治和政治工作，“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7]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阐明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奋斗，这实质上就是“党指挥枪”的思想的一种原始表述；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必须对红军进行建军宗旨的教育，“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

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批评了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所谓思想建党，正如决议所指出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为了有效地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决议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决议在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提出加强各级组织的工作等要求。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新党员的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明确规定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及各自的职权范围。决议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决议更加明确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政治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

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关心、优待伤兵，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纠正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决议提出，要加强对官兵的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要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是中国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时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集中体现了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党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中贯彻执行，而且随后在各地红军中也都大范围推广，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建军问题的解决，党有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这就使进行武装斗争、实施武装割据，有了可靠的物质力量。而且，古田会议决议不只解决了建军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农村环境建党以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问题。因此，古田会议决议实际上是探索和形成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①⑤《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71年10月下旬，内存文献资料。

②《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2七，第41页。

③《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1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⑥《毛泽东致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页。

⑦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2页。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经过两年多的革命实践，通过对游击战争和多次会议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共产党内和红军内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正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到1930年上半年，共产党通过艰难的探索，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共产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的经验总结，是在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解决了农村斗争中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了初步说明。

在当时，共产党内对于在中国条件下农村斗争与城市斗争的关系、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夺取全国政权中的作用，还不十分清楚，甚至有错误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看法上：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



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①]。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大多依靠暴力手段维持其统治的。实践证明，共产党要想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方能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

在农村区域进行的中国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的力量相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还十分弱小，共产党和红军内有部分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②]。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对于这个问题，即便是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毛泽东，也是逐步认识清楚的。

1928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对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论证。不过当时还没有形成把农村作为工作中心的思想，还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闽浙赣边创立根据地的。从1929年到1930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深刻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此时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发展，并已经在中国革命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而城市斗争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把农村放到中心位置。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以乡村为革命中心的思想。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只有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毛泽东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的主要群众，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不是在若干近代工

商业大都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就把广大农村变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略基地。毛泽东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曾对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特殊现象及其和红色政权存在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再次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它们分别扶植不同的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他们相互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样，"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边界地区的农村，更易于红色区域的发生和发展。

以上两方面说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条件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此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针对一部分同志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主张一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以及"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毛泽东着重阐明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他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只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第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指出，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在估量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时候，也要从实际出发，



要透过现象看实质。既要反对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又要反对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都是不切实际的估量。

毛泽东针对当时革命力量比较弱小、容易使一些同志产生悲观念头，"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等等情况，着重分析了如何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

毛泽东首先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主观力量的弱只是相对的。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引起革命发生、发展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然后说："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还说中国革命"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③]。

以上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红色政权在半殖民地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强调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要"必须这样"做，即必须走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这里已没有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关于"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最大任务"、"农村斗争的发展"是"帮助城市斗争"等提法，表明毛泽东已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提出了把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时机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这基本上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革命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如果不以乡村为中心而扩展的话，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是放弃革命去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妥协；二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地下，同强大的敌人作彻底的战斗。这两种选择虽然性质不同，但同样都会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样不可避免的遇到教条主义的阻力。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就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批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实践中毛泽东深切地感到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于革命斗争具有极大的危害，他在批评那些认为有了“本本”，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利的错误想法时说：这些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为此，他在论述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同时，也著文阐明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批评了错误的保守的思想路线。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总结了党内争论的经验，阐明了调查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性，实际上阐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实际上批评了那种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文章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的调研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完成民主革命、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因此，应该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实践调查去！”

第二，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开口闭口“拿来主义”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这种对待“本本”的错误态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无疑是要执行的，但是，“我们说上级领导机



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④

总之，对待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也好，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好，贯彻执行都必须了解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联系到在2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强调中国同志要了解中国情况、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注重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要了解中国情况，纠正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就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⑤他说，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就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

在中国革命严重转折关头，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了向实践学习，走群众路线，善于总结斗争经验，才能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造才能，探索出复兴和发展中国革命的道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释：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 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61 页。

③④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7 ~ 99 页，第 115 页，第 110 页、第 113 页。



红军的壮大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

由于红四军一年多的艰苦转战和地方党组织及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赣南、闽西根据地取得不断发展。到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扩大到兴国、于都、宁都、瑞金、寻乌等县，成立了由曾山任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当地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六军；闽西根据地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成立了由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当地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十二军。赣南、闽西根据地正式形成。

古田会议结束后，由于革命势力得到恢复和发展，红军也迅速发展壮大，赣南、闽西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靠近国民政府的武汉、南京、上海，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视之为心腹之患。1930年1月4日，蒋介石派调其嫡系刘和鼎部参加，组织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以14个团兵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二次“会剿”。为粉碎这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采用“离开闽西，保卫闽西”的策略，发展闽西苏区，扩大赣西南根据地，红四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和武夷山中部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纵队在龙岩小池，准备随时阻击参加“会剿”的闽军；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闽西古田向赣南连城开进，筹措给养。红四军为避开强敌的锋芒，把敌人引出闽西，遂分两路离开闽西，经福建连城、清流、宁化转向赣南集结。

1月5日，朱德率红四军一、三、四纵队先行离闽，经连城、宁化到江西石城，朱德率部进抵庙前时，国民党军的“会剿”已经开始。赣军分别从长汀、上杭进到上杭以北的涂坊、旧县，准备进攻新泉、庙前；闽军由龙岩、坎市进至龙岩以西的小池、灌阳地区，准备进攻古田；粤军已推进到永定、武平地区。6日，红军主力到达连城，赣军一部跟踪向连城进攻，隔断了红四军主力同前委和第二纵队的联系。为了威胁“会剿”主力赣军第十二师后方，调动其回援赣南，红四军主力于9日离开连城，从宁化入赣。1月16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攻克江西广昌县城。此时，蒋

桂军阀混战正酣，赣西南敌军兵力空虚。为利用有利时机扩大赣西南赤色区域，并与江西红二、四团和赣西、赣南特委取得联系，朱德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部队改由广昌到宁都东韶红区休整。先与毛泽东及二纵队会合，后经乐安、永丰到吉安，与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六军会合，以夺取江西全省。朱德派人将此决定通知了毛泽东。

毛泽东率二纵队于1月5日离开连城到龙岩，后经宁化，冒雪翻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塘坊，23日，前委和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纵队在小池地区给予闽军刘和鼎部以打击后，即从古田北进，经连城以东的姑田和宁化、清流、归化县境，翻越武夷山脉进入江西，于1月24日在宁都东韶与朱德等会合。1月25日、26日，朱德、毛泽东分别率部冒雪行军，经小耐岭、石嵊上到达乐安金竹。1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率部队到达永丰藤田。1月下旬，毛泽东在宁都东韶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31日，红四军第四纵队在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和宁都地方党组织配合下，再次攻占宁都县城。接着，部队以县城为中心，分散在周围90里农村开展宣传革命道路和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经过20余天的工作，将工作区域基本赤化，使宁都北部红色区域与县城周围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2月7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赣西特委在吉安陂头召开“二七”陂头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组织问题等，从而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及其如何实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不仅对赣西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全面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党所领导的整个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迅速打开赣西南党的工作局面，推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至对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的详细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与会代表联系当地斗争实际，紧紧围绕会议的中心议题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特别是对“攻打吉安”和“分配土地”两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经过深入讨论，与会代表在对当前形势、敌我态势、红军任务、土地分配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解决了赣西南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会议确定的当前主要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发展苏维埃区域，以逐步夺取江西全省为斗争口号。会议肯定扩大红军第六军是正确的，指出“扩大红军与建立地方武装是目前争政权、分土地，反帝反军阀



的唯一任务。目前红军要集中，群众武装要加强。会议决定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在军事上首先要攻取吉安。同时确定了攻打吉安的战略战术部署，是拉开攻击架势，围而不攻，首先解决吉安周围之敌，然后再一举攻取吉安。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从组织上加强和统一党的领导。提出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决定将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红四、红五、红六军则分别成立军委，受共同前委指挥。共同前委人选由各军负责同志和闽西、东江、湘鄂赣边、赣西南等特委负责同志组成。会上共选举产生共同前委委员 17 人，他们是：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共同前委得到党中央的承认，仍随红四军行动。其后红四军军委成立，潘心源担任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将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并指定刘士奇、曾山等为临时负责人。会议还决定择日召开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

会议批评了赣西南有些地方割据两三年才迟迟建立政权的错误，要求各武装割据区域都必须迅速成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二七会议后，1930 年 2 月中旬，赣西县、区苏维埃代表会议召开，正式选举产生赣西苏维埃政府。3 月，在赣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赣西南地区统一的革命政权组织——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其所辖各县、区、乡也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至 10 月初，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 30 余县、400 余万人口。此时，红军攻克吉安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曾山当选为主席。江西红色政权区域的面积已占全省总面积的 80% 左右，成为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3 月 18 日至 24 日，在龙岩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闽西工农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以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2 月中旬，江西、湖南、湖北的国民党军出动 12 个团，向赣西南根据地发起新的“三省会剿”。红四军放弃了攻打吉水、吉安的原定计划，采取“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的战术，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待机歼敌。2 月 24 日至 26 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及红六军一个纵队，乘鄂敌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单独冒进、势单力孤之际，在吉水的水南、吉安的值夏一带连续展开攻击，将该敌大部歼灭。是役共俘敌 1 600 余人，缴枪 2 000 余支，捕获三名敌团长。红四军入赣后，在闽西的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除留少数兵力驻守长汀、上杭等城外，主力撤回江西境内；在龙岩的闽军则因闽北土著军阀卢兴邦与杨树庄争夺省政权，发生“福州事变”，纷纷撤往福州；在永定、武平的粤军也相继撤走。闽西苏区的红军和赤卫队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城。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又告破产。红四军从闽西回师赣南，不仅打破了敌人对闽西苏区的“会剿”，而且对赣南的革命斗争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3 月中旬，红四军到兴国一带活动，得知赣州之敌金汉鼎部赴闽，与福建军阀开战，遂决定乘虚攻打赣州。3 月 16 日，红军从东、南、西三面向赣州发动猛攻，不料金汉鼎部一个团尚未开走，凭借坚固城池负隅顽抗。赣州古城，城高墙厚，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缺乏重武器，虽连日攻击，未能奏效。

3 月 18 日，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赣州，撤回根据地，以三个月的时间，在赣南、闽西、粤东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4 月，为加强武装建设，闽西地区红军五个独立团合编为闽西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搞更



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同这相反，无党的地方，红军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不怕你做半个月也好，做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显然，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线。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红四军经过三个月的分兵活动之后，于6月中旬按原计划向闽西地区集结，并一举攻占长汀。这时，赣南、闽西根据地已连成一片。6月19日，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红四军与赣南的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闽西的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最初称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全军计两万余人。红军第一军团组建后，即改称为中共红军第一路军前敌委员会，后又改称为中共红军第一军团前敌委员会，仍以毛泽东为书记。后来，赣西南的红二十、红二十二军，闽西的红二十一军等部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成立后，赣南、闽西的红军进入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的新时期，开始实行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赣南、闽西根据地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再度会师。红三军团成立于同年6月，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总政委，下辖红五、红八、红十六军（在鄂东南）。会师之后，两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总兵力三万余人。红一方面军是当时全国红军中最大的一支主力，兵力最多时有八万多人，因其所属部队后来曾直接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所以又称中央红军。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

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做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31 年 1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9 月，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扩展到 30 多个县境，在 24 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也叫中央苏区，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苏区最大时包括 21 县，人口 250 万。党的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临时中央，都先后设在或迁往这块根据地。毛泽东等长期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人、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广大群众，为这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巨大了努力和牺牲；但是，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中央根据地终于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中共六大的召开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大会系统的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对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处于混乱的状态下大体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1927年，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下，革命形势发展迅猛的关键时刻，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叛变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致使同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蒋介石，在全国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革命政权。为了挽救革命，8月1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选举了临时中央局，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初，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随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认清中国国情，统一思想，明确奋斗方向。1927年11月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倾错

误，更加需要明确当前形势，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此，召开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刻不容缓。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一年的准备时间。八七会议时就已经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 年 1 月 18 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初步将时间定于 3 月底。而当时，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险恶的环境，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使共产党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就在这时，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8 年春夏将在莫斯科举行，考虑到届时中共也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会议，遂将中共六大会址定在了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址选择莫斯科的深层原因，在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必然联系。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对失败的原因存在分歧，对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在此时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可能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并统一全党思想，于是寄希望于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也认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共产国际充分发挥顾问作用。

1928 年 3 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 月 2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 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 100 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在筹备召开六大的过程中，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4 月 28 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革命者的看法，认识到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承认中国革命形势未处于高潮，革命发展不平衡，仍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群众、继续力量上。但此时还未完全认清“左”倾盲动的错误。

到达莫斯科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中共六大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极大重视和直接的指导。斯大林



和布哈林都是中共六大主席团成员。6月9日，斯大林在大会开幕前，会见了出席六大的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苏兆征等中国党的主要负责人，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六大路线的确定提出指导意见，并始终关心着大会进程。他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加以说明。同时指出中国革命不是高潮，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6月14日、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的革命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国共产党内在革命性质和形势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次大会完全是秘密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国内秘密地分批到达莫斯科。中央在发出召开六大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要选派工农分子。出席这次大会的各地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以五届中央委员委员身份出席大会者四人，指定与邀请参加的代表54人。84名代表的成分是：工人44人，占52%；农民六人，占7%；知识分子34人，占40%。代表全国党员四万多人。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此外，参加开幕大会的还有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由向忠发主持并致词，随后，共产国际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苏联共产党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中国少共中央代表关向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分别向大会祝词。6月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向大会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今后的任务。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及《军事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决议案提纲》、《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通过了《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以及关于党纲、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确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的中心任务。指出现在应该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似有徒弟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为此，大会提出了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1.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 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 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 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5. 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8. 改善士兵生活，分给士兵土地和安置工作；9. 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 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决议案明确了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决议案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不断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益激化，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团结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认为武装起义从全国范围的意义上讲，暂时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行动口号。

在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为了完成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在职工运动方面，大会指出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工



人阶级的大多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的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大会总结共产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同时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决议案在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指出：共产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它们都是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的。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正式中央委员 23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 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大会同时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为正式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为候补委员。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7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把向忠发推选为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受到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事实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这两个重要问题，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前途。大会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治纲领。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明确了当时革命发展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是低潮期，革命发展不平衡。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的组

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积蓄力量。指出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

六大总结了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对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作了重要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阶级基础，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反对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共产党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中共六大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客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深远而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六大提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大会确定的党的路线的基本方面都是对的。这是六大的主要功绩，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最危险的敌人，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没有把更多的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过来，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把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这些缺点和错误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使革命遭到挫折。当时中国共产党出于历史的大变动时期，面对着马克思主义不曾遇到的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要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很快做出准确而合乎国情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反复探索和修正，从而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国统区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在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了。

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着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但自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起又陷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之中，许多原来“清剿”工农红军的军队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战场，后方空虚，给了各地工农红军以发展的机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根本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更加激化。南京政府日益法西斯化，全国工农平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解放。就是原来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人们，不满也日益增长起来。从主观方面说，六大后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的群众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比较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写道：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的方向，必须坚决的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并且明确规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后，共产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地转变，努力整顿遭受严重打击的国统区的共产党的组织，指导党的组织转变斗争形式。经过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中央的派出机关。1927年9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北京成立，书记王荷波，秘书长蔡和森，委员有彭述之、张昆弟、刘国庄、杨善南。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整顿顺直、山东、山西、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在周恩来未到以前，由张太

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1927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等组成长江局，罗亦农任书记，负责长江流域党的工作。10月1日发出决议，规定长江局管辖范围为湖南、四川、陕西、河南、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七省，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在建立派出监管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派巡视员到各地，实际指导地方党组织迅速转入秘密状态。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所面对的局势是严峻的。1927年11月开始的"左"倾盲动主义，使经过大革命失败而艰难的保存下来的力量又遭受新的沉重损失。中共中央曾把湖南、湖北和广东当做重新发动斗争的中心，这些地区遭受的破坏最为惨重。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各地党组织很不能适应。它们大多是在大革命风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过去往往只有两种经历：大革命时期那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方式，或者按照"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只依靠少数人拼命，不顾一切的蛮干。六大前后，情况虽然已经有了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改观。共产党的骨干大多集中在省委、特委和一些重要城镇中，形成庞大的秘密机关。共产党同群众处于严重的隔离状态。许多支部陷于瘫痪甚至名存实亡。

鉴于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好地下工作，中共中央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192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规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秘密环境。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提出共产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问题。这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是利用职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使党组织和党员能够长期潜伏，并在群众的掩护下开展工作，不断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重建。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江苏、江西、顺直、河南、陕西等地的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得比较迅速。在陕西、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党组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到六大召开时，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有12个省委、3个临时省委、400多个县、市委。这些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各项工作尤其是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

人经过顽强的斗争，逐渐从大革命失败的沉重打击中走出来，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逐渐学会秘密工作，形成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

但是，从总体上看，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共产党的组织还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湖北省委在1928年一年中遭到三次大破坏。广州起义后，广东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同年，湖南省委被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无法立足，只得迁往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委同中央失去联系。保存下来的一些党组织，也存在或消极涣散或“左”倾盲动，以及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群众等问题，党员中则滋长了相互抱怨和不信任的情绪。六大针对共产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提出要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加紧建立地方党部，要注意发展党员队伍，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

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回国后，非常注意党的建设。1928年9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讨论了广西、河南省委的改组问题。一直到1928年底，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安徽、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山西、山东、陕西等省委的改组问题，对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改组、重建、充实，作出切实可行的指导。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屠杀下，要把广大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共产党的组织保存下来是极其不易的，要使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更不容易。这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而且需要有智慧和比较正确的指导。经过一年工作的不懈努力，共产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29年6月共产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已经从六大时的四万多人，增加到6.93万余人，产业工人支部也达到了近百个。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削弱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逐渐能起到领导作用。到1930年9月，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共产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即增加到228个。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地区内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尽管中间历经严重的挫折，这些经验对此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共产党的六大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加强了指导，开始强调以下原则：第一，必须切实的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只有在下层组织已经健全起来、工作有了开展以后，才能建立上层组织。第二，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各地党组织设法从各方面接近工农群众，包括采取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实际考察他们的生活痛苦和要求之所在，艰苦耐心地去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一点一滴做起，日积月累的集聚力量，实现争取群众的目标。第三，坚持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充分利用职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这些指导意见和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处在困难境况下的各地党组织和群众斗争逐步得到复兴。这集中表现在工人运动方面。

中共中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为加强中央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将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决定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参加江苏省委，并组织以周恩来为首的巡视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以响应为首的全国总工会巡视上海工运委员会。中央在对各地工人运动的指导中，注意纠正“左”的倾向，贯彻党的六大关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精神。在策略指导上，强调要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应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在组织形式上，强调要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为了争取群众，提倡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能够利用的合法条件。由于中央重视，党的六大路线和工运策略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得到贯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1928年的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许多城市的工人群众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和禁止，纷纷开展抵制日货罢工等形式的反日斗争。在上海，各工会代表大会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长沙，由船员和码头工人参加的湖南全省对日绝交运动，以及收回大金码头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在汉口，日本租界和日资企业的工人 8 000 余人，为抗议驻汉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车撞死中国人力车夫而举行罢工，持续半年之久，终于迫使日本领事答应道歉、赔偿等条件。在山东，1929 年 6 月青岛商纱厂两万余工人举行为期四个月的反日大罢工。席卷全国的反日斗争，是自五卅运动以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各地工人争生存、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增多，而且这种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再一个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这时，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帅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不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面对白色恐怖统治，中共中央也对已有的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加强了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的中央特务委员会，即中央特委，作为情报工作的决策机构。特委下设特科执行具体任务。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六大后的两年时间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左”的倾向。从总体看，工人运动的规模不是很大，斗争能够争取到完全胜利的情况不是很多，斗争还明显带有防御的性质。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仍然很弱小，远没有实现六大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目标。

共产党内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中共六大结束后，在努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同时，共产党又坚决的同右倾的主张和行为作斗争。当时，陈独秀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们同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六大后共产党即同托陈取消派进行了斗争。

中国托派的最初来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苏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于1927年底和1929年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大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虽然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

他们反对和取消中国革命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托陈取消派首先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所谓“机会主义的领导”，从而完全否定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他们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关于组织北伐战争，关于发动工农运动等意见都是正确的，虽然它也有不少失误甚至是重大错误。托陈取消派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一方面是替自己的投降主义错误辩白；另一方面，是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取消中国革命。

第二，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矛盾问题。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涉及革命性质和战略路线的重大问题。托陈取消派在这个问题上



的中心论点，就是否认当时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他们认为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取得胜利，国民党对人民的统治已经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中共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路线，为他们的取消主义制造根据。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农村的富农）之间的矛盾了。这样一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就被一笔勾销了。

第三，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革命性质与革命政权性质问题。围绕着革命失败后的形势问题，托陈取消派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一直向下落，形成了托陈取消派的低潮观。他们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但由于没有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不应当组织红军，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斗争。他对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也不赞成。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确实处于低潮，但不像托陈派所说的那样，是一直向下落，也不同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的一直向上涨，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托陈派的低潮观，导致了他们的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的结论。托陈派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政权性质也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说：“中国1925年~1927年之革命，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国民党政权，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领导的政权；国民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以此来否定共产党坚持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托陈取消派提出所谓“第三次革命”论（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1925年~1927年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来反对当时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关于所谓“第三次革命”的性质，托派之间虽然有不同的提法，但是在他们的纲领性文件中强调：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民主政权现在已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可见，托陈派是立意反对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鼓吹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次革命。

第四，关于“国民会议”问题。托陈取消派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当时的总的政治口号，其目的是以此来代替共产党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他们把“国民会议”看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由的道路、必需的手段和唯一的形式，攻击代表着新的革命道路

的农村武装暴动政策。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完成，无产阶级只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只能进行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和工厂，准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关于红军问题。中国的托陈取消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组织红军，否则就是军事冒险。在他们看来，如果深入农村搞农民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会使共产党蜕变成为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左”倾盲动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是异曲同工的。

第六，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突变，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当时党内民主生活固然有不甚健全的现象，但主要的倾向则是组织不够严密，政治上处于涣散状态，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共产党的工作不能适应这种严酷的斗争形势。毫无疑问，在革命危急的关头，特别需要的是加强党的纪律，提高组织的战斗性。托陈取消派全然不顾这种客观形势，攻击共产党，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并实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企图造成共产党内政治上的混乱，导致组织上的公开分裂，从而达到由托陈取消派取而代之的目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停职而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回到上海后，他一方面揭露鞭挞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对于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的，共产国际应负主要的责任。应当指出，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是不适当的。

1929 年春，当陈独秀、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认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公正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独秀等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陈独秀反对中共六大路线，提出了同共产党对立的主张。1929 年 8 月至 10 月，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取消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观点。在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陈独秀在中央对他的信件未作出答复以前，就将这些信件经过彭述之等在共产党内散发，鼓动一些人起来反对党的路线，并且秘密进行小组织活动。

1929年8月，李立三针锋相对，写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一文，发表在由他领导的《红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专号》上。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理论错误及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错误主张，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陈独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陈反对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加以挽救。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再次作了系统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为尽可能给陈独秀等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仍责令他们"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完全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不接受党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举起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做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开除出党。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托陈取消派纲领)。到1931年5月，几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联合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1930年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三、四、五期上，李立三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长篇文章，全面地论证了党的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路线的分析，对托陈取消派胡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谬论，再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由于托陈取消派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就陷入分裂和瘫痪，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和纠正

从1929年到1930年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国民党统治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阀混战接连不断，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反而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有利的革命形势，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提出的。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共产党的多个组织被破坏甚至瓦解，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农村根据地缩小或丢失，红军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29年3、4月间，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的蒋桂战争爆发。此后又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之间的剧烈斗争；张发奎、俞作柏联盟的反蒋斗争；唐生智、石友三联盟的反蒋斗争。这些反蒋势力的斗争失败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从1930年1月开始筹划于3月达成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着手开始做反蒋战争的准备。5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个战场，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和湘粤边战争。这场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总耗资达五亿元，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10月间才以阎锡山、冯玉祥的失败而告终。

北洋军阀覆灭后，东北易帜实现了表面上的全国统一。但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的军阀政治，其特征就是以军队私有为基础，形成军阀割据。这必然导致各派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发动战争。在国民党新军阀



统治建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军和各路杂牌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各派军阀特别是蒋、桂、冯、阎四大派系，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除争夺地盘外，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权的争夺。这样，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此外各派系军阀都是有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为背景的。因此，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势必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纷争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只要各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野心存在，各派军阀之间的任何妥协都只是暂时的，和平共处的情况也只是相对短暂的。

频繁的军阀混战，一方面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混战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困境中走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城市，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说革命局面比大革命失败时有所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形成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强大。

在国际上，1929 年资本主义国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使得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统治并未瓦解，也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面对着看似对中国革命十分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部分领导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抬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出现。1929 年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1930 年 3 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已经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

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的。1929 年 2 月、6 月、8 月和 10 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接连发来多次强调“反右倾”的指示信和决议案，这些指示明显含有“左”倾错误的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0 月 26 日的指示信，信中断言：中国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并且认为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共产国际的这些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者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1930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的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地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现在就应集中红军攻坚。

在 1930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4 月 3 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



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

4 月 15 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激进地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5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正规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5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

“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①]。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②]

在1930年的4月、5月期间，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当1928年革命浪潮低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党内虽然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倾向，大家还比较容易清醒过来，从而较快的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一到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走向复兴时，党内不少人对革命形势作出脱离实际过高的估计。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界战争爆发后，此时周恩来已经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取



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地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③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6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6月12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6月22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南昌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间，李立三等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7月下旬，红三军团一度乘敌军防守空虚的机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8月5日退出）。李立三这时更加认为自己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8月初，李立三在整个共产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

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此时，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共产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十几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急遽发展，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1930 年 7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通过《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议决案强调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发展红军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党的第一任务，实际上是对李立三不重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观念的批评。并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 7 月扩大会议的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8 月中下旬，二人相继到达上海，开始采取措施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1930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指出“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并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总结。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会后李立三离开了原有的领导地位。城市暴动的计划已经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行动在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后已不再进行，中央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撤销，党、团、工会的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六届三中全会也有不足之处，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认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并错误地批评了曾经正确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会议仍然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过分的估量，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强调城市暴动的重要性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目标。这表明，继续克服“左”倾错误思想，仍然是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总的说来，作为“立

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整个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3页。

②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1930年5月30日。

③《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91页。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从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四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共产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周恩来、瞿秋白等的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这次会议，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不久，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与共产国际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在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共产国际在同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也没有类似评价。这次十月来信不承认这种说法的转变，强调自己看法的始终一致性。这封信虽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它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仍然是“左”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组织群众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来信批评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就导致全会之后开展的纠“左”工作无法继续下去，造成了全党的严重混乱。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其他留苏归国同志的途径，在10月底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



央，决定彻底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纲领性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指责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他们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0 年 11 月 13 日，王明和博古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标榜他们是带头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实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立三路线”的延续。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随后于 18 日、22 日、25 日召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说明六届三中全会已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承认没有把“立三路线”彻底揭发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为了扶王明上台，共产国际一反常态，置自己在中共六大会上宣布的以后不再派全权代表去中国的语言于不顾，突然派出米夫作特使来华。12 月 1 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传达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情况，对“立三路线”形成的条件，特别是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还批驳王明等共计三中全会的说法，批评他们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周恩来指出，他们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看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在立即夺取武汉等大城市和以此作为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端等问题上，和李立三的观点是相同的。这时，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纷纷起来要求改组党中央。控制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乘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种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这样，一方面有共产国际的压力，一方面有党内的宗派活动和思想混乱，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央政治局在 12 月 9 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

1930年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这次会议又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会上，与会者赞扬王明等人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为他们没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鸣不平。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在上海的远东局，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路线。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23日，在米夫的逼迫下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96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承认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做了较长的发言，极力宣扬《两条路线》的观点。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会议打着“反调和路线”的旗号，部分地改组了中央及政治局。会议撤销了李维汉、贺昌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夏曦、陈绍禹（即王明）、沈泽民等九人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七人。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陈郁、任弼时、陈绍禹等为政治局委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现了共产国际代表扶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中央领导的意图。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够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直接的、不正确的干预造成的。八七会议以来，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党的



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王明“左”倾错误是又怎样往苏区逐步渗透的呢？由于他们在中央的领导刚刚确立，又身处上海这样一个远离革命根据地的大城市，对苏区的指挥鞭长莫及，除了沿用机关交通的联络形式外，唯一能够对苏区发生直接影响的组织形式，便是三中全会确定建立的苏区中央局。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决定，1931 年 1 月 15 日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3 月 18 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那时苏区中央局没有收到四中全会的文件，尚不了解四中全会的精神，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肖道德和胡家珍、戴辰生由沪返赣，带回了国际的“十月来信”，所以决定先传达国际来信精神。会议由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并作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报告》，经过讨论，表示“一致地接受国际来信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这次会议，虽未传达和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但由于国际“十月来信”是王明篡夺中央领导权的由头，又是他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实际上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向中央苏区发展铺垫了基础。

同年 4 月中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于 4 月 17 日又在青塘召开一次会议，作为上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听取了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及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决议等五项决议。通过以上两次会议，王明的“左”倾错误便开始传到了中央苏区，标志着苏区中央局在政治上接受了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精神。但是，由于毛泽东、朱德等正确领导在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有深远影响，加之当时又处于紧张的武装斗争时期，一切工作均围绕粉碎敌军“围剿”这个中心，所以王明“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尤其是军事工作中去。

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1931 年 4 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钱壮飞获悉这个极端

机密的情报后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措施，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很快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将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于12月底前往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在他们离开之前，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周恩来、王明再一离开，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全盘继承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9月25日，王明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时也是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12月上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负责人康生，专门管理全国党的组织工作。

王明提议让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是有特殊原因的。早在1930年11月13日，王、博二人就结伙给中央写信，扮作反“立三路线”的急先锋，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领导，进行小组织活动，要求改组中央，掀起一股反对中央领导的风潮。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暂时隐蔽。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工作。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仅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进入“上海中央局”。当王明即将赴苏时，他自然要提携一起上来的博古。由他掌权，王明是最放心的。后来，这条“左”倾路线，延伸到中央苏区，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结束，给共产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根据博古的授意，会议传达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斥责毛泽东在军事上“保守、退却”，坚持的是“纯粹防御路线”。会后，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排斥了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

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他们认为“路线错误”的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



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1月底，临时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陈云及杨尚昆等到达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结果博古当选。其他负责人是：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即是临时中央，但对外有时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1933年6月初，博古、项英等赶到江西宁都，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杨尚昆。会议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之职。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宁都会议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这样，“左”倾路线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前方总部机关返回瑞金后，“中共中央局”名称停用，开始采用“中共中央”名称。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是常委会）。选出的书记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明（在苏联）、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由博古负总责。至此，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工作了两年零四个月后，即告结束。但它的路线却延续至遵义会议召开。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

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王明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



富田事变的缘由

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反AB团的斗争在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9月进入高潮，11月由地方发展到军队，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于是爆发了红二十军一部分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之后，“左”倾临时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因此，又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发现江西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人把持党务，这是他要把南昌变成反革命基地的极大障碍。于是，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组织成立国民党右派组织——AB团。其主要成员有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轨、巫启圣、曾华英、熊育钖、王礼锡、王冠英、罗时实、贺扬灵等。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AB团产生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篡夺省党部的领导权。1927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AB团篡夺了省党部的领导权。之后，很快把一些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各县、市。他们每到一地便纠集同伙，拉拢流氓打手，无恶不作，为所欲为，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同AB团把持的省党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月30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改造江西省政府的决定。4月2日组织了大暴动，一举打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4月3日，南昌各群众团体三万余人在皇天侧公安体育场举行揭发控诉AB团罪行大会，并组织了裁判委员会，除了少数逃到京沪的AB团分子外，被捉到的30

余名 AB 团骨干，批斗后被进行了处置。从此，AB 团的组织彻底崩溃，其寿命仅三个月。AB 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 AB 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 AB 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 AB 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 1927 年 4 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 AB 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

AB 团解体三年之后，赣西南苏区却把 AB 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共产党内的庞大的特务组织。因此，从革命队伍内部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 AB 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 年 12 月 12 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 AB 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

赣西南苏区在 1929 年冬开始肃反，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后扩大到反 AB 团分子的斗争。1930 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 AB 团大本营。接着，红四军前委根据二・七陂头会议精神，于 2 月 16 日发布第一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赣西南共产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打倒机会主义政策，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矛头逐渐对准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6 月份，赣西南党团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根据前委一号通告精神写的《反改组派 AB 团宣传大纲》，提出 AB 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豪绅地主的集合场，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对准改组派 AB 团勇猛杀去。

1930 年 10 月，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 AB 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 AB 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11 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 AB 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 AB 团首要分子。赣西南地区反 AB 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



肃出的AB团与日俱增，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 400人之多。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立即派李韶九前往捉拿。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还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于是立即通知刘敌返东固。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的刘敌奉命从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没有立即逮捕刘敌，但李韶九与刘敌谈话时，采取威胁和拉拢的办法，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后认定李韶九抓AB团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而回到独立营营地。并在12日晨与营长张兴、政委梁贻秘密开会，紧急商议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让他们讲出阴谋，救出被关押的同志。但张兴不等请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

1930年12月12日，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放出了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由于担心李韶九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省苏警队排12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正在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古柏、曾山等发现情况，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12日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

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13 日一早，20 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此后，红二军领导人又让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模仿毛体，伪造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但被朱、彭、黄识破。

此后，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良弼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 200 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931 年 1 月 5 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接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将其定性为 AB 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要决心消灭叛逆。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 1931 年 1 月 16 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 AB 团取消派。苏区中央局在 2 月 19 日的第十一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



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①

1931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2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 AB 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 AB 团所利用”。②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 3 月 28 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 A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4 月 17 日，任弼时一行三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塘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前往苏区中央局青塘村。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他们刚走进青塘村，立即被捕，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同志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 AB 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 月 19 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

兴国，于都一带转移。7 月，他们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20 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 20 军的番号被宣布撤销。不久，又将这些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 172 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讯逃脱。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忠心的优秀。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七万多 AB 团，两万多改组派，6 200 多“社会民主党”。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 AB 团这一类的组织，认定为“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案。

首先，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同 AB 团毫无关系。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马铭、丛允中、金万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和骨干。他们不仅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而且是红三军、红二十军等江西地方武装的组织者与创始人。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兵源是他们动员群众输送进来的。毛泽东 1929 年 1 月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于 2 月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也是他们竭力给予帮助和支持，使红四军得以休息整顿一个星期，开辟、壮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力量。1930 年 5 至 9 月，毛泽东率领的主力红军不在赣西南苏区，这时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在他们领导下得到继续巩固和发展。总之，他们的斗争历史，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证明他们同 AB 团毫无关系，AB 团纯系强加的罪名。

其次，事实证明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虽然把队伍拉往河西，使防地空虚，有错误，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也避免了红军互相残杀的悲剧。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始终没有任何动摇。省行委 1930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和 1931 年 1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都把对敌斗争作为前提进行了部署，实际上他们一直把发动群众，消灭敌人，攻打吉安作为活动准则。无论多么艰险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投敌叛变，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和敌人作斗争。这是



有案可查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历史已充分证明，“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

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是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同时也可看到，富田事变的行动，也确有某些错误，如何看待他们的错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分析。如果当年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 AB 团，绝对不会有富田事变；如果富田事变后按犯错误进行处理，今天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在敌人 10 万大军“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关头，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但对领导机关肃 AB 团的错误采取武装反抗的手段，无疑是错误的。尤其是把队伍拉过河西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口号等更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像中央苏区肃清 AB 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实在是不应该的。

注释：

①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11 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05 页。

赣南会议改变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1931 年 11 月初，中央苏区党组织在赣南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把毛泽东的主张说成“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反右倾，开始排斥毛泽东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

早在 1930 年 8 月至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四次讨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当时，任弼时即被指定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1931 年 1 月 15 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正式成立，任弼时仍是九名成员之一，但他仍在上海。当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三人。

中央政治局对于苏区中央局已正式成立一事，直到 1931 年 2 月尚未得到正式报告。2 月 6 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增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以加强苏区的理论宣传工作，得到同意。这次会上还决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四人为常委，项为代理书记，任管组织，王管宣传，毛管军事。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派顾作霖为团中央代表去苏区中央局工作，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这次会议上王稼祥提议，第一批去苏区的同志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去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此议获得通过。于是，便有了“中央代表团”。

恰在这时，中央得知赣西南苏区发生了富田事变的消息。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



在赣南会议之前，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无论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革命的路线，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国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为处理富田事变，1931 年 2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全盘解决”，并委托任弼时代表中央起草一信。2 月 23 日，由任弼时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的信件发出。信中告知：中央已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未到以前，从总前委起直到各地支部，所有组织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3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正式决定“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并要他们立即动身前往苏区。

任弼时等三人离开上海前，中央将筹备召开“一苏大会”的部分文件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部分组成人员名单，交给了任弼时。周恩来还将由他亲自编制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无线电密码，交给任弼时带往中央苏区，并交代由任亲自掌握，以保守党的机密。

1931 年 4 月“左”倾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其所肩负的使命，除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一项外，其余几项很快完成。4 月 17 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及“左”倾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量，并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这个决议无端指责 1930 年 6 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这年春夏，毛泽东、朱德坚持积极防御战略，采取“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方针，指挥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敌军第二、三次军事“围剿”。从 1931 年 5 月开始，任弼时他们不再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开展工作，而是参与苏区中央局正常的领导活动。同年 5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并且明确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这样，苏区中央局与“中央

代表团”的职能合而为一。由任、王、顾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其历史使命也到此为止。

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后，1931 年 8 月 30 日，王明主持下的党中央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提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并罗列了这种错误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解决土地农民问题、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方面、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及党内和群众中思想教育等五个方面表现，并且认为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根源是受“联合富农政策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影响。”同时还指责苏区同志对上述的根本错误，“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执行及时的纠正”，还犯有富农路线的错误。此外，指示信还指责“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中共中央这封信，是中央代表团召开赣南会议的指导思想。

为了贯彻中央八月指示信的精神，对照总结检查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这次会议主要贯彻中央 8 月 30 日指示信，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提出要防止不顾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覃等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说明根据地现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群众是拥护的，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中央代表团不顾根据地干部的意见，坚决贯彻王明中央的“左”倾路线，围绕中央指出的中央苏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这一条，开展各方面的具体批评与指责。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凭借中央路线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威力，通过了中央代表团成员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都“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



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实践经验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他们认为：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有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照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并且坚持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富农路线，虽然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决议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由各军政治部管理。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传统”，应采用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和夜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都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1 年 11 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职务自然取消，至于他的中央局

代理书记一职暂时不动。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 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由上海到达瑞金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赣南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否定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中央文件变成为实际行动，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这是符合王明亲自起草的中央 9 月 20 日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精神的。这个决议，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大打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还很不够。在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时，临时中央常委认为：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中央区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是“民粹派的观点”等。接着，临时中央连续发出批判“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的文件，如 4 月 14 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5 月 20 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指示电批评赣南会议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指出：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这就明显地预示着，中共临时中央要加强对毛泽东的打击。



反“罗明路线”与所谓反“邓、毛、谢、古”斗争

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而就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形势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瑞金，随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一些重大决策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于是从1933年2月开始，在福建省大张旗鼓地反对起所谓的“罗明路线”来。这场斗争导致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等福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撤职。

3月，临时中央又在江西开展更为猛烈的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不仅打击了所谓的“毛派”——“邓、毛、谢、古”，而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县委书记几乎全被撤换，极大地削弱了江西党的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通过这两次错误的党内斗争，更加强化了“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统治。

罗明当时只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而已，之所以被批斗，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罗明原名罗善培，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年，罗明受广东区委委派，参加了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1926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28年2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6月作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党的“六大”，回国后，长期在闽西上杭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斗争。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于年底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

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1930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任书记，大搞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罗明与张鼎丞、郭滴人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

1930年，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1931年1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王明已取得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沈泽民与罗明谈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1932年3月，闽粤赣边区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1932年3月14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在长汀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闽粤赣边区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后来，在进军漳州时，跌伤了腰部，住进了长汀福音医院。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受到“左”倾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之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撤消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让他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0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也到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向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不久，福建省委组成前敌委员会，罗明为书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谭震林、方方等到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后将战争胜利的经验向连城、新泉、武平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领导作了传达和介绍。但罗明的做法却受到了中央临时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的指责。会后，省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呈



报中央政府。“左”倾苏区中央局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随即，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即福建省）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去迎接。由于罗明执行了毛泽东对反“围剿”的游击战术，对新中央的指示并不了解，因而罗明与博古的首次面谈不欢而散，给博古留下了不大好的印象，这与日后的反“罗明路线”不无关系。1933年1月19日博古等人平安抵达中央苏区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由上海迁到瑞金苏区。随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

在进入中央苏区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众人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要掌握中央苏区的实际权力，就要在人事上作一个大的变动。此时中央苏区省县一级的干部大多是毛泽东任命的，他们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对这些新来的“钦差大臣”也不适应，而博古等人更是瞧不起这些凭借经验办事的地方干部。

博古为了积极推行所谓“积极进攻路线”，不顾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下令要江西、福建等地“猛烈扩大红军”，并限期要江西、福建地方党组织完成扩红任务。敌人乘机大举向边区进攻，边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群众意见很大。罗明依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边区的实际工作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两次向省委写了报告，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与《关于杭永岩情况给闽粤赣省委报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阐明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在前一个报告中，罗明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罗明认为党在岩、永、杭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在后一个报告中，罗明根据这个地区群众长期受战争苦害的情况，认为要在这些地方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扩红任务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卫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而不愿意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群众这种低落的斗争情绪，必须靠我们很艺术地组织胜利的武装斗争来提高。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

且一些说法不当，比如："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明所提的意见，与当地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这个报告是先转给省委，由省委转给中央，这样做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省委将这个报告通过当时正在汀州检查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洛甫上交中央。罗明的报告引起了博古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罗明严加指责。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词。博古后来见到赶赴瑞金的罗明时质问他道：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指的是毛泽东。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一些重大决策是退却逃跑路线。罗明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①

临时中央为了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首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 年 2 月 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武断地说："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改组省委机关，"并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

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做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全面详细地阐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对"罗明路线"的"实质"，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无限上纲的"揭露"和"批判"，基本上定下了在全党反"罗明路线"的调



子。博古在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从而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从福建蔓延到江西，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2 月 20 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并给“罗明路线”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罗明路线”运动中，不少人听到要与“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是“反革命分子”。闽西“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人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最后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也都被称做是“罗明路线”分子。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被斗得晕头转向，在“肃反”之后剩下的一点老干部都遭到打击和排挤，一时间造成了人人自危，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许多本来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和罗明接近。而下层同志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反“罗明路线”的 2 月旋风，在福建冲击了如谭震林、张鼎丞等一批老干部后，1933 年 3 月间又刮到了江西。“左”倾领导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而邓、毛、谢、古是江西苏区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代表人物。

邓小平时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他们四人被称为“毛派”。

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博古等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

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仍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等等。并且，在1931年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即有过抵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同志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过我们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就被认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因此，他们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地方红军一部被编人中央红军，红军独立三师也被调往北部，兵力空虚的寻乌县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占领。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及时地组织了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抓住这一点，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导火索。

1933年3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绕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3月31日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即“罗明路线”，并批评江西省委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人。这次会议，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4月下旬，在中央局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并公开提出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督促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指责江西有“三个怪”障碍了工作的开展，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但邓小平等四人在原则问题面前并没有退却，他们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与他们所写的申明书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观点。

江西各县相继召开“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成为红军中的“罗明



路线”代表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反“江西罗明路线”历时一年多，由上层到基层、军队，打击了不少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给江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临时中央提出了“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之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大搞人人过关。1933 年 6 月到 8 月，各县相继召开了以反“罗明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党代表大会。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左”的中央领导人还推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老干部，轻率地提拔随声附和的新干部。仅广昌县在 1933 年 5 月到 8 月，就洗刷了县苏维埃主席、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等主要干部 17 名；由谢维俊担任司令员的江西军区第二分区，洗刷干部 50 多名。1934 年 4 月到 6 月，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被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而新干部缺乏经验，在“进攻路线”行不通时又被撤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极大地削弱了全省的党组织。

在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中，邓、毛、谢、古受到“无情打击”，分别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反“江西罗明路线”直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时才结束。这场斗争，实际上反对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注释：

①《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21 页。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它直接关系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成败。共产国际在会议议程、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以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上事先均作了仔细的安排，并与中共中央有过沟通。这次会议全面肯定、维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并将这种错误发展到顶点，因此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长征。毛泽东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同意中共中央让毛泽东赴苏的动议，后又对全会的政治决议中一些极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这次全会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选入政治局，为今后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性。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三年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从 1930 年 11 月至 1931 年 9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了一至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其他省区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出现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高潮。同年 11 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政权对立局面。另一方面，1931 年 9 月，因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他们通过 1931 年 11 月的赣南会议和 1932 年 10 月的宁都会议，进一步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打击和排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 年 1 月，临时中央



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同年9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造成对红军和根据地的严重威胁。

这次会议的召开其实在事先共产国际早有安排。1932年冬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报告说，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团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其他成员，包括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建议在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召开第五次全会，以便总结近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并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在收到上述电报的第三天（12月21日）就“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1933年3月19至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就当前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和工会政策作了指示，其中特别提及：“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在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①

关于六届五中全会的议程，共产国际也有具体的安排。9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代表的电报说：“为不使全会负担过重，请只讨论以下问题：1. 总的政治形势；2. 反第六次‘围剿’（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任务；3. 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请作出简短通俗的决议。以前关于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和工会政策问题的电报仍然有效。要在反帝团体里建立无产阶级骨干力量，在企业里开展群众工作，在作战行动中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在上海和在北方取得了部分成绩，但工会工作还是最薄弱的方面。……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在工会中工作，谁就不是革命者。责成每个党组织制订出具体的工会工作计划，并对完成情况经常组织检查。要对准备和举行罢工以及掌握自发行动的不足之处进行具体的批评。苏区的工会组织应该吸收每个工人参加，并克服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②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关键时刻，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满洲、四川、陕西、河南、鄂豫皖、江西、福建、粤赣、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省委的代表参加。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将“左”倾

错误发展到顶点。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上述三个报告，于1月18日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形势的分析。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分析。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从这一结论出发，全会不顾当时中国革命运动遭受的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挫折和白区工作的巨大破坏等基本事实，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一斗争的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③

二、规定党在苏维埃区域和国民党区域的各项任务。全会指出党在苏区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党的四中全会以来，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粉碎罗章龙反革命派，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在面向工厂的基础上，白色区域内的革命职工运动方面，曾得到了许多成绩，党不顾一切困难坚决地领导工人阶级日常斗争，参加与组织了工人的罢工，组织了反日的罢工与反帝非战大会的群众运动，进行过反对'围剿'红军的群众运动。国民党区域内革命职工运动渐渐开始走上了坚决转变的轨道。"同时《决议》承认"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之开展的速度和范围与党和赤色工会的领导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白色区域里的工人群众斗争，没有在党和赤色工会领导之下提到应有的政治高度，而与苏维埃运动密切的配合起来，……甚至没有恢复过去失去的阵地。规定党在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



红军的口号。”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党要求：1. 健全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组织，使他们变成为红军的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与地方部队。2. 加紧与改善苏维埃工作，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强与密切自己与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3. 继续实行苏维埃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4. 努力扩大、加强、健全一切苏区的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5. 加强和健全党的组织，提拔训练新干部，清除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保证完成任务。④

全会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强调“为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一些地方把群众的统一战线变成放弃党的独立政治面目与黄色领袖和平合作的倾向”，认为党应该“去组织工人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建立下层群众反抗资本的统一战线，……加紧在统一战线内部无情的暴露黄色工会及反革命派一切的叛卖斗争的企图。”⑤

五中全会认为党的白区工作十分薄弱，尤其是中心城市党的工作状况很严重，，仍是党整个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为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党规定在白区的工作任务是：1. 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党的全部力量应放到工厂、工会罢工上面”。2. 发动农民群众反对捐税和高利贷，反对地租的斗争，发展分粮抢米，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农村中，党要团结贫农、反对富农，打倒地主豪绅。3. 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4. 党必须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为完成上述任务，白区党的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党的组织，”“创立与加强党在大的工业中心的工作与组织。”⑥

三、高度评价六届四中全会，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全会指出：“四中全会后三年来的事变与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愈益明显地显示了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全会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认为“奠定了党内工作全部转变的基础”，“完成了党在布尔塞维克化方面极大的进步”。使党“最后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全会强调：在新的形势面前：“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为政治局委

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全会还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知道较晚，也不太清楚。直到1月2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还没有收到详细的通报。7月4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结果。8月3日王明、康生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进行了批评：

第一个问题是六次“围剿”问题，政治决议讲将冲破六次“围剿”，作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六次“围剿”的政治意义是这样的估计：“粉碎六次围剿的斗争，那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那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像这样的措词，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即是使一些人感觉到六次“围剿”的斗争，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事实上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问题，……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这样使中国的民众可以认识只有苏维埃是真正准备力量，武装抗日，但是这一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便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所以我们提议中央向苏区各级党明白解释这一口号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与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在五中全会决议上说，冲破六次“围剿”来实现这个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苏维埃革命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如果现在还把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否认了这些省份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把这个任务了解成占领一省与数省的中心城市。……目前……如果将占领一省数省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心任务，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1）使党员和群众觉到党提出的行动口号在几年斗争中不能实现；（2）使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方向，就不能适应目前环境和将来的前途的需要；（3）不能有计划的适当的分配和蓄积我们的力量。

建立反日反蒋的广大联合战线问题———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但是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策略原则，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个口号之下，不仅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尽可能的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如果这方面过去我多半是处在等待被动的地位（指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方面），那么现在应当走到积极的和主动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组织一个反日反蒋的最大运动，能够使中国革命走到新的有利阶段。同时也就是真正的帮助红军冲破六次“围剿”的有效方法。⑦

王明等人这封信，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切实的、具体的改正“左”的错误的政策与措施，但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指出了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中一些极左的观点，进行降温。

六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全会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全会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继续在党内和红军内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干部的政策。强调“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全面肯定、维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并将这种错误发展到顶点。“左”倾错

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迫使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

另一方面，这次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革命的精英。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入选政治局，为今后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性。他们在一年后的遵义会议上成了反对“左”倾错误、改变中央错误领导的中坚力量。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又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是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尽管张国焘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以红四方面军的八万之众要挟中央，但在中央政治局中他是绝对的少数。在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斗争下，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图谋，不得不遭到可耻的失败。

注释：

①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81 页，第 499 页。

③④⑤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3～38 页 第 53～54 页、第 63～65 页、第 73～77 页。

⑦周国全、郭得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4～105 页。

连续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不经历前进和后退，胜利和挫折的搏斗而成长壮大起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上，先后犯了三次大的“左”倾错误，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为什么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续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呢？要知道，在革命战争时期，每一次路线错误都是要付出血的教训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

第一，共产党内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左”的错误。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教训时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其缺点是：一是没有注意使干部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二是太着重了个别同志的责任。没有真正了解清楚国民党的性质，以为没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更具有一致的可能，更能团结和合作。”①

共产党内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广泛性和复杂性。敌人是如此强大，革命力量是如此弱小。革命是复杂的，简单看待革命，是党内许多同志对左倾错误无法正确判断。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最大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从历史来讲，封建观念的影响，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阴影。主要的体现在对权威的崇拜和对“本本”的依赖。封建观念的阻碍，使得在很多行动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

第二，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还处在幼年时期，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特别对在革命词句掩盖下的“左”倾机会主义更是认识不清。从党内斗争经验来看，一般地说，共产党处在与国民党分裂的时期，也比较容易发生“左”的错误。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准备，在创立之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加之吸收入共产党内的一些成员党性不够，没有对共产党有较全面的认识，普遍素质不高，整体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性问题。党内一些人只知道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不知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有创新地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渐滋生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这使得那些脱离中国实际，违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这一根本原则的“左”倾观点，被人们所接受并日益严重起来。“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第三，王明“左”倾错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依靠三块“招牌”推行其“左”倾错误，其有更大的欺骗性。

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王明依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往往把不同意见和反共产国际路线联系起来。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王明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行什维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引处吓唬工农干部和青年。

打着反立三路线，反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号。王明说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并认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他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以“改造领导”、“改造中央”，使“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



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第四，共产国际错误的领导。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十分关键又极为消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成立的。具体来讲，从1922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形成了上下级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从事的活动与共产国际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上的“左”倾指导思想有密切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此时期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的“左”倾错误，其真正发端不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而是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对当时国民党的性质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特点上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左”倾错误与它在大革命时的“左”倾错误是一脉相承的。

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都曾起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历史中，在指导中国革命上也出现了诸多重大失误，造成了一些极为严重的后果。

共产国际大部分时间内都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②]。各国党同时也就成为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加入国际后，同国际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过程中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层和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极力干预，造成了此时期中共在革命上先后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虽然中共的前两次左倾错误的纠正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从总的来说共产国际还是没意识到自身一直存在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左”的倾向。

1925年，斯大林在执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

党的事物”，并且说“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3]。当时我党不仅年轻幼稚，理论水平低，而且力量小，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尊敬、信仰和忠实随着本身的生长在加强着、生长着、巩固着。”[4]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建立及初期发展过程中是有功绩的，这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磨灭的。但是，共产国际远离中国，不能及时掌握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变幻迅速的形势，使共产国际很难及时做出反映。对这种情况，国际仍然“以莫斯科发号施令”，这就不可避免地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由于对共产国际的崇拜，对其决议指示神圣化，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有分别地运用这些决议和指示，而是照搬照抄，结果对形势判断失误，在策略上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教条主义错误。

当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7年5月就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极其复杂的任务，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军阀的斗争跟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相互交错”[5]。罗米那兹作为国际代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说：“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取得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6]

他的这种观点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是一起加以反对。没有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整个资产阶级以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根据国际的决议精神，也对阶级关系进行分析。第一次“左”倾的代表者认为，“四·一二”蒋介石反动以后，“中国革命战线中，资产阶级几次陆续地退出革命战线而进入反革命的阵营。”[7]第二次“左”倾的负责人认为，国内阶级关系“显然是两个阶级的对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和农民。”[8]第三次“左”倾的主导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大中层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9]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认识阶级关系的一致性，是有其共同的思想根源的。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国际方面所起的作用。由于对阶级关系的错误认识，使革命性质混淆起来了。

在“八七”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根据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各阶级分离组合情况，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他



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的联合，南昌暴动时期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过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10]中国共产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发展。”[11]在他们看来，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这样，就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共产国际在纠正第一次“左”倾错误时，仍然把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对象，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则提出，中国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因为革命动力成分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资产阶级一块，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在直接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12]同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底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段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底迅速，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得多。“[13]

李立三根据国际的观点，提出了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14]。他们同样混淆了不同革命阶段的界限，否认革命性质的转变需要在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李立三错误与国际有直接关系，然而，李立三又受到了国际批评，使他受审检查，并没有对理论错误加以彻底纠正，相反，说李立三是右倾，这样，不但没有扫除“右”的根源，而且给王明再次推行“左”倾路线铺平了道路。王明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下上台的，作为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提纲——《两条路线》小册子，完全是照搬国际的，王明本人并不讳言地说，小册子是根据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成的，博古在“七大”检讨时也说过，许多问题书上没有就抄国际的决议。所以说，王明

路线基本上就是国际路线或斯大林路线。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成为王明“左”倾错误在阶级关系方面的理论根据之一，根据斯大林说法，第三阶段中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这样，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地划入了反革命阵营。斯大林的这种观点成为共产国际从1927年~1931年后，一段时间里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观点。这种观点散见于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之中，王明的小册子的内容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把资产阶级同样列为革命的对象，必须打倒，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上，认为“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半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15]。同时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已转入了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16]他们完全抹杀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这种关门主义，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在革命性质，王明等人虽然承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他又说，“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已跨过了俄国1905年~1907年革命的进程，所以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17]对革命性质的认识是不明确的。王明言论的渊源在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文件中，王明自己并没有独到的新见解，所以，可以说王明的“左”倾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总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接连三次出现“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阶级因素和外部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单独强调某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三次“左”倾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历史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颇值借鉴。

鉴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领导地位，这也就决定了随之而来的王明的“左”倾错误又是难以避免的。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王明的上台完全是共产国际一手经办的，有了共产国际这个靠山，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组织了左倾宗派主义领导集团，并又通过两个步骤夺取了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步炮制江浙同乡会，组织造成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之间



的剧烈摩擦，从而打击和搬走了这个阻碍自己上台的最大障碍；第二步提出要在共产党内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机会主义要加以无情打击，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实现了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这是前两次左倾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而他之所以极力打压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完全是为了他夺取党和革命的领导权的需要，并不是路线上的根本分歧，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

固然我们不能把责任全盘推到共产国际身上，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起着一般的指导作用，很多时候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共产国际本身的缺陷、革命理论的不完备，再加上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出现错误指导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一个不成熟的共产国际指挥着一个不成熟的中共，一个脱离实际的上级引领着一个书生气的下级，一个缺陷甚多的组织指导着一个同样问题多的组织，这所有的问题结合起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此外，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犯“左”倾错误原因的多维审视，还可从文化上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西方文化和苏联文化的不利影响一直在作祟；从伦理上看，受到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品行不端、能力素质不高的影响；从心理上看，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复仇心态、小资产阶级急躁冒进心理、知识分子优柔寡断心理及其他心理在党内的反映。

注释：

①《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94页。

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③《斯大林全集》（七），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58页。

④陈潭秋：《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⑤《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0页。

⑥⑪⑫⑬《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第222页、第223页。

⑦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革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⑧李立三：《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⑨王明：《两条路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8页。

⑩《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见《周恩来选集》（上），第160页。

⑭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273页、第339页。

⑮⑰《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内部版，第1页，第300页。

诱敌深入 龙岗大捷 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是在力量上升，但与国民党力量相比仍有较大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从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开始到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历经曲折，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约10万人，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并开辟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左右江等大小根据地15块，这使红军有可能实行从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大规模的歼灭敌人。

面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感到极大震惊和异常的恐惧。为尽快消灭红军，也为避免以前由一省或几省军阀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失败，由国民党政府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于8月下旬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根据地红军的总方针。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取得胜利，使之有能力抽调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企图在3个~6个月内消灭红军，将重点置于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同时指令其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任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实施。

鉴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指示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目前党的最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各根据地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相互策应。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要“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惫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各个击破”。

10月20日前后，从湖南省和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方面抽调“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陆续进入江西省境内，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也准备

进入江西参战。11 月 2 日，鲁涤平将集中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为三个纵队。并限于 5 日前，第一纵队第十八师集结于樟树，第二十四师集结于丰城西北之赣江北岸，新编第十三师集结于临川；第二纵队第五十师集结于西山万寿宫，独立第十四旅集结于靖安；第三纵队第七十七师集结于上高，新编第五师集结于高安；总预备队第八师集结于南昌。企图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摧毁根据地，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袁水流域的清江（今临江）至分宜地区。

这时，红一方面军约四万人正在根据地西北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活动。10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反“围剿”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讨论中，有一种意见主张仍按中共中央和军委 8 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在红军和根据地尚未巩固、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宜脱离根据地贸然攻打大城市。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应主动退却，将敌诱进根据地内，发现和造成敌之弱点，依靠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于红军作战之战场，集中兵力适时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之中，以粉碎其“围剿”。

10 月 30 日，总前委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罗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通过了“诱敌深入”这一方针。11 月 1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之”的命令，并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在地形、群众条件较好，便于尔后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作战，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据此，中央苏区党、政、军、民迅速行动，进行政治动员，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作战，建立支援红军作战的组织等反“围剿”准备。

11 月 5 日前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以红三军留在赣江西岸监视国民党军；率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第十二军等部，从袁水两岸东渡赣江，向靠近苏区北端的新淦（今新干）、永丰、崇仁、宜黄之间地区转移，并向樟树镇、临川方向进逼。11 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喻（今新余）、分宜等地，均因红军已先期转移而扑空。鲁涤平得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遂以第三纵队仍在赣江西岸进攻，以第一、第二纵队尾追过赣江，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红军面对国民党军的并进长追，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即以少数兵力



配合群众武装迟滞、消耗“围剿”军，主力于11月中旬分别由赣江以东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18日~20日，“围剿”军各纵队分别进至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再次扑空，遂转入就地“清剿”，为进攻根据地中心区作准备。12月初，红二十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并与当地群众在东固附近山头构筑假工事迷惑敌人，主力则秘密移至宁都县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集中。中旬，又移至平田、砍柴冈、安福圩地区，抓紧整训和筹措给养。

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亲自组织对根据地的“围剿”，确定于中旬开始，各路“围剿”军以东固地区为会攻目标，分进合击。并急电催调第十九路军由武汉入赣参战；另调驻福建的第五十六、第四十九师、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至此，“围剿”军总兵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为了加强指挥，设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鲁涤平兼主任；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其部署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由蛟湖向东韶、洛口、宁都进攻，第八师由黄陂、南丰之线向广昌、宁都、雩都（今于都）进攻，第五十六师经建宁向石城推进；第四十九师和暂编第二旅向瑞金、会昌推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由永丰分经古县、白沙向东固进攻，第五十师由乐安分经招携、藤田向龙冈、东固进攻，新编第五师由吉安经富田向东固进攻；第七十七师主力守吉安，一部向安福方向“清剿”；第十九路军第六十、第六十一师经萍乡分向万安、泰和推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仍防守赣州。

红军适时反攻，打破“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鉴于国民党军正面宽大的“围剿”布势及战线拉长，间隙过大，兵力分散，且“围剿”军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派系复杂，难于协调等情况，于12月中旬在宁都县黄陂召开总前委会议，再次缜密研究反“围剿”作战方案。毛泽东等鉴于战场态势已利于红军反攻，决定选择接近红军集中地的“围剿”军主力为歼击目标，集中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割裂“围剿”军整个部署，然后各个击破，粉碎“围剿”。

为不失时机地转入反攻，红一方面军派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赴兴国东北约溪地区引敌西向并监视之，主力全部集中到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抓紧进行政治鼓动和临战准备。12月16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19日~21日，新编第五师（后改称第二十八师）、第十八师先后

进占东固，未见红军主力，该两师却在浓雾中发生误战。第五十、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二十四、第八师分别进到招携、万安、泰和、草台岗、新丰、三坑等地。沿途屡遭红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袭扰、阻击，交通运输常被阻断，故进展迟缓。24日~28日，第二十八师进至因富，第十八师先头1个旅进到南垄；第五十师进到源头，准备续攻小布；第二十四师经东韶进至洛口；第八师进到广昌，先头进至头陂；第六十师准备经赣州转向北进，配合泰和之第六十一师进攻兴国。红一方面军得悉第五十师欲孤军进犯小布，遂于25日和27日两次在小布设伏。但该师唯恐被歼，不脱离源头阵地，红军伏击未成，撤回原集结地待机。28日，鲁涤平令其深入根据地的五个师向宁都以北黄陂、小布、麻田地区红军发起总攻。其中张辉瓒率第十八师第五十二、第五十三旅和师直属队，于29日由东固孤军冒进龙冈。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第十八师主力向龙冈推进，当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在赤卫军、少先队配合下，牵制源头、洛口、头陂之第五十、第二十四、第八师；集中主力分左、右两路秘密西进，求歼第十八师主力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29日下午，方面军在向龙冈前进途中，查明第十八师主力已到龙冈，当晚确定围攻龙冈的部署：左路红三军为右翼，于30日晨占领木坑以北地区，继向龙冈攻击前进，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指挥第六十四师）为左翼，于30日拂晓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占领龙冈南端之盲公山，主力截断龙冈至南垄大道，从兰石、茅坪攻击第十八师侧后；右路红三军团、红四军以主力向上固、下固前进，以一部到还铺附近，向龙冈西北端之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固无敌，主力向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以一部向下固、潭头警戒。在约溪地区的红三十五师，于30日午前插至南垄、龙冈之间，配合红十二军主力攻击龙冈，并向南垄警戒。方面军总部30日进至小别附近的黄土岭指挥。

30日晨，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为先头，师部和第五十三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9时许，其先头在龙冈以东小别附近，突遭居高临下之红三军先头第七师迎头痛击。张辉瓒误认为是红军小部队袭击，自恃兵力、武器占优势，遂组织部队向红军阵地反扑。战至中午，红三军全部加入战斗，第十八师亦展开两团兵力猛攻，战斗十分激烈。15时许，张辉瓒率4个团拼力向红军实施多路进攻，又被击退。此时，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已插到张家车，截断了第十八师与东固、因富的联系，并从侧后向龙冈猛攻；红三军团主力占领了上固及附近有利阵地，切断了敌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之敌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至16时许，完成了对第十八师主力的合围，红军

即发起进攻。张部向西北突围未逞，全军溃散。激战至18时许，红军全歼第十八师师部和2个旅，俘张辉瓒。

第十八师主力被歼后，深入根据地的其他各路“围剿”军闻讯退缩。其中，第五十师于1931年1月2日晨分路溃逃，主力经南团撤往东韶。红一方面军总部当日决定，分左、中、右三路尾击第五十师主力。中路红十二军经南团、琳池由西向东攻击东韶；左路红三军团经头陂由北向南攻击东韶；右路红三军到达田营后，以主力牵制第二十四师，以一部迂回东韶以东攻击；红四军为总预备队，随红十二军跟进；方面军总部进到龙坛指挥战斗。3日，红军中、左路相继进抵东韶附近，旋即向立足未稳之第五十师发起攻击，激战至15时许，分别突破其防御。但这时，因右路红军尚未迂回到东韶东端，第五十师余部乘隙向东和东北方向窜逃。红军奋起追击，再歼其一部。此战共歼第五十师1个多旅。

东韶战斗后，各路国民党军争相撤离根据地，在兴国、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之线转入防御。至此，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

此战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以少胜多，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不仅保卫了中央根据地，而且使中央根据地得到巩固与扩大。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这样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集中兵力　运动中歼敌　红军打破第二次“围剿”

1931 年 4 月至 5 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围剿”的战役。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1931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又以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兵力，并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输入苏区，然后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以主力分路推进，互相策应，以期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这时，红一方面军仍是第一、第三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 3 月 23 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 1 月 15

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强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十九路军、第二十六路军和第六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五路军的第四十三、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从北方新到，第二十八、第七十七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开始进攻，红军主力退却，待机反攻。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第十九路军之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主力由兴国向龙冈、宁都方向前进；第五路军之第二十八师、第四十七师1个旅、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师，分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之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师，由乐安、宜黄向大金竹、洛口方向前进；第六路军之第八、第二十四师、第五师4个团，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各路国民党军在红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阻击、袭扰下，行动缓慢，至23日，始进到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界上、横石、广昌之线。国民党军在进攻中，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手段。按照“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每日只前进2.5~10公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召回地主豪绅，

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恐怖统治和欺骗宣传；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牲畜，制造苏区经济困难；派遣特务进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人民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后方。

中央苏区党政军民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和破坏手段，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红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破袭国民党军的后方交通线，袭击其兵站，打击“守望队”和“善后委员会”，迟滞国民党军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进行反“围剿”作战的准备。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反“围剿”的方针和红军作战方向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有的主张红军应分散到苏区外，进行游击战，把国民党军引出苏区；有的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南、贵州、四川建立新苏区。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粉碎敌之“围剿”；并提出先打较弱的第五路军，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下一次“围剿”。最后，中共苏区中央局肯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4 月 20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都、石城、瑞金地区出发，于 23 日转到退却终点龙冈、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进行临战训练。

红军转入反攻，粉碎国民党军“围剿”。5 月 10 日，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推进。第五路军之右翼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 1 个旅，于 13 日由富田地区分两路向东固前进，15 日进到桥头江、择龙坑之线；中路第四十三师由水南进到大源坑、潭头；左翼第五十四师由严坊进占百富、沙溪。与此同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各一部经崇贤、方太向城冈圩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之第二十七师经大金竹向南团前进，第二十五师进占肖田、东韶、洛口；第六路军之第五师一部和第八师进占头陂、白水（今赤水）后，即在这一带“清剿”，第二十四师进驻广昌，第五十六师进至福建省安远汛（今安远）后，以一部兵力进入江西省“协剿”。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山区持重待机 20 余日，终于等到了第五路军右翼部队脱离其富田阵地的极好时机。5 月 14 日 ~ 15 日，朱德、毛泽东决定集中兵力，歼灭由富田出动之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 1 个旅于运动中。部署是：红三军团并指挥红三十五军为左路军，经江树头、固陂圩迂回到富田侧后进行攻击；红三军（欠第七师）为中路军，沿东固至中洞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红四军（并指挥红六十四师）、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为右路军，分两路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隘口，尔后向富田攻击前进，

红三军第七师和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一部位于枫边、城冈及方太、崇贤附近地区，阻击第十九路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一部位于潭头一带，协同地方武装一部，阻击第五路军之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师；对第六、第二十六路军，则以地方武装和赤卫军予以牵制。

15日拂晓，红军各部按照上述部署开始行动。16日，中路军红三军主力和右路军之红四军、红六十四师，向正在沿中洞至东固大道东进的第五路军之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展开攻击，经激战，将其大部歼灭于富田、东固之间地区，残部逃向水南。担任迂回任务的左路军红三军团、红三十五军，攻占固陂圩，歼灭第二十八师兵站，当夜进占富田。红十二军主力转向大源坑、潭头方向进攻，第四十三师逃向水南。5月1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水南追击。逃向水南之国民党军，因在潇龙河上架设的便桥已被赤卫军拆除，河水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红三、红四军跟踪猛追，红三军团亦直插白沙河附近，于19日在白沙截歼第四十七师1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余部逃向永丰。与此同时，红十二军攻占沙溪，第五十四师逃向永丰；第十九路军也由城冈撤回兴国，随后又撤到赣州。两仗获胜后，红一方面军按预定计划，继续向东扩张战果。5月21日，红一方面军前锋部队进到中村附近，即与由南团向沙溪增援的第二十六路军之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旅的先头部队接触。据此，朱德、毛泽东决定歼灭进到中村之敌，乘势攻击南团。22日，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向第八十一旅发起攻击，攻占中村。歼该旅大部，余部窜回乐安。当晚，红军追至南团，第二十五师仓皇撤回宜黄。

红一方面军进到南团地区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即留驻龙冈，另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红军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此后，红一方面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这时，第六路军慌忙由白水、头陂向广昌收缩兵力，并自5月23日开始，按第八、第二十四、第五师的顺序，由广昌地区向南丰撤退。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乘第五师4个团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部署是：以红三军经甘竹向南丰方向急进，追击北撤之第八、第二十四师；以红四、红十二军攻击广昌城；红三军团为攻城总预备队。27日晨，红军直逼广昌城下。守军凭坚顽抗，红军激战终日，于21时攻克广昌城，歼第五师一部，余部逃向南丰。

红军攻占广昌城后，归第六路军指挥的第五十六师约7 000人，自闽赣

边界之中沙仓皇撤回建宁县城。28 日，毛泽东、朱德令红四军第十师北进，配合红三军继续追击第二十四、第八师和第五师余部；令红四军主力留广昌城开展工作；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主力继续向建宁城前进，求歼第五十六师。30 日，红军进到建宁城以西地区，31 日突然向建宁城发起攻击，于 18 时攻占该城，歼第五十六师 3 个多团。至此，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个重要战役，对我军军事思想的形成和今后的用兵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紧密配合下，集中兵力，连续作战，共歼国民党军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枪两万余支（挺），炮 30 门，电台两部，并占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进一步取得了反“围剿”的经验。

避敌主力　打其虚弱　红军打破第三次“围剿”

1931 年 7 月开始，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又很快组织对中央苏区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将其嫡系部队第十四、第十一、第六、第九、第十师共 10 万人调到江西省，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 23 个师又 3 个旅共 30 万人。并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这次“围剿”，蒋介石依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首先把红军压迫到赣江东岸，消灭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乃至完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第一方面军三万余人，在闽西北、闽西、闽赣边和赣南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反“围剿”准备。6 月底，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最后判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企图，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待敌深入苏区中心区，再集中兵力实行反攻，以打破“围剿”。随后，以独立第四、第五师和红三军第九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红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军前进；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三军团、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军在临时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指挥下，于 7 月 10 日前后由闽西、闽西北、闽赣边和赣南等地迅速收拢，向苏区中心区集中。红军冒着盛夏酷暑，紧急行军，绕道瑞金以北的壬田，行程千里，完成回师集中的任务，于 22 日前到达雩都（今于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平安寨、桥头地区，同由雩都、瑞金北上的红三军主力、红三十五军和由赣江以西来到的红七军及红二十军军部和第一百七十五团会合。28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县城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向苏区

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不断地阻击、袭扰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苏区人民群众则实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集中，并为转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并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军第七军、第二十军军部及第一百七十五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国民党军屡寻红军决战未逞，红军相机反攻。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20余日，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至7月底，蒋介石才得悉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判断红军可能西渡赣江，遂以其主力分路向兴国地区急进，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此间，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高兴圩地区进行了反攻作战的准备。7月31日，方面军总部得悉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方向行动，其右侧后富田、头陂、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也较薄弱。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以红军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移，首先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横扫敌后方联络线，置深入赣南苏区之敌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发觉回头北向时，再乘其疲惫寻机打其可打者。当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时，发现第二路进击军两个师已进到富田。毛泽东、朱德决定改变计划，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8月4日折返高兴圩地区，另寻战机。

此时，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西有赣江，南、北、东三面有国民党军9个师逼近。但其中进到白石、崇贤地区的第一军团，进到兴国地区的第一路进击军和第四军团，以及在富田地区的第二路进击军，战斗力较弱。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以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和独立第四、第五师，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以积极行动，将敌第二、第一路进击军、第四军团向万安、良口方向牵引，将第一军团牵制在白石、崇贤地区；集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向东突进，实行中间突破，求歼向莲塘前进的第三路进击军，尔后由高兴圩地区向东突进，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人，择其好打者打之，于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为隐蔽这一意图，造成“围剿”军错觉，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将“围剿”军主力7个师吸引到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主力则于5日晚从兴国、崇贤两地国民党军防线之间20公里的间隙中隐蔽向东急进。6日午前进到莲塘、官田地区隐蔽待机。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这一行动没有察觉，其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在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的牵引下，正扑向赣江边；而第三路进击军则由良村分



两路向莲塘、城冈前进。6日午后，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先头第二旅进到莲塘附近时，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旅，尔后向北进击，求歼第三路进击军主力。当日晚，红三军团、红四、红七军秘密接敌，于7日拂晓突然发起攻击，战至9时，全歼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又1个多营。莲塘战斗后，红军主力乘胜向良村急进，途中与由良村出援的第五十四师第一百六十旅遭遇，歼其1个团，该旅余部逃向良村。红军衔尾猛追，于13时许攻入良村，又歼刚由城冈撤回良村的第五十四师师部和2个旅的大部。良村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以红三军佯攻龙冈，率主力东进，围歼刚从君埠、南陵等地缩回黄陂的第三军团之第八师。11日晨，红军进到黄陂附近，中午向黄陂发起攻击，一举突入村内，歼第八师2个团。15时，第八师余部分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在追击中又歼其2个团。随后，红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休整。莲塘、良村、黄陂战斗的胜利，使红军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

莲塘、良村战斗后，蒋介石和前线总司令何应钦始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并估计可能北出临川。遂于8月9日起，令其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和第一军团掉头向东，企图协同由广昌西进的第十师，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于12日至15日，以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围剿”军8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毛泽东、朱德决定以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西返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16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利用夜暗，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10公里间隙地区秘密疾进，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次日晨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会合。红十二军主力则扬旗鸣号，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动，并以一部兵力攻占乐安县城。蒋介石误认红十二军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遂急调其第十师返回临川，令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等部追击红十二军。红十二军主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将国民党军主力一部拖了近半个月，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移和休整。8月底，待国民党军发觉红军主力再回头西进寻找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时，红军已休整近半个月。蒋介石随即以其第一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国民党军，于9月初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地区隐蔽待机。

此时，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除其三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急剧下降。与国民党军情况相反，红军三战三捷之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战场上国民党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更为明显。此间，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红军乘胜追击。9 月 6 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地区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遂令红三军、独立第五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断敌退路；红三军团、红四军（并指挥第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进攻高兴圩及其南北之敌；红七军牵制兴国之敌。7 日拂晓，国民党军第四军团由兴国地区向北撤退，其先头独立旅撤到老营盘附近时，红三军一部切断了该旅与第四军团后续部队的联系，随后，红三军、独立第五师向独立旅发起迅猛攻击，战至 14 时许，将其全歼。7 日，红七军向兴国进逼，牵制第五十二师；红三军团、红四军（并指挥第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地区之国民党军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激战至 8 日，毙伤敌 2 000 余人，战斗形成对峙。红军为保持主动，即撤出战斗。13 日，国民党军第四军团主力和第五十二师分别由长迳口、兴国等地向吉安撤退，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部实施追击。15 日拂晓，在第四军团主力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赶到，一部抢占了方石岭，截住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 1 个炮兵团和 1 个步兵营，并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随即发起猛攻，战至 9 时，将其全歼。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至吉安、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至此，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疲惫敌军，避强击弱，速战速决，以少胜多，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经过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军的作战原则已基本形成。战斗中，红军共歼国民党军 17 个团 3 万余人，其中俘 1.8 万余人，缴枪 1.5 万余支，机枪 175 挺，迫击炮 55 门，电台 6 部。在反“围剿”作战中，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四军师长曾士莪、红三军团师长邹平牺牲。

湘鄂西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湘鄂西苏区由洪湖、湘鄂边、巴（东）兴（山）（秭）归、襄（阳）枣（阳）宜（城）等几块根据地组成，其中以洪湖苏区为最大，是湘鄂西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至1930年秋，洪湖苏区已发展到拥有长江南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华容、南县等七座县城，纵横数百里。因此，洪湖苏区已成为湘鄂西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1930年11月，蒋介石任命湖北省主席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四个师七个旅的兵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战法，准备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并把重点放在洪湖苏区。

当时，湘鄂西苏区主力红二军团正奉命离开根据地南征，获悉敌人准备“围剿”洪湖苏区消息后，总指挥贺龙、红六军政委段德昌等坚决主张回师洪湖进行反“围剿”作战，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也去信督促红二军团回洪湖苏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但红二军团前委书记认为洪湖苏区是水网地带，大部队不易活动，决定只派段德昌率少数武装运送伤员和物资返回洪湖苏区。红二军团主力由于意见不一致，在长江南岸湘北一带徘徊，没有取得什么胜利，反被敌人乘机突袭，损失严重，被迫退至湘鄂边苏区。洪湖苏区为反对敌人的进攻，在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下，将各地的游击队及由段德昌带回的少量红军分编为江左军、江右军和独立团，苏区群众组织分别编成赤色教导军、赤色守备队、少先队等，为反“围剿”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

1931年1月中旬，敌人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地区。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采取伏击、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入侵之敌，使敌人十分恐慌，不敢轻举妄动。同时，江左军主力和独立团转到外线去开辟新区，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红军虽损失了一些老苏区，但开辟了大片新苏区。在洪湖苏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使敌疲于奔命。江北吃紧，敌

就集中兵力防御江北，江南告急，又转兵南渡，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最后只得步步后撤，红军失去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1931 年 3 月初，国民党军为摧毁湘鄂西苏区党政首脑机关，以江南为重点，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相继攻占藕池、石首县城，并继续向根据地推进，形势极为严重。

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两路，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周逸群卒部分干部和武装南下洞庭湖区开展游击战争；段德昌率红军独立团北渡长江，到被敌占领的潜江、沔阳、监利地区活动，在江左军配合下，先后两次攻克峰口，四次攻克朱河，击溃敌人一个团，歼敌一个营。独立团扩编为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另外还组织了湘鄂西警卫团、教导团、沔汉独立团等部。4 月下旬，红九师及地方武装对入侵江北地区之敌发起进攻，在老新口先后歼敖两个营，击溃敌两个团，收复了龙湾、熊口等地；接着又向江陵地区之敌发动进攻，在三官殿、沙岗、普济观、汪家桥等地歼敌 2 000 余人，缴枪 1 000 余支，江北苏区大部恢复。与此同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开展攻势，东山地区得到恢复，还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 年 3 月，中共中央派夏曦来湘鄂西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由夏曦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崔玫（后为杨光华）仕临时省委书记。5 月间，周逸群在洞庭湖区岳阳县城遭敌伏击，不幸牺牲。周逸群在大革命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和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时任师长，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31 年 9 月初，敌人调集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以江南华容东山地区为重点，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当时红九师正在江北活动，东山地区仅有 300 余人的游击队，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寡不敌众，东山地区陷入敌手，1 万多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屠杀。这个地区的革命群众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震慑，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重新组织起江南游击大队，经过极端艰苦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1 年夏，湖北省遇到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湖泊河流密布。入夏以后，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国民党军又利用洪水，丧心病狂地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在监利的上车湾掘堤，使江



北苏区一片汪洋，几成泽国。江南苏区亦部分被淹。严重的水灾，对红军反“围剿”斗争带来了严重困难，粮食、医药更是缺乏。为了战胜水灾，在反“围剿”的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动员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抢险修堤，保护未受灾地方的秋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给受灾群众；实行继续生产和极端节约措施及发动群众募捐互救等政策。此外，党和政府又将广大灾民组织起来，向白区和新苏区就食。沔阳、汉川两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数千人，深入白区，击溃国民党军一部，夺取运载物资船数十艘，将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分给灾民度荒。洪湖苏区军民在粉碎敌人“围剿”的同时，战胜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渡过了苏区最严重的难关。

红三军出击襄北，扩大新苏区在洪湖苏区反“围剿”期间，主力红二军团转到湘鄂边，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苏区和红军却没有获得发展，部队供应日益困难。1931 年 3 月，红二军团按照中央命令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唐赤英，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为配合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三军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以后在武当山区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同年 9 月，接到中共湘鄂西分局要红三军返回洪湖的指示信，红三军即留一个团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五师，坚持鄂西北苏区斗争；贺龙率部向东南出击，在红九师迎接下到达襄北（汉水以北）。红三军和红九师的会合，增强了主力红军的突击力量，为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全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襄北局面，沟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10 月上旬，返回洪湖苏区。夏曦借口红三军和红九师在襄北活动打击敌人是改变军事计划，脱离苏区，不要群众，撤去万涛（会师后刚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夏咸兼任，同时撤销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为 5 个团，直属军委指挥，实际上架空了红三军军部。经贺龙等领导人力争和中央的批评，才恢复第七、第两两师番号，另辖 1 个独立团。

11 月，红三军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调动进攻洪湖苏区的敌人，主动在襄北发起进攻，连克皂市、陈家何等地，歼敌一部，进逼应城。12 月下旬，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派遣第四师第十二旅等部增援应城，并相继进占龙王集、陈家河、皂市等地。1932 年 1 月，贺龙命段德昌率红九师及汉川独立团赴汉（川）宜（昌）公路歼灭该敌。红九师首先袭占皂市，并将大部队埋伏于公路两侧，派出骑兵连与敌接触，佯作溃退，

引诱敌人深入红军伏击圈。敌进入以后，分别被包围在龙王集、陈家河地区。红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经几次战斗，在龙王集地区歼敌1个多旅，俘敌旅长以下官兵3 000多人，缴枪3 000余支（挺），迫击炮20余门。

1932年3月，敌调集10多个团对洪湖苏区发动进攻，第四十八师第一百四十四旅由皂市出动，进至文家墩、李家场等地。红三军在贺龙、新任政委关向应指挥下，集中兵力，将运动中的敌人包围歼灭于文家墩，俘敌旅长以下官兵2 000亲人。随着作战的胜利，洪湖苏区和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新建了9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超过原有苏区一倍以上。洪湖苏区扩展到襄北广大地区；红三军发展到3个师1.5万余人，地方武装有枪2 800余支。龙王集、文家墩战斗的胜利，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进入了全盛时期。

红军经过一年多以来的反“围剿”作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锻炼成为一支英勇善战、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同时，由于红军的迅速壮大和实行了集中统一的指挥，作战能力大大增强，作战成果显著提高。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完成了由游击战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且形成了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在战略上，红军的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红军也乘敌“围剿”部署尚未完成、对红军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以主动进攻、外线歼敌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在战役战斗上，红军已经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迂回包围，围点打援，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套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红军反“围剿”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的形成，对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总指挥，先后调集8个师3个旅近10万人购兵力，由刚刚投靠蒋介石的冯系军阀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并以他的部队充当“围剿”军主力，计划第一步先对鄂像皖苏区形成“圆箍式”包围；第二步以主力突入苏区，占领集镇，控制要道，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清剿”。当时，鄂豫皖苏区主力红一军正奉命在外线作战，先后进行了姚家集、黄安、谢店、新州战斗，特别是新州一仗，歼敌1个旅部2个团，打乱了敌人伯部署，震动武汉。敌立即调整兵力，重新部署，以鄂豫边为中心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12月上旬，敌分四路，南北对进，东堵西压，开始向鄂豫边苏区进攻。11月，由中央委任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到达鄂豫边苏区。在敌人准备“围剿”、红一军主力又在外线作战的紧急情况下，曾中生召集会议，决定组成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并以地方武装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阻击敌人，迅速调回红军主力攻击敌人弱点，以改变不利态势。会后，随即以鄂豫边的地方武装以及半脱产的红色补充军7个师2万余人为基础组成三路，建立了第一、二、三路指挥部，并和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共同组成指挥委员会，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敌人进入苏区以后，苏区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进犯之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扰。敌提心吊胆，进展异常迟缓。正在这时，由蔡申熙、陈奇率领红十五军由商南到达黄麻地区。临时特委决定以红十五军为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打击入侵之敌。12月16日，红十五军一举突入河口，歼敌一部，使苏区南线之敌不敢冒进。下旬，北线之敖凭借优势兵力，大举向七里坪进犯，并进占鄂豫边黄麻中心区。红十五军转移外线作战，鄂豫边苏区游击队、补充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内线，对进入苏区“清剿”之敌展开英勇的斗争。他们利用高山密林，时隐时现，

割电线，摸岗哨，打击小股敌人和反动民团，前后缴枪500余支，俘敌数百，使窜入鄂豫边苏区之敌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只能困守几个县城和集镇。在鄂豫边军民反"围剿"的同时，红一军在皖西袭击金家寨、苏家埠、韩摆渡之敌，一度包围六安，诱敌来援。敌为救援六安，于12月底向红一军发动进攻。红一军在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3个团，击溃3个团，毙俘敌3 000余人，缴枪1 700分支，迫击炮数门。1931年1月3日，红一军主力回师鄂豫边途中，又在商城四顾墩歼敌1个团，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即告失败。

1月中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于商城南长竹园胜利会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2 000余人，归特委直接领导。临时特委举行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军委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经理处、总医院。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提出把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作为党的第一任务。同时成立红军军政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校长，刘杞任政委，加强干部的培训，以满足红军日益发展的需要。红四军组成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特委、军委的决定，立即转入攻势作战，向信阳、广水段京汉路出击，连续袭占李家寨、柳林等车站，歼敌一部，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威胁豫南重镇信阳。敌为确保信阳，分由广水、孝感等地出援。3月8日，敌第三十四师到达广水以南的双桥镇。红四军集中主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奔袭双桥镇。9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激烈，阵地几度易手，最后红军将担任预备队的两个团及时投入战斗，一举突入镇内，捣毁敌指挥中心，并将敌军分割围歼，经7小时战斗，歼敌第三十四师大部，师长岳维峻想乘隙逃走，但他的乘马被马弁骑跑了，自己乖乖地当了红军的俘虏。此役，红军俘敌5 000余人，缴枪2 000余支，炮10余门。前后50天的攻势作战，歼敌1万余人，鄂豫皖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3月中旬，敌人先后调集10多个师10余万兵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鉴于第一次"围剿"中部队行动不一致，被红军各个击破的教训，敌军改取"追堵兼施"的作战方针，以3个建制师（缺2个旅）组成"追剿"队，专寻红军主力作战；

其余部队分布于苏区周围，配合"追剿"部队堵击和"清剿"。第一步



计划合击新集、七里坪，歼灭鄂豫边红军；第二步转向皖西作战。4月上旬，敌各线堵击部队开始在苏区边沿区展开“清剿”，皖西之敌乘红军主力未在，首先侵人麻埠，进往独山，伺机进攻金家寨。红四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4月25日，一举攻克独山镇，全歼守敌1个多团，首战告捷。入侵皖西之敌仓皇退出苏区。敌“追剿”部队乘红军主力在皖西作战之际，相继侵占新集、七里坪。敌进入鄂豫边苏区以后，因地势险恶，道群众反对，时时处于我人民游击战争袭扰包围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不敢久留。5月上旬，敌准备实施第二步计划，转向皖西寻我红军主力作战时，红四军迅速西进，在符湾歼敌第五十三师近千人，5月底围攻黄安、宋埠间敌供应线上之桃花店据点，先后歼敌近4个营。敌“追剿”部队到处扑空，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蒋介石梦想5月底肃清鄂豫皖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告破产。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5月，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原有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由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沈泽民任省委书记。不久，还成立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陈昌浩任书记。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政委曾中生。7月，鄂豫皖边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高敬亭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平章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7月中旬，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旷继勋已调任第十三师师长）、政委曾中生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率军部和个多团兵力，冒着酷暑，由豫南地区南下作战。他们从实际出发，转战英山、蕲水（今浠水）、罗田、广济等地，连克四城。歼敌7个多团，生俘5 000个人，牵制了敌准备调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扩大了地方武装，筹集一批经费，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新苏区。但张国焘借口红四军没有按他的主张，攻占英山后出潜山、太湖，相机攻占安庆，威胁南京，而“错误”地擅自南下蕲黄广作战，严令红四军火速返回。红四军北返后，即宣布撤销曾中生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政治委员。接着召开会议开展批评与斗争，并在红军和地方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错杀了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造成党

内盲目服从的气氛，使张国焘逐步建立起军阀主义的家长式的个人统治。

敌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1931 年 8 月，蒋介石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也估计到敌人新的“围剿”不可避免，即抓紧时机，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首先开展反第三次“围剿”的政治动员，号召苏区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努力扩大红军和支援红军作战；整顿和扩编地方武装，将不脱产的 18 岁至 35 岁的赤卫队、守备队改编为赤卫军；17 岁以下的组成少年先锋队。到 10 月间，全区赤卫军已组成 15 个师，脱产的地方武装，仅县独立团就有 20 多个。有 7 000 余，人参加正规红军。11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第四、第二十五军。红四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方回军的总兵力已近 3 万人。方面军的成立，使作战行动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对红军完成由游击战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敌人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兵力已陆续增至 15 个师。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抗日反蒋浪潮和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同中央统治者的矛盾加剧，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迟迟不能实施。红四方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黄安县城是南线敌人伸入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据点，位置孤立、突出，由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驻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目的是歼灭该师，夺取黄安，打乱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战役从 11 月 10 日开始，红军首先以扫清黄安敌外围据点，切断守敌与外地联系为目标。经 10 天战斗，黄安县城完全处于孤立被围状态。第二步，红军紧缩包围圈，威胁城内敌人，迫其向外求救，以便打敌增援。敌第六十九师被围后，有损无补，难乎为继，曾两度突围，未能得手，只得固守待援。敌第三十三师和第三十一师 1 个旅奉命从宋埠、歧亭出动，分两路向黄安增援，来势凶猛，直迫近方面军总部，战斗极为惨烈。方面军总指挥涂向前亲临前线指挥。敌在红军三面进攻下，溃不成军，弃尸千余具，狼狈四窜。打退援敌以后，红军即对黄安守敌发起进攻。12 月 22 日，红军“列宁号”飞机在黄安上空投掷迫击炮弹和宣传品，更使敌人惊慌失措。入夜，红军发起总攻，黄安城破，师长赵冠英化装潜逃被赤卫军活捉。黄安战役，历时 43 天，歼敌 1.5 万余人，生俘近万，缴枪 7 000 余支。黄安战役得到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



男子运粮弹，抬担架，妇女烧水煮饭，救护伤员，群众送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当地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群众充分动员，使黄安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黄安战役胜利后，城内召开盛大的庆祝会，宣布将黄安改为红安，以示纪念。黄安战役结束后，为打击北线敌人，夺取商城，拔掉楔入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中间的钉子，鄂豫皖军委会决定组织商潢战役，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1个旅在商城、潢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腰斩”进驻在商潢公路一线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第二师，控制商潢公路，然后相机夺取商城。1932年1月19日，红军发起进攻，敌第二师等部逃往潢川，红军完全控制了商潢公路，也切断了商城与固始间的联系，驻守商城的敌第五十八师已陷于孤立。2月7日，集结在潢川地区之敌3个多师分两路出援商城。红军集中力量，乘敌运动之机，实施勇猛突击，将敌击溃。9日，红军乘胜追击，直追潢川近郊。此次战斗，蒋介石嫡系第二师遭到歼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固守商城的第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惊恐万状，乘红军主力追击援敌之际逃往麻城，红军不战而克商城。商潢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在固始地区稍事整顿后，即按鄂豫皖军委决定，东进打击皖西敌人。皖西地区有敌第四十六、第五十五师等部共12个团的兵力，从六安至霍山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担负对红军进攻和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的任务。经方面军总部研究，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3月21日，方面军主力秘密渡过淠河后实施战役展开，至23日，完成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和韩摆渡之敌，准备打敌增援。3月底，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驻六安、霍山两城部队倾巢出援。因红军早有准备，敌由六安南进的4个团，1个团被歼，1个团窜入韩摆渡，其余狼狈逃回六安；由霍山北援之敌一个旅，亦被红军击溃。青山店之敌乘机突围，大部被歼，小部窜入苏家埠。4月，敌无增援活动。苏家埠、韩摆渡守敌被围经月，粮食用尽，多靠野菜、树皮充饥，敌机虽不时以空投接济，但大部落入红军阵地，守敌更加恐慌动摇。红军乘机开展政治攻势，并欢迎白军士兵前来觅食，凡来者即予热情招待。4月底，蒋介石任命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拼凑15个团2万人，从合肥大举增援。红军决心围歼援敌，在六安以西的樊通桥、戚家桥一线布阵，以逸待劳。5月1日，红军以小部兵力与敌接触。边打边撤，诱敌失头旅渡过陡拔河。敌渡河后，向我既设阵地猛攻，遭红军重大杀伤，接着红军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大乱，往后逃窜。时值连日大雨，河

水猛涨，陡拔河两岸敌军人马前拥后挤，自相践踏，乱成一团，红军乘势冲杀，敌大部被歼。敌后续部从见先头失利，慌忙抢占高地顽抗。红军主力从两侧迂回包围后发起总攻，一举突入纵深，摧毁敌指挥机关，活捉总指挥厉式鼎。其余敌军在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进攻下，悉数被歼。在战斗时，苏家埠、韩摆渡之敌曾数次突围，均被红军堵回。援敌被歼后，苏、韩两地敌军处于绝望之中，红军乘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士气。指战员编成顺口溜对被围敌军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那桩?""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长，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之下，苏、韩两地敌军于 5 月 8 日全部缴械投降。苏家埠战役，历时 48 天，共歼敌 3 万余人，俘敌总指挥以下官兵 1.8 万余人，缴枪 1.5 万余支（挺），炮 40 余门，电台 5 部。这是红军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胜仗，也是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完满成功的范例。苏家埠战役后，以六安、霍山等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红 74、75 师，属红二十五军建制，留在皖西活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则挥师豫南，发起潢光战役，打击侵入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之敌。战役从 6 月 12 日开始，红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光山南部的敌第十二师，一部兵力在光山以北、潢川以南打援，主力攻击进占双柳树、仁和集之敌。战役进行 5 天，歼敌近万人，缴枪 7000 余支。

从 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6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过四次战役，歼敌约 6 万人，给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这一辉煌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胎死腹中。

由于军事的胜利，扩大了苏区，壮大了武装力量。主力红军发展到 4.5 万余人，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发展到 20 万人。鄂豫皖苏区扩大到东临舒城，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面积达 4 万余千方公里，人口 350 万，建立了 26 个县的革命政权。四次战役的胜利，使鄂豫皖苏区步入鼎盛时期。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月~3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湘赣地区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作战。

1931年1月，湘赣苏区红军为了支援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趁国民党军集中主力进攻湘鄂赣红军之机，湘东红军独立师主动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湘西地区进击，开展湘东南的革命斗争，并迎接由广西北上的红七军。1月29日至2月6日，湘东红军独立师相继攻占酃县、资兴、永兴等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七旅一部和酃县保安团，击溃资兴保安团和永兴挨户团。随后，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的追逼，于2月上旬返回莲花县境内。中旬，湘东红军独立师改称湘东南独立师。并新组建了第二团，全师发展为3个团，共1 500余人。3月，蒋介石“围剿”湘鄂赣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从萍乡、宜春向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开进，准备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此时，由广西进到湘粤边境的红七军。正在继续夺路北上。红一方面军首长指示湘东南独立师，以第一，第二团北出萍乡、宜春地区，迟滞国民党军第五路军东进；以第三团出湘东南，迎接红七军。第一、第二团北上后，在当地武装群众的配合下。以游击战术多次袭击过境之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有效地迟滞了其行动。南下之第三团，于3月14日同红七军先头在酃县十都圩会合后，共同北返。途中，于24日在茶陵以东的将军山地区歼灭追击的国民党军湘军第十九师1个团大部，遂返抵莲花县境内休整。随后，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东进，与在永阳以东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军第一百七十五团会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赣苏区）红军在湖南、湖北、江西3省边界地区，反对国民党军“清剿”、“围剿”的作战。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计划使用5个多师的兵力，对湘鄂赣苏区进行

"清剿"。红军第十六军乘国民党军"清剿"部署尚未就绪之际，主动出击，红军第十六军在军长孔荷宠、政治委员李楚屏指挥下，乘国民党军"清剿"部署尚未就绪之际，采取避实就虚，主动出击的战法，突然以一部兵力于1930年12月11日攻占修水城，继攻武宁县城未克。国民党军即以驻浏阳、平江、通城、崇武等县城的第十五师和新编第三十一、新编第三十二、新编第十师和第五十四师各一部，向修水、武宁之间地区合击红十六军。红十六军乘隙西移，于18日攻克通城，歼新编第十师1个团及地主武装一部，俘1 500余人，缴枪800余支（挺）。旋即转兵向南，先攻平江城，继攻浏阳县古港，均未克，遂于1931年1月下旬进入江西，分兵在宜丰、上高、高安、铜鼓等县境内消灭地主武装，同时进行休整和筹款。在此期间，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迅速发展，组成了红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分别活动在平江、浏阳地区和万载、宜春地区及鄂东南地区坚持斗争。

3月，红十六军乘国民党军调防之际采取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度袭占铜鼓城，后在万载县潭埠攻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俘100余人，缴枪200余支、迫击炮3门。5月，国民党军以8个多团的兵力，向阳新县三溪口地区进攻。中共鄂东南特委指挥红军独立第三师和地方武装，广泛袭扰，迫其撤走。6月初，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师向通山地区发动进攻。红十六军和独立第十师在通山至咸宁的要道上设伏打击国民党军，俘900余人，毙伤700余人，缴枪1 000余支。16日，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三师进攻咸宁县官埠桥、马桥，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又2个营，俘300余人，缴枪900余支。

7月，国民党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位于阳新县三溪口、白沙铺、木石港地区的红十六军发动进攻。红十六军以一部兵力佯攻阳新县北部的鸡笼山，集中主力对占领木石港的第二十六师1个团进行攻击，该团坚守不出，红十六军佯作撤退，在玉岭山地区诱歼其1个营，缴枪800余支，迫击炮10门。9月，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二旅进攻渣津，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二师在黄坊进行伏击，俘300余人，缴枪400余支。10月，国民党军第十八师2个团和宜春地主武装一部进攻万载县茵果，红十六军和独立第一、独立第二师进行反击，毙伤其300余人，缴枪300余支。此后，红十六军和地方部队转战于修水、万载、阳新等地。

1932年3月，湘鄂赣军区成立，孔荷宠任总指挥，黄志况任政治委员。至7月，全区红军及地方部队发展至1.6万余人。9月10日，国民党军以



优势兵力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先后占领龙港、燕夏和小源等地。红十六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小源等部分地区。1933 年 4 月初，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十六军和由独立第一、第二师编成的红军第十八军，由万载县高村一带沿锦水北岸向南昌进发，以牵制即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途中，在宜丰县港口地区，歼国民党军 1 个团另 1 个营，缴枪 650 余支，重机枪 15 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 2 个多团乘红军东进之机，由浏阳向湘鄂赣省委驻地小源进攻，红十六、红十八军随即西返。8 月中旬，在小源以西的株木桥，与国民党军激战 1 昼夜，将其击溃，毙伤 600 余人。尔后，红十八军又在宜春县小洞俘国民党军 1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

1933 年秋，国民党军以 5 个师又 3 个旅的兵力，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9 月～11 月，红十五师（6 月由红十六军改编）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转战浏阳、萍乡、醴陵等地，以吸引湖南国民党军，策应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作战。12 月，红十六师奉中革军委命令，向袁水下游行动，以威胁南昌，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26 日，攻占南昌附近的西山万寿宫，歼国民党军 2 个营。1934 年 2 月初，红十六师在奉新县黄沙同由湘赣苏区北进的红十七师会合，共同进入南昌经冯地区，转战 1 个多月，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破坏南浔铁路（今南昌-九江），威胁南昌，吸引赣江以东国民党军的任务。3 月中旬，红十六师西返铜鼓县幽居时，湘鄂赣苏区已被国民党军分割和实行分区“清剿”。6 月上旬，红十六师主力在宜丰、奉新边界黄沙、甘坊地区，被国民党军第十八、第五十师的 6 个团包围，大部牺牲，少数突出重围，于 8 月间转移到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边界地区。红十六师另一部在金丰一带也遭受重大损失。至此，湘鄂赣苏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十六师余部及游击队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历时近 4 年，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部队，取得了许多次作战的胜利，扩大和巩固了湘鄂赣苏区，但最后却是部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苏区大部被敌占领。所有这些说明，红军要想取得胜利，一是要有正确的战略方针，二是要有灵活的战略战术，三是要防止一切不从实际出发的冒险主义。

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在方志敏、邵世平等领导下，粉碎国民党据对于 1930 年 11 月和 1931 年 3 月发动的两次“围剿”，使红军发展到 5 000 人。1931 年，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组成立，根据地进一步发

展。1932 年 9 月，在方志敏、邵式平战略思想占指导地位的情势下 ，赣东北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到闽北、浙西、信南等地，随后根据地扩展到皖南，构成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至 1933 年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地趋于巩固成熟，鼎盛时期版图含有赣东北 21 个县，闽北 13 个县，浙西 21 个县，皖南 17 个县共有 72 个县之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且赣东北根据地是当时唯一一块获得“苏维埃模范省”殊荣称号的革命根据地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曾洪易（1935 年叛变）到赣东北，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占领。

1930 年冬至 1932 年春前后，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国民党军队“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残酷。红军内部还要承受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不畏艰难，团结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沉重打击国民党军队，扩大红军，根据地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大。

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初步形成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以四万左右的兵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次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不仅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10个师又5个旅共7.5万人的巨大军事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更重要的是通过反“围剿”战争形成了红军克敌制胜的一系列作战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基本框架，为后来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对今天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十六字诀”原则到“诱敌深入”方针的重大转变。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和第一、二团余部，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前委在此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新的立足点。10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由城市向农村转变的开始，此后逐步产生了适应崭新的武装斗争方式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创建时期敌人的四次“进剿”、三次“会剿”到中央苏区时期敌人的五次“围剿”，红军一直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有效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是摆在处于弱势的红军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从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中较早地认识和把握了“围剿”反复的斗争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红军的行动，使红军始终保持主动并在不断战胜敌人“围剿”中得到较快发展。1928年，毛泽东在领导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针对当时的敌我情况，总结了初期作战经验，制定了朴素的游击战争作战“十六字诀”。从1930年夏季开始，红军在中央苏区得到较大发展，约有三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基

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一时期，主力红军的作战原则也适应当时的形势适时的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尽管这一时期的运动战某种程度而言只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但它却是一个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红军的战略战术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到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来了。红一方面军运用“诱敌深入”战略，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使我军作战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创造发展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其主要内容有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毛泽东的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军事思想。

第二，“诱敌深入”是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正确战略 。罗坊会议最终作出“诱敌深入”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赣江，诱敌深入。1930 年 11 月 1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罗坊会议的战略决策。由毛泽东、朱德签署在罗坊园前村发出《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

当敌人实施大规模的“围剿”时，红军采取的基本战略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有利于主力红军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有利于动员和组织苏区内各种力量支援和参加战争；有利于使敌人分散兵力。削弱敌人优势兵力；有利于发现敌人弱点和造成敌人的过失；有利于红军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直至打破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在后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时提出：“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毛泽东在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时，先是做好反“围剿”的战争准备，主要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宣传、动员，征集兵源，筹措给养，寻找有利作战的阵地、组织动员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准备参加和支援反“围剿”作战。在敌人“围剿”开始前或同时，红军主力应向苏区内退却，以诱敌深入，待机破敌。退却的终点，通常在根据地中部，有时在后部或前部的边缘区。同时，以一部主力协同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采取运动防御和广泛灵活的游击战袭扰、迟滞敌人的进攻，以保障红军主力集结、隐蔽、休整适时转入反攻。反攻开始后，一般选择的目标，通常选择在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阵地，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的要害及比较薄弱处，给敌以沉重打击。反攻是打破敌人“围剿”的决定性步骤，既要打，更要打好。毛泽东十分重视坚持慎重初战的原则，打则必胜，从而转被动为主动，打破敌人的“围剿”。

反“围剿”取得胜利后，红军乘胜开展有计划、有部署的进攻作战，拔除苏区内敌人的据点，消灭苏区外的分散孤立之敌，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措给养，整训部队，为打破敌人的下次“围剿”做好准备。

实施“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必须拥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革命根据地，“诱敌深入”就有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和广阔的战场。这与毛泽东对预定战场的选择的六个条件十分吻合。因为“（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这六个条件只有在根据地内才能发现并创造；只有在根据地内才能发现并利用“人民条件好”这一优势，发挥红军之优长，组织动员群众，打具有人民基础的人民战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同时必须拥有和建立一支信念坚定、英勇顽强、敢于战斗、勇于牺牲的人民军队。这样，在敌人大举进攻苏区时，我军仍能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疯狂“围剿”。

第三，“慎重初战，战则必胜”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重要谋略 。毛泽东对于反“围剿”之“初战”极为重视。他认为打好反“围剿”第一仗至关重要。这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主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必须打胜，则是在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人，有胜算概率的情况下开战。照顾主战役计划，就是在打第一仗时，必须统筹兼顾第二、三、四乃至最后一仗大体上的打法。必须对战争的变化有清醒的估测，没有成竹在胸，是打不好仗的。照顾下一阶段战略，就是当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

计算谋略到往后几个阶段会出现的情况，至少应谋略预计到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与问题。没有这种谋划计算。束缚眼前的利害，就必然会陷于被动之中，而一着被动，则着着被动。

第四，结合游击战的运动战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主要形式。毛泽东指出：“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仍然是运动战。”红军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历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其作战形式基本上都是以运动战为主，同时辅之以游击战法，红军驰骋于广阔的战场上，大踏步地进退，迅速集中和分散兵力，充分调动敌人军力，使其陷入我军布设的陷阱。在运动战中拖垮敌人，创造战机，乘其虚弱，打其弱点，实行近战、夜战，包围迂回，更有效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达到速决和全歼目的。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实行运动战：（一）必须正确地判断情势，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红军在实施战略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等情况下，都要走；当面对敌人兵力过大、火力过猛，或占领着巩固阵地，或邻近各部靠得紧、靠得近，不好打时或不能快速解决敌人时都要准备走；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在相持中我军不力的情况下，也要考虑主动撤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更好的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二）运动战要把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敌作为主要作战目标。通常我们所说的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就是这个意思。为此，加强侦察、掌握敌情变化，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等待时机，积极创造和及时捕捉有利战机显得十分重要。这关系到能不能在运动战中准确打击、消灭立足未稳之敌。（三）以打运动战为主，还必须配合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运动战是主要形式，游击战是红军的拿手战法，可谓变化无形，收得拢，散得开。这些都必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多种作战形式，战胜敌人。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提出和总结，我们可以在更早年代找到论证。1930 年 12 月 24 日，为进一步鼓舞红军反“围剿”斗志，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黄陂移驻小布，翌日在小布赤坎村外麻糍石下的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亲笔拟对联一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幅对联把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说得清楚透彻，便于理



解，更利于操作。这种以运动战为主结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经历三次反“围剿”的检验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和丰富。

第五，实行歼灭战是贯彻反“围剿”战争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的主要手段。毛泽东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以歼灭战消灭了敌人共10个师5个旅计7.5万人，其中俘虏国民党军4.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6万余支，迫击炮七八十门，子弹五六百万发，不仅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而且在敌人阵营中造成了恐慌，被红军歼灭或遭重创的国民党军队，长时间难以恢复战斗力，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军军心。同时，红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和俘虏的敌军士兵，壮大了自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也获得了较快发展。

实施歼灭战，在作战指导上，要力求把握以下要点：（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当敌人大规模进攻时，红军应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牵制、迟滞其中的多路，集中红军主力打敌一路或一部，以形成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二）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除寻歼战斗力较弱小之敌外，凡态势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饥疲困乏、疏于戒备、孤军深入以及由进攻转为退却之敌，都易于歼击。这就需要战场指挥员适时抓住战机，果断处置。（三）采取包围迂回战术。打歼灭战，必须采取四面、三面但至少两面的部署。通常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向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之侧后发起攻击；同时要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四）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速决战是达成歼灭战的重要条件。实行速决战，除了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之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和方向，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采取穿插分割，将敌化整为零予以吞食；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作战手段；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连续作战。

第六，兵民是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之本 。毛泽东曾经说过“兵民乃胜利之本”。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时期，党由于贯彻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第二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发布了系列通告和通令，动员根据地群众扩大红军。坚壁清野，加强赤色戒严，设立军事交通站，筹措经费，建立

兵站，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布置地方红军和赤卫队袭扰和疲惫敌人，配合红军歼敌。根据地人民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支援红军，配合红军袭敌扰敌，筑起了一道打不烂的铜墙铁壁，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寸步难行。敌第十八师在遭到惨败后供认："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亘，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的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探问道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对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于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其所以不放一枪自行放弃其极坚固之东固匪巢者，即欲诱我深入匪区，予我以上述种种痛苦，而发挥其特长，将我一举包围而歼灭之也。"

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给深入苏区之敌以节节打击，成为反"围剿"战争无形的第二有力战场，构成苏区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胜利果实的重要力量。同样，他们在拥军参战、扩红支前的生命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战略思想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舞台。毛泽东曾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创建时期就和朱德同志一起，总结和提出了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作战"十六字诀"原则和"打圈子"战法。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军疯狂"围剿"，毛泽东又从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出发，提出并坚持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根据地内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坚持慎重初战，打好第一仗；坚持打运动战，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速决战等一系列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作战原则，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框架雏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她是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首都为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具体来说：

一是统一领导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从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 1931 年秋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十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残酷“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

二是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反革命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 年 12 月到 1931 年 9 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 21 座县城、5 万平方公里面积、250 万人口的全国最

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1930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革命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革命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筹备工作。

1930 年 5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 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1931 年 1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等对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牵头筹办“一苏大”的会务和各项庆祝活动。6 月，苏区中央局决定 11 月 7 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 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苏大”筹备就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呼之欲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2007 年 6 月 1 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到：“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中国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近似于苏联苏维埃政权。列宁、斯大林认为苏维埃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



形式。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有区别的。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

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这个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

主专政；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苏维埃领域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二个红色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因为地处农村和面临战争环境，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山坳里的中国”、“马背上的共和国”、“山林里的国度”等等。总体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但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还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丰富并充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红军也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由此形成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并成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和政府就牢固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并努力付诸实践。当时苏区的干部都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当年中央苏区的干部没有薪饷，只发伙食费，干部下乡和开会，必须自带干粮。有这样一首革命历史歌谣，被老区人民广为传诵：“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高度评价。当时在苏区政权机关提倡的精简、廉洁、高效的作风，以及为发扬这种好风气而进行的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无私奉献以及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大规模“围剿”的作战。

1932年6月，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以左路军10余万人“围剿”湘鄂西苏区外，以中、右两路军九个纵队、两个总预备队共24个师又六个旅，计30万人，及四个航空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省信阳（后移湖北省广水镇），蒋介石兼司令官；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省六安，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司令官。该两路“围剿”军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法，企图第一步攻占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省新集（今新县县城）、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驱逐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地区，再由北而南，将红军压迫于长江沿岸加以歼灭。

此时，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由于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被黄安、苏家埠等4次战役的胜利冲昏头脑，因而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这次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不堪一击，拒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提出的暂时停止进攻，将红军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预作反“围剿”准备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方针。先是命令红四方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信阳至广水段出击，进而威逼武汉，继又令红军南下夺取湖北省麻城，继续实现其威逼武汉的冒险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两次围攻麻城未下，费时近月，极大地疲劳和消耗了部队，致使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8月7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10日，其主力中路军第二纵队第二、第三、第八十师由湖北省宣化店向黄陂站、七里

坪急进；第六纵队第十、第八十三师由茅店、夏店直扑河口镇，第八十九师由长轩岭进抵河口一带，直扑黄安。张国焘见黄安危急，被迫决定撤围麻城，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迎击，企图一举粉碎“围剿”。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在冯寿二、冯秀驿地区迎击第六纵队，经3日激战，形成对峙。这时，第二纵队3个师已迫近七里坪，威胁红四方面军主力侧翼。红四方面军总部鉴于再战不利，即率主力转向七里坪倒水河以东阻击第二纵队的进攻。1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经勇猛反击，歼第二纵队担任主攻的第二师4个团大部，迫使第二纵队主力在七里坪西北据险防守，双方形成相持状态。以上两战，红四方面军共毙伤国民党军5 000余人，但未能转变整个战局，并遭受重大伤亡。17日，第六纵队2个师由黄安北出，企图与第二纵队夹击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即转移到檀树岗地区另寻战机。

22日，国民党军第二纵队避开檀树岗一带险要地势，绕道黄陂站向宣化店集结，拟经陡山河与第一纵队靠拢，会攻鄂豫皖苏区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军这一调整部署的行动是溃退，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攻击第一纵队。但红四方面军刚到达新集以北地区，第二纵队4个师就由西面逼来，红四方面军主力遂在新集浒湾西北和西南的扶山寨至金兰山一线进行阻击，激战5天，毙伤第二纵队2 000余人，迫其转为防守。9月6日，国民党军第一、第六纵队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红四方面军侧后进逼，与第二纵队构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四方面军续战不利，经白雀园、余家集、汤家汇向皖西金家寨地区转移。国民党军即以第二、第六纵队平行尾追，以第一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分头堵击。新集、商城、金家寨、独山、麻埠、罗田、英山相继被敌占领。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拟攻英山，因未获战机，即分两路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抵达黄安城以西河口地区时，与国民党军第一、第八十八师各一部共6个团遭遇，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9日，国民党军第二师再向河口东北的红四方面军阵地猛攻，红军连续打退其七八次冲击，毙伤其近千人。战斗中，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甘济时牺牲。这时，国民党军第二、第三纵队等部从东、南、北三面逼近。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下第二十七、第七十五师及各独立团在苏区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12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

人，从广水、卫家店间越过平汉铁路，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此次反“围剿”作战，历时两个月，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而失败。

鄂豫皖根据地军民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历时2个多月，尽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最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其根本原因在于张国焘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及其错误的形势估计与战略指导。张国焘片面夸大红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认为国民党军已成“偏师”，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到来之前，仍坚持执行“坚决进攻”的战略方针，令红军出击京汉线，威逼武汉，造成了作战之初红军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不是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方针，而令红军主力黑夜西移，迎击国民党军主力，试图与其决战，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在冯寿二、七里坪等战斗中，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但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也未改变不利的战局，而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根据地。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引起了湘鄂西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不满。1932年1月，临时中央派关向应到达洪湖苏区，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在夏曦主持下，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通过了包含着严重“左”倾错误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这个决议案，不仅全盘接受临时中央提出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军事战略，而且进一步肯定了1931年夏曦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大会以后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上述方针进行的。夏曦特别强调向武汉外围的应城、京山、云梦、孝感等地发展的重大意义，并要红军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争取中心城市而斗争。

1932年3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命令红三军执行积极进攻战略，打下京山城，扩大新苏区。红军以一部兵力强攻京山未克，自己遭受很大伤亡。3月底，国民党军以4个旅进占襄河以北地区的瓦庙集一带村镇，红三军对该敌发起攻击，在七昼夜的阵地战中，敌人先后投入2万余兵力，红军虽前赴后继，顽强冲击，作战十分英勇，但因未形成优势兵力，战斗打成对峙，红军被迫撤出战斗。5月下旬，红三军奉命进攻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将该师3个团包围在张家场地区，经连日激战，未能歼灭敌人。瓦庙集、张家场战斗，红军伤亡4 000余人，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6月初，川军第二十一军向洪湖苏区进犯，红三军主力立即从襄北回



师，以红七师进至下蚌猢地区打击左路敌军侧背，由段德昌率红九师进入东荆柯以南苏区中心区域，求歼中路敌军。6月中旬，敌1个师被红军小分队诱至新沟咀地区，红军以正面部队阻击，命骑兵部队秘密迂回至敌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敌遭受两面夹击，溃不成军，红军紧紧追赶，在熊口一带将其全歼，俘敌3 000余人，缴枪2 000余支（挺）。新沟咀战斗的胜利，是红军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方针而取得的。

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党代会以后红军作战失利，特别是瓦庙集战斗未打好，夏曦归罪于红三军中存在的所谓“游击主义”。1932年4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全盘接受临时中央要求各苏区加紧进行“肃反”斗争的指示和其他苏区“肃反”斗争的经验，认为各种反革命派别都想打入红军进行破坏活动。从上述“左”的观点出发，夏曦把党内的两次内部争论说成是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从5月开始即进行第一次“肃反”，万涛、潘家辰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杀害，造成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革命积极性和战斗力。

转战湘鄂川黔地区正当湘鄂西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时候，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左路军10余万人，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仕副司令官兼总指挥，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方针，计划第一步进占襄北，将红三军压迫到长江和襄河之间，第二步全力围剿洪湖苏区，妄图歼灭红三军主力。

1932年7月中旬，敌人向襄北发起进攻，当时红三军主力正遵照中央分局的指示，在襄北的京山、应城、皂市地区寻求作战，在强敌进攻下红三军被迫撤出襄北。3月上旬，敌人实施以摧毁洪湖苏区中心区为目标的第二步计划。夏曦决定分兵两路，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要红七师等部构筑碉堡，分兵把口，以阵地战阻击敌人，固守洪湖苏区；命令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重返襄北去牵制敌人。红七师等部在洪湖苏区中心区实行固守决战，使苏区越战越小。9月上旬，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并在杨林关、新沟咀等决定性战斗中，红军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和包围，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难以立足，于是决定突围。夏曦等率红七师突围后，于10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区与红三军主力会合。留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不久也被迫转移，洪湖苏区完全丧失。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丧失。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红三军到达大洪山后，中央分局因丢掉洪湖苏区，怕受到中央的指责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只得在山区无目的地往返游击。10 月下旬，得悉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西进的情况后，才决定红三军转移至洲鄂边。11 月初，红三军 1.5 万人由大洪山向北越过桐柏山，经豫西南、陕南，沿鄂川边境南下到达湘鄂边，行程 7 000 里，一路上克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侵袭以及第二次肃反造成的严重困难，广大指战员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坚强不拔的精神，完成了艰难的转移任务。1933 年 1 月，红三军先后攻占鹤峰和桑植城，准备恢复湘鄂边苏区。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慑于红军声威，表示愿意以让出部分地盘为条件，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都表示同意，认为这对红军也是一个休整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很好机会。但夏曦以反对“革命不彻底”为理由，坚决不同意，并强令红三军立刻向陈部进攻，结果反被敌人击败。红军被迫退出桑植，返抵鹤峰休整，取消红八师编制，将撤出洪湖时失去联系后转战远安地区的卢冬生的独立师编入红三军。

红三军刚刚来到湘鄂边，夏曦又借口一些指战员要求“打回洪湖去”的意见是“改组派”破坏恢复湘鄂边苏区的路线，立即进行第三次“肃反”，先后捕杀了军委主席团成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等大批干部，使红军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参加南县、华容和石首等地的农民起义，领导游击队在江陵、天门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洪湖苏区创始人之一，建立正规红军以后，一直担任领导工作，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过多次坚决的斗争，在洪湖苏区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被害时年仅 28 岁。

这时的夏曦，觉得什么组织、什么人都靠不住了，共产党、青年团和苏维埃政府已被反革命所把持，其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在他把持的中央分局会议上，不顾其他领导同志的反对，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并继续进行第四次“肃反”。敌人利用苏区和红军忙于“肃反”之际，调集兵力围攻红三军，红军又被迫离开湘鄂边，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历尽艰辛，部队由洪湖出发时的 1.5 万人减至 3 000 人左右，处境十分困难。1934 年 6 月，红三军占领贵州沿河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举行会议，初步批判了夏曦的“左”倾错误，决定在红军中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并在黔东创建新苏区。9 月，包括沿河、西阳、德江、印江、松桃五县，纵横约 100 公里，人口 10 余万的新苏区已建立起来。黔东苏区的创建，为红三军建立了立足点，同时为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撤围南丰　黄陂大捷
打破第四次“围剿”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5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早在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这时，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在如何应敌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1932年10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

“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还认为，“毛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所以，会后便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为理由，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11月24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朱德、周恩来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深知，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提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间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又在12月26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又指出，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2月30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二十九个师又两个旅，约50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其中左路军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向闽西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12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只有5万余人，双方兵力是十与一之比。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



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1933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朱德、周恩来随即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并取得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

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这时，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1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1月16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21日和23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1月24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2月12日晚，红三、红五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守敌第八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陈诚一面令南城第二十四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周恩来于13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2月22日，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国民党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

进推进。其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二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一纵队与第二、第三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2月26日，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27日上午至28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五十九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3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及第三纵队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一方面军以第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3月20日，敌后纵队之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五十九师残部在后跟进，第九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21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十一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22日，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朱德、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原有的经验，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的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毅然决定采取退却的步骤，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由被动转为主动，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从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川陕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与反“围剿”的胜利

1932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奉命向西战略转移，12 月经陕南到达川北。12 月 18 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河口场，建立了川陕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赤北乡苏维埃政府。此后，在川陕两省党组织和王维舟等率领的川东游击队配合下，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32 年 12 月下旬，红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层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赤江（通江）、红江（涪阳）、南江、清江（巴中）县和巴中特别市等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1933 年 2 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组建了中共川陕省委，并按照《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原则，起草和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宣告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1933 年 5 月，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大捷中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派遣的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攻占了长赤、广元、仪阆、苍溪、江口、万源等七个县，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使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

1933 年 6 月，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即木门会议）先后召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根据地反围攻胜利后的新形势，做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红军与地方武装”和“组织问题”等决议。决定扩编军队，加强政治、军事和后勤工作。红四方面军扩编为 4 个军、11 个师、29 个团，计五万余人。张国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在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川陕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取消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者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分配了土地，夺得了土地革命斗争胜利，极大地宣传、发动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1933 年 2 月 12 日印行的《怎样分配土地》和 1934 年 12 月 30 日出版的《平分土地须知》以及川陕省工农政府和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土地革命的布告，就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土地革命的历史。

1933 年 8 月中旬，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红军乘四川军阀刘湘组织新的“围剿”尚未就绪之际，迅速开展了仪南、营渠、宣汉三次进攻战役，攻占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五座县城。相继建立了仪陇、阆南、嘉陵、英安、营山、长胜、渠北、达县、宣汉、红胜（罗文坝)、城口（万源大竹河）等苏维埃政府。根据地扩大到 42 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600 万。有绥定、巴中两道级苏维埃、23 个县和 1 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与川东游击队胜利会师，改为红三十三军。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 15 000 多人扩大到五个军，80 000 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发展到 10 余万人。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同时，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为川陕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1935 年 1 月 22 日，为了北上抗日，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应集中红军主力向西进攻，……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命令，发动了陕南战役，调动敌人北移，随即回师川北，成功的取得强渡嘉陵江的胜利，并乘胜向西进攻，解放了涪江与嘉陵之间的大片土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北进入川的作战战略，为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征途。

1932 年夏，国民党发动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未能粉碎敌人的围攻，被迫放弃了苏区进行转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根据地又被敌占领，红三军再次失去依托，流动于鄂川边。1933 年 12 月 19 日，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创造湘鄂川黔边根据地。从此，红三军开始了另创根据地的新时期。



大村会议后，红三军向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红三军虽确立了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思想，但是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夏曦同志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肃反”的扩大化，使红军自己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几次谋求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都未实现。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努力下，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夏曦同志在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面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正确的意见。从而，促成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的召开，决定创建黔东特区。

1934 年 6 月 19 日在沿河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是红三军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成为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起点。枫香溪会议决定了在黔东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方针。由于群众基础较好，红三军宣传队深入各地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政权和扩大武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各地苏维埃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到七月底，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 14 个，乡苏维埃 30 多个，黔东特区初步形成。建立黔东特区，红三军得以休养生息，结束流动状态，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红六军团突围后有目标可找，为两军的会师提供了基地，对贵州的革命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4 年 8 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十月，到达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队伍共八千余人，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促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会师后，部队在南腰界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的番号，所辖七、九两师编为三个团，红三军黔东独立师一部编为一个团，共四个团；红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三个团；以红三军黔东独立师另一部和六军团的伤病员组成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确定了下一步的发展方针：两军团集中作战，以积极的行动，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主力向湘西发展，留下黔东独立师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继续开展游击战，成立黔东特委统一领导，坚持黔东特区的斗争，以“巩固发展原有苏区”。

10 月 28 日，黔东独立师返回黔东特区中心区，牵制追敌，主力由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从敌人的侧后方发动了猛烈的攻势。11 月 7 日，占领永顺县城。湖南军阀何键大为震惊，调兵进逼。为诱敌就歼，我军放弃永顺，向北转移，于十万坪伏击敌人，给追敌予歼灭性打击，重占永顺。十万坪大捷，是在湘西建立根据地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役。接着，连克大庸、桑

植、龙山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扩大了苏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电，成立了以任弼时同志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湘鄂川黔省委员会、以贺龙同志为主席和司令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省军区。湘鄂川黔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在此期间，东南面的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黔东的斗争；西北面的鄂川边红军独立团仍活动于鄂川边。这两块游击区，成为以永、大、龙、桑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两翼。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和湘、鄂两省军阀何键、徐源泉，在1935年初，又集结了四十多个团的兵力，从三面分兵六路准备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面对敌人重兵"围剿"的严重形势，省委对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动员和战斗准备，加紧清剿地主武装。2月上旬，敌人发动进攻，根据地军民开始了反"围剿"斗争。据中央指示精神，二、六军团采取了从内线转移到外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两次战斗的胜利，使反"围剿"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从退却转入反攻，出现了新的形势。继而取得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我军乘胜东进，扩大战果，出击洞庭湖以西广大地区，连克石门、临澧、津市、澧县及湖北松滋的许多城、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区域扩展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县境，西北至湖北咸丰、宣恩一带，南至沅陵地域，北至鹤峰境内，人口百万以上。使"我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这一时期，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与川陕根据地相呼应，有效地配合了中央红军转战黔、滇、川、使蒋介石既堵我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又防我东出湖南和二、六军团的会合，首尾不能相顾。策应了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大迂回至金沙江渡入川，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中央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的转战，又配合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后方，蒋介石为清除他的这一心腹大患，集结了130多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保安团队达30万之众，部署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围剿"。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任命陈诚为行辕参谋长，代行蒋介石职权指挥部队。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经济封锁，从东向西筑碉推进，

紧缩包围，企图压迫我军于桑植、永顺、龙山一带歼灭，苏区范围日益缩小。我军兵力仅有四个师十二个团约二万一千多人，连同地方武装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活动范围东西只有300余里，南北才百余里，粮食缺乏，地形上不利于大兵团作战。

11月4日，在刘家坪召开的军委分会会议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争取到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创造新苏区。1935年11月19日，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突围转移。为突破敌人的封锁包围，转向外线活动，没有完全放弃回湖南的企图，留下红十八师的目的，在于牵制敌人，向西佯攻，掩护主力的行动。同时，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由于敌众我寡，损失较大，遂入贵州与主力会合

二、六军团遂向黔、大、毕进军。2月2日，突破鸭池河，接连占领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至此，完成了第二阶段转移。在黔西召开的总部和军分会上，决定开辟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将湘鄂川黔省委改组为川滇黔省委。接着在大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进入另创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1936年3月底，总部电令当时已到贵州盘县的红二、六军团西行，北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由红二、六军团建立起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革命处于低潮，红军突围长征的生死关头发展起来的一块新苏区。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在长江南岸与川陕根据地相呼应，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从敌人的侧后方威胁其反动统治，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围剿”的战役。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一、第二、第三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其第一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二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三路军在第一、第二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两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三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

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五个师又四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六个师又两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五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此时，正在闽西北和抚河与赣江流域之间地区分兵作战。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错误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十九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四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10月6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大部歼灭后，于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方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13日，“围剿”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

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22日，红军以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四天未克。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七军团（总指挥寻淮洲、政委肖劲光）、红九军团（总指挥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月11日，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三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七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15日～17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作战指导上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企图以阵地防御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并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前往镇压第十九路军。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12月11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八纵队3个师从黎川向团村、东山、德胜关推进。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三军团、红三、红三十四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敌。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三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六路军2个纵队从永



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五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九军团和红三军团第四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红一、红九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红一、红九军团、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五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25日开始，红一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山岬嶂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击溃其1个师。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至此，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在闽西北方向，2月24日~3月下旬，红七军团等部先后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今明溪）等地区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军东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三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及红五军团第十三、第二十三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10日开始，国民党军7个师又1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红军退出广昌。4月下旬~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

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此时，中革军委以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但此举亦未能牵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8月5日，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8月底9月初，红一、红九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八军团。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中央红军完全丧失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迫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坚决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红军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陷阱。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红军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此战，持续一年

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占我东北领土。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3 000 多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32 年 1 月 28 日，得寸进尺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企图将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原本奋起抵抗的 19 路军也被迫撤离上海。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联合抗日的主张，早在 1932 年 4 月 15 日，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1932 年 4 月 26 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然而对于这一切，蒋介石政权却视而不见。《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便于 1932 年 7 月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3 年 3 月，中央红军粉碎了蒋军的第四次“围剿”。9 月，蒋介石又集中了一百万大军、两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中央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迫使中央红军放弃江西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国共产党于 1934 年 7 月初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了“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宣言表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

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投降卖国政策，并指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15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取了我们的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与蹂躏！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与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元，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紧急动员令[①]，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一）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二）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三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曾经一再反对《塘沽协定》，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日本傀儡政府的“满洲国”，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公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

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镇压与屠杀。

全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都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出卖热河，内蒙古，出卖华北，出卖福建与全中国，而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反日主张与反日行动。这不能不使国民党更疯狂的封锁我们，向我们进攻，使我们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能同全中国民众直接联合起来，不能同东北抗日义勇军一致行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驱逐出中国。国民党军阀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日的提议，完全置之不理，而且更无耻的出卖中国，加紧他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

因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不再受到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匪徒们的蹂躏与出卖。从无数次同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决不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

我们认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具体主张：

（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

（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三）号召全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用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为反日战费。

（五）普遍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募捐援助义勇军与红军委员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纠察队，破坏队，交通队，宣传队，运输队等。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利用罢工，罢课，罢市，罢商与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不顾一切牺牲，要为这一纲领而奋斗。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全国民众拥护这一纲领，同我们在一起为这一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到底！

让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让国民党的汉奸卖国贼去叫喊“中国无力抗日”罢！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总动员，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武装，全中国民众的反日团结，有全部的力量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汉奸的集团的国民党！

《宣言》全文约两千六百字，它观点明确，言辞锋利，具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它是一篇昭示天下、寻求正义援助的战斗檄文，在当时苏区和白区的广大人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宣言》从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开始，历数“满洲国”和国民党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为了自由的苏维埃领土不再受到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蹂躏与出卖，“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

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所以，即便清楚地知道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力量悬殊，但为了全中国的民众们，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仍然“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份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人共同签署宣言（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宣言全文约2 600字，对当时全国的抗日活动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进一步孤立了反动的蒋介石政权。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最困难的关键时刻，此宣言的发表表明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此宣言鼓舞了工农红军的将士，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红七军团——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就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1933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6日，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向闽中前进。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并发出了《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给各级党部的指示》，要求广泛宣传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政治意义，拥护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等。中央指出：“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这个部队虽然只是一个先遣部队，但有充分的战斗力……我们的抗日先遣

队，将很快壮大成为抗日作战的大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

7月29日，红七军团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翌日，攻占樟湖坂，并于当晚北渡闽江，占领黄田、谷口。8月1日，占领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正式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随后，北上抗日先遣队按照中革军委“继续彻底地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的后方”的训令，在闽浙赣皖边界广泛活动，创建新苏区，取得了一定战绩。8月3日，“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由漳州专程来福州，与陈仪研究部署，决定以第五路军一部从延平南下，八十七师主力由福州北进，夹击红军于白沙、水口一带，并令空军飞机配合轰炸扫射。随后，蒋介石又令由湘北水运第四十九师等部入闽增援。

8月3日，红七军团到达安仁溪，为避开沿江国民党军阻击和飞机轰炸骚扰，绕道闽侯北部山区，从雪峰、大湖、江洋向福州西北郊挺进。8月4日下午，八十七师主力乘船溯江而上，次日一部窜抵水口扑空，7日侦知红军去向后，以五百二十一团向大湖方向尾追，主力退回福州。

8月7日，红七军团主力进抵北峰之岭头、前洋、叶洋地区，当夜23时即从里洋、笔架山一线向福州发起进攻。当时八十七师主力尚未缩回，福州西北郊由五一八团防守，该团以一营占领浮村以东阵地，二、三营主力占领隐士山坡（义井南）以西阵地，预备队两个连位于铜盘。红军以一部向左侧击，牵制五凤山、大夫岭守军；主力进行正面突击，直取新店，进逼北门。正面攻击部队于新店击溃守军前哨排后，向义井、浮村迅猛进击，守军将两个预备队连投入战斗，增强隐士山坡和浮村防御。由于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了解不够，突击方向选在守军重点防御阵地上，红七军团从午夜至次日凌晨3时，几次猛烈冲击均未突破，被阻于隐士山坡之前。与此同时，红七军团派出小分队迂回突击王庄机场，也未得手。8日，八十七师主力驰回福州，并不断出动飞机轰炸红军阵地，红军再次攻击受挫。军团见已不可能攻进福州，便果断放弃攻城计划，将部队撤回小北岭，准备向闽东转进。

8月9日，红七军团护送一二百名伤病员，由岭头经江南竹向连江桃源、潘渡转移。当日下午，八十七师令五百二十二团轻装从宦溪向桃源进行侧面追击，企图封锁桃源通往潘渡的道路。10日9时30分，五百二十二团前卫第三营窜到降虎与桃源之间的梧桐山，与红军的侦察警戒部队发生遭遇



战。军团参谋长粟裕当即率领第二师迎头痛击该营。五百二十二团主力随后赶到投入战斗。12时，军团又以第二师攻击其左翼第一营，令第一师迂回敌侧后，断其退路。五百二十二团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频向福州请援。13时，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急令二五九旅旅长沈发藻率旅直属部队和五百一十七团一部，携带10门火炮，驰往增援，并派飞机前往轰炸助战。15时，红军乘敌援兵未到，“以密集部队向五百二十二团中央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守军阵地，与敌肉搏。双方混战时，红军旗手冲上山头，将红旗插在山顶。国民党飞机误以为是红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炸死不少国民党军，红军也有伤亡。与此同时，迂回敌后的红军第一师也遭到敌机轰炸扫射，损失较大，师长、政委都受了伤。此后，五百二十二团得知援兵将到，又有飞机助战，便据守几个山头抵抗，双方遂成对峙状态。

为了保存实力，红七军团于当夜撤出战斗，向连（江）罗（源）苏区转移。11日，福州援兵和五百二十二团扑空后分路尾追，但红七军团已在连罗中共组织、游击队和群众的接应下，安抵罗源风坂、百丈一带。随后，水运入闽的国民党军四十九师赶到连江，接替八十七师继续尾追红军。

8月12日，红七军团领导在百丈村会见闽东红军独立2团团长任铁峰和独立十三团团长魏耿等人。根据闽东党政军民要求，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打通连罗与宁德几块苏区的联系。并要求独立2团在福安、宁德地区做好策应军团北上的准备，独立十三团以部分兵力在丹阳阻击尾追的四十九师，另一部配合攻城和接管县城。13日，粟裕率领先头部队进至罗源城西五公里的白塔村，派侦察兵与游击队小分队化装进城侦察，摸清敌情，并留下一部作内应。

罗源城守军为保安11团1个营、海军陆战队1个连，以及县警备队、民团等共1 000余人，重点防守大小西门和北门，东门滨海，南门地形开阔且有护城河阻隔，易守难攻，仅有1至2个排兵力驻守。军团根据敌情、地形，决定“采取奇袭的方法”：由连罗红军独立十三团一部及赤卫队2个连，攻打东门，控制北门，牵制守军主力；由军团1个营佯攻大小西门，1个团出其不意，从南门突破，直捣城北之县政府，打掉其指挥机关。8月13日22时许，攻城部队到达攻击位置后迅速完成攻城准备。14日0时30分，战斗由佯攻营首先打响，接着对东门也开始攻击。主攻团突击队利用守军应付东、西门的攻势之机，架竹梯由南门登上城墙，迅速解决城楼1个排守军，打开城门。主攻团点燃火把冲进城后，一部向东西侧击，主力直插城北

敌指挥机关。此时，白天隐蔽在西门马房街的游击小分队乘机打开西门，接应佯攻营入城。不久，攻击东门的红军游击队也登城而入。守军无心恋战，纷纷投降。整个战斗不到两小时就结束，全歼守军1 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数百支和大批军用物资，救出被关押革命者及群众44人。

红七军团攻克罗源城后，将300多名重伤员交给连罗中共组织安置，并留下300多支枪，于当日下午撤离县城继续北进。17日，红七军团又以1个团兵力在罗宁边境的罗源梦龙（满盾）伏击尾追的四十九师，经过6个小时战斗，击退敌7次进攻，重创二百九十一、二百九十四团五个连，毙敌180余人。随后，军团与闽东红军独立二团会师于宁德赤溪。

11月4日，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方志敏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政治委员；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为委员，领导红十军团创建新苏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遭到数倍于我军的敌人的疯狂追堵和围攻，部队作战举步维艰。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在返回闽浙赣苏区途中，在德兴港头村被敌军截为两段，先头部队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出敌军包围，回到苏区；主力部队被合围于怀玉山中，激战至下旬，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被俘后英勇就义，曾洪易向敌人自首投降。2月27日，红十军团突围部队改编为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王蕴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由上饶灵山地区出发，向浙南进发，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战开始后该部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历时6个多月，行程5 600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次战略行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因为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及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通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是可行的。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建立新



苏区，开展反日运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等等，这些在当时政治气候和战略环境下，都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此外，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在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抗日先遣队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搞大兵团作战，“正规战打不成”；而且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游击战也打不成”；作战指导上的错误是抗日先遣队失利的重要原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但作为第一支从中央苏区出发向敌人腹地进击的主力部队，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以方志敏等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已成为我军战史上英勇悲壮的光辉一页。

红十军团的建立与孤军奋战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中央决定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到闽浙赣皖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新苏区，发展反日运动，以调动敌人北上，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直接目的是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1934年7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11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月，行程五千六百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著名的老苏区，胜利地粉碎过敌人的多次“围剿”，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飘扬。红七军团到达苏区时，方志敏



同志亲自到驻地看望，苏区的革命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用尽可能筹集到物资慰劳。群众称红七军团这支历经风霜的子弟兵为“老十军”（1933 年 1 月，闽浙赣苏区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在党和人民的亲切慰问下，四个月来的艰辛劳累，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随后，部队进行整编。根据中革军委 11 月 4 日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当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军委在电令中还指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

军团整编以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11 月 18 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受到我军坚决回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接着，19 师经上方镇，渡新安江，向分水县（今武盛）前进，并逼近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又转向皖南行动，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这一时期，寻淮洲同志率领 19 师独立行动，摆脱了曾、乐的干扰，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就在 19 师活动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区发来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十军团部立即率 20、21 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调我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团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抗日先遣队即先后离开了赣东北苏区。先行的十九师，经玉山、常山、淳安、分水折入皖南的旗德，又穿过泾县和宣城之间，指向芜湖。当此之际，该师接到中央军委和军团首长的指示，迅速南返安徽歙县汤口镇。先遣队总部、20 师、21 师在 19 师离开赣东北之后，取道开化、婺源、休宁，于 12 月 10 日先期抵达汤口镇，在这里，等待十九师的到来。

抗日先遣队各部在汤口会齐后，随即便越过黄山，抵达黄山北麓的古竹溪，准备在太平县的谭家桥宿营。这时，由于侦察不周，又与群众缺少联系，总部接到一个很突然的重要情报：国民党南京政府调集了五个正规师、两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用七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一举吞噬抗日先遣队。12 月中旬，我红军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一带与敌人遭遇了，交战的结果，我军伤亡三百余名，干部也伤亡不少，19 师师长寻淮洲负伤后壮烈牺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八名师以上的干部也相继负了伤。谭家桥这一仗损兵折将，终于失利，除了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这一客观原因外，也由于我军在军事指挥方面失当等主观原因所致。方志敏在总结这次战役时，指出了它在战术上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合，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19 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19 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未能完全一致。"

谭家桥一仗失利后，近万人的队伍，在强大敌人的前堵后截中，辗转于石台、太平、东至、祈门、休宁一带，给养日益紧张，战斗力日渐减弱。面对此情况，抗日先遣队在结束皖南的行动后，又盲目返回赣东北。因此，正如方志敏所指出的，谭家桥这一仗，"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

在抗日先遣队撤向赣东北的过程中，因为部队疲惫不堪，过于集中地在杨林（今属浙江开化县）、港头（属江西德兴县）一带进行休整。敌闻此讯，即命浙江敌人从星口抄捷径，连夜急进 70 里，追击到了港头。两军相



遇，开火后，我军便被分割成两段。前一段八百余人，由方志敏、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突围到怀玉山区的陇首；后一段约几千人，由刘畴西、王如痴等率领，被阻截在化婺德地区。据粟裕同志回忆，已突出敌人包围到陇首的方志敏等同志，因考虑到大队人马尚在后面，便要粟裕等同志先率领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以及一些轻伤员立即向闽浙赣边沿地区转移，方志敏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下来等待主力部队。等了几天，没有等到，结果被敌人重重包围。我红军战士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惨遭失败。红军指战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只有少数同志突出包围，脱离险境。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王如痴和方志敏都先后在怀玉山被俘。至此，抗日先遣队遭到惨重失败，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

抗日先遣队虽然失败了，但是闽浙赣皖根据地的党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低头，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坚持与敌人展开斗争，革命的火种又燃起了燎原之势的烈焰。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突围到闽浙赣边境的抗日先遣队部分指战员，成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基础，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从此，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在浙西南和闽浙边，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此外，原来留在赣东北、浙西南、皖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党政干部、红军游击队以及散失在这些地区的红军小股部队，在群众支持下，也都自动先后转入了游击战争之中，其主要领导人有：唐在刚、关英、李步新、匡龙海、柳真吾、周成龙、余金德、方远辉、倪南山、邹琪、滕国荣、宁春生、杨文翰、余汉潮、程伯谦、赵梓明、王丰庆、刘毓标、方远淡、陈直斋、江天辉、何映辉等同志。在闽北，尚有黄道、曾镜冰、饶守坤、洪坤元、黄知真、吴先喜、黄富武、饶恭美、黄立贵、卢文卿等同志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这些红军和游击队，利用山峦起伏、连绵不绝的磨盘山、怀玉山、鄣公山、武夷山、黄山、天目山打游击，与敌人周旋，形成了一道进可出击、退可隐伏的游击地带，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胜利坚持到加入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游击队的领导人，除在斗争中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外，许多同志都成为新四军的领导骨干。

红六军团西征　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在红七军团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帜北上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拟与红三军取得联系，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

1934 年 7 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将湘赣边区的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改编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的先遣队突围西征；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基本任务就是先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活动在贵州东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探索前进的道路。1934 年 8 月 7 日，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横石突围，踏上西进的征途。10 日抵达桂东县的寨前圩，在这里召开了庆祝突围胜利和誓师大会，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誓师大会是红六军团长征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此后，红六军团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迭克新田、零陵，上阳明山，下白果市，占嘉禾，过潇水、渡湘江。9 月 17 日，红军攻占通道，前锋直指贵州。

红六军团的胜利进军，震撼了湘、桂、黔三省敌人。湖南军阀何键派路邦道、潘壮飞二人为代表；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张蕴良为代表，先后来到贵阳找贵州军阀王家烈，共同商量如何联合行动，以对付红六军团西进的问题。结果，决定湘军派第十九师师长兼保安司令李觉率兵跟进；桂军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兵九团尾追红军；王家烈命令原驻榕江一带的周芳仁部开赴黎平附近堵截，又任命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黔军第五、第六团到施秉、黄平一带设防。湘军李觉指挥补充第一、二两个纵队、第五十五旅、第一百零九团及保安第二十三、二十二两个团由新宁向城步急进。桂军第十九师从龙胜由南向北进攻。湘军第三十二旅、桂军第十九师沿西延、城步大道



尾追红军，企图迫使红军与之决战。

当红六军团进到三里驿和新厂地区时，湘敌补充第二纵队何平所部第三、四两个团，邀功冒进，从靖县离开主力，直奔新厂。军团部当机立断，决心消灭这股敌人，立即命令红十八师之第五十二团，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构筑工事，阻击敌人；同时，派出另一部红军占领三里驿附近岩头上、五里冲一带袋形阵地，加强伪装，封锁消息，设下伏兵，张开了罗网。

湘敌补充第二纵队，认为红军长途转战不堪一击，企图抢先占领有利地形，攻击运动中的红军队伍，以收到以逸待劳的效果。可是，出乎敌人意料，红军已先机占领了有利位置，严阵以待。敌人只得硬着头皮向红军第五十二团阵地发起强攻，红军居高临下，敌人死伤枕籍，寸步难进。向三里驿方面进攻的敌人，也钻进了红军设置的袋形阵地。袋口刚一收紧，枪声、炮声、喊杀声混成一片。红军关门打狗，痛歼来犯之敌。时值滂沱大雨，敌预备队乘恶劣气候、隐蔽地绕至红五十二团阵地西北，进行偷袭。军团部得悉这一情况之后，决定出奇兵制胜，火速命令红十七师从岩崖山北面向东攻击敌人侧翼，以配合红十八师进行夹击。战斗打响后，红军愈战愈勇，敌人毫无还击之力，19 日黄昏，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红军击毙敌营长汪鲁，重伤另一敌营长杨镇，歼灭敌连排长以下两百余人，活捉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湘敌补充的第二纵队，自此再无作战能力，新厂一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士气，为红六军团在贵州的进军争取了主动。

新厂战役后，红军分路由平茶、三里驿进到贵州黎平县属之潭溪、中黄，接着在鳌鱼嘴会合，进入清水江流域。

清水江地区，风光秀丽。苗、侗少数兄弟民族世代生息在这一带。进入兄弟民族地区之后，军团领导三令五申，要求全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贴布告，写标语，举行集会，深入广泛地向兄弟民族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逐渐地消除了兄弟民族对红军的误解和对当兵的传统偏见。苗、侗兄弟积极地为红军带路，并运来了粮食供给军需。当他们知道红军要从南嘉渡江的消息后，又帮助红军探水势、结木筏、架浮桥，使红军得以顺利渡江。

军团部命令部队抢渡八卦河，绕道北上去和红三军会合。正碰上八卦河

涨水，红军遂折回到大广一带。桂军覃联芳师由锦屏方向向我逼进，两军在大广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红军第五十二、五十四团英勇反击。当地群众积极地为红军当向导，抬伤员，一起出没在火线上。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军团主力顺利地从大广西侧山地安全转移。大广遭遇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红军也付出了较大代价。五十四团经过浴血苦战，余部坚持到最后才撤离战场。团队的战旗被当地群众一直珍藏下来，解放后才献给有关部门。

红六军团入黔后，敌湘、桂联军主力，沿舞阳河南岸的施秉、镇远、黄平一线展开。黔军王家烈在马场坪督战，并派王天锡到施秉拦桥与李觉、廖磊谋图“会剿”红军。他们认为红六军团必然东去与红三军会合，所以决定湘军主力由镇远开赴石阡，桂军主力由施秉开向路腊、大地方一带拦截红军。黔军悉数开往黄平。企图三面合围。

红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以黔军为主要打击对象，拟在施秉、黄平间抢渡大沙河。10 月 3 日击溃黔军，克旧州，占领瓮安属的猴场。

此时，军团部收到军委来电，说：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了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其实，此时桂敌正在石阡境内积极寻战，桂敌另一部和湘敌补充第一纵队、加上部分黔军由南向北压迫红军。形势对我不利，红六军团按照电报指示方向，从猴场经龙溪调头东进。

七日拂晓，六军团按照十七师、军团部、十八师的顺序向甘溪前进，拟在甘溪一带休息。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前卫到达甘溪镇的时候，桂军十九师之张、汪两团已进到距甘溪镇百米处的小河沟。桂军发现红军后，立即把部队在小河南岸的石堤后边展开。离甘溪镇半里路程的白虎山，群宝山也先后被桂军占领。红军第五十一团发现敌情之后，立即在甘溪镇北头展开部队，就地抵抗，并派出部分兵力抢占甘溪镇南面的青龙嘴高地。刚进入甘溪西街的四十九团的一个营，也就地抗击敌人。敌人利用小河沟的有利地形向红军接近，又沿着下水道的暗沟，偷偷地摸进甘溪镇中心，并从暗沟中向外射击，袭占了四十九团一个营在甘溪西街的阵地，切断了第五十一团与主力部队的联系。五十一团全体指战员，在敌人包围和猛烈冲击下，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若干次猛烈的进攻，给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军团主力在王震、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下，在大土村南山丛林中，临时开辟道路向大地方方向转移。肖克同志指挥第五十团接替了红军学校的抗击任



务，并占领老莱土掩护第五十一团、第四十九团、红校转移。完成掩护任务之后，第五十团机动地退出战斗，经四方堰向大地方寻找主力。

甘溪战斗打得非常英勇，部队各自为战，人自为战，发挥红军英勇顽强的作战作风，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同时，无数烈士在这次战斗中为革命光荣捐躯。第十八师师长龙云同志，亲自率领第五十二团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战斗达两天之久，最后在岑巩县因受伤被俘，英勇就义。

此时，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两部和一个机枪连，离开了主力，单独经过七、八天苦战，冲破了敌军封锁，到达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和红三军会合。

甘溪激战之后，桂军廖磊命令周师张、汪两团紧追红军，并亲自率周师余部折回大地方。湘军李觉部由白沙急趋走马坪。覃联芳和成铁侠部向骂溪分途截击。当时敌人以24团的兵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这是红六军团长征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部队有时一天只能喝上一顿稀饭。山路陡峭、骡马行李无法随军行动。许多同志光着脚在深山老林里行军作战。虽然遇上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但全体指战员在军团总部的指挥下，坚持转战在施秉、余庆间的大地方，路腊、骂溪、紫荆关一带。

最后，由军团直属队组成的一个直属营，在石镇大路上，堵住了成铁侠和三十二旅之南北夹击。而军团主力在石阡县南部，突破了湘敌独立第二十三旅的防御阵地，经小公鸡村向石阡之凯楼方向疾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甘溪遭遇战，事先没有作战预备方案，战斗发生后，51团虽然抓获了敌人侦探及时摸清了敌情，但前卫指挥员迟迟未下决心，致使贻误了战机。加之对地形不熟，临时开路，山路险窄使部队拥挤不堪，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但红军指战员，以气吞河山之势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是永垂青史的。

黔东特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原红二军团），在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领导下，于1934年开辟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它包括现在贵州省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和四川省的秀山等县的部分地区，东西宽约六、七十里，南北长约百里。红三军进入贵州时，只有两个师第七师和第九师。9月，由独立团等地方武装组成了一个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同志任师长。10月间，红三军总人数约四千三百多人，枪三千余支。此外，地方上的游击

队、赤卫队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同时，还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区、乡革命委员会。当红三军获悉红六军团在甘溪激战的消息后，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红三军主力冲破敌军拦阻，急速南下去迎接兄弟的红六军团的到来。10 月 24 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部队，在松桃县属的石梁一带胜利会合。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亲自到印江县属的木黄迎接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师。红三军当时与党中央的电讯中断，红六军团的到来，恢复了黔东特区和中央的联系；两部分红军的汇合，进一步加强了湘鄂川黔地区的革命力量。

在南腰界猫洞大田，红二、六军团举行了一次极为隆重的会师联欢大会。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给全体指战员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红二、六军团会师之际，中央红军于 1934 年 10 月 16 日，开始了自己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行动，迫使湘、桂、黔等省敌军不得不重新部署，暂时放松了对二、六军团的围追。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对当时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研究，决定东进湖南，向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敌人的侧后方出击，以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为了巩固已建立起来的黔东苏区，把黔东地区原有的一些武装，包括其中的两个独立团，以及六军团中不能继续跟主力行进的人员，合编成一个黔东独立师。派六军团干部王光泽任师长，段苏权同志为政治委员。同时决定段苏权同志兼任黔东特委书记，领导和坚持黔东苏区的斗争。红二、六军团主力于 10 月 27 日，离开南腰界，转旆东征去执行新的战略任务。

红六军团，自 1934 年 7 月，离开湘赣苏区开始了自己的长征。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领导下，驰骋于湘、桂、黔广大地区，大小数十仗、斩关夺隘，追奔逐北，给湘桂黔省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沿途攻占了无数城镇，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长征先遣队的任务。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以黔东会师为起点，开始了湘鄂川黔斗争的新时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红二十五军——第二支抗日先遣队

提到长征，除一、二、四方面军的万里征程之外，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进行了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到达陕北。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采取了沿途建立根据地的跳跃式前进，长征结束时的人数比出发时不减反增。说起红二十五军，必须要搞清一个概念，那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以大别山区为中心，包括周围20余县，同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北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红二十五军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成长发展的。1931年10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安徽六安县麻埠（金寨县境内）成立，不久与红四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在苏区推行极“左”政策和所谓“内部肃反”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三个多月，歼敌上万人，但终未打破敌人的“围剿”。10月12日傍晚，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线，仓促西进。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之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除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外，以约20万兵力继续对根据地进行“围剿”。

在敌人重兵“围剿”，又不知主力红军行动去向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2年11月29日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独立坚持斗争，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全军约7 000人。

这次会议在红二十五军军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红二十五军的建立，初步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以后根据地斗争力量分散和局面混乱的状况。从此，鄂豫皖苏区军民开始了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的新时期。

1934 年 8 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约 3 000 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于 12 月 9 日进至雒南（今洛南）的庾家河。12 月 10 日，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的第三天，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称鄂豫陕省委，在鄂豫陕边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的郧阳地区和河南省西部的部分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庾家河省委会议后，红二十五军以飘忽的游击行动，南下湖北郧西地区。1935 年 1 月 9 日，红二十五军一举攻克镇安县城。坚持在鄂陕边界的鄂陕游击师立即与红军主力取得联系，25 军根据陈先瑞提供的情况，马上把红军主力拉出镇安县城，抵达山阳、郧西、旬阳交界，转入发动群众，创建了鄂陕边第一块革命地。红二十五军军部机关以及所属分队，当时就驻在泗峡口、虎坪、涝池、红岩等地，省委和军司令部驻虎坪涝池。

红二十五军在郧西镇安燃起的革命烈火，引起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恐慌与不安。1935 年 1 月下旬，蒋介石以 11 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围剿”军，遂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尔后又转至凤凰嘴，突然出现在敌之后方。1 月 31 日，红二十五军以一部兵力袭占柞水县城，吸引“围剿”军警备第二旅西进，将其兵力分散。2 月 1 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在蔡玉窑击溃敌第一百一十六旅第二百五十二团 2 个营，歼其 1 个多营。战后，向北移至葛牌镇休整。5 日，“围剿”军第一百一十六旅旅长柳彦彪又率第二百五十一、第二百四十八团向葛牌镇进攻。红军依托文公岭高地给“围剿”军以杀伤后，从正面和左翼实施反击，歼其 2 个多营，其余向南溃退。红二十五军在红岩寺和袁家沟口等地，建立了第三、第四路游击师，乘胜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区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创了第二块根据地。



2月8日，红军主力掉头南下于2月12日到达袁家沟口，紧接着从袁家沟口回转郧西。2月14日，红二十五军在郧西的一、二、三天门、丁家坪、蔡家场、回龙、李家磨、庙川、虎头岩、寺家院、三十六岩等地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对1 500余户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粮食和其他物资。从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站住了脚跟，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大红军400余名。

1935年2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郧西出发，接应红四方面军南下汉中，途中连克宁陕、佛平两座县城，歼灭守城的保安队，于3月8日进至华阳镇。3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华阳镇东南之石塔寺设伏，击溃警备第二旅5个多营，歼其600余人，缴枪500余支。战斗结束后，我军在华阳地区建立了七个乡的革命政权，开辟了第三块根据地。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一举击溃杨虎城警备第三旅2个团，歼灭其1个团又1个营，俘其旅长以下官兵1 000余人。18日，攻克雒南县城。至此，陕军的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

九间房战斗后，鄂陕边几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四月中旬，省委在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在全体同志中坚定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决心。会后，红二十五军东进，攻克洛南县城。以后又进至洛南、商县、商南、卢氏等四县的边区，大力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先后在孙家山、庾家河等地建立了乡苏维埃成立了游击队，开创了第四块根据地，半个月内，红二十五军吸收了六百各新战士。到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 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2 000多人，发展地方党员3人，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十个区46个乡340个村级政权，人口近50万，初步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在鄂西北、陕南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连战皆捷，使鄂豫陕边区的革命烈火愈烧愈旺蒋介石大为震惊，1935年4月2日，国民党紧急调动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三个师和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入陕南同庞炳勋部第四十军，萧之楚第四十四师、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17师51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共30多个团的兵力，向红二十五军鄂陕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5下旬，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庙川莫家山“九棵树”的地方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研究制定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省委决定鄂陕边及陕南地区山大、无公路、人口少，敌军后方补给困难，必然采取速战速决

作战方针。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再采“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6 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郧西二天门出发，转至外线捕捉战机，向北直插陕南商县。4 日夜、5 日晨，先后在商县的商洛镇附近，与敌东北军第一百一十、第一百二十九师遭遇，毙伤敌团长赵绍宗及以下官兵二百多人和缴获敌部分武器，随后，又直转南下，远程奔袭鄂豫陕三省交汇点———荆紫关，占领全城，歼敌近两个营，从被窝里活捉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红军战士情绪高涨，连夜转回南化塘。接着，挥师西进郧西，北挺陕南。红二十五军沿着郧县、郧西与陕西交界的崇山峻岭急速西进，25 日抵达黑山街。行军近一个月，转战近二千里。敌人被红军搞得团团转，一路穷追不舍。敌人被拖得相当疲惫，锐气大减。6 月 29 日下午，敌警一旅追到黑山街附近，红二十五军向西退到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的袁家沟口一带我军预选战场。7 月 2 日拂晓，陕军警一旅进入伏击区，我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经过约 10 个小时的激战，歼敌 1 700 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缴获轻重机枪 40 挺、长短枪论 1 600 支。我军仅伤亡 100 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二十五军为继续掌握主动，把敌调出根据地，扩大影响，补充兵员和物资，根据省委决定，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锋直抵西安以南 20 公里的子午镇。继续长征，配合陕北红军，迎接党中央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打破后，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根据地逼近西安，致使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八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准备保卫西安。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的行动，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

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在长征途中总是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和指示，力图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当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后，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分析形势，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胜利会师还将要继续北上创建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红二十五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同时确定将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



委，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统观全局、独立自主、坚决果断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安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军领导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8 月初，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两当、天水等县城，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我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红二十五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以有力的行动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1935 年 9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这支部队东进北上，声东击西，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联系，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并在 20 余个县建立革命政权，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至此，红二十五军完成了被称作“小长征”的历时十个月、途经五个省、转战近万里的战略转移，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特别是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艰苦转战万余里，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重兵集团，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与陕北红军一起发展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将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为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对此，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惧。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急于8月下旬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取得胜利后，即迅速抽调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企图在3个~6个月内消灭红军，并将重点置于中央苏区。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合编组建了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组建后，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成功地运用“诱敌深入”等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在根据地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围剿”，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赣西、赣南与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中央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1933年5月，国民党重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总管“剿匪”指挥之责。同时重金聘请赛克特等德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亲自授意编写了《剿匪手本》等，军官们人手一册，实现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红军在经济上采取“将匪区严密封锁”的战略，“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程度，所以凡属要紧的地方，无论隘路碉卡围塞岔路……一定想种种方法去检查防范”。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并直接用五十万兵力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妄图实现消灭红军，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和持久战的新战略，从根本上

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面对强敌围攻，中共中央发布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号召全苏区民众紧张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战争，开展经济建设工作，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战。苏区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各地方部队整团整连的报名参加主力红军，全力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同时，苏区人民还组织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担架队开展支前活动，当年仅于都县支前人数就多达5 977 人。这种踊跃参军参战，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场面，充分表明苏区人民决心，消灭来犯之敌，捍卫中央苏区。

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面对敌人进攻战略的变化，没有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坚持推行和实施共产国际总顾问费雷德·斯特恩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同强敌拼消耗，打阵地战，所以战争开始就使红军陷于被动局势。

1933 年 9 月底，共产国际派任德国籍、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到达中央苏区，这位原本“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到瑞金后，博古决定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把中央红军的最高作战指挥权交给了这位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红军特点的外国革命者，导致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放弃了历次反“围剿”作战中运用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略战术，错误的战略方针贯穿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加剧了被动局面。

至 1934 年 4 月上旬，红军防线被迫退到广昌、建宁一线。敌人集中 11 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这时，博古、李德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惫，急忙从建宁一带的红一、三、五、九军团中抽调 9 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一带与敌进行决战，同时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不是胜利就是就是死亡”等错误口号，与敌人堡垒对堡垒进行历时 18 天的决战，我军伤亡 5 500 余人，广昌失守。彭德怀当面斥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敌人调整部署，分六路向中央苏区推进后，博古、李德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也分兵六路全线抵御，实行李德提出所谓的短促突击，红军东堵西击，穷于应付，到了 1934 年 4 月至 5 月，广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大开。

至 9 月底，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中央苏区，会昌、兴国、宁都、石城一

线相继失陷，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打破敌人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于都渡河出发长征，其客观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的兵力过于强大，而其主要原因有三：1. “左”倾领导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丧失了有利时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一直处于十分被动地位。2. “左”倾领导者以“短促突击”战术支持消极防御的战略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3. “左”倾领导者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分兵六路，全线抵御，推行军事平均，导致兵力分散，进攻时不能大量有效地消灭敌人。与敌人拼消耗，促使苏区内的人力、物力资源濒临枯竭。

巧妙周旋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钢铁封锁线

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最高“三人团”最后制定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路线和目标，是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沿粤赣边界西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月上旬，按最高“三人团”制定的突围转移计划，所有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部队和中央机关人员，统编成红军野战军共8.6万余人，撤离瑞金等地，实行战略转移。

为阻止中央红军向粤赣边境地区发展，国民党粤军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整个封锁线中构筑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广铁丝网、深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在防御线的最前沿，布置有当地靖卫团和“铲共”团把守。陈济棠曾称这条封锁线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因何长工、潘汉年代表红军与陈济棠部罗塘谈判达成的秘密停战协议尚未贯彻到粤军驻赣南部队，红军野战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10月16日傍晚，红军野战军开始从于都集结出发，渡过贡水。19日，全部进入突围集结地域安远、于都、赣县边界。行军队形分为左、中、右三路，以红一、三军团分别为左、右两路前锋，红九、八军团分别为左、右两翼拱卫，中路为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红五军团担负整个野战军的后卫掩护任务。21日上午10时，中央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突围，向国民党粤军封锁线发起总攻。前锋的红三军团红四师首先向信丰百石守敌发起攻击，全歼该敌。战斗中红四师师长洪超被流弹击中牺牲。23日凌晨，红四师乘胜一举攻占古陂，敌人大部被歼，残部逃向安息。担任右翼拱卫的红八军团，也于22日随红三军团后侧跟进，在赣县王母渡击溃守敌，西渡桃江。

与此同时，左前锋红一军团第一师也于21日下午4时向信丰新田守敌发起进攻，歼敌300余人。后又毙伤金鸡守敌200余人，占领金鸡圩。22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向信丰西南全速追击，将溃退途中的粤军教导团拦截于信丰石背山隘，击毙俘虏敌人各300余人，缴获大批辎重。23日凌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协同向安息守敌发起强攻，毙敌1 000余人，因敌增援部队赶到，未能攻占敌阵地。为争取时间突破封锁，红一、三军团奉命各派一部兵力牵制安息和信丰县城守敌，主力绕道坪石、铁石口、大塘埠一带，抢架浮桥，西渡桃江。24日，担任左翼拱卫的红九军团，紧随红一军团跟进，将敌击溃，占领安息圩，随后西渡桃江。同日，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在小河口渡过桃江。担任野战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在赣县窑下一带西渡桃江。至此，整个红军野战军已全部渡过桃江，胜利突破了国民党粤军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赣粤边界突进。

1934年10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顺利突破了国民党设置在安远、信丰的第一道封锁线，经江西崇义，迅速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方向挺进，可部队面临的，是蒋介石更为严密的第二道封锁线。蒋介石急令堵截。

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湖南省进出南岭地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古有“内为衡（阳）宝（庆）门户，外扼赣粤咽喉”之美誉。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尚未弄清中央红军突围西进的企图。九月底，蒋介石以为江西围攻红军的已大功告成，胜利在望了。他多次和他的随员们洋洋得意地高谈阔论：“湘鄂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向西转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而直到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向汝城、城口方向进军时，蒋介石才匆匆赶回“南昌行营”，商讨对策，制定了一个初步追堵计划，并迅速调遣兵力。当红军通过粤军余汉谋部的防线、到了湘粤边境时，蒋介石电令陈济棠、何键火速出兵，利用湘粤军原在汝城、仁化间的碉堡阻截红军（即第二道封锁线）。同时，令北路军薛岳、周浑元各率四个师分由古龙岗、兴国地区西进，协同南路军、西路军追击红军。

湖南军阀何键接到蒋介石“追剿”命令后，迅速调集湘军六十二师赶往汝城布防，并在湘南各地加紧办理保甲，建筑碉堡，实行所谓“坚守碉堡、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的坚壁清野政策。10月26日，湘军六十二师遵照师长陶广的命令，防守汝桂南北干线碉堡，堵红军西进的道路；并安排第一八四旅钟光仁部防守楂坪经汝城至新桥一段碉堡线；补充第



五团钟涤生部防守沙田经楂坪至濠头圩一段碉堡线；第一八六旅王育英部防守沙田、寨前至桂东城一段碉堡线。汝城县也成立了以朱松俦为首的建碉委员会。建碉堡委员会强抓民夫，日夜赶修，短期内共筑成碉堡200多座。每个碉堡都分别由国民党湘军六十二师师长陶广、汝（城）桂（东）宁（岗）遂（川）边区“剿匪”指挥胡凤璋、汝城“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朱凤鸣率队驻守，粤军安排了一个连驻守城口，企图依托坚固工事堵截消灭红军。汝城至城口的主道、隘口上，碉堡相望，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至30日，国民党各路部队均已各就各位，严防以待红军的到来。

中央红军发现湖南军阀正向湘赣边集结主力，一部正向汝城开动，为取得先机之利，遂决定迅速夺取汝城、城口等地，打破敌人的封锁。10月30日中午，红军右路前卫红三军团4师11团抢先抵达热水，随即占领附近大山有利阵地，俯控热水。热水，为由赣入湘的重要通道。当天正值热水逢圩，熙熙攘攘，人声嘈杂，而敌人麻痹，连哨所也没设一个。待红军进到街头附近了，才被敌人发现。红军一举歼灭了这股民团，占领了热水。红三军团通过热水后继续西进，途中，接到彭德怀军团长命令：迅速抢占汝城县城东南制高点。驻守县城的国民党军和胡凤璋保安团发觉后，分三路包抄，形成合围之势。坚守的红军顽强拼搏，击退了敌军多次进攻，歼其一部，残敌逃回县城固守。

因为湘敌六十二师先我占领汝城，加之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经激战两三日，红军伤亡甚重，未能拿下。3日晨，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同意红三军团对汝城敌情的侦察报告，决定“放弃进攻汝城”，改为派一个师监视和钳制。4日，野战军司令部指示一、三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

汝城南面密布敌军碉堡干线，从泰来圩至大坪圩一带，有30多座敌军碉堡。为扫清西进障碍，红三军团4师11团在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的指挥下，一面钳制县城之敌，一面强攻泰来圩至腊岭一带敌军守备较弱的碉堡线。在攻打泰来圩之黄家寨碉堡时，屡次被敌军密集的火力所击退。恰好彭德怀军团长来到前沿阵地，见此情况，便指挥炮兵作了调整，亲自发炮，只一发便打掉了黄家寨碉堡。11月3日，战斗呈白热化，虽然上有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前有敌军重机枪的疯狂扫射，但头顶柳圈的红军战士毫不畏惧，愈战愈勇。飞机一来，战士们隐匿在草丛中；飞机一走，战士们则用土炮猛轰敌军碉堡。至4日，红军相继攻下泰来圩、城头寨、米筛岭、伍

桂岭、腊岭坳等几处主要碉堡据点，并捣毁沿线碉堡三十余座，顺利打通了官路下至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与此同时，红三军团20师1部自江西上堡进入濠头，抢占了汝桂交界的要隘石壁山，扼阻了桂东守敌向濠头增援，并乘胜占领了濠头圩附近的庙下店碉堡，围困了五里牌炮楼守敌三天三夜，沿途摧毁敌碉堡10余座，掩护大部队向南折西前进。

为打破敌人的阻击，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国民党阻击部队未到之前，迅速抢机挺进。10月30日至11月1日，红一方面军八万六千余人即由文英、丰州、古亭、上堡、乐洞、聂都等地分五路进入汝城之热水、集龙、益将、濠头、东岭等地，并迅速向前推进。

11月3日，红军总部进驻热水，并在热水老街一栋简朴的民房中设立指挥部，统一指挥。热水群众主动引红军到汤河旁用温泉水疗伤。红军用温泉洗浴后，消除了疲劳，恢复了体力，斗志昂扬地迈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程。至今在热水汤河旁还留有“红军池”。

11月4日至6日，红军大部队前往汝城县城南面，并经泉水，向延寿、文明转移。红军抵小垣、延寿后，在小垣、简水、东寿、官坑、下杨、桑坪等村宿营，积极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打土豪、除恶霸，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如在延寿官坑村宿营时，该村村民胡四德筹集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供红军食用，红军写了借据给他。红军走后，为防止被国民党军队和胡凤璋保安团搜到，胡四德忙偷偷地将这张借据藏入灶台。直到1996年，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挖到这张借据时，它已在墙洞里深藏达64年之久！

红军大部队刚通过延寿，国民党粤军独立第二师及独立第二旅与独立第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分别从广东城口、江西大余出发，向延寿衔尾追击红军。驻汝城的湘军陶广部与胡凤璋保安团也派其一部经外沙溪赶往山田坳进行尾追。而此时，红军后勤部队大批骡马、辎重却拥塞于延寿向西的山间小道上，行进迟缓。当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二个师及二个独立旅追至延寿简家桥、中洞、九如、桑坪一带时，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不得不拼死阻敌。粤军在增援的湘军及胡凤璋保安团的配合下，与红五军团34师反复争夺延寿江边制高点青石寨，许多红军战士倒在江中，情况万分危急！军团长董振堂猛地一声吼：“跟我来！”手端冲锋枪，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夺回了青石寨。经过三日三夜血战，终于掩护辎重队伍顺利通过。

11月7日，中央军委纵队、其他各军团陆续抵达文明圩，中国工农红



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卫戍司令部等领导机关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同时，红军还在文明街、沙洲村等处设立银行兑换处，开展了兑现“苏钞”、严打土豪劣绅等活动。红军部队陆续在文明圩停留了七天七夜，得到了文明群众的热情帮助，使红军部队得到了较好的休整。至今，在文明乡还流传着“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长征期间，邓颖超、蔡畅等三位女红军住在沙洲村徐解秀家。邓颖超看到徐家一贫如洗，连床棉被都没有，于是将自己的棉被剪下一半，留给了徐家御寒。临走时，徐解秀丈夫带着三位女红军追赶大部队，后来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徐解秀是世纪同龄人，前些年已去世，但她珍藏的那半条棉被却成了那段伟大历史的见证物，后来作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藏了。

11 月 8 日至 10 日，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陆续经盈洞、文明往宜章、郴州方向挺进。11 月 11 日，中革军委发布嘉奖令：“赞扬三军团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这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全线修通，但是有些地方火车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也频繁，对敌人调兵非常方便。敌人几年以前就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在这一线山上修了不少碉堡。而且这时敌人已判明我们在突围，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敌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正赶往我们前面堵击。

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徐向前和林彪之间，为了部署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发生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争吵。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次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本来是要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以后，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因为红军早就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川，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他持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徐向前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红军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两只脚怎么能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红军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

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这是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徐向前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他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徐向前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以后陈光侦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红军没有图侥幸。11 月 6 日下午 3 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名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该民团团长告诉他，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他才着了急，赶紧派二师四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这就更增加了有利条件，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血染湘江　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了著名的长征。按照预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地区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21日，中革军委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至11月15日，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蒋介石欲围歼我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于11月2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洲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洲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结集；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四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两个师与第三路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一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路22日袭占道县，左路24日占领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一部兵力西出永明（今

江永）。白崇禧害怕我军攻取桂林，遂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我军西进，并防止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全洲、兴安一线敌兵力比较空虚。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洲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此时，何键也令其第一路两个师由东安进至全洲、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 月 27 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二、第四师个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次日，敌“追剿军”第一路由全洲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二师发起进攻，敌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两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击了数十倍于红军的优势之敌，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 12 月 1 日渡过了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敌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被俘，后遭杀害。其他各部也遭到惨重伤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 8 万 6 千余人，锐减为 3 万余人。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连同前 3 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为 3 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此战之所以能够保证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是因为红军指战员在作战中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之所以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则主要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没有充分发挥红军的长处，部队在行动中仍要背负着“坛坛罐罐”行军，行动迟缓，战略战术指导上更是存在着严重错误。但是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通道紧急会议改向贵州前进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顺利通过这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是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4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

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次日，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通道境内时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

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三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黎平会议确定红军战略转移方向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关召开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是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开始，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开端。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军事基础，在中国革命史、党史和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黎平会议前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为黎平会议的顺利召开及会议决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2月12日，中央红军经湘江血战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行军至湖南通道县的芙蓉镇，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讨论进军问题。会上毛泽东审时度势分析军情，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一意孤行，未能对改变战略转移的方向作出决定，只是作出了西进贵州黎平，再北上湘西的行军路线调整。于是，当天晚上七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令各军团：“（1）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如尚在牙屯堡应进至洪洲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于十二时前全部离开牙屯堡；其十五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队，加强侦察警戒；在十五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2）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明日以主力进至牙屯堡、团头所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其先头团或师应进至播阳所、黄垢地域；侦察部队则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在长安堡、黄垢地域应留下后卫部队，向陇城、林溪警戒，以保证主力通过。（3）军委一、二纵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4）五、八军团应进至土溪之心园地域，并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同时指出：“各军团依实际情况得变更其前进位置，但必须严格的遵



守前进的主要路线及其分界线，以免障碍运动。”翌日又电令：“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找动机，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并兵分两路向贵州黎平进发，以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经湖南靖县新厂、平茶，击溃驻守湘黔交界的黔军的第一道防线——周芳仁旅毕骏团一营，进入黎平县的界牌、马家团、潭溪、罗团，突破周芳仁旅毕骏团设在五里桥第二防线，直逼黎平县城；以三、五、八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为左纵队，经湖南通道县播阳、流团，进入黎平县的草坪、洪州、中潮、佳所，攻破周芳仁旅毕骏团布防在羊角岩的守敌，夹击黎平县城。

由于通道会议未能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定的战略军事计划，如果继续往湘西进军，就会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遭来灭顶之灾。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反复思考，决定在交通闭塞、兵弱民穷、粮草富足的黎平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通道会议后，他便下到一军团第一师先头部队中，亲自安排攻占黎平县城的任务和政治局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据该师三团党总支书记肖锋的《长征日记》载：“12 月 13 日，阴雨，上午 8 时出发……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就召集我们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

12 月 14 日，担任左路纵队先头部队的三军团先头团一营首占黎平县城，因一营兵力较少，又退至城外。紧接着担任右路纵队先头部队的一军团二师六团与一师三团会同抢占黎平县城，城内敌军弃城而逃。红军攻占黎平后，周恩来即令一部北上锦屏铜鼓，将守敌击溃，对黎平东面和北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警戒线，并从一军团派出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扫除城中残敌，保卫县城的安全。14 日～17 日两路中央红军部队先后进入黎平县，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的行动是：“一军团在进占剑河后，不渡清水江，改由南岸西进；九军团进至蜡洞附近，向来路及王寨方向警戒；三军团向黎平西北开进，进至五福、罗里、抱洞地域，并侦查经育洞、朗洞到台拱的道路；军委纵队在黎平不动；五军团进至黎平县城，并对来路施行破坏警戒。”并要求每日行程不要超过 50 里，具体位置由各军团首长依据实际地形自定。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商号——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

博古、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及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李德仍未肯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到黔东北后转向湘西，与强敌硬拼，达到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甩掉重兵围堵，避实就虚，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改向黔北进军。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从而结束了自老山界以来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问题，改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前进方向。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长征开始时，中央错误路线有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才解决；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的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一路争吵没休没了，通道会议没解决，是在黎平会议上才第一次明确解决，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

暗中的摸索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

猴场会议决定加强对军委的领导

按照前黎平会议的决议，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后，即可渡过乌江，进入指定的黔北地区。猴场会议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猴场会议，是在“左”倾冒险主义者坚持回兵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和的错误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党中央不得不再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1934 年 12 月 18 日，中央红军进抵贵州黎平县城后，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黎平会议主要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并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军事方针的错误。周恩来同志回忆说“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黎平会议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和向川黔边发展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黎平会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以后，红军以破竹之势，长驱入黔，屡挫顽敌，先后攻克了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 月 31 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瓮安县猴场，先头部队抵达乌江南岸，准备北渡乌江。早在 12 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 2 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



固守，可保无虞”。

但是，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经黎平进到乌江边的猴场，‘左’机会主义者不同意过乌江，仍主张与湘西红军会合。”刘伯承在《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一文中指出：“从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也指出：“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都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十足表现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赵文华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记载：（红军）“25、26 日连陷施洞口、镇远、黄平、施秉、青溪、玉屏等处。一部向北推进占领旧州、余庆、石阡、印江等县，似欲与川湘边区的二、六军团取得联络。“黔军谢参谋长汝霖艳（29 日）电称：（红军）其先头本日已到余庆，一部已到老坟嘴，有沿肖克旧路北窜模样。上述情况说明：黎平会议后，“左”倾领导者并没有彻底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他们置黎平会议的决议于不顾，而是主张不再前进，打算在乌江南岸转战打游击，只想对付战斗力弱的黔军和地方民团，待机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

鉴于上述情况，1934 年 12 月 31 日，中央军委纵队进抵猴场后，当晚，党中央不得不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进一步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统一了认识，坚定了渡乌江北上遵义的决心。1935 年 1 月 1 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使红军进一步明确了战略行动方向，从而最后一次纠正了“左”倾领导者坚持去湘西的军事方针的错误。再则，当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黔军各部、桂军廖磊部等仍然前堵后追，四面合围，企图将红军“聚歼”于乌江南岸。如果按照“左”倾领导者坚持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势必在乌江南岸有背水一战的危险。由此可以说，在红军的进军战略方向的重大问题上，猴场会议再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猴场会议在黎平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提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黎平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情况的变化，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而且更明确更具体地提出了渡江后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猴场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由此看出，猴场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渡江后立刻准备转入反攻，以消灭蒋介石或其他部队，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和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根据地的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使红军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下一步的进军方向、战斗目标和具体任务。这对实现中央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无疑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正如猴场会议的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这一反攻的彻底胜利，五次'围剿'的最后粉碎，与川黔边区的建立，对于我们胜利的粉碎蒋介石正在布置着对于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新'围剿'计划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

猴场会议，标志着"结束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同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进一步的准备。猴场会议以后，红军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战略目标。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集体指挥下，中央红军迅速地突破乌江天险，直捣遵义城。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振奋起来了。猴场会议为实现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为即将结束"左"倾路线在党和红军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进一步的准备。

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召开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错误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

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 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于 12 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 月 31 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 年 1 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 月 7 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四年之久，给共产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接连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共产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大家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中，酝酿着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这种极为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从老山界到黎平，再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



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人在会上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而会上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 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 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 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在2月8日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采取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积极防御，首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使敌发生过失和暴露弱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如果在内线无法粉碎敌人“围剿”时，就应当转入外线作战，威胁敌人的腹地，迫使进攻根据地的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博古、李德否认了红军过去作战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却以单纯防御代替了积极防御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红军作战遭到失败，根据地日渐缩小，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护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而是当内线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时，他们或者拒绝外线作战，或者仓促突围，实行逃跑主义。回忆总结了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政治上“左”倾领导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可以看出，决议在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时，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不仅如此，决议还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指出博古、李德“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他们实行的单纯防御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余相反的”。决议号召红军在今后的作战中，应当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去战胜敌人。决议强调指出，“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



（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①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决议批判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和正确的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后继续分工。1935 年 2 月 5 日，中央红军在由遵义出发的行军中，到达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他曾说，那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可见，张闻天是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的。由于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仍然处于敌人围追堵截之中，行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并未扭转，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指挥部队打仗，继续成为中共中央的经常性紧迫的中心工作。为了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军事的领导，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 年 3 月 4 日，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为进一步统一作战指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3 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行军途中，

为了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党中央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团长，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这是一个党内专门负责指挥军事的最高领导机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从此以后，中央红军沿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不断取得胜利。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战争由失败开始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发展的道路。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当时紧急状况下，要就多年来共产党和红军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因而会议只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其一，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思想路线看，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左”倾领导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外国的经验，把革命引上失败的道路。事实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进行革命，需要解决许多特殊和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不可能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也不能得到成功，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科学理论，才能战胜敌人。毛泽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来就反对脱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



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思想路线的转变，从照搬照抄转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这种党的指导思想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下一步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伍修权曾回忆说：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

其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极度削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是由于这一转折，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遵义会议的召开证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得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时期内，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史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不断的把党和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①《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80 页。

大规模的运动战四渡赤水河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在毛泽东为中心的新的中央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面对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险境，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王稼祥将军、朱德将军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迂回曲折的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 年 1 月，当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时，就已经使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 150 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共产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四渡赤水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和形成的。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在这次作战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

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三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

1935 年 1 月 19 日起，红一、三、五、九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前进。24 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并往赤水疾进。25 日，红三军团抵达土城。26 日，红一军团在黄陂洞、复兴场遭遇川军章安平旅、达凤岗旅阻击，红九军团在箭滩遭遇川军特遣支队徐国瑄部阻击，红军占领赤水计划受挫。27 日，中



央军委纵队进驻土城。28 日，红三、五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以及从丙安回援的红一军团二师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但川军后续部队四个旅迅速增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28 日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青杠坡，改变北上行军路线，避开强敌。29 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元厚、土城向西渡过赤水河，即四渡赤水第一渡。

2 月上旬，红军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寻机北渡长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四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鉴于以上新情况，毛泽东等人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简，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红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红军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红军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 2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 日占领桐梓。25 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 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三个团的阻击，28 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是日中午，红军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 2 个师接触，红军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拼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 1 800 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 2 个师又 8 个团，俘敌 3 000 余人，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三渡、四渡赤水，突破天险，摆脱敌人。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 3 月 2 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

新的围攻，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追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红军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红军之际，3月11日，红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红军，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一个“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改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县，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黔军）。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成立的）司令员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称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云南威信县境就构思好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这样就同朱德产生分歧。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召集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遵义县第12下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万急”电报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①]。在座的首长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②]。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结果把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



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3月11日一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③]。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转达给张闻天。

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④]。1959年初努力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⑤]。

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突围转移中的中共中央（“长征”的提法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区后朱德提出的），主要是领导红军打仗、求生存。毛泽东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复执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时，就构思成熟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两次被动转移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不放弃进攻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就是希望从长计议，实施把滇军调出来，进滇入川战略计划。

3月13日，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

十三团由枫香坝奔袭驻遵义县第12上区西安镇（今泮水镇西安村）、泮水镇黔军犹禹九旅周相魁团、宋华轩团，佯攻黔西县打鼓新场，是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引出来聚歼。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一举将黔军周相魁团、宋华轩团驱逐到打鼓新场，驻进遵义县第12中区岩孔场（今金沙县岩孔镇），开展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政权。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倾巢而出，向打鼓新场开进；前锋行进到三元洞，发现主力红军没有去进攻打鼓新场，急返鲁班场修筑碉堡、工事固守。

3月14日，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率领红十团、红十三团奉命由岩孔场赶往鲁班场参加会攻国民党军周元纵队，途经遵义县第12上区（泮水区）洪关坝（今洪关苗族乡），遭溃驻小坝场（今洪关苗族乡小坝场村）的黔军伏击，牺牲30多名红军战士，当地农民将这30多位烈士掩埋在皂角树梁子山上。

3月15日2时，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各部由现驻地向鲁班场运动，对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形成扇形包围，拉开决战态势。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国民党军都吸引到黔北来，找个缝隙突出蒋介石设置的大包围圈套小包圈。双方激战至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接报：距鲁班场西北60里，川军八个团向鲁班场开来；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鲁班场开进，前锋已到遵义县第十二下区枫香坝、花苗田。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县中枢镇（今仁怀市中心城区）、茅台镇转移。16日，朱德从坛厂经怀阳洞向中枢镇行进，前往茅台镇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第二次挺进川南。如果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所迫的被动转移。那么，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就是带有战略性的主动转移。

3月16日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渡河前，毛泽东吩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工兵去二郎滩和太平渡查看二渡赤水河时架设的浮桥是否存在。虽然时任中革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的回忆有待考证（因为当时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追击，后卫部队过河后是要毁桥的），但是却佐证了三渡赤水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迷惑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

3月20日至22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从太平渡、二郎

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红军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在赤水河流域进行的运动战战役。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后帮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和在苟坝会议进入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核心后亲自指挥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过程是毛泽东构思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的基础；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为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广义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之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其次，红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方、不利于敌方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

最后，红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我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

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我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吸取前几次战斗的教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注释：

①《大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②③④⑤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第4页，第1页，第2页。

南渡乌江引滇军至贵阳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掌握了走与打的辩证关系，以走创造打的良好条件，以打为走开辟道路，从而创作了世界军事史上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35 年 3 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使 30 万国民党“追剿”部队疲于奔命，最大限度地调动敌人。为了寻求更大的战略机动，毛泽东等提出了“再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取道金沙江入川”的战略方针。1935 年 3 月 29 日，红军主力四渡赤水之后，突然调头向南，直抵乌江北岸之金沙县后山乡一带，发动了南渡乌江战役。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原定的行军路线是从宜宾附近过江入川，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川军刘湘的 1、2 师四个团在赤水一线堵截，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也在后面追击。敌人的前堵后追造成了对红军夹击的态势。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制定出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来调动敌人，以达到入川的作战目的。这样，南渡乌江就成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先决条件。

1935 年 3 月 24 日，蒋介石飞抵贵阳，立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犹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他希望“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则一定能“剿赤成功”。为达到围歼红军目的，蒋介石自任战场指挥官，亲自调动部队，在红军四周布置围堵。蒋介石判断红军返回黔北的目的，仍在企图寻找渡河点北渡长江，或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或向南绕去湘西。然而红军是围不住的，重返黔北后，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挥师南下，南渡乌江。就在蒋介石到贵阳的当天，中革军委派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分抵习水，“示形”于东北，而以主力向南突破敌人的遵义、仁怀封锁线。

1935 年 3 月 25 日，中革军委要求各军团以遭遇敌人姿态赶快通过遵

义、仁怀封锁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红九军团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迷惑敌人，以掩护红军主力的南下。27 日，中革军委又致电红一、三、五军团，明令其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南转移。同日，朱德连电红九军团于 28 日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特别要注意自己侧位警戒与封锁消息。28 日，朱德又电红九军团，令其在马鬃岭西北路上大量设置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主力迅速向南转移。红九军团马鬃岭分兵诱敌，对敌发起佯攻，是中革军委派出的一支战略奇兵，对于保证红军南渡乌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5 年 3 月 22 至 27 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遵义、仁怀封锁线抵鸭溪、白腊坎，兵分两路由底水、偏岩塘越过偏岩河进入金沙县地界。在红军主力以急行军速度兼程南下时，他判断红军在遵义、仁怀封锁线附近，将向西南防线前进。3 月 28 日、29 日，他连电滇军孙渡，命令他以最快速度，于 31 日前赶到打鼓新场和西安寨、黔西一带堵截。

中央机关随左路经湾子至沙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分别住在沙土街万寿宫、石柜台，石院子等地，后由马道子、垭口田、三丈水、川洞抵后山乌江边；右路一部由木孔、岚头、中心（狗场）、翁贡抵后山乌江边；一部由苦荼园（茶园）、安底、长坝、天灵寺抵后山乌江边。3 月 29 日，红军主力各路陆续抵达乌江北岸的金沙县后山乡一带，准备从江口、大塘、梯子岩等三个渡口南渡。

正当红军各路部队抵达乌江北岸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所部一个营及黔军江防团已驻守乌江南岸的手扒岩、观音岩等隘口。并于险要处构筑坚固堡垒，控制江面所有船只，封锁所有登陆要道，尾随之敌亦步步逼近，企图消灭红军于乌江的北岸之金沙一线，形势非常严峻。

江口、大塘、梯子岩三个渡口，大塘居中，但江面略宽，守敌火力集中；梯子岩居右面下游，南岸岩险不便登陆；江口居左面上游，虽江流湍急，但江面略窄，南岸山势稍平缓，便于强渡或偷袭。3 月 29 日晨，担任先遣任务的红一军团一师第三团和军团工兵连奉红军总司令朱德之命，担任先遣渡江任务，先期抵达乌江北岸的江口渡口。当日下午即砍竹扎排伪装成黔军从江口偷袭渡江，但被南岸守敌发现，红三团决定改偷袭为强攻。红一连连长朱日亮挑选出 75 名战士，各持长、短枪一支组成渡江突击队。三排长钟富文率 34 名战士乘坐三只竹筏，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江南岸划去。



当红军干部战士刚坐上竹排时，就遭到敌人疯狂阻击。竹排到江心后，在惊涛骇浪中沉没起伏半小时，战士们已无法把握竹筏的方向，不但没有划过去，反而又漂回北岸江边，偷渡未果。

午后，红军主力在后山乌家桥召开了渡江军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1. 选江口渡口夜间偷袭过江；2. 渡江任务由先遣部队担任，渡江后迂回歼灭大塘、梯子岩南岸守敌；3. 抵达江边其他部队准备材料在江口、大塘、梯子岩三渡口架设浮桥让主力部队过江。当晚，风云突变，狂风挟着暴雨倾盆而下，敌人的枪声也稀疏下来。朱日亮决定，亲自带领突击队，利用黑夜和风雨作掩护，再次实施强渡。此次强渡选择了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江口渡口为强渡点。晚 10 时许，红军先遣队在黑夜和暴风雨的掩护下，登上竹排，顺水斜划，终于胜利登上南岸的江口渡口，进入了息烽县的鹿窝乡境内。这里的地势十分险要，沿江是高耸云天的绝壁，唯有一条石缝可供人手脚并用地攀上山顶，当地老百姓称其为手扒岩。正因为有了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敌人只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在此防守。红军战士沿着石缝摸黑往上攀，快接近山顶时借着闪电，扔下几颗手榴弹，炸得敌人死伤无数，拼命地向山顶的地堡逃去。地堡内的机关枪疯狂地扫射起来，紧急关头，红军班长赖治将身上的手榴弹一一取下捆成一捆，再猛地塞入地堡的枪眼里，红军战士们一跃而起，控制了江口渡口。随后，先遣队扼守渡口，保护红三团的后续部队乘坐竹筏过江，与突击队员会合。子夜时分，红三团全部渡江完毕，并分兵直扑江南岸的大塘、梯子岩两个渡口，歼灭了沿江守敌，打垮了王家烈增援部队两个营，占领了江防据点。第二天凌晨，江南岸的三个渡口已全部控制在红军手中，先遣团和三军团工兵连迅速在三大渡口架设三座浮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大门全部打开。

1935 年 3 月 30 日 2 时 30 分，中革军委发出南渡乌江的命令：一军团限令晨 8 时前全部渡江完毕；三军团准一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浮桥渡河，限 14 时前渡完；五军团在苦茶园、狗场、沙土等地继续钳制与迟阻周（浑元）、吴（奇伟）、王（家烈）三部之敌；九军团现在苟坝准备南移；军委纵队限令 10 时渡河完毕；干部团则为后卫警戒。各军团（除红九军团外）根据野战军司令部电令，从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全部南渡乌江，在息烽流长一带集结修整。从此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几十万追敌甩在了乌江北岸，胜利实现了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计划。

3 月 31 日晨，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向息烽侦察前进。红一师三团二

营，由潮水进至黑神庙。向守敌九十八师五百九十团一个连发起攻击，半小时解决战斗。击毙击伤敌数十人，俘敌56名。敌残余溃往县城。二营向县城方向追击挺进。是日中午，红一师二团在黑神庙北面阻击由遵义、养龙站向息烽开进的援敌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九旅三百一十五团。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毙伤敌官兵40余名，敌向山王庙方向溃退。下午3时，敌三百一十五团占领黑神庙，当晚构筑碉堡六座等防御工事。红二团数次组织佯攻，以阻敌增援息烽县城。与此同时，红五军团顺利进驻息烽县九庄镇朱家山、望城坡、青堰塘、梨树坡一带休整。下午3时左右，四架轰炸机飞来，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九庄镇西街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10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许多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数十名负伤。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兵锋直逼蒋介石的统帅部贵阳。当然红军之意不在攻打贵阳，而在于调出滇军西进云南，为抢渡金沙江扫除障碍。1935年4月初，毛泽东为“调虎离山”，乘虚进军云南，即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前锋逼近贵阳。

4月1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命令。红一军团从县城西、西南、西北三面逼围，将城外敌军赶入蚕桑坡、牛角坡等14座大小碉堡内。4月2日拂晓，县城内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奉令向底寨、下阳朗出击。红二师将其阻击回县城。敌五十八师三百一十五团由黑神庙向县城靠拢。红一师一、两两团1 600余人，在盘脚营以西及三合土一带高山阻击，战斗一小时，将敌三百一十五团击溃，撤向底寨。当晚8时，红一军团奉总司令朱德“通过息烽，向东南前进”急电令，开始转移。4月2日晚，红一师三团由底寨进至阳朗。4月3日晨7时，红一师一、二团在阳朗一线构筑工事，封锁敌九十三师、五十三师南进，掩护主力跨越川黔公路向开阳、修文挺进。敌向阳朗、笔架山、石瑛山发动进攻。红一师凭借工事利地，顽强抗击，奋战6小时，待主力全部过公路后，边打边向下红马方向撤退。是日，红一师三个团翻越狼鸡岭，入开阳境。至此，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息烽县境。4月4日红军占领扎佐，逼近贵阳。

贵阳是蒋介石行辕所在，是敌必救之处。而当时守军却不足两个团，兵



力薄弱，大军被甩在乌江北岸，附近无兵可调。红军突然兵临贵阳城下，吓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赶忙召集会议，部署防堵力量，确保贵阳安全。为此，他当即决定，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令驻黔西的陈金诚团星夜兼程赶来贵阳“保驾”；令在遵义的李韫珩纵队速至息峰堵截；令在黔东的李云杰纵队速至黄平、余庆地区防堵；令吴奇伟纵队速至修文、鸡场、沙子哨等地，周浑元纵队在黄沙河、六广河之线防堵；令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在东面，桂军廖磊部在南面堵截。此外，急电孙渡，火速东进贵阳，以救贵阳无兵之虞。

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救驾”之际，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判断失误，红军一路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并到处书写“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边，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的清水江上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清水江的姿态。同时，派出部分兵力东进，佯攻瓮安、黄平，摆出要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回合的架势，迷惑敌人。

蒋介石果然再次上当。他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于是，他又急令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上述佯动，既不是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准备开往湘西，而目的旨在调动敌人，为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

4月上旬，蒋介石部署在遵义至贵阳线及其以西地区的主力部队，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特别是把滇军调到贵阳以东，贵州西部出现了一片空白。趁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从“声东”迅速转向“击西”，于4月7日晚给各军团发出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的指示。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主力由清水江地区突然急转南下，兵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越过湘黔公路南下。而后向西前进，沿途势如破竹，所向无敌。4月8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南移，红三军团以一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积极佯攻贵阳。蒋介石听到炮声隆隆，立即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并亲自派飞机侦察轰炸。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

4月中旬，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以每天行军120里的速度，红军相继攻克贵州的青岩、广顺、鸡场、定番（今惠水）、长顺、紫云等县城，胜利地渡过了北盘江，接着又连占兴仁、安龙、兴义等县城，迅速由贵州向云南推进，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计划再次落空。

蒋介石见红军渡过北盘江后有长驱直进云南之势，慌忙调整部署：电告龙云，令他将尚留在云南的部队部署在滇黔边境黄泥河以东防堵；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令中央军和孙渡纵队尾红军追击。但是，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更加低落，行动十分缓慢。4月18日，中央红军于白层、者坪地区顺利渡过北盘江。随后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城镇。

这时，被滞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曾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的老木孔击溃黔军七个团的进攻，4月9日，红九军团由瓢儿井出动，越过大定、黔西间的公路，向乌江上游的三岔河前进。经过四天的行军，走了200多里，于13日下午从容不迫地到达织金县的猫场，同红军主力南北呼应，协同作战。

南渡乌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上又一神来之笔，红军又一次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包围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红军赢得了主动，蒋介石则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于赤水河以西、乌江以北的梦想，南渡乌江后的红军，从乌江渡的梯子岩渡江，直逼贵阳城下，蒋介石惊慌失措急令滇军紧急增援贵阳，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局面。

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主动权

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继四渡赤水之战后，指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不断造成蒋介石的错觉，进而调动敌人，乘虚北渡金沙江，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计划，夺取战略转移主动权的军事行动。

为了顺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命令红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向北穿插，在乌江以北的滇黔边界牵制敌人。其目的是要使“云南王”龙云和薛岳、蒋介石相信，红军的目标是攻占昆明，让他们调动军队驰援，好闪出道来供红军过江。毛泽东巧计安排，蒋介石再次上当。

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再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他决定集中第二路“追剿”军主力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之间地区。1935 年 4 月 23 日和 26 日，蒋介石连电龙云、薛岳，令尚留云南的部队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五十三师经平彝向宣威、威宁转进滇黔边境黄泥河以东“堵剿”，令中央军和孙渡第三纵队尾追红军，川军 1 个师集中毕节机动。

毛泽东为打破蒋介石的这一追堵计划，即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疾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疾进。4 月 24 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当红军前卫一师二团越过云南境内的第一道险阻块泽河，向平彝县羊肠营急进时，滇军李菘独立团已抢先赶到羊肠营，占领了海拔 1 800 多米的白龙山制高点及两翼的山梁。红二团战士们在“消灭李菘独立团，打通入滇通道”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向敌人发动猛攻，首先夺取了敌军前沿阵地杨梅垴。接着，红军采取正面佯攻和两侧迂回的办法，在夜色掩护下，夺取了主峰两翼的山梁，并迅速包围了主峰。李菘怕全军覆没，率敌狼狈逃窜。红军乘胜追击 35 公里，在平彝县糯岗村附近的车新口追上逃敌。敌人据险阻击，红军以部分兵力正面进攻，主力迂回到敌人侧背的办法，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 200

多名，俘敌数百名，李菘仅带几个随从夺路逃命。毛泽东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命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

红军西进云南，意在渡金沙江北上。为使滇军向红军让开北进渡金沙江的通道，毛泽东决定利用龙云惧怕红军占领昆明的心理，首先佯攻昆明，再次调动滇军集中到昆明去守城。为了增强昆明的防务，龙云组织了昆明城防司令部，并决定：将红军堵截于云南境外，不使深入滇境，万一堵截不住，务尽种种方法使红军仅能通过边隅地区，转向邻省，将红军逼向西昌、会理方向。为防蒋介石“假途灭虢”，龙云请蒋严令中央军各“追剿”部队，务须向会泽、巧家方面“追剿”，迫使红军进入会理方向，以收当年清军消灭石达开那样的成果。

龙云还派心腹、旅长刘正富驰赴巧家金沙江边，明为加强防务，封锁渡口，实际是想同红军罗炳辉接洽。因为罗炳辉是云南省彝良县人，又在滇军中任过职，龙云欲用老乡关系来劝说他由巧家过江，不要深入云南，并声明滇军志在保境，不欲远追，切望红军不要经过昆明附近。由于红军疾速进入云南，龙云眼看红军直指昆明，吓得手忙脚乱。除向蒋介石紧急呼救、急令孙渡回防昆明外，他急调第三旅、滇越路警大队和附近各县民团来昆明防守，甚至将在金沙江驻防的两三个团也调回来了。并昼夜赶修碉堡、工事，准备顽抗。另外，他还做好准备：如果昆明守不住，就西逃缅甸。

4 月 26 日，按照军委部署，红军向沾益县白水前进。当天，三军团进驻白水城，并以一部对沾益县包围佯攻：一、五军团各一部对曲靖进行包围监视。红军准备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回击滇军先头旅。但敌人鉴于李菘独立团的失败，不敢前进，而是绕道罗平、陆良、宜良等地，乘火车返回昆明保卫老巢去了。4 月 27 日，红军占领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前锋直逼昆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红军继续向昆明逼近，到达了离昆明仅 30 公里的大板桥，接着又到达了昆明的近郊。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的一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甚至在昆明城郊高喊“活捉龙云”的口号，发动群众大做爬城云梯，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当佯攻昆明的战斗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红军主力却悄悄地迅速北进，直奔金沙江了。

在此期间，红九军团以急行军速度向宣威前进。宣威和东川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之地。红九军周毫不费力，先后进占这两座县城，并在这里休息了

三天，开仓散谷，将官僚经营的火腿公司的财物也没收分配，扩大了政治影响，获得了大量物资供应。在这里，大批贫苦农民踊跃参军，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仅东川一地，一天半的时间就扩大了新战士一千三四百名。

甩掉了追敌向金沙江畔前进的红军，急需云南地图。当时全军只有一份云南省地图，比例尺太小，地点、路线都不详不准，部队因此老走弯路，也看不出金沙江渡口在哪里。依靠向导探路，也仅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有时仍要走弯路。军委指示各部队想方设法，搜集大比例尺地图，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4 月 28 日，军委纵队沿曲靖公路向马龙镇的进军途中，俘获龙云由昆明派出的一辆军车，车内载有龙云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 20 余份，以及宣威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土特产。这些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9 日，红军先头连乔装成中央军，智取马龙镇，并乘胜向昆明的东部屏障杨林进击。在杨林，红军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还佯装看守不慎，故意放走了几个俘虏的兵丁，去向昆明告急。

直到红军即将抢渡金沙江之时，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判断出红军之意不在攻占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于是，他赶忙部署新的“围歼”计划，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北岸阻截，妄图把我军消灭在金沙江畔。4 月 28 日，蒋介石发密电给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严令该段之各军民长官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并且严令在渡河点附近，要实行“坚壁清野”，“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于当晚接到这份密电后，急忙下达有关各县，封锁金沙江各渡口，藏匿和毁坏所有渡船。龙云为保住昆明老巢，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兵力，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5 年 4 月 29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4 月 29 日，中央红军兵分二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两岸都是崇山峻岭，江涛汹涌，水流湍急，自古称为天险，难以徒涉。国民

党军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对岸渡口，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成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红军不怕天险，兵分三路向金沙江皎平、龙街、洪门三个渡口急进。4月30日，军委纵队到达寻甸县柯渡的丹桂村。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部署了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会议决定加快速度，分三路抢占金沙江渡口。具体兵力部署是：一军团为左纵队，从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军委纵队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皎平渡。红一军团顺利夺取龙街渡口，并在这里架设浮桥，但因水流太急，桥架起一半就被急流冲走。不过架桥让前来侦察轰炸的敌机发现后，倒是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蒋介石和龙云认定龙街渡口是红军的主要渡口，一再调动部队“向元谋急进”和“兜剿”。红三军团迅速进占了洪门渡，这里也因水流太急，浮桥没有架成，最后找到一只小船，只将红十三团从这里渡过了江。这样，红军渡过金沙江的希望便都寄托在皎平渡上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根据形势变化，果断决定红一、三军团两路全部赶到皎平渡过江，并由五军团掩护。

中央红军在分路向金沙江畔兼程疾进过程中，左纵队红一军团为争取先机，即以先头分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于5月1日到达禄劝。国民党禄劝县县长不辨真假，即将红军先头分队迎接城内，热情款待，并交出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交办的全部军粮款。随后，红一军团又轻取了武定和元谋县城，直趋金沙江畔。与此同时，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以一昼夜行进200余里的速度，于5月3日晚抵达金沙江皎平渡口。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自古以来，皎平渡就是有名的渡口。当时，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而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他特产。因此，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了夺取皎平渡的计划。为加强领导力量，刘伯承亲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抢夺皎平渡渡口战斗。

刘伯承与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商量后，决定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他和宋任穷一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抢占皎平渡口，消灭驻守敌人，收集船只，组织架桥，保证后续部队渡江；陈赓团长率两个步兵营、一



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20公里的通安镇，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援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红五军团渡江。

快到金沙江边时，天色已近黄昏。担任前卫连的九连根据便衣侦察员了解的敌情和渡河点，迅速、秘密地接近了江边，发现江中停着两只船。原来这两只船是皎平渡对岸敌人送便衣探子过江来侦察情况用的。由于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么快，这些探子便寻欢作乐去了。前卫侦察组机智地把两只船俘获。

宋任穷政委令九连萧应棠连长率领全连首先渡江。其中，三排在江南岸掩护，萧连长率一、二排首批渡江。萧连长率一、二排，分乘两只小船，在船工们的帮助和夜幕掩护下，搏风斗浪，顺利地到达了北岸。萧连长先派出两名战士，俘虏了两名敌哨兵，然后令一排顺街往右打敌一个连，令二排往左打保安队，同时烧起茅草，向南岸发出已经过江的信号。

夺取皎平渡之后，刘伯承又命令陈赓率干部团后梯队主力夺取皎平渡以北20公里的通安州。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集镇。它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刘伯承正是看到通安州对保证全军安全渡江的重大意义，才命令陈赓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的。

为了迅速奔袭通安州，部队来不及休息，便立即组织分批抢渡。干部团除留先遣营防守渡口外，主力部队由陈赓指挥，渡江后强行军向通安州进发。红军一到通安州，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队遭遇。敌人有一个旅共二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而红军还不到一个团。敌我兵力悬殊。双方都力图抢占通安州，于是，在通安州山顶小镇上打了一场极其激烈的遭遇战。先头部队开战后，刘伯承估计到形势严重，又立即命令宋任穷带防守渡口的三营，火速赶到通安州，同团主力一起战斗。由于敌人正面为开阔地，火力强，红军不便正面进攻，于是团部决定二营在正面佯攻，把一、三营调到右翼包抄迂回，攻击敌人的左侧。全团上下行动迅速，经过拼命争夺，红军占领了小高地，并连续向敌人冲锋，终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敌军残部不支，向会理县城逃窜。入夜，干部团占领了通安州。

夺取通安州的战斗可以说是皎平渡战斗的继续。就这样，干部团用30个小时，急行军140公里，不折一人一马，取得了夺取皎平渡的胜利，接着，又拿下通安州，确保了皎平渡的安全。以后，他们又立即派小部队四处找船，在群众的帮助下，先后找到了另外五只船和汉、彝、傣、纳西等各族

船工36人。此后，在九天时间里，红军依靠七只船，昼夜抢渡。5月7日上午，红三军团除了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渡江外，主力全部过江。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于5月7日在树桔渡顺利渡过金沙江。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一夜赶了120多里路，于8日天亮时赶到皎平渡口，黄昏前渡江完毕。5月9日红军全部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红军能争取到九天时间安全渡过金沙江，实属不易。这里既有红五军团顽强阻击之功，也有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其部下的矛盾之妙。红五军团在完成牵制昆明敌人的任务以后，即奉命北上，担任中央红军主力强渡金沙江的后卫，在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的敌人。红五军团到达石板河后随即作了具体部署：39团位于砍邓附近，为第一梯队；37团位于石板河背面大山上，为第二梯队；军团部驻在石板河村，军团的前沿指挥所设在小庙丫口。

蒋介石获悉红军已分头抵达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一带后，立即派飞机天天侦察轰炸，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纵队加速尾追。蒋介石用于追击红军的先头部队万耀煌第十三师，已到达距石板河不远的团街附近，蒋急令该师全力尾追我军，保持火力接触，不让红军摆脱，以利周、吴纵队迅速向该师方向增援。

但是，万耀煌这次没能让蒋介石满意。第十三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非嫡系，师长万耀煌是个老奸巨猾的军阀。蒋、万之间存在着矛盾。万师有二个旅六个团。为保存实力，他既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又怕蒋介石以追击不力的罪名吞并他的部队。在万的先头部队与红军后卫37团火力接触，遭到37团猛烈反击后，万部就在团街构筑工事，固守不追了。5月4日，蒋介石严令薛岳督促各纵队："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这使万耀煌更加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他设了个金蝉脱壳计。当晚，他向蒋介石发电，谎称：派侦察队严密搜索，在前进的方向上，尚未发现共军的任何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俟查明共军去向后，再尾击而"剿"之。5日晚，他又继续向蒋谎报：经过一天侦察，前方仍未发现共军，6日拂晓前如无新的训示，将率部队从团街以南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实际上，他在发报后即命令部队后撤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大怒，向万发出了"限即刻到"的手令，断言飞机侦察共军确实已经从皎平渡到了北岸，命令他仍从团街向皎平渡全力"追剿"，如再违令，将按军法从事。在蒋介石的严逼下，万耀煌只好重新向团街推进。

万耀煌师这一退一进，正好为红一、三两军团赶来皎平渡渡江争取到必要的时间，毛泽东等果断决策，一方面电令一、三军团迅速赶往皎平渡渡江，一方面加重五军团的掩护任务，并派李富春到五军团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向江边前进，以保证红军主力渡江。

当李富春到达五军团时，五军团已经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但因红军分散配置，每个山头只有一二十人，故仅轻伤数人。争取到一定时间后，五军团就主动撤到后一阵地。战斗正激烈时，李富春来到阵地，他首先代表中央、军委对五军团全体指战员进行亲切的慰问，并且传达了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他对军团和各团干部说：原来全军准备从三个地方北渡金沙江，由于情况发生变化，现在只能集中在皎平渡过江了。

过江的时间要延长几天，所以你们阻击敌人的任务也加重了。他又说，数万红军正依靠几只小船，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我们能再坚守三天三夜，蒋介石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即要宣告破产。李富春最后铿锵有力地说："毛主席要我告诉同志们，中央相信五军团是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

红五军团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立即派干部到各阵地，传达李富春来到前线慰问的消息和军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成了大家的共同誓言。指战员们更加顽强、巧妙地阻击敌人，使万耀煌师难以前进。

5月8日，龙云和薛岳又命令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一齐"向环州石板河一带之匪，竭力压迫，乘其半渡而击之"，严令"各部努力追击"。尽管敌人越来越多地麇集山下，敌我力量越来越悬殊，但红五军团指战员仍然顽强战斗，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把阵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红五军团的领导富有战斗经验。他们在坚决阻敌的同时，也做好了及时甩脱追敌的准备，把伤员全部送到了后方。因而，当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接到军委要他们撤到金沙江北岸布防的命令时，便迅速地脱离了追敌，以急行军到达皎平渡渡口。

5月9日，红五军团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他们在做好船工工作的情况下，把七只渡船全部毁坏。红军给船工每人每天发工资大洋五元，另给每人发30块大洋，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还深情地对船工们说："我们全都过了金沙江，你们有很大的功劳。白军很快会再来，你们回去要

小心，要同反动派做斗争。我们还要回来的。”船工们一个个深受感动，有的船工还坚决地参加了红军。在这期间，红九军团也在会泽西北的树桔渡过了金沙江。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的第二天，即5月10日，前来追赶的国民党军队才赶到皎平渡口。可是这里已经没有了船只，而此时红军早已到了金沙江北岸，追敌只好望江兴叹。

毛泽东继四渡赤水之战后，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滇军来援。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不断调动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特别是将滇军调离云南，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红军利用滇军移动时留下的空隙，迅速插入国民党兵力空虚的云南，巧渡金沙江，使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数万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使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获得了绝对的战略机动，为红军主力西进四川、北上抗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负责人之后取得的，是红军长征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纠正消极情绪的“会理会议”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风波。1935 年 5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击溃狮子山的一部川军，经过通安、富乐、彰冠等地，进入会理地区。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洛甫、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城是一座古城，300 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 7 天，都未攻破。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但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决定于 5 月 12 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本来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机动作战就不服气，散布毛泽东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甚至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林彪为什么会有此举动呢？因为他感到在毛泽东指挥下，搞得部队很疲劳，他这种情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渡赤水以后的第二天，即 1935 年 1 月 30 日，他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右纵队（由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二、第三梯队及干部团上干队组成）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沿途群众极少，无粮食补给，只能吃稀粥，且受追敌侧击，建议经古蔺

向永宁方向前进。4 月 23 日，当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他又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对目前行动，建议……须尽速脱离周、吴、孙（周浑元、吴奇伟、孙渡，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第一、第三纵队司令）而力求消灭万师（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如条件不利时，则应力求迅速超过万师，在万师以北即盘县、平彝以北活动。"电报还说："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随后，渡金沙江的一段经历可能加深了林彪的不满情绪。

5 月初，中革军委决定抢渡金沙江。红军将要渡过的这一段金沙江位于海拔 5 000 多米的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大峡谷，两岸多悬崖峭壁，落差巨大，水流湍急。从这峡谷中渡江，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关口。

中革军委计划从三个渡口渡江。红三军团为右翼，在洪门渡渡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居中，在皎平渡渡江；红一军团为左翼，在龙街渡江。在这三个渡口中，龙街位于西面，在元谋县，是四川和云南之间的主要渡口。皎平渡居中，在禄劝县，同龙街之间的直线距离有 60 公里。洪门渡在东面，距离皎平渡比较近。

中革军委之所以决定分三个渡口渡江，显然是为了提高渡江的速度。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形、敌情、气候等因素的变化，作好有的渡口不能渡江的准备。

红军进入云南以后，蒋介石已察觉到红军的目的不在占领昆明，而在于渡金沙江。4 月 28 日，他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要龙云严密封锁金沙江。于是，龙云下令金沙江南北两岸所属部队一律封江，重点则是龙街渡口。

林彪、聂荣臻命令一师为前卫，抢占龙街渡口。5 月 4 日，一师到达龙街渡口。此时，江上的渡船已被川军拉到北岸，要架桥又无器材。天上还不时有飞机前来侦察、骚扰。据当时的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我估计一时难以把桥架起来，同时也考虑到如果后面的部队都拥到渡口来，一旦有情况，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我预先命令部队向后架了 15 里地的电话线，并派一名参谋等在那里，以便和前来的军团司令部随时取得联络。随后，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借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

这时，红一军团司令部已到达 15 里外。林彪要通了渡口的电话。李聚



奎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林彪便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部队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回忆说：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随后，林彪立即致电中革军委，反映在龙街不能渡江的情况。当日，朱德复电："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日兼程赶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割断的危险。"林、聂立即决定，沿江边向东，向皎平渡前进。这一夜走得非常疲劳。据聂荣臻回忆：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120里地。

120里，再加上一夜横越48道急流，这对于林彪的烦躁情绪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尽管红军此时已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林彪却仍然认为四渡赤水以来路走多了，在龙街骂娘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他认为部队行军应该走"弓弦"，取快捷方式。现在尽走"弓背"，会把部队拖垮。一路上，林彪不断讲自己的意见，聂荣臻、左权、朱瑞、罗瑞卿都不同意林彪的意见。聂荣臻尽管和林彪共同签署了4月23日的电报，但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看法。他说："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德彭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遭到彭德怀的回绝，也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聂荣臻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林彪不听，又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还要求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在信上签名，但都被他们严词拒绝了，林彪就以个人名义

将信发出。聂荣臻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林彪要求更换指挥的意见虽然遭到红一军团几位领导干部的一致反对，但他那嫌路走多了的埋怨情绪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就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红三军团的意见是在遵义会议后，军委派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联名发电报反映给军委的。

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 45 里）。我们 11 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人退路，故缴获也不多，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革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1935 年 5 月 12 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列席了会议。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张闻天的报告大纲是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他在报告中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



指挥，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彭德怀这时才看到。接着是聂荣臻发言，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还说当时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他出来指挥时，彭德怀根本没有同意。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就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几渡赤水，他说：“像这样迂回前进，有没有必要呢？我看大有必要，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如此嘛。不从实际出发，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可是现在，有人对迂回前进多跑一点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总书记写信，要求改变指挥，这是一种动摇，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动。大敌当前，我们的干部说什么都不应该有这种情绪”。

毛泽东在会议上主要是批评了林彪，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毛泽东说：“你是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既然信的内容也牵涉到彭德怀，彭德怀在会上也发了言，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毛泽东还对彭德怀提出指责，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张闻天、彭德怀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

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1959 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但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此事又成了一大罪状。彭德怀在“自述”中总结道：“在这 24 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者。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边，自己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红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心里，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才挑明。在 1941 年 6、7 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 1943 年 9 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对此事作了澄清。

关于会理会议，张闻天作了这样的客观评价：“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会议从 5 月 12 日下午开起，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并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区；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和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对取得的成就和胜利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会议又认真地研究了党内和红军中的思想状况，对于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意见，也进行了批评。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会议还对下一步红军的行动计划进行了研究，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按照遵义会议制定的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5 月 15 日中央红军撤离会理，沿安宁河谷北上。17 日，红军前锋到达德昌，守敌许剑霜旅前哨营与红军刚一接触，即败退西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在四川礼州附近的铁坑开会，讨论行军路线，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取道冕宁过彝民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在渡过金沙江后，形势已转变到对红军有利，所以在渡金沙江的前夕，中革军委就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唯一正确的决策。会议还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充分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当开路先锋。

会理会议的主要结果是积极的。通过这次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在四渡赤水中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采取的在运动中摆脱敌军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但会理会议也表明，毛泽东获得的这一领导地位也还不巩固，还要经受斗争的考验。毛泽东的权威这时还是相对的，可以挑战的，也有人挑战，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崇高的威望。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对领袖也敢提出不同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党内民主所必需的。

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

“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增添了最光彩的一笔。在通过彝区的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提出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等主张，为革命胜利后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彝海，红军还建立了第一只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彝海结盟，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红军主力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为红军北上抗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凉山，还有近万名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凉山和凉山的少数民族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达到了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但是当时红军前面还是困难重重，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要到川西北，或川陕甘去创造新苏区，找到一个落脚点，还需要战胜许多的困难，而当前的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5 月 15 日 蒋介石在昆明电令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自川南率部于十日内赶赴大渡河布防，并拨二十一军、二十四军各一部归其指挥调遣。国民党军队日夜兼程向大渡河急进，妄图抢先占领大渡河北岸，阻止红军渡河。后面尾追红军的几路国民党军队，也都进至金沙江一线，紧紧跟着不放，如果红军不能迅速占领大渡河，那就不可能向北，只能向西进入人烟稀少的川康交界地区，困难和危险更大。此时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冲破天险大渡河。

1935 年 5 月 20 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族地区，大渡河的命令：“要求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过泸沽、登相营、越西，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河消灭敌人”。红军当时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

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四川的心脏——成都。另一条是小路，而且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安顺场。"①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1863 年，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达大渡河的紫打地（今安顺场），就是被大渡河所阻。清军勾结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几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对石达开的部队围追堵截，致使石达开及其部队进退无路，辎重全失，妻儿七人投入大渡河，全军覆没，石达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所获，被害于成都。

5 月 11 日，蒋介石在昆明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策定封锁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陇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的部署，命令川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渡；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各部，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红军夹攻，以解会理之围，然后进至西昌筑碉，右与昭觉之郭勋祺部，左与盐边、盐源之滇军，连成碉堡封锁线，严防红军南下；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后，沿雅陇江两岸筑碉防守，并在水仁、元谋各县沿金沙江右岸筑碉防堵。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河急进的消息后，妄图在大渡河附近消灭红军，吹嘘红军将成为太平国后期西征的第二个石达开。为在大渡河一带围歼红军，蒋介石绞尽了脑汁，他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他为在大路上围追堵截红军下了大本钱。

早在 5 月 10 日，蒋介石就从贵阳飞抵昆明，以便就近督促各路人马围攻红军。一到昆明，他立即给其在大渡河南北的各路部队发电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今红军已进入这崇山峻岭，一线中天，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他命令各部：努力作战，建立殊勋。他还给其部下打气说：红军此次进入凉山大渡河地带，此乃我军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各部官兵，人人洞悉 72 年前石达开率师 80 万尚败亡在这里的故事。蒋介石为了提高部下在大渡河地域歼灭红军的信心，竟然不惜编造历史，把在大渡河失败的 4 万军队夸大为 80 万。又说红军的形势更比石达开困难，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的壮志，立即率部围击，在大渡河夹击红军，予以聚歼。

为保证围歼毛泽东红军战略目的的实现，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尾追红军的10万国民党军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分几路向红军夹击，企图迫使红军向大渡河靠近；另一方面命令前头截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企图凭天险之河而扼守，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之南。为使红军无法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反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明白，蒋介石部署的大渡河会战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不使红军渡河，待尾追红军的10万中央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南北夹击红军。打破蒋介石如意算盘的关键是赶在中央军追上来之前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决定避开大路而选择小路，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为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连（联）着争取少数民族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着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用通俗易懂、真切感人的语言将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公之于众，以便消除彝族群众对红军的疑惧："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族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③1935年5月1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④

5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治委员。任命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组成支先遣队，侦察了解大渡河边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以决定从何处渡过大渡河及如何渡过大渡河。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且作风细致，很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



情，对彝区的“黑骨头”、“白骨头”和家支的状态都非常清楚。刘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刘伯承、聂荣臻指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和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但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聚居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彝族。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他们世代繁衍生息在群峰耸立，气势磅礴的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数千年来，彝族一直参加我国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对于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维护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在当时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彝族还是一个尚处在奴隶社会的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是由几个互不隶属的黑彝家支分割统治，按照果基、罗洪、倮伍三支划分区域。每一个家支，就是一个父系血缘（部分地区也有母系血缘）集团，一个独立王国。彝族人民性情强悍，部落之间时常因奴隶主互相争夺土地、奴隶牲畜而引起械斗。

反动的家支制度加上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便是解放前套在凉山广大奴隶颈上的两具沉重的枷锁。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军事上征剿，政治上歧视，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同化，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狡黠的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的军队和地方的军阀又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隔阂，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担任红军先遣队任务的刘伯承、聂荣臻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可想而知。

红军为了强占大渡河争取时间，就必须经过彝族居住的凉山地区，这样必然会遇到当时红军所预计的那样的困难“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里

的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民族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②]这些都是红军必须作好准备和必须面临的问题。在当时，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

四川军阀为控制彝族人民，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领关在冕宁县城监狱里当人质，哪个家支若不听令便杀这些头头。这种压迫政策，使彝区上下对汉人普遍都有猜忌甚至是仇视情绪。红军占领了冕宁县城后，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来，还请一些头目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一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又当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员。

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部队于5月20日晚9时，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5月21日到达大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行军命令，并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经过调查研究工作，找好了向导和通司（翻译），先遣队于22日进入彝区。在红军过额瓦垭口时，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发出呼啸，企图阻止红军前进。部队被迫缩短行军距离，走到彝海子，突然从身后额瓦方向传来枪声，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手舞大刀簪矛和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冲来。接着，后面传来消息说：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掉队和没有武器，所带的架桥工具，器材都被彝人抢光，衣服被剥尽，被迫走原路退回出发地。先遣部队面临着前有包围，后有袭击的严重局面，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决不打枪，于是部队停止前进。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刘伯承、聂荣臻命令部队停止行军，在袁居海子（今彝海子）一带驻足待命。四周是山崖、沟谷、林间，彝民向海子一带包围过来。为防止不测，一方面，刘伯承当即布置防守阵地；另一方面，聂荣臻带领宣传队和翻译向彝民喊话，耐心地讲解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说明红军只是借路北上抗日，决不久驻。

经通司（翻译）向彝人喊话、做宣传解释工作还不见效果时，此时，果基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派了他的四叔果基约达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听情况，通司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同意了，当即挥散了集聚的人群。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人

同胞，红军刘司令统率大队人马路过此地，只是借路北上。并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起初，果基约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又看到红军解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民，并不像地方军阀军队那样恶狠狠地涌进堡子烧杀抢掠时，便消除了怀疑，便本着“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表示同意交朋友。当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果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作为果基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愿意结盟是为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并不想介入彝族内部冲突。刘伯承为了团结彝族同胞，确保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定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小叶丹的四叔得知率领大军的刘司令愿意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后，很是高兴，纵身跃上骡子，扬鞭奋蹄，奔回家去向小叶丹回命。

小叶凡全名为果基小叶丹，果基或译为古鸡、古基，小叶丹或译为小约旦。彝族实行父子连名制，按这一习俗，小叶丹的全名应为果基．木吉．叶丹。果基为家支名称，木吉为父名，叶丹为本名。为了与同名的叶丹相区别，于是加是“小“字。按照彝族习俗，在一般情况下称呼“果基叶丹”即可，但是在某种场合，为表示庄严或郑重，就必须称呼父子连名的全称。

小叶丹出生于公元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果基家系凉山彝族传说中的两个始祖之一的曲涅之后裔，为凉山地区最大的家支之一。所谓“家支“，系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的一种父系血缘集团组织，内部严禁通婚。在当时，凉山彝族地区约有 100 多个互不隶属，各有固定地域的黑彝家支，实际起着政权的作用。家支内有大小头人，按习惯处理内外事务。果基家族本世居于凉山腹地之中的普雄一带（今越西县境），直到 19 世纪末时，其先人才辗转迁徙到冕宁县今彝海乡白沙村。果基小约丹兄弟共六人，他排行第四。自幼就性情倔强、豪爽，青年时代即善交际、讲义气。由于处在贵族地位，耳濡目染，在中年时已熟悉习惯法与典故，能言善辩，成为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重大事件的裁决者之一。他不仅在本家族内颇有声望和号召力，就是在冕宁一带也是有影响的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率红军来到果基的地盘时，“果基”与“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是“果基”家的领袖，他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

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件承立刻骑马来到彝海子边。同时，果基小叶丹带领当家娃子（即从奴隶中选拔的管家）沙马尔各子也来了。他看到刘伯承，便率众人下跪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前扶住，不让他行礼。

刘伯承即告诉果基小叶丹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过好生活。小叶丹大为感动，许诺："红军从这里通过，由我们管，由我们保。"这样，通过通司和沙马尔各子作翻译，很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于是，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结拜兄弟。

彝海，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海拔2 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面积约20万平方米，呈元宝形，四周山峦环抱，林木蓊葱。1935年5月22日，就在这个地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按照彝族习俗，结拜兄弟要杀鸡喝血酒，果基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刘伯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当沙马尔各子杀了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高高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果基小叶丹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来大声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刘伯承当众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小时丹。果基小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这就是长征路上的彝海结盟。

当晚，刘伯承在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小叶丹叔侄一行。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伯承建议，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随后，刘伯承将带来的武器、弹药送给了小叶丹，并帮助他们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雞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果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写下了委任状，还赠送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小叶丹心中的感激溢于言表。彝海结盟后次日，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通过俄瓦彝海子向北前进。沿途山上山下，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人，发出"啊吼"的呼喊声。但是，这次的呼喊声不像昨天的怒目相待，而是笑逐颜开的欢迎和欢送了，刘伯承在喇嘛房与小叶丹分手，红军留下参谋丁伯霖作后续部队的联络员。然后派手下的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

各等人做向导，把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一直护送到筲箕湾，再由果基阿最支送到岔罗，出了彝区，直抵安顺场。

从此，红军的后续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5月21日红九军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于是日至西昌城北的礼州（距西昌城50华里）与红三军团留守部队会合，并接替三军团防务，担任全军后卫，以掩护主力抢渡大渡河。至此、红九军团在离开主力，单独活动，转战千里之后，与主力会合了。“彝海结盟”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体现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爱戴和军民的团结。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先遣队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经过彝人交涉，都得顺利通过。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七天七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百里彝民区，继续向大渡河挺进。

彝海结盟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实现了北上抗日军事大转移，彻底宣告了蒋介石反动派妄图利用彝族人民阻止红军北上阴谋的破产。刘伯承曾回顾历史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了。”这三天时间，真是改写了历史。”“彝海结盟”几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顺利到达安顺场。和刘伯承见面的时候，毛主席特意给他敬酒表示祝贺。周恩来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主席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⑤

红军走后，许多彝民为了纪念红军，把当年出生的孩子取名为“红军子”或“红军姆”（即“红军女”之意），还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留下来的东西保存起来，爱如珍宝。红军走后，白色的恐怖再次笼罩了凉山地区，但广大的彝汉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红军

果基支队，他们举着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牢记刘伯承“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的话，不仅自己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而且还联合了倮伍、罗洪家族的武装一起组织成游击队，打击国民党派到这一带的军队，有名的扯羊村和野鸡洞保卫战，就是他们打的。

“彝海结盟”作为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高度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果基小叶丹作为在大汉族主义压迫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不顾个人和家支的安危，能够深明大义，毅然决然的接受红军的主张，勇敢的站出来，与刘伯承司令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接受“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支队长的任命，带领彝族群众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畔消灭红军，重演石达开全军覆没历史悲剧的美梦。红军走后，国民党要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所谓罪责，他被迫交出一万二千两白银和一百二十头适龄母羊，他的家支和舅子也各交出了一万二千两白银。在这危机的关头，他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果基支队的战士们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毁，牛羊被抢劫，却千方百计地保住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小叶丹把这面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身边的许多东西都丢掉了，唯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旗帜始终保存着。他将这面旗帜藏在背篼下面特制的夹层里，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记共产党红军的恩情。他说：“只有共产党和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她亲手交给红军。”1950 年 5 月 21 日，西康省解放后，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郑重地把刘伯承赠送给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队旗亲手献给了政府。这面旗帜是彝族人民的光荣，红军的光荣，长征的光荣。它记载了红军和彝民的深厚情谊，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实见证。

注释：

① 杨国宇：《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年版，第 92 页。

②《红四方面军几次会议情况》，载《四川党史资料》，1983 年版，第五期。

③④李勇、殷子贤：《中国红军编年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4～75 页。

⑤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8～39 页。

强渡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它打破了蒋介石妄图让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开拓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和红军北上的道路。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经会理、德昌、泸沽抵达大渡河畔安顺场。这条路线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渡过金沙江后走的路线非常相似，而安顺场一带正是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而且红军到达大渡河畔比石达开要晚半个月，此时已进入洪水期，大部队极难通过。在红军抵达大渡河前，蒋介石于5月中旬飞抵昆明，效法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对付石达开的战役部署，不仅让自己的嫡系打头阵，还拉拢刘湘、杨森等地方军阀，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六万人，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红军，对红军形成南攻北堵之势。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扬言一定要让朱德、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而红军也不是石达开，要强渡大渡河，为全军开辟胜利的道路，积极动员和鼓励指战员。5月22日，《红星报》在《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提出，“要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迅速强渡大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实现“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的战略方针。

大渡河是四川境内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奔腾在横断山中，流至石棉县，突然掉头向东，形成一个90度的大转弯。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安顺场便位于大渡河拐弯以西20公里处。这里河宽约300米，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嶙嶙，形成无数漩涡，俗称“竹筒水”，可让鹅毛沉底，水性多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驾船横渡时，先得把船拉到上游200米处，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十几个船工篙橹齐使，与水流形成一种合力，方能使船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渡口有石坎，如靠岸不准，撞上岸边石

壁，将船毁人亡。大渡河成了横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的一道天堑。据史书记载，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率部到大渡河渡口，因强渡失败，全军覆没于此。刘伯承一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老船夫来，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给他讲多串联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做了安排。尽管如此凶险，红军必须过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到船。

1935 年 5 月，红一方面军红一师红一团在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顺利通过彝人区之后，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赶在薛岳、吴奇伟数十万大军之前，强渡大渡河。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作为全军的先遣队，担负抢占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的任务。经过一昼夜 140 多里的急行军，5 月 24 日晚上到达距安顺场 15 里的一个小村子。

此地由川军两个连驻守，这时，在南岸守卫安顺场渡口的敌人，是国民党二十四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北岸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韩槐楷营。韩营从南岸撤到北岸时，把南岸的渡河船只、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并在安顺场满街堆积柴草，准备放火烧尽民房，而赖执中是当地的恶霸地主，安顺场的一大半房屋和财产是他家的，舍不得在红军到来之前就付之一炬。这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第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二师五团攻占了离安顺场 20 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这就有力地掩护了红一团的行动。敌人以为红军可能走通富林的大道，会从大树堡过河，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安顺场。赖执中留下一只准备逃命的木船，派一个班看守，又派部队分头在街上巡逻，守卫他的“公馆”，自己睡起了大觉。

晚上，杨得志找了几个老乡，刚刚摸清了敌人在安顺场布防的情况，就接到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的命令，要红一团连夜向安顺场敌人发起突袭，夺取船只，强渡过河。根据预定的计划，第一团第一营是主攻部队，团长杨得志负责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团政委黎林带领第二营向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动，吸引敌人的主力；第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刘伯承、聂荣臻亲自向杨得志和一营营长孙继先交代了战斗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找到后点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最后，刘伯承强调：“我和聂政委带后续部队马上就到，

记住，三堆火！”

孙继先回到营部，把各连干部都找来了，扼要地传达了刘伯承、聂荣臻交给的任务，研究了各连的战斗分工：第一连攻正面，从安顺场南面冲；第三连从西南冲；第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第二连并负责找船。晚上10点钟，部队开始行动。

红一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这时已是深夜，多数敌人已经入睡。红军从安顺场东南面绕过一个敌堡，直插街心，迅速包围了敌营部，不到三十分钟，击溃川军二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赖执中逃命用的那只木船，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船。孙继先想：找到了船，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上游一二里处，做好渡河的准备。于是他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推船，一推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不知不觉到了25日凌晨三点多钟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心急如焚，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被消灭，一营占领了渡口。于是，他们亲自赶到了河边。刘伯承急问为什么不发信号？孙继先这才省悟过来：光顾推船了，忘了点火。

由于大渡河惊涛骇浪的咆哮声掩盖了南岸激烈的枪声，北岸敌人还没有发觉我军已占领安顺场。兵贵神速！刘伯承、聂荣臻和杨得志一起决定，立即组织部队渡河，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一营营长孙继先。25日一早，一名老船夫带领20多名青年把船拉到上游起渡点系好，把水手分成两班，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工作。

七点多钟，一营在岸边集合了。干部、战士们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只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致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从礁石错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强渡，这要冒多大的危险！但红军指战员却要争，要抢，要争坐第一只船。孙继先与杨得志商量后，决定集中在二连挑选队员。开始选了16个人。参军不久才十六、七岁的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争着要去，把刘、聂首长和杨团长都感动了。孙继先决定加上陈万清，一共17个人。17勇士名单是：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5 月 25 日上午 9 时，强渡大渡河战斗开始。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17 勇士每人一支冲锋抢，一支驳壳抢，一把马刀，八个手榴弹和作业工具，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渡船，冲破急流巨浪，向对岸驶去。刘伯承与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走出工事，站在岸边，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敌人火力。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和聂荣臻挤到后边去。红军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机枪排长李得才几个连射，扫向前排的敌人，另外几挺机枪也一起向敌人扫射。

快要接近岸边时，对岸的敌人突然从山上冲下来，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情势十分危急。为了分散敌人的火力，刘伯承命令司号员一起吹冲锋号，迷惑和威慑敌人。船靠岸后的登陆点有 40 多级石阶，只有这个地方可以上岸。勇士们利用石阶的死角隐蔽，竟没有伤亡。然后，登上石阶，一排手榴弹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 200 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早已瞄准对岸敌军碉堡的炮兵连长赵章成，仅有的四门迫击炮，只有四发炮弹，却要打三个敌军碉堡。他凭着多年的实战经验，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他们不知红军只有四发炮弹，一听炮声，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迅速占领了渡口，残敌向后溃退，为红军后续部队渡河取得了立足点。17 勇士控制安顺场对岸渡口后，小船返回，在勇士们的掩护下，李德才带着重机枪和孙继先营长乘第二船过河，杨得志团长乘第三船过河。敌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扑。第一批渡过去的勇士们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在第二船到达的李德才重机枪掩护下，战士们挥舞着大刀冲向敌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渡口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 40 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至 26 日上午 10 点，红一团才全部过河，巩固了滩头阵地。这时，后续部队也上来了，红军趁势紧追不放，一口气扫除了沿河 20 公里的敌人，直到占领了美罗场侧翼的野猪岗山顶才停止了追击。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当天的白天和晚上，第二天，第三天，安顺场的三艘渡船不停地来回，最后约有一师人员运到了北岸。但是河流越来越湍急，渡河越来越困难了，第三天渡一船人过河需要四个小时。还没有完成过河，他们就会受到包围。

这时一军团已挤满了安顺场，后面还有侧翼纵队，辎重部队，后卫部队陆续开到。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大肆轰炸。由于安顺场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大部队不能只靠三条小船渡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用八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三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这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及红军总司令朱德都来到安顺场。当时只有三条木船，红军过河的速度缓慢，而四面围追堵截的敌军又一天天逼近红军。如果拖长了过河时间，红军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于大渡河两岸的危险。

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太平天国得以在南京建都，文武全才的军事家、政治家石达开曾立下汗马功劳。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将士二万余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为何全军覆没呢？毛泽东很想立即了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铜河的详细情况。5月25日夜，当他获知有个83岁的清朝末年秀才宋大顺熟悉这段史实时，立即派了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前去邀请。毛泽东当时住在安顺场一家中药铺隔壁。老秀才到来后，毛泽东问道："老人家，您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吗？"这位当年亲眼目睹翼王兵败将亡的老秀才略思片刻后答道：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挡，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檑木蔽天。据老人说，石达开的军队到安顺场时还有五六万人，但一到安顺场，忽然遇到上游发大水，安顺场因山洪暴发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小河的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那时彝民比现在多得多，石达开被困在这里达47天。当时军心不稳，而石达开本人也动摇，因此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清军俘获。老人说："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达开的部队对人民很和气，军队有纪律。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地问：安顺场的老百姓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何看法？宋大顺回答：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红军的纪律比石达开更好。毛泽东又仔细询问了与翼王石达开失败有关的许多细节，以及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才派警卫员把老秀才送回家去。

石达开当时没有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是事实，上海、四川各报，和蒋介石亦伸引石达开为例，认为红军必然不能过大渡河而失败于河边。宋大顺走后，毛泽东反复思索和分析导致石达开悲剧结局的各种因素，将此作为前车之鉴，随即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开会。会上，毛泽东坚定地说：72 年前翼王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够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堑大渡河挡不住我们，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是不能变为现实的。5 月 26 日上午，红军领导人全面分析敌情，立即改变全军由安顺场渡河的原计划，并拟定了新的布署：由刘伯承、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上溯进攻泸定；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大渡河南岸逆流而行，由红二师四团王开湘、杨成武、罗华生率领飞夺泸定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的决策，使红军强渡大渡河成为举世惊叹的奇迹。经过集体研究，由朱德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向各军团首长发出电令，决定兵分两路，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红二师（师长陈光）、一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纵队夹河而上，互相策应，协同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由于大渡河在安顺场向北拐了一个大弯，原来的河南、河北，变成了河西、河东。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能否渡过河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为了渡过大渡河，在作战开始前，先遣队首长对这次作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同作战部队一起制定渡河方案，并强调这次渡河作战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作战部队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勇气，为作战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坚信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坚定信念，使作战部队全军上下对这次作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红军战士们正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河对岸冲去，并成功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条通道。红军部队成功地强渡大渡河，17 勇士在作战中的英雄壮举，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飞夺泸定桥

中央红军以迅疾之势赶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在四川省安顺场展开渡河作战。占领对岸后，由于安顺场水深流急不能架桥，缴获的几条小船难以保障数万将士几天之内渡河，军委领导当机立断，改变渡河计划，决定一部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继续过河，过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策应西岸，主力则由林彪带红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赶向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九军团随左纵队跟进。左右两路夹河而进，互相掩护，火速抢占距安顺场近200公里远的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数万人随后由泸定桥越过天险大渡河。灵活的战略战术指导，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在大渡河作战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935年5月26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顾问端纳由重庆飞赴成都“督剿”红军，参谋团亦随同移驻成都。蒋介石声称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吹嘘四川军阀是“再世的骆秉璋”。5月27日蒋介石命令以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和川军刘元璋师编为第二路军第五纵队，以李韫珩、刘元璋为正副司令官。28日，薛岳电令刘元璋除留一团守备西昌外，主力向泸沽、冕宁追击红军。防守泸定桥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下辖38和11、10，三个团。以李金山为团长的38团（缺一营），重点防守泸定铁索桥。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敌人大为震惊。刘文辉于5月27日曾亲率警卫旅到前线指挥。蒋介石也严令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薛岳等部向大渡河前进。如果红军不能抢在敌人增防部队到达之前夺取泸定桥，大渡河东西两岸的红军部队就可能被分割，因此必须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

5月26日新的部署决定抢占距离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的决定发布后，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渡河后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进的道路崎岖难行，左边是河，右面是山，有的路在峭壁中间，有的又在河水里面。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一个团，是先一天到的，派一个营前出20里向安

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伸出五里。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一师第二团与敌连哨接触。沿途只有一路可行，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第二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28 日，急行军一百余里，中间翻过一座上下 60 里路的大山，到了德妥。这是个小圩场，有几十户人家，相传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与瓦坝溃散敌人约百人，经半小时战斗，将其歼灭。时大雨如注，天色已晚，遂在德妥宿营。29 日，红二团在地形险要的铁丝沟，与凭险扼守的敌 11 团，进行了右纵队最激烈的战斗。这铁丝沟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第二十四军第四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 50 里。袁国瑞派第三十八团扼守泸定桥，第十一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刘伯承命邓华率第二营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第一、三营由萧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侧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红军将敌人击溃，然后乘胜追击，占领了距泸定城五十里的敌旅部所在地龙八布，继续向泸定桥前进。之后刘伯承率领右纵队佯攻雅安，作直取成都状，迷乱了川军，调开了固守泸定的川军二百零八旅。

此时，林彪率领的左纵队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 4 团为前锋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 320 里，左岸与右岸一样，一面是悬崖陡壁，一面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河边是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河流又窄、又深、又急的地方，有条有名的铁索悬桥叫做泸定桥，这是大渡河上西藏以东的最后一个可以过河的地方。现在赤脚的红军战士就沿着峡谷间迂回曲折的小道，赤足向泸定桥出发，一路上有时要爬几千英尺高，有时又降到泛滥的河面，在齐胸的泥沼中前进。如果他们能够占领泸定桥，全军就可以进入川中，否则就得循原路折回，经过彝族区回到云南，向西杀出一条路来到西藏边境的丽江，迂回一千多里，很少人有生还希望。

王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率红四团在 5 月 27 日早上从安顺场出发，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头一天行程 80 余里。5 月 28 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这样在第一天赶了 80 里路后，第二天左路军不得不根据军委的指示，要在一昼夜走完余下的 240 华里山路，于 29 日 6 点前赶到泸定桥。

时间紧、任务重，红四团在王开湘、杨成武带领下，不敢有一秒钟的迟疑，跑步前进。黄开湘、杨成武边行军边动员，鼓舞士气，部队飞速前进。红四团在清晨五点钟从什月坪出发，急行军赶到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上下各三、四十里的猛虎岗。敌人的一个营扼守着山顶的隘口，这时正巧大雾弥漫，我军利用大雾掩护，悄悄摸上山去，在接近敌阵地时，发起突然袭击，一排排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响的喊杀声和军号声，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仓皇溃逃。红四团指战员穷追猛打，一鼓气追到敌团部和一个营驻扎的摩西，将敌人打散，用1小时20分钟架了一座桥，继续向泸定桥前进。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晚上七点多的时候，离目的地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这时天又突然下起大雨，把他们都淋透了，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这时，红军发现敌人在对岸与自己平行走着，这分明是敌人向泸定桥的增援部队，红军战士也顾不得停下来吃饭，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只为要赶到敌人前面达到泸定桥。到杵泥坝时，对岸的敌人点起了火把急进，这给了杨成武启示，他叫部队把附近村庄老乡家的竹篱笆全部买下来，绑成火把，并布置熟悉敌情的司号员和俘虏在必要时与对岸联络，以便伪装成敌人。就这样，敌人与红四团并行了30里。12点整，突然对岸那条火龙不见了。杨成武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他又让司号员吹号问敌人干什么了。敌人深信红四团是他们的人，因此回答宿营休息。得知敌人休息了。红军战士们士气陡涨，一个跟着一个，打着火把冒雨前进。红四团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终于在29日早上6点钟到达了泸定桥西岸，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而后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这时天已大亮，由于需要准备木板，同时，河东红军还未到达泸定桥，河西的红四团与桥东的敌人处于对峙状态。但是，到达泸定桥并不是目的，红四团的目的是抢占泸定桥，占领泸定城，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天险大渡河。

大渡河的西岸连着中国第二高峰贡嘎山，东岸是二郎山。两山夹峙，大渡河水夹在陡峭狭窄的缝隙中，而泸定桥就飞架在距离水面十丈的高空上。泸定桥建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同华西急流深河上的所有桥梁一样都是用铁索修成。桥由13根长达一百多码的粗大铁索横跨在河上，每根铁索都有碗口粗，九根作为桥面，两边各有二根作为扶手。铁索两端埋在石块砌成的桥头堡下面，用水泥封住。铁索上面铺了厚木板作桥面，但是当红军到达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80余米的桥板，在他们面前到河流中心



之间只有空铁索。在北岸的桥头堡有个敌军的机枪阵地面对着他们，后面是一师白军据守的阵地。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当然，这条桥本来是应该炸毁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少数几条桥感情很深，修桥很困难，代价也大。据说光是修泸定桥就花了十八省捐献的钱财。没有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索上过桥，但是红军就是这样做的。

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二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2名夺桥突击队。黄昏前，河东红军赶到了泸定桥。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5月29日下午四点，红四团组成的以二连连长廖大珠为队长的突击队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发出总攻命令。全团几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起了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炮弹一起砸向敌人阵地。在红军火力的掩护下，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着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爬着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在王友才的率领下，战士们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铺桥板边匍匐射击前进。

终于有一个红军战士爬上了桥板，拉开一个手榴弹，向敌人碉堡投去，一掷中的。敌军官这时急忙下令拆毁剩下的桥板，但是已经迟了。又有几个红军爬了过来。就在突击队几乎接近敌人桥头的时候，泸定城西门外突然燃起熊熊烈火，敌人企图用火来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原来，敌人为了防止红军攻进城去，把从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然后浇上煤油。突击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冲天烈焰，一时手足无措。这时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突击队如梦方醒，一个一个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

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这时已有20个左右红军匍匐向前爬了过来，把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投到了敌军机枪阵地。勇士们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向袁国瑞告急，袁国瑞答："我这里也很紧张。"匆匆挂了电话。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率残部向天全逃窜。这时便有更多的红军蜂拥爬上了铁索，打退了敌人的反扑，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铺上了新板。随后进入城街，展

开巷战。不久，在安顺场过了河的一师红军也出现了，对残余的敌军阵地展开侧翼进攻，后续部队迅速跟进，这样没有多久白军就全部窜逃——有的是窜逃，有的是同红军一起追击，因为有一百左右的四川军队缴械投诚，参加追击。经两小时激战，于5月29日19时红四团占领了泸定城，控制了泸定桥，歼灭守敌一个团，与东岸第一师一部会合，为红军主力迅速渡过大渡河打开了局面。与此同时，右纵队的红二、三团的几个连队也到达泸定城附近，对夺桥战斗起到了配合作用。

这时，蒋介石才察觉到红军佯攻雅安、成都的真相，于是恼羞成怒，走马换将，命令新任川军司令何湘辉火速调二百零八旅回援泸定城。这时，红军左路部队已占领桥头，当蒋介石打电话训示右岸守敌时，接电话的已是红军战士。夜晚十时，从大渡河东岸出发的红一师赶到泸定城。他们在路上把和红四团赛跑的敌人吃掉了，一路马不停蹄，还是被红四团抢了头功。5月31日，红一军团主力到达。6月1日，中央红军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进入了四川境内。在他们头顶上空，蒋介石的飞机无可奈何地怒吼着。在红军渡河的时候，这些飞机企图炸毁铁索桥，但炸弹都掉在河里，溅起一片水花。

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泸定桥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13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钟了。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和聂荣臻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至此，强渡天险大渡河的战斗胜利结束。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跨过草地　翻越雪山

1935年5月30日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到达泸定城。是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泸定桥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会议决定：一、红军北上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区；二、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毛泽东和司令部在泸定逗留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到化林坪休息了几天。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后，从泸定城出发，继续北上。红军过了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放慢了前进的速度。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6月2日，杨成武率领的突击队又出发了，他们全速前进，目标是东北方向约45英里以外的天全一带。接着在天全河击溃川军杨森部的堵截，占领天全、芦山、宝兴等城。

当时的形势仍然充满矛盾。毛泽东虽然摆脱了国民党进攻的危险，已经没有敌人来阻止中央红军与川西北的张国焘及第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是毛泽东却不知道张国焘的确切位置，张国焘也不了解毛泽东的位置。其实他们及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英里，只是中间被大雪山隔开了。

长征初期，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他事先根本不知要长征，长征开始几天之后他才听说。这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是相符的，许多红军干部也像张国焘一样蒙在鼓里。张国焘甚至在听说一方面军已开始行动后仍不明白其意图何在，但推测一方面军出了问题。一、四方面军相互极少联络的一个原因是四方面军丢失过一个密码本，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尽管如此，张国焘声称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后，他的无线电侦听台便开始为长征当“耳目”。他回忆说．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在电台旁边，以确保把四方面军侦听到的情报扼要地发给一方面军。

1935年1月22日，张国焘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定的通报。中央指

示他采取行动帮助一方面军渡过长江。但是没有下文。因为四方面军帮不上多少忙，而且一方面军也从未真正靠近长江上的任何一个主要渡口。一方面军渡金沙江时，这一指示仍然有效，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四方面军是按照这个指示行动的。

通信联络十分困难，这不光是因为担心密码不保险，而且因为两个方面军都在运动中。张国焘决定率领部队渡过嘉陵江，进入靠近西藏的四川西北角。事实是迄今没有找到证据说明 1935 年 1 月 22 日后，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任何信件或信使往来。有时，他们通过老百姓中间的传闻或国民党报纸刊登的片言只字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消息十分有限。当毛泽东率领部队在贵州兜圈子和张国焘四月份挥师向边远的西北运动时就更是如此。据张国焘回忆，大约是在 5 月底或 6 月 1 日，他获悉一方面军渡过了金沙江，如果张没有记错日子，红军这时实际上已渡过了大渡河。难怪毛泽东过了泸定桥后要停留一下，要好好考虑到哪里去找红四方面军。

李先念回忆说，1935 年 6 月初，张国焘指示他派一支部队去迎接一方面军，当时估计一方面军快到了。但张国焘既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抵达日期，也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方位。李先念派自己属下的一个师向南攻克了位于雪山北麓的懋功。很明显，红一、四方面军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 6 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

天全是个岔路口，大部分红军在那里停留了几天。红军当时面临三种选择：可以沿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插向雪山西面，这条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路程较长，沿途几乎都是充满敌意的藏民聚居的地区。他们也可以走雪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遭受国民党进攻的危险极大。第三种选择就是走中路翻越雪山，这是一条险路，但当地有人包括妇女、儿童走过这条路。毛泽东的决定明确地表现出他一贯的主张：如果没有把握就走偏僻的小路，这就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的抉择。

红军翻越雪山与过草地并列为最艰苦的行程。雪山有足以能留住冰雪的海拔高度，夏季温度也在冰点以下——山脚下明明是夏天，山腰就成了春秋季，山顶则是肃杀的冬季。长征中的红军除了 25 军外，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二、四方面军都领略了大雪山的淫威。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进入邛崃山区，把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蒋介石此时不再追赶，而只派兵守在川西的山口外面，因为他断定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正在走向死亡。1935 年 6 月 12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师四团作为全军先遣队自硗碛村出发，率



先在向导的带领下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由此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夹金山海拔4 500多米，位于懋功之南，山上终年积雪。从山上极目远眺，地平线上雪峰兀立。在这里，所有的绿色都不见了，山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褐黄。日落之后到日出之前的时段，到处阴风怒号，漫天飞雪，寒冷异常。即使在5、6月间，也还是厚厚的积雪，一直铺到峰顶，铺到雪山的另一边。当地藏民把它称为“甲儿”或“神仙山”，意思是说山很高很陡，鸟儿都飞不过去。山上除了寒冷还缺氧，当地人把缺氧而死的人说成是被山神掐死的，这为大雪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红军长征来到夹金山脚下时，已经过了八个月的跋涉。许多人已经打了三、四年或更长时间的仗。对他们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很艰难，却又使人感到踏实，因为毕竟没有国民党追兵的威胁了。当时部队指战员们不仅衣衫褴褛，绝大部分是湘、闽、赣、粤籍，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峻的雪山，也没有经历过严寒刺骨的气候。上山前，红军只在硗碛做过简单准备，如砍竹竿、树条做拐杖，把干海椒发给每个人御寒。战士们衣着不多，把能穿上的都穿在了身上，或者干脆把被子、毯子披在了身上。当地老乡建议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但当地人烟稀少，烈酒、辣椒都难买到，能找到的只是每人一根棍子。翻越大雪山必须要有足够的冬衣，最好还要有御寒的烧酒。可惜这两样红军都缺。朱德总司令运用自己曾转战川、滇、黔的丰富经验，向总部建议后通报全军：必须在山下吃一顿饱饭，喝一些辣椒汤，尽可能多带一些干姜、辣椒，在攀越峰顶体力不支时嚼碎吃下去，以刺激精神。总部还要求：每人都要将破衣、破毡子剪成条，牢牢包在脚上，以免冻伤脚。

翻越夹金山前，所有的战士简单地被告知了高山、冰雪及严寒对健康的危害，被要求用布条遮眼睛，防止雪盲；要稳步前进，不要在高处停留；在出发前要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大多数人只有补了又补的单军装）。宣传员把注意事项编成便于记忆的顺口溜，教战士唱诵：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病人走不起，帮他背东西。大家互助想办法，一定帮他过山去。

爬夹金山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坡度不大，终年积雪的山顶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实际上山脚的海拔就已相当高，结果造成大家对高度的错

觉。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人在积雪上行，上边是雪的陡壁，下边是雪的深渊。单衣顶不住风雪的侵袭，脸上身上像被千把尖刀刺着。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空气逐渐稀薄起来，许多人感到呼吸困难，开始头晕腿软，一步一喘，一步一停。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卫生员见此情景立即意识到山顶不能停留，哪怕停一步都可能丧命，必须尽快翻过山顶，下到氧气较多的高度上去。一旦越过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上往下滑，反正没有路。不少人都这样滑了下去。有些人摔断了骨头，有些人不慎滑下了悬崖。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到了暮色苍茫时，红军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度上翻过了大山，当天晚上，红军就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为了避开敌人的轰炸机，战士们在半夜就起来了，开始爬第二个山头。天下着大雨，后来又变成大雪，冷风像刀子一样，又有许多人在严寒和力竭中死去。中午 12 时 40 分，红军登上海拔 4 140 米的垭口时，突然天色昏暗，山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山顶被雨雾包围，刚刚走过的路已看不到了，寒冷瞬间降临。红军战士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还是瑟瑟发抖。山顶让大家都感觉到了胸闷、太阳穴阵阵隐痛。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说话，只能闷着头走，也不敢停下来休息。大家用数步子的办法来鼓励自己。开始走一百步停下来喘口气，以后改为 50 步休息一次，后又改为 30 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少了，走不动也得走。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一军团司令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红军情报局局长徐迪宁也是如此。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泽东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泽东把他扶起来。而当毛泽东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走时，又是陈昌奉设法帮助毛泽东重新迈开步子的。



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以防摔倒。山上不是下雾就是刮风，积雪常常从山头崩落。魏头晕目眩，浑身无力，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一口气，越走越慢。起风了，魏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乡倒了下去。还没等他走到跟前，那人就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把尸体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好。下午三点他们到达顶峰，开始下山。下山后，周恩来频频咳嗽，这是最初症状，这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除夹金山外，在川西北以及滇西北的莽莽雪峰中，这片地理上属于横断山系的区域中，先后有十几座海拔 4 000 米以上、人烟罕至的雪山极顶印上了红军的足迹：红一方面军翻越的夹金山、梦笔山、虹桥山、鹧鸪山、达古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红二方面军翻越的哈巴雪山、德格雀儿山；红四方面军翻越的夹金山、党岭雪山、达古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这些生命的禁区使得红军付出了比日常作战还要惨重的代价。据权威统计，红军在长征中伤亡最多的战役是湘江战役，而行军中的减员最集中的就是雪山和草地。仅在 1935 年 7 月 ~ 1936 年 8 月间，仅亚克夏雪山至黑水途中，红一、四方面军就有近万名战士倒下。

红四方面军派李先念去迎接一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时驻扎在理县。他带领第八师和九军第二十五师和 27 师一部于 6 月 8 日占领懋功，6 月 9 日占领下山必经之地达维。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电告李先念，预计一方面军 6 月 10 日可以到达。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怀疑韩东山的报告不准确。他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于 6 月 11 日翻过雪山，并于 6 月 12 日上午到了达维。这里距雪山不到 25 英里。当一方面军的侦察兵发现四方面军派出的部队后，一时敌友难辨，双方都打了枪，但无人伤亡。当吹响军号，双方便弄清了对方是谁。

一方面军的部队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李先念急忙从懋功赶来。6 月 14 日，毛泽东、周恩来（仍在病中）、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彪等都下了山。当时，达维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有 106 户人家。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座大喇嘛寺。这里盛产鸦片，是个鸦片之乡。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罂粟。每年初秋，达维一带村村卖鸦片。6 月 14 日晚，在村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集会。幸存者们估计一万人参加了大会。毛泽东阐述了团结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晚会演出了戏剧、歌舞，还举行了会餐，食物和其他用品都是四方面军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第二天，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继续前

进。还要翻过不少山，包括一些雪山，才能同张国焘最终相逢，这将是他俩在1923年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上各执己见以来的第一次重逢。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没想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却与中央在战略方针上发生严重分歧。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28日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却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主张红军南下，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率指挥，仍以军委主席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中央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路军。以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右路军，由以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前敌指挥部指挥，北上过草地，向班佑、巴西推进；以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二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向阿坝推进。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面积约15 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 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垠。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



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为林彪的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　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

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

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坐骑、牦牛骡子。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在草地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红军战士宝贵的生命。

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



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一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红一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三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三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用了五天（8月21日—8月26日）。左路军大概也是6天左右。

8月21日，沿着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红军右路军主力随后开始陆续进入草地。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雪交加。变幻无常的草原气候，时而晴空万里，暑气蒸腾；时而乌云翻滚，浓雾弥漫，风雨冰雹降临。每逢夜晚，战士们常常是裹着湿漉漉的单衣露营，背靠背以相互体温御寒。没有了粮食，开始吃树皮，吃草根，吃皮带。红军战士有的被泥潭吞噬，有的不敌严寒被冻死，有的因身体虚弱而病死，更多的是因饥饿而死。泥泞，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这种情景真是前所

未见。

第一天三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这里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一些低矮的小树，只能折一些小树枝搭了一个小棚，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下了一夜大雨，小棚无法挡雨，战士们被雨淋得满身透湿，无法入睡，只好背靠背挤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或唱歌，总算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开始还可以看到太阳，但过一阵子，便狂风大作，忽而又下起雪来。第三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不少战士因体弱、缺氧和寒冷，过河上岸时倒下了。第四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仅天气变化无常，而且地面完全是水草，要选择在草堆上走，如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有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出不来了，不少骡马也因陷入沼泽坑内拔不出来。许多红军将士就在这样的沼泽草地中，失足陷入泥潭，站在一边的战友却无从援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慢慢地沉下去，永远留在那泥沼之中。战士们抬着向导，选择草根较密的地方，一步一跳，艰难地行进着，并为后续部队留下一个又一个路标和安全标记。第五天，8月26日，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红军右路军各部队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终于走出草地，在8月底以前到达川甘边境的班佑、阿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

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二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

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8月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三十军以二百六十四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四十九师全部被诱入红军伏击圈内。下午3时，红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四十九师被

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四十九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 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 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红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1934 年末，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战役。然而，经过 10 个月的战争，苏区已面目全非。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逃荒的人群、废弃的盐井，人力、物力、财力都损失极大，伤寒、痢疾到处流行，满眼都是一片破败。在这样的情况下，10 万红军如何生存，如何再应对国民党军的下一次“会剿”，成为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时，红四方面军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南下川南，那里人烟绸密，经济富庶。但敌军力量也较强，立足不易。另一条是北上陕甘，那里国民党军力量较弱，但经济较差。相对而言，向北的方案更加现实些。因此，张国焘也制订了一个北上建立陕甘苏区的计划。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断来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部队南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能与中央红军会师，对于独立苦战七、八年的红四方面军来说，是一件大喜事。经过仔细研究，为接应中央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江河之一，发源于陕西凤县的嘉陵谷，流经陕南和川北，向南注入长江。沿途多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江宽水急，十分险峻。沿嘉陵江西岸布置了川军邓锡侯、田颂尧部共 53 个团，防线长达 600 余里，凭险固守，以图将红军堵在江东岸。攻击这样一条防线，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为调动和迷惑敌军，以创造进行强渡的条件，1935 年 2 月，徐向前率 12 个团红军进行了陕南战役，于十几天内连克宁强、沔县和阳平关等地，歼敌四个多团，一时川陕震动。陕南地区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都增兵布防，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川军邓锡侯部也将嘉陵江边的四个师部队向北移防，以阻止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脱身。达到战役目的后，徐向前率部队南撤回到了嘉陵江东岸。

3 月，红四方面军全军向嘉陵江边移动，连战苍溪、仪陇等地，歼灭川



军5个团，占领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徐向前仔细察看江边地形，发现敌军虽多，但防线太长，到处分兵把守必然导致到处防守薄弱。徐向前看准了苍溪附近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这里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利于红军进行火力掩护；后山则坡道较缓，草深林密，利于大部队进行集结隐蔽。而且这里河道弯向东岸，水流平缓，西岸又多是平滩，利于部队抢渡和迅速展开。据守这段江防的是川军田颂尧部，只有不到两个营，已是屡次的手下败将，战斗力不强。

为解决过江的舟桥问题，红四方面军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准备之中。造船地点要离抢渡场不能太远，又要隐蔽不被敌军发现。因此，选在了离塔子山30余里的王渡场。这里山高林密，林中又有大片空地，是隐蔽造船的理想地点。红军官兵亲自上阵，又动员了大量青壮百姓，日夜赶造不息。造船用的大木材要从上百里外用人力运来，造船用的钉子则用的是到处搜集来的废铜烂铁，工地上就地摆出了炼铁炉，很多乡亲捐出了自家用的桐油，以为工地夜间照亮。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造出了100多条船和三座竹扎便桥。红军战士们又和群众利用夜暗肩扛手推，将这些舟桥从高山上运到了渡江地点，完成了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

徐向前确定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计划：采用重点和多路相结合的突击战法，以余天云、李先念的红三十军为抢渡主力，在塔子山地区渡江，然后直插剑阁、剑门关方向；副总指挥王树声率三十一军为北路，渡江后抢占剑门关，然后防堵邓锡侯的川北之敌和胡宗南的陕敌；陈海松的红九军为南路，攻击阆中、南部，保障三十军的南翼安全；王宏坤的红四军为二梯队，担负战役展开的任务。总部炮兵营置于塔子山顶，火力掩护三十军强渡。

为抢渡成功，李先念特意拿出了三十军最能打的八十八师担任主攻。这个师的二百六十八团擅长进攻，号称“钢团”；“二百六十五团以突袭闻名，号称“夜老虎团”；二百六十三团则以攻守兼备闻名。师长是青年猛将熊厚发。八十九师担任辅助攻击的任务。

1935年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二百六十三团突击队悄悄驶近对岸，然后突然发动攻击，一举压制了敌人火力，掩护后续部队源源登陆。川军出动一个师前来防堵，正与八十八师的二百六十八团和二百六十五团相遇，双方展开激战。而八十九师部队也已过江成功，从侧后发起进攻，一举击溃了增援的敌军。与此同时，三十一军于苍溪以北强渡成功，击溃川军一个旅；红九军于阆中以北过江。三路红军全部强渡成功，嘉

陵江西岸的川军防线已开始崩溃。

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也迅速过江。此时三十一军已扑向剑门关；三十军突向剑阁；九军则与川军王致远部拼起大刀，夺下阆中和南部，歼敌三个团；红四军也已相继过江。下一步战役发展的关键则是夺取剑门关。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城东北 60 里的大剑山上，扼控川陕大道，72 峰峰峦绵延，高耸入云犹如刀削斧砍。关口位于东西两峰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小路穿过，地势极为险要。剑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蜀将姜维曾在此抗拒了魏将钟会的 10 万雄兵。据说自秦惠王伐蜀后此关还从未被人攻克过。剑门关的要害在于它是联结江防的要点，向北可以与陕军呼应，防止红军进陕南；向南可以袭击红军侧背，阻止红军南下。此关如不克，则如痈在背，红军动转不灵。川军邓锡侯部三个团在此防守，明碉暗堡密布，吹嘘为“固若金汤”。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三十一军担任主攻剑门关的任务。三十一军两个师在三十军八十八师一部的配合下，一路急行，至 4 月 2 日，对剑门关形成了东、南、西的三面包围。根据川军的防守部署，王树声决定从南北两面攻关。他集中了四个主力团，在方面军迫击炮营和重机枪营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实行强攻。红军勇猛冲锋，逐点攻击，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挤压川军的防御体系。到了中午，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在漫天雨雾中，红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攻击，山道上很快就被血水染红。川军组织了兵力拼命发动反击，双方厮杀得极为惨烈。关键时刻，王树声将预备队拉了上去，重新组织了火力和攻击线路，在付出大量伤亡后，撕裂了守军的防线一翼。川军的抵抗本来十分顽强，但红军的这次冲击异常猛烈，一些川军部队陷入混乱，很快就四处逃散，影响整个防御体系变得乱七八糟。红军乘势集中火力猛打，击毙了守关主将川军团长杨倬云。失去指挥的守军终于崩溃，开始漫山遍野地乱跑。激战到傍晚，剑门关上升起了红旗，守军三个团被全歼。

剑门关被攻克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联成一体，并力向西猛攻。经八天进攻，歼灭川军 8 个多团，攻占阆中、南部、剑阁、昭化四座县城，控制了 400 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川军后撤到盐亭、梓潼、江油、中坝地区，再次组成防线。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马不停蹄，兵分四路穷追猛打。

这一次，徐向前又制订了一个围城打援的计划。江油位于成都以北的盆地边缘，土地富庶，城防坚固。这里是成都的北大门，当年魏将邓艾就是经这里奇袭灭了蜀汉。4 月 10 日，红九军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兼程急赶，攻克



中坝，包围了江油城。江油一失，成都就直接受到威胁。在刘湘的严令下，邓锡侯调动了18个团，自绵阳出发来救江油。徐向前命九军二十七师围住江油，九军二十五师和三十军八十八师迅速进至江油以南的南塔坡、鲁家梁子一带隐蔽集结。同时，命令许世友率红四军紧靠八十八师布防，配合作战。

4月18日，邓锡侯的救援军大队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埋伏的红军一齐开火，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很快，红军从四面发起冲锋，开始截断川军。这一路川军装备较好，火力很强。虽然被打了个冷不防，但很快稳住了阵脚，开始展开兵力抢占山头制高点。双方缠斗在一起，每个山头都打成了残酷的攻防战。江油城中的敌人也出动支援，但被红九军部队截断歼灭。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发动了一次比一次凶猛的反扑，红四军和三十军八十八师联合奋战，连续击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经常进行了大刀纷飞的肉搏战，到处是尸横枕藉。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傍晚，八十八师部队发起了反攻，而九军二十五师也向敌侧后猛插，川军阵脚终于乱了。红军开始全线反击，“活捉邓锡侯”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川军溃逃而去，红军乘势进攻，占领了江油。这一战，红军歼敌四个团，俘虏3 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

在江油激战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各部像弹钢琴一样不断发起进攻，全线攻进至涪江流域。至此，规模浩大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战斗24天，攻克县城9座，歼敌12个团10 000余人，打开了一个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有利局面。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发动新的“围剿”以消灭红军的迷梦。同时，由于在渡江以后连克几座县城，继而又从昭化、广元向北进占青川、平武，大有北出甘南之势，使蒋介石忙着调兵到陕西、甘肃，防止红军北进；另方面，红军又向南占领剑阁、梓潼而进入绵阳、彰明地区，威胁四川首府成都。特别是在渡江战役后，又紧接着发动江油战役（即中坝战役），攻克了川陕公路上的重镇中坝，并在江油、彰明一带屯兵一个多月，大有进攻成都之势，使四川军阀不得不调兵保护其老巢成都。这样，实际上牵制了川军，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活动。强渡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历程中的光辉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1933 年 10 月至 1934 年 10 月，蒋介石以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错误，导致红一方面军被迫向西大转移，浴血奋战，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当时的中央领导者，决定率一方面军去湘西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窥测到我军动向，调集十五个师近四十万军队集结在湘西城步、武冈、绥宁、靖县、会同一线，布成一个口袋，妄图全歼红一方面军于湘西。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敌我形势，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迅速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往川黔边发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贵州挺进。1934 年 12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占领黔东黎平后，党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从而将原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正式改成向川黔边地区发展。这意味着红一方面军在向西转移途中，将逐步接近战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占领瓮安后，1935 年 1 月 1 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占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中央将“猴场会议”精神电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并询问川黔边敌情状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及时作出决策。接着，红一方面军迅速强渡乌江，占领遵义。1 月 15 日至 17 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当时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不久，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

当红一方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立即指令各路敌军拼凑 150 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包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研究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关于



川黔边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周敌情的报告，同时得知：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已从湖南向贵州追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106队前锋已逼近遵义。于是，毅然决定立即率红一方面军撤离遵义地区，向川黔边赤水河前进并准备进入川南，在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从而壮大红军力量，进一步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争取赤化全川。1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在其作战方针中指出："我野战军（指红一方面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中央军委于1月22日将此行动计划电告了红四方面军。这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抓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作出的英明决策，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计划即由此而产生。两大主力红军在此后的行动中一直循着这一战略方针前进，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川西懋功终于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的重大历史意义。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战斗史上重要的一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懋功会师"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妄图在川黔边和川陕边区消灭红一、四方面军的迷梦彻底破产。

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转移，蒋介石指使各省军阀部队前堵后追，沿途封锁，先欲歼灭红军于湘西，继而深恐红一方面军突破封锁线后向川黔边发展，重建新的根据地，或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对四川军阀刘湘极力拉拢，企图借川军之力与湘黔军合围，一举而消灭中央红军于川黔边。此时，刘湘与蒋介石虽有矛盾，但惧怕红一方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使革命势力发展，动摇其老巢重庆，进而出西北，攻占成都，赤化全川，乃转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共商阻止红一方面军入川和对红四方面军准备发动新的，"川陕会剿"事宜。他们达成一笔政治交易：蒋介石承认刘湘统一掌管全川军政大权，刘湘则允许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共同堵截中央红军和围攻红四方面军。

1935年1月，蒋介石派其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刘湘指挥"剿共"，同时调中央军嫡系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八个师向川黔边推进；令贵州军阀王家烈指挥犹国材、何知重、柏辉章、魏金荣四个师向遵义地区逼近，控

制赤水河上游。在蒋介石指令下，刘湘派郭勋祺、廖海涛两师北向贵州入土城堵截中央红军；又急调四川预备军总司令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驰往泸州督师，扼控长江一线，阻止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蒋介石还命令湖南军阀何键督师沿乌江东岸筑碉堡以阻拦中央红军东进湘西；令云南军阀龙云派主力三旅由滇入黔西北向赤水河上游推进，令广东、广西军阀部队由都匀向贵阳推进。蒋介石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

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调动了150多个团的兵力，妄图全歼红一方面军于黔北地区。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未曾料到，红一方面军撤离遵义后，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进行战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运用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率领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川、黔、滇广大地区作大弧度的迂回运动，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出奇兵，设迷阵，调动敌人东颠西跑，疲于奔命而不明红军前进方向和来回穿梭的真实意图。当红军高度机动灵活地穿插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四渡赤水，突然飞兵东进，威逼贵阳，转瞬间入云南作出袭击昆明之势，蒋介石尚未醒悟过来时，党中央、毛主席却率红一方面军神速地跳出敌人包围圈，巧妙地渡过金沙江。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终未得逞。

另一方面，刘湘纠集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失败后，川省统治阶级一片混乱，这时红一方面军又转战到川黔边。刘湘对两支主力红军则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但蒋介石为了插足川政，稳定四川局势，仍企图消灭红四方面军于川陕边区，因而飞赴西安，亲自策划新的“川陕会剿”。

由于红一方面军迅速向川黔边转移，蒋介石不得不用大批兵力围堵中央红军，因而使得“川陕会剿”时难以准备就绪。红四方面军为了积极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行动，同时贯彻继续向川甘边发展约方针，决定在苍溪、间中之间实施西渡嘉陵江计划。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下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并于四月下旬取得渡江战役胜利，连续攻克九座县城。五月，红四方面军先后占领茂县、汉川和理县。6月初，徐向前命令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88师与9军二十五师及27师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并指令二十五师为先头部队，为迎接红一方面军进入懋功打开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安全通过夹金山。6月7日，红二十五师占领懋功，接着攻占县城南之要镇达维。与此同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经会理、德昌至冕宁，顺利通



过彝族区，在取得震惊世界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战役”的重大胜利后，继而攻天全、战芦山，从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懋功的达维镇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兄弟部队顺利会师。“懋功会师”的胜利，使红一、四方面军携手并肩挺立于川西北，宣告了蒋介石妄图在川黔边与川陕边区消灭红一、四方面军的黄粱美梦彻底破产。

（二）红一方面军到达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新的军事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集体领导。实践证明：在红一方面军几次处于最困难、最危机的时刻，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措施都是英明而正确的。党中央及时提出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新的战略决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

由于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多种原因，红一方面军虽然未能在泸州、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川南，又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擅自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使川陕边区被红军点燃的革命烈火未能燃遍全四川，致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在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向西转移，从而事实上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长征。但是，有了红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顽强歼敌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新的军事路线，不到半年的时间，两大主力红军终于在四川懋功实现了胜利大会师。因此，“懋功会师”是党中央新的军事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三）“懋功会师”使红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红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都是党的好干部、好战士。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愿望和奋斗目标，但都不同程度地曾受到“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带来的危害，都迫切希望及早纠正“左”的错误，清除其流毒和影响，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携手并肩前进，共同团结战斗。

（四）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标志着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新高潮，使广大红军和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自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一直梦

想消灭共产党。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起义等各地工农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支强大的工农革命武装来反对反革命武装。虽然蒋介石纠集新旧军阀部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妄图消灭全国红军。但是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连续作战，冲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层层包围，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政策，为贯彻北上抗日的方针创造了良好条件。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大主力红军总人数超过十万、大大加强了革命力量，鼓舞了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的士气，提高了胜利信心。在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是继遵义会议后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懋功会师”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为红军长征的最后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它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新的高潮，使广大红军和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北上与南下之争

1935 年 6 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约 10 万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 6 月 26 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报告，到会同志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 28 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会上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

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出现北上和南下的争执。红四方面军（包括留在其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跟随张国焘南下后，在川康边界地区几经激战也站不住脚，被迫退向甘孜藏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开拓了广大的根据地，并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当时国内抗日高潮正在兴起，红军只有进入到北方抗战前线，才能发展力量。如果退到偏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在政治上无法争取最庞大的群众，在经济上也无法长久保障供应，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等地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北上，是具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南下失败　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即军委纵队）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5日和20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对北上战略方针作了进一步肯定和重要补充，并制定了新的战略行动计划。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是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以东地区。战略方向是北出甘陕。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红军分两路过草地北上，夺取岷州。为此，还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会议针对张国焘当时提出向青（海）、宁（夏）、新（疆）方向发展的错误主张，补充决定从居民情况、军事发展前途、物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红军向这一带发展很不利，困难极大。

为执行这一新的战略部署，决定将红军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道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组成，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军（原七军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再一起向夏、洮地区开进。在红军主力部队准备北上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东即松潘方向佯攻，以造成敌人以为我军必经松潘、平武进入甘南的错觉，吸引和钳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过草地北上。还以一部兵力向南、阻击北进之敌。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仍按兵不动；徐向前、陈昌浩一再劝说，希望他执

行中央的决定，迅速按原定计划本部北上。8 月 15 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一、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二、新麦所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干粮十五天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三、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冷，速到甘南才能解决被服；四、毛儿盖到夏河 12 天，到班佑仅几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五、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力、理番之敌。"在徐、陈劝说和中央来电网催促下，左路军才开始出动，8 月 18 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走右路，一方面军部队走左路，平行前进，兵力颇集结"。并以主力进入洮河、岷州一带。对左路军则提出："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8 月 20 日，即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当天，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详细分析了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将遇到的各种困难，对我是非常不利的。并指出："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两河之间之不利、不应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便集中灭敌。"8 月 21 日，徐、陈再次致电朱、张，进一步说明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中央局决定主要是岷州为根据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今后发展或向文、武、成康向东南，或向天水、庆阳向东北，当依当时情况决定。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8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本人："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力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电报强调指出："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电报还明确指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



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黑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当日，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张，坚决主张两大红军主力不能分开，必须一起向夏、洮、岷地区开进。电报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两路主力端出岷、哈，抑出夏、洮。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在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痛心决立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从徐向前、陈昌浩给张国焘的上述四份电报看，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对执行中央战略方针是坚决的。他们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根据中央一毓指示精神，诚恳、耐心地说服张国焘北上。

左、右两路军从8月中旬开始，分别向阿坝和班佑地区挺进。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团结奋斗，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终于越过数百里涉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于八月下旬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这样，一、四方面军在共同北上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35年8月底，右路军到达包座地区后，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令部和四军一部，进行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包座战斗。

右路军总指挥部，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和地形情况，决定在胡宗南援兵未到之前，首先消灭上、下包座的敌人，控制要点，然后再集中兵力消灭胡宗南增援的主力部队，以保障全军顺利进入甘南。根据这一部署，命令程世才、李先念率二十军消灭驻上包座达戒寺的敌人，并布置兵力准备歼灭胡敌援兵；四军一部围攻并歼灭求吉寺守敌。以控制通往甘南的交通要道。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集结于班佑、巴西地区作为预备队。

包座战斗从8月29日黄开始，到8月31日结束，由于我军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勇猛顽强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在战术上采取了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取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共歼敌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牦牛、马匹上千头，以及大量军需物资。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敌人作战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战果最显著的一次战斗。

包座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补充，而且粉

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妄图把我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扫除了我军前进的障碍，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门户，为实现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正当我军胜利结束包座战斗，即将进军甘南的时候，张国焘却在加紧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挑起了北上和南下的一场尖锐斗争。9月1日，即包座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张国焘，催促左路军。电报详细分析了敌情，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电云："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地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9月3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阿坝向班佑右路军靠近时，又突然借口噶曲河涨水，令左路军停止前进。他同时回电徐、陈并转呈中央："上游侦察70里已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黑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回电还说；"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已多阻碍"以此为由，他提出："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张国焘在我军已经打开北上通道，形势对我极为有利的关键时刻，再一次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命令左路军按照他的错误主张回师阿坝。

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都热情劝说张国焘认清形势，改正错误，迅速北进。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致电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明确表示左、右路军都不能南下的态度，同日，为再次说服张国焘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能够继续北上，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同志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正确地指出了北进的有利形势及发展前途和南下的困难及危险，说明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电报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左路军向南行动的不利前途：1. 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



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直至懋功、抚边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2. 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绥、崇人口八千余，粮食根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3. 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以继续下去。4. 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电报在陈情述理之后，殷切希望张国焘深思熟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虽有较大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电报最后敦促张国焘，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和革命前途着想，当机立断，率部北上。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个电报，既有精辟的分析，又有耐心的说服；既有严肃的批评，又有诚恳的帮助；既有明确的指示，又有殷切的希望。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然而，张国焘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9 月 9 日，他回电说："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继增可能。"他强调："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 10 天行军，左路 20 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他接连提出一系列问题，反驳中央的正确指示。并极力为其南下主张寻找"理由"，说川敌弱，不善守碉；南方粮不缺，包谷已熟，有房住；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优于洮、夏等等。因此，他坚持"以一部向东佯动，诱敌北进，锢 乘势南下"。他还声称"南打不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同日，中央再次致电经和国焘，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势、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界新地区，再向东发展。"张国焘置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劝导、批评、指示于不顾，仍坚持南下，并命令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回过头来再过草地南下川康边。

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原则，坚决斗争，当机立断，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北上。

1935 年 10 月，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在陕北吴起镇会合。12 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

策略，打开了新局面。

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率领南下川康边后，虽然进行了一些著名战役、战斗，歼灭了许多敌人，但是终究未能突破强敌的围堵和封锁，在川康边陷入极大困境，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四方面军南下后，党中央一直与其保持紧密联系：通报敌情，发布指示，耐心等待张国焘改正错误，正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又由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对张国焘不断地说服和斗争，尤其是四方面军转战川康边，经历了艰难困苦和牺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四方面军孤军南下对红军战争所造成的危害，因而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越来越表示不满，张国焘这才被迫同意再次北上。1936 年 3 月 15 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要相机消灭李抱冰，会合二、六军（应为二、六军团——引者）来顺利地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个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1）四月一日，四方面军在《关于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中也说："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任务，为实现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最近的行动计划：（一）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团。（二）首先赤化西康、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北开展。"四月二十一日，徐向前致电张国焘、朱德说："与二、六军（应为二、六军团——引者）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这期间，张国焘一方面吹嘘南下"正确"，以平息广大指战员对他的不满；另一方面，又极力掩盖和歪曲他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错误的裨，说什么："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各种场合，做部队再次北上动员工作。

这时，张国焘所说的北上，他的战略行动方向，是出夏、洮地区，向西北发展。6 月 10 日，他致电中央："我们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 7 月 20 日前后可达夏、洮。二方面军大约 6 月 20 号前后集甘孜休息于天跟进。"6 月 19 日，中央回电指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第一，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之马。过去回、汉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第二，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



部；马步芳不会向甘南，若出夏洮则将王、毛、鲁、马各部集于一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较困难。第三，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不出陕南策应时局。第四，甘南利于补充。”对于中央这一指示，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是赞成的。6月25日，即与二、六军团会合前夕，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提出；“我军拟以松潘、包座之线为出动目标，分三纵队进。”“我们拟在二方面军先头进。”6月28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关于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致电徐向前、周纯全及各军首长，指出：“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总部。”8月5日，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后，制定了《岷洮西战役计划》遂后，各纵队向甘南挺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这时，党中央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征军西征甘肃西征军挺进甘肃后，又派出一方面军一部，在左权，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下，进至西（安）兰（州）公路以北地区二方面军先后占领了礼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城。这样，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态势，准备按照共产国际批准的“河西计划”，冬季西渡黄河，进据宁夏、甘西、打通苏联。但这时，两广反蒋的“六一事变”已被蒋介石平息，蒋军胡宗南部几十个团正陆续进入陕西，抢占兰（州）西（安）大道。其目的有三：一是压迫与削弱红军，割断我三大主力会师，强迫我就范成立妥协；二是割断我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三是割断红军和苏联的联秒，为打破敌之企图，中央命令四方面军北上西兰通道地区，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公路及其附近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待冬季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后取甘西。为此，9月15日、16日、17日，中央曾连续致电二、四方面军。这时，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组成的西北局在岷州附近的30里铺召开了会议，会上朱德、陈昌浩等同志，坚决主张北上，实现“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他们的意见获得了与会大多数的拥护，张国焘提出的由四方面军先渡黄河，在兰州以北立脚，待冬季再接应一方面军渡河的意见，被会议否决。于是在9月19日，朱、张、陈致电党中央表示：“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24、25日到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9月21日，张国焘赶到漳县，召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公然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的决定轮子哭哭啼

啼地说陈昌浩反对他，要辞职不干了。他主张西渡黄河，并调动部队，准备从循化一带渡河。朱德在9月22日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其他领导同志，说："（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原案。（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同时，朱即电告张国焘："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陈昌浩到达漳县后，对张国焘反对西北局决议很气愤，也表示如果不能北上，他也要辞职。实际上早在9月6日，陈昌浩就给朱、张打电报，主张"抽出九军、三十一军全部向通渭、会宁、静宁方向大大发展，具体配合一方面军行动"这场争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承认："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一件冲突。"

9月26日12时至22时，仅仅十个小时内，张国焘就接连四次致电党中央，坚持西进，反对北上。其主要理由是：一、他认为四方面军在静、会地区是四面受敌，决战不利。二、他认为宁夏地区窄小，会合后集中宁夏，有黄河、沙漠之险，如被敌封锁，对红军不利。三、他认为从兰州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一带，可以抢占永登、红城子；可以配合一方面军从宁夏渡河，占领甘北；可以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同日，中央复电张国焘，驳斥了他的错误主张，指出："胡宗南部到洛阳，本月底其后继将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此处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9月27日，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问题，为坚持既定战略方针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以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土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王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



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同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北上实为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接着，又致电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电令说：“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迅速北上。”就是这样，在中央一日三电的催促之下，张国焘终于放弃了他的“西渡计划”，当日致电党中央，同意执行北上战略方针。电曰：“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时须较长，有可能 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和”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9 月 28 日，四方面军为执行北上战略方针而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说明目前胡敌被二方面军吸引。有利于红军主力在通渭、静宁地区之会合。“西渡计划”，因受地形、天候及河川的限制，不能按期达到目的，目前需要争取全国红军主力迅速会合，紧接着，就发布了北上进军的命令，从9 月 30 日起，四方面军部队分作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静宁、会宁方向进军。与此同时，中央指派西征军（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二师，在隆德、静宁、界石铺一线和庄浪、渭水与平原大道这间，纵横游击，威胁胡敌，积极策应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北上。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等地胜利会师。至此，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终于得以全部实现。

中央关于北上战略方针的提出、发展和实现，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它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正确分析敌我斗争形势的情况下，在不断地实践和总结经验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它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体现。

总之，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从提出到实现的全部过程，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在我军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　结束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实行战略大转移。期间，历尽艰辛，迂回曲折。但对北至何处，踌躇未定。直到进入甘肃的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之前还未作出最后决断。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的红一方面军，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惊喜地发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决定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9月27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榜罗镇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士气高昂，精神振奋，突破了国民党军最后一道封锁线（平凉—固原公路线），挥师向陇东高原东进。10月18日中央红军进入今吴旗县境，10月19日胜利到达吴起镇。至此，历时整整一年的长征，红军终于找到了家。

吴起是一个小镇，相传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郡守，他曾带兵在此戍边达23年之久。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此镇起名吴起镇。元朝时此地设"旗"，称"吴旗营"。清朝嘉庆年间称"吴旗镇"。该镇地处陕甘交界，洛河源头，是北上宁夏，西出甘肃的咽喉重镇。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这里是陕甘边区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中央红军离甘入陕之际，蒋介石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与此同时，给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也发去同样的电令。国民党这几路兵马立即在陕甘交界的河连湾（属甘肃环县）集结。国民党军尾追之敌在河连湾一带集结后，骑兵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因地形熟悉作为先头部队，日夜兼程，飞奔而来，10月18日夜已到达铁边城以西的油寺一带宿营，距中央红军后卫部队仅有20余里。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国民党军骑兵就追到了苏区大门口。毛泽东、彭德怀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分析敌情。毛泽东同志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会后，彭德怀精心部署，亲自指挥了“切尾巴”战役。

10月19日太阳出山后，敌骑兵先头部队顺头道川侦察前进，在王畔子、新寨、白屯被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的后卫部队多次击退，给主力红军在吴起镇集结赢得了时间。

10月20日，按照军委统一部署，确定把反击的重点放在吴起镇西北方向的头道川一带。第一、第二纵队分别设伏于头道川、平台山（今胜利山）、二道川、三道川，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10月20日，马培清率领骑兵团顺头、二道川中间的山岭侦察前进。白凤翔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气势汹汹地顺头道川奔驰而下，由正面推进，妄图歼灭疲惫不堪的红军。他们未曾料到已钻入中央红军的伏击圈内。

10月21日4时半，毛泽东登上吴起镇西边的平台山，来到设在一棵杜梨树下的指挥所，召开部分干部战前动员会，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随后疲劳至极的毛泽东要休息，叮咛警卫员：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枪声零星响时再叫醒我。毛泽东运筹帷幄，稳操胜券，酣然入睡。时任一纵队宣传部长的邓小平，也带病随部队参加了这次战役。

吴起镇“切尾巴”战役7时全面打响，中央红军采用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把敌骑兵分别包围在二道川、胜利山，头道川的杨城子、圪坻梁、柳树梁、燕山梁一带。经过数小时激战后战役结束。消灭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一个骑兵团、击溃国民党第三十二、三十六两个兵团；缴获战马数百匹，山炮、迫击炮、重机关枪数十门（挺）。至此，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阴谋破产。

吴起镇战役共牺牲红军指战员200余人，其中主要有军团政治部秘书长李鸣铁、军团卫生部政委胡定国、一纵队二大队队长李英华、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方镇钧。另外一纵队四大队队长王开湘病逝于吴起镇。这些烈士长眠于胜利山及洛河之滨。

10月18日中共中央进入吴起镇境内，在铁边城张湾子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讨论了中央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由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训令：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

与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自己解决物质器材及过冬的衣被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为了研究制定党和红军在新形势下的行动方针和战略任务，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现在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已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围追堵截已经结束，现在是敌人的"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为了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统一全军干部思想，明确当前行动方针和今后战略任务。10月25日，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热情洋溢地总结了长征。

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张闻天获悉国民党重新增调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继续"围剿"的情报后，中共中央于10月27日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变"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的行动方针，确定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吴起地处陕北苏区的边缘，敌我之间的"拉锯"斗争十分激烈，一些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据险筑堡，屯兵积粮，不时对我苏区袭扰，抢劫财物，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苏区人民痛恨入骨，早就想拔掉这些"白钉子"。盘踞在金佛坪村对面山上豹梁寨的张廷芝民团，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其数百人被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驱逐到今定边县安边一带，当时留守寨内的是其叔父张六、张七兄弟俩，共带百余人，有迫击炮两门，长枪、驳壳枪百余支。吴起镇战役后的第二天，根据毛泽东"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



拟派队消灭之”的电报指示，左权参谋长派一大队副率领卫兵连担任攻打豹梁寨的任务。慑于中央红军的强大威力，张六、张七于头一天夜间逃跑。打开张家粮库后，将20多万公斤粮食，除留足红军的口粮外，其余分给当地老百姓。驱逐了这股残余反动武装后，附近群众拍手称快，箪食壶浆，慰劳中央红军。

吴起镇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各纵队分别与当地县、区、乡干部，游击队、赤卫军及群众举行庆祝会、联欢会、群众大会等，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搞好苏维埃政权建设，扩大地方武装组织，积极投入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去。在此期间，毛泽东委派民运部长协助赤安游击支队队长张明科在吴起镇召开了3 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成立了赤卫军第四联总队。会后举办了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干部学习班，为苏区的政权建设和扩大地方武装组织培训了人才。

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前，组成以刘悠安为组长的工作组，协助定边县革命委员会搞好政权建设；任命谢维俊为三边“剿匪”总指挥，协助地方“剿匪”。给定边县游击队、赤安游击支队、陕甘边二路游击队配发了一批枪支弹药，装备了地方武装组织。毛泽东还特意赠送张明科一把手枪。

中央红军进入吴起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他们不顾疲劳和饥寒，帮助群众打扫院落，挑水劈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凡损坏的东西照价赔偿。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烧裂农民张宪杰的一口水缸，及时赔了两块银元；住在吴起镇的红军打破了宗维华的一个瓷盆，硬给其赔了五角钱；住宗圪堵红军受惊的马踩坏了宗维珍的猪食槽也赔了一元钱；徐特立同志在吴起镇后街察看地形环境时，发现一位老太太和孙女跌入河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跳入冰冷沁骨的河中，救出祖孙二人。徐老的崇高精神，至今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于10月28日与彭德怀、林伯渠商讨解决过冬被服、西药、无线电器材和兵工厂机器等问题，决定在凤凰镇（寺）（今吴旗县五谷城乡凤凰寺村）设采办处，以陕甘支队后勤部长杨至诚为主任。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表《给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呼吁苏区军民“动员起

来，团结在苏维埃和红军的周围，拿起枪炮和刀矛，坚决肃清苏区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积极进攻外面来的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保卫和发展苏区而斗争”。

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从 10 月 18 日进入吴旗县境到 10 月 30 日离开吴起镇共 13 天时间，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活动和休整任务后，在苏区人民的热烈欢送下，分别取道洛河川、宁塞川向陕甘边苏区政府所在地下寺湾前进。至此，吴起镇作为震惊中外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地被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具有极其光辉的政治地位。



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永坪会师。

1935 年 9 月初，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7 日，到达保安县的豹子川。由于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县四坡村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9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永宁山，同中共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5 年 9 月 15 日清晨，雾特别大，相隔 10 来米远就看不见人。但是，陕西延川县永坪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永坪镇的河道上，欢迎经过长途跋涉，战胜无数艰险困难，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

庄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面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河道里立即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鼓响，也扛着锄头赶来了。

徐海东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形的军帽上，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挥手向欢迎的人群问好。紧跟在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面的是手枪团。手枪团排成四路纵队，一边走，一边喊口号、唱歌，一个个神采奕奕，笑容满面。手枪团后面是司号连，吹打得震天响。再后面是几十个 15、16 岁的宣传队员，又唱又舞地走了过来。战斗部队过来了，分成三路纵队行进，每个人都扛着一色的马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欢迎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称赞着。

9 月 16 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三个军胜利会师。陕甘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也把老大娘、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问红二十五军，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柴、打水，妇女抢着洗衣服、补袜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线赠给老乡。

9 月 17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

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第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改编为第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第八十一师。

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年。会场上，红旗飘扬，刀枪林立，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红十五军团发展到7 000余人。不久，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消灭敌人110师，使陕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

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的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此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确定落脚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抵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1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附近将尾追之敌骑兵2 000余人击溃。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会后，派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10月底，党中央派人给红十五军团送去了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表达了对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热情慰问、鼓励和对胜利会师的祝贺。《告指战员书》指出：“我们久已听到了红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红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我们的会合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红十五军团指战员听了《告指战员书》无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军团长徐海东高兴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上一仗，作为见面礼！”



11 月 2 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先头团进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11 月 3 日在富县以北地区召开欢迎中央红军到陕北大会。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尔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十五军团驻地开进。毛泽东、彭德怀在红十五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给予了亲切的勉励。这个消息传到部队，鼓舞了红十五军团的斗志。

为了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中革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受到红十五军团各级领导的热烈欢迎。

直罗镇大胜　巩固陕甘根据地

直罗镇，坐落在陕西省富县境内葫芦河中段南岸，是富县通往甘肃合水大道上一个较大的集镇，集镇南北群山相连，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让敌人控制了葫芦河，那就必然将我军限制在葫芦河以北，洛河以西的三角地区，直接威胁我根据地的巩固。因此，直罗镇是此次战役的枢纽。

1935 年 7 月，蒋介石调集东北军 11 个师和中央军第八十四师、第八十六师及晋军的五个旅共 10 余万人，对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妄图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将红军主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彻底摧毁我陕甘根据地。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于同年 10 月 28 日，敌西路第五十七军开始东进了，军长董英斌深知红军的厉害，尽管手握重兵、装备精良，还是惧怕被我歼灭，行动小心翼翼，进展缓慢。直到 11 月 1 日才占领太白镇，随后即徘徊于太白镇、合水地区，构筑碉堡，搜刮粮食，不敢再往前进。而在东路进攻的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所属第一百一十七师更是不敢出头，他们在 11 月 6 日才进至富县，以后就再也不敢前进了。

与此同时，我军则于 10 月 30 日开始集中和进行战场准备。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下，由保安地区南移，于 11 月 6 日至 7 日先后到达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子林地区，与第十五军团会合，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军团（原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团合编成）和第十五军团，共 11 000 余人。第一军团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三、第十五团，第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

为了隐蔽我军主力，扫清战场，监视敌人，第十五军团于 11 月 11 日以前，先后消灭和驱除了张村驿、东村、金村、套通等地敌人的民团据点，并以一部兵力进驻桃花砭，同时肃清了上述地区的敌人特务机关和侦察人员。



另外，还以一个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连的兵力，进至直罗镇、黑水寺一带进行游击、侦察活动，监视西路敌人的一举一动。11 月 21 日以后，我第一军团进至上高地、套通、阎村地区，第十五军团主力在张村驿、桃花砭地区隐蔽待机，积极进行战前准备工作，并以一部分兵力加紧围攻甘泉，以迷惑调动敌人。

第十五军团的举动致使敌西北“剿总”感到十分头疼，为了解救那里出现的紧张形势，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速令西路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除留第一百零八师守备合水至太白镇一线外，其主力第一百零九、第一百一十一、第一百零六师立即东进，以解甘泉之围，并迅速构成沿葫芦河封锁线。11 月 19 日，敌先头部队第一百零九师附第一百一十一师的第六百三十二团，在师长牛元峰指挥下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第一百零六师、第一百一十一师（欠一个团）由军部率领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

根据敌人的进展情况，我方面军首长判断敌人可能于 20 日进至直罗镇，遂定下最后决心，按照原作战计划歼敌，令第一军团于 19 日夜秘密进至直罗镇东北的纸房沟、石咀、凤凰头等地区集结待机。第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拆毁直罗镇东南端的土寨墙，防止敌人利用，并派出一个连的兵力，进至直罗镇以西阎家村北山，担任战斗警戒，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待敌进至直罗镇后，乘其立足未稳，以我军主力部队采取南北夹击的方式，予以分割围歼。

果不其然，20 日晨，敌先头部队在第一百零九师师长牛元峰的带领下，仰仗飞机的掩护，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我在阎家村担任警戒任务的那个连，按照上级指示，采取节节抗击的打法，一步一步把敌人牵向直罗镇。战至 16 时左右，将敌诱致直罗镇。敌人做梦都没想到，此时已钻进了红军为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

牛元峰率第一百零九师进至直罗镇后，很快就转入了防守状态。他命第六百二十七团、第六百二十六团分别防守直罗镇南北两山的制高点，他自己率师指挥部和第六二五团防守直罗镇。21 日 1 时，我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实施战术展开，拂晓时分，直罗镇枪声大作，我军以突然猛烈的行动，向敌发起了进攻。

第一军团以刘亚楼的第二师，陈光的第四师（欠第十团）从正北、西北方向，向直罗镇北山进攻；第四师第十团则迅速插向安家川以东老人山高地，切断敌第一百零九师的退路；以第一师的第一团为方面军预备队，第十

三团控制直罗镇东北的阵地，并协同第十五军团一部堵住敌人向东的去路；第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欠一个团）和七十八师一个团自西南、正南、东南三个方向，向直罗镇南山及镇东南的土寨进攻，并堵住了敌人东逃的去路。

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毛泽东一再嘱咐部队，一定要打歼灭战！我红军将士充分发挥了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敌人指挥瘫痪，陷于混乱状态。战斗进行得十分紧张激烈，当时针指向10点时，我第一军团将防守直罗镇北山的敌第六百二十六团大部歼灭，并击溃了由直罗镇向北山增援的第六百二十五团的两个营，残敌约一个营退守直罗镇东北侧的小高地进行顽抗。与此同时，我第十五军团亦将防守直罗镇南山的敌第六百二十七团大部歼灭，并在第一军团的协助下乘势插入直罗镇内。敌师长牛元峰犹如一头困兽，率残部拼死向北突围，均被我军击退，他的师直属队也在突围中被歼灭。战至12时左右，牛元峰见突围不成，不得不率残部500余人退守直罗镇东南的土寨，固守待援。我军继续猛打猛冲，14时许，第一军团的第二师在第四师十二团的配合下，歼灭了固守直罗镇东北侧高地的敌人一个营。同时，我在安家川以东地区的第四师第十团及第一军团预备队（第一师第一团），击退了由黑水寺来援之敌。第十五军团的第七十八师在向退守土寨残敌发起攻击时，遇到一点小麻烦，由于该处地形十分险要，寨墙虽被我事先拆毁，仍易守难攻，未能攻克，但土寨内的敌人缺粮断水，已成瓮中之鳖。据此，我军决定采取围而不攻的方针，以第十五军团一部兵力暂时将敌围困，诱歼来援之敌或待敌人逃跑时在运动中予以歼灭。21日22时，敌第一百零九师被围的消息传到“西北剿总”，敌人在惊恐之中，慌忙命令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率第一百一十一师和第一百零六师迅速增援直罗镇被围之敌，又令在富县的第六十七军、吴克仁的第一百一十七师向羊泉镇、张村驿前进；另调中部地区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向龚家塬、丁家塬西北方向前进，妄图从东西两翼夹击我军，以解第一百零九师残部之围。22日上午，各路敌军开始行动。董英斌亲率第一百一十一师沿安家川北山向我发起进攻，遭我在安家川以东高地的第一军团部队的迎头痛击，这股敌军在遭打击后，于当天下午向西溃退，敌一百零六师也窜回黑水寺。从富县出来的敌一百一十七师，于23日开始进至羊泉镇、凉水泉一线，遭到我第八十一师部队顽强阻击。战至26日，敌人再也不敢打下去了，他们也怕落得个被歼的下场，所以慌忙撤回到富县城



内。中部来援之敌第十七师遭我一击，也停止了前进。此时，敌第一百零九师残部已无力反击，第一百零六师进退迟疑，据此，方面军首长决心抓住有利战机，乘胜扩大战果，除留少数部队继续阻击东面之敌第一百一十七师和围歼第一百零九师残部外，以主力围歼黑水寺之敌。正当我军调整部署之际，敌第五十七军惟恐红军西进将其歼灭，乃仓促决定于23日下午弃守黑水寺，以第一百零六师为后卫，掩护军部及第一百一十一师向太白镇撤退。我军发现敌西逃企图后，不怕疲劳，冒着风雪严寒，立即以第一军团在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一部配合下，以主力沿大道极其南北山地，分三路跟踪追击，于24日中午，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追歼了担负后卫掩护之敌第一百零六师第六百一十七团。黄昏后，我追击部队进至杨家湾极其南北地区时，敌已逃入太白镇，占领阵地固守，我军鉴于敌人兵力集中，且工事坚固，一时不易攻克，又为争取东北军第一百零六师等部反蒋抗日，遂令部队停止攻击，展开政治攻势。

董英斌率部逃跑了，这下被我第十五军团围困在直罗镇东南土寨里的敌第一零九师残部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等待救援的希望彻底破灭，只好自己逃命。23日午夜时分，土寨内的敌人一窝蜂似地冲出来，随即四散而去，但他们并未能逃脱覆灭的下场，24日上午，我第十五军团的部队就将其全部歼灭，敌师长牛元峰被活捉。这时我军主力回师东进，准备歼灭敌第一百一十七师。但在我东进途中，敌第一百一十七师因惧怕被歼，于26日退回富县城内。至此，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迫使敌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敌第六十七军一个师退出富县。

直罗镇一战，红军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 300余人，缴枪3 500余支。是役的胜利，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两支红军部队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的胜利。它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使红军自长征以来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新的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同时，由于东北军遭到沉重的打击，毛泽东决定在前线教育、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军官，并让他们转告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东北军，这一举动对红军后来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红一方面军东征

1936 年 2 月中旬至 5 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东渡黄河，出师山西的东征战役。此役，历时 75 天，红军转战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歼晋绥军约七个团，俘其 4 000 余人，粉碎了晋绥军苦心经营的黄河封锁堡垒线，予山西军阀阎锡山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扩大红军 8 000 余人，筹款 30 余万元，在同蒲路沿线 20 余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平津、太原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支援作用，为后来红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

1935 年冬季，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使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是中共和红军开展新局面的关键。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当时的兵力仅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比较困难，扩军不容易。苏区周围的形势比较严重：在南面、西南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十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五个旅。他们正加紧对苏区和红军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妄图将红一方面军困死、饿死，最终“剿灭”陕甘边地区。

参加对陕甘苏区围困并准备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主要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据守宜川、韩城、自水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据守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等县城和附近一些乡镇，阻止红军向西南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井岳第八十六师从榆林、靖边、安边、定边向南袭扰，企图夺占瓦窑堡、安塞、安定等地；高桂滋第八十四师据守绥德、米脂和清涧地区；阎锡山的正太护路军司令兼



陕北“剿共”总指挥孙楚率领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布防于吴堡、义和镇及其南北地区，并指挥晋绥军骑兵第四旅及井、高部队各一部“清剿”神木、府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在黄河东岸，阎锡山以三个旅另一个团的兵力，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地段筑堡守备，阻止红军东渡入晋。其中第七十一师第二百一十六旅2个团担任包括黑峪口、罗峪口等渡口在内的兴县、临县、离石三县河防，第二百零七旅2个团担任包括沟口、河口等渡口在内的石楼、中阳两县河防；第七十二师第二百零九旅1个团担任永和及其以西河防；第六十九师第二百零三旅担任包括禹门口等渡口在内的大宁、吉县河防；另有第一百零一师第三旅两个团在柳林机动。此外，以六个旅另一个团的兵力，在太原、汾阳、临汾等地区防守，另有14个旅驻守在长治、应县、大同等地及绥远境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黄河东征的方针，中央军委于1935年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随后，陕甘苏区的党政军民进行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主要有：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晋绥军，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扩大红军，充实部队实力；调集大批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工作；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了造船民工，并组建了工兵连，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和政治思想动员；各部队指挥员现地勘察了渡河地点，拟制了渡河作战计划，还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保密规定，以保证渡河作战的突然性。

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自1936年2月18日下达东征命令开始，到5月2日晚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结束，历时75天，可划分为三个作战阶段。

红军突破晋绥军黄河防线，占领晋西有利阵地。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第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第二师主力，第四师、第一师、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随后，从沟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福乐坪、马花坪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留誉镇地区，并向南发展，同第十五军团打通联系。第十五军团（欠第八十一师）以第七十五师第二百二十三团为先头，第七十五师主

力、第七十八师随后，从河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舍峪里、辛关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

20日20时，渡河战斗开始。各军团突击队和先头团在预定的渡河点突破晋绥军黄河防线，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公里的地区。之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百二十四团开始转攻石楼城，方面军主力集结于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的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此间，山西游击队500余人从河口渡河，进至义牒镇为中心的地区，担任维护交通、巩固占领区的任务。

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进而驱逐红军至黄河以西，阎锡山急调入陕之晋绥军4个步兵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原在该地区的第七十一师等部，阻止红军北进，牵制红军东进；调驻长治、晋城的第六十六师到介休，驻太原的第七十二师主力1个旅另1个团和第六十八师1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之独立第二旅向关上村推进，阻止红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的第六十九师主力及驻防大宁、吉县的另1个旅分路北上，均向隰县前进，阻止红军南进，牵制红军东进。另调驻浑源、大同之第六十八师两个旅向岢岚集结，调驻大同、丰镇之骑兵两个旅到崞县至忻县间，随时增援太原；调驻应县的独立第三旅至文水、交城地区，以防卫太原的西南方。

为打破晋绥军的封锁，建立临时根据地，红一方面军首长彭德怀、毛泽东于24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绥军一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两步任务。依据上述决心，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开始了行动。红十五军团于2月25日1时先在石楼南端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晋绥军约1个营；继以3个团向隰县急进，在预期的遭遇战中，歼晋绥军第六十九师先头部队1个营，击溃1个营。随后，军团主力转向东进，于27日占领水头镇。红一军团于26日下午从南北两面进攻关上村，歼晋绥军独立第二旅第四团。该旅旅部率第三团由石板上向汾阳溃逃，红军乘胜追击，于27日将该敌歼灭。军团主力随即推进到兑九峪、三泉镇地区。

面对红军凌厉的攻势，阎锡山以救援石楼为目的，一面电告蒋介石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编为四个纵队，于3月4日开始，分路向红军



实施反击：第六十九师3个旅为第一纵队，由隰县向北反击；第六十六师3个旅为第二纵队，由介休向西反击；第七十二师1个旅另1个团和第六十八师1个旅为第三纵队，由汾阳向西反击；第一百零一师和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各1个旅共5个旅为第四纵队，由中阳向南反击。

鉴于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迅速定下粉碎阎锡山反击的决心：第一军团第二师一部在关上村钳制阎部第四纵队，第十五军团1个营在石口镇钳制阎部第一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军团的主力，歼击兑九峪附近阎部第二、第三纵队。10日7时，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向兑九峪守军发起攻击，击溃阎部第一线部队。接着，阎部第三纵队在第二纵队的配合下，向红一军团攻击，红军两军团主力奋起还击，将其2个纵队击溃。这样，阎锡山组织的第1次反击即被粉碎。

红军分兵南下北上作战，发展胜利。第1次反击被粉碎后，晋绥军第二、第三纵队退至孝义、汾阳及其附近地区整顿；第一纵队一部退隰县，一部调回临汾；第四纵队主力仍在柳林、离石、中阳和关上村附近。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从3月上旬起陆续入晋，其第二十五师已进至灵石，第三十二军第一百四十一、第一百四十二师已经从正太路向平遥、介休间开进，第十三军正准备从晋东南和风陵渡分路向侯马开进。这些部队初到山西，开始行动比较谨慎。

为打乱阎蒋两军的进攻部署，扩大占领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力量，彭德怀、毛泽东决定分兵南下北上作战，扩大和发展战役胜利，其决心和部署是：以第一军团指挥第八十一师（欠1个营）组成东征先锋军（后称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首先向霍县出击，尔后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第七十五师主力和军团直属队为一路（后称左路军），进至灵石以西地区，掩护第一军团南下；以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百二十四团、第八十一师1个营和新组建的第三十军等部为一路（后称中路军），由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继续包围石楼和在石口镇、关上村附近地区牵制晋绥军第一、第四两纵队，并保障黄河渡口及后方联络线畅通。

3月16日，红军右路军从大麦郊及其以北地区出发，于17日突破晋绥军汾河防线，包围了霍县县城，并占领了城北的道美、南关西村；左路军于16日由双池镇以西地区出发，于17日进抵灵石以西，并佯攻姚家山和灵石

县城。这时，阎锡山为解救石楼并夺回被红军所占地区，又集中了4个纵队，于3月17日开始向石楼方向组织第2次反击。这样，太原、晋南、晋西北地区的防守力量便减弱了。彭德怀、毛泽东决心分兵南北作战：以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继续南下，相机进占赵城、洪洞，并向曲沃、闻喜、运城攻击；以左路军乘虚北上，首先占领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县，创建晋西北游击根据地，力争与陕北的神府苏区打通联系；叶剑英参谋长指挥的中路军，继续包围石楼，反击晋绥军的反扑，控制黄河渡口。这样，红军便形成了左、右两路南下北上发展进攻，中路钳制晋绥军主力的有利态势。

按照上述部署，右路军于3月19日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乡村，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材，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左路军于3月18日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进到岔口镇作短暂休整，并开展地方工作。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广大地区钳制了反击之晋绥军4个纵队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线的作战。同时，继续控制着黄河渡口，保障了后方交通运输，并开展地方工作，扩大部队，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建立了地方党和政权机构，为下一步的作战准备了战场。红二十八军在神府苏区，协同当地武装，积极打击晋绥军，有力地策应了红十五军团主力的行动。

打破阎蒋两军“围剿”，红军回师陕北。3月下旬，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直接指挥由进入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编成的第五、第六、第七三个纵队，企图封锁黄河，分别围歼各路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强令在山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进击，以造成红军后顾之忧。根据这种情况，方面军首长于4月初决定，逐步收缩兵力，准备集中歼敌。为此，右路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即由古城、汾城（今襄汾）等地北上，攻占吉县，进至大宁、蒲县、隰县地区，并逐一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的晋军黄河沿岸堡垒；左路红十五军团，经白文镇、圪洞镇、金罗镇，于4月12日在师庄地区歼晋军第六十六师1个团另1个炮营，击溃其三个团，俘团长以下600余人，尔后转至大麦郊镇休整。红二十八军经金罗镇攻占三交镇后，经石楼到达康城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军



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时，山西境内各路晋军纷纷向红军围拢，同时，蒋介石又命令陕甘宁各省国民党军队，向红军陕甘根据地进攻。为避免与优势晋军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4月下旬，方面军首长决定回师河西，遂于5月2日下达了渡河命令。自5月2日晚开始到5日，各参战部队分别经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全部返回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平地区。同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至此，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西征

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时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继东征战役胜利后进行了西征战役，给宁夏国民党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很大打击，创造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的倡议。但是，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共的倡议，继续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仍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共，并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调集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等部共16个师另3个旅，对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其部署是：蒋系中央军汤恩伯第十三军（辖第四师、第八十九师）和晋绥军李生达第七十二师和1个炮兵团，渡黄河入陕，协同原在陕的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高双成第八十六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以中央军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和晋绥军的2个旅为预备队，集结在山西境内待命机动作战。另以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辖3个师）、刘多荃第一百零五师主力（2个旅）和西北军冯钦哉第七军第四十二师、孙蔚如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由延安、甘泉、鄜县、洛川、韩城、宜川向北，进攻陕甘苏区南部；以东北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的3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东北，进攻陕甘苏区中部；宁夏马鸿逵第十五路军（1个师5个旅）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胜（今下马关）等地；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驻守环县、曲子、庆阳、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还以晋绥军4个多师，在黄河东岸的晋西、晋西北地区，防备红军再次东进。

是时，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其



广大官兵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倾向抗日救亡，不愿同红军打仗。蒋介石、阎锡山素有矛盾、貌合神离，阎只求自保不愿再以大量兵力投入“剿共”。所以，蒋介石进攻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力，实际上只有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所部。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虽然反共坚决、积极，但防区广大，兵力有限，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所编第七师师长马鸿逵仅有步（骑）兵12个团，马鸿宾仅有第三十五师共步（骑）兵8个团。是一个较薄弱的战略方向。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立了中共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红军力量，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在军事战略上，避免与当面敌人决战。据此，赋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陕甘苏区党的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坚持东面的游击战争。确定上述三项战略任务之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空间和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进而发动全国抗战创造条件。

中共中央军委依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战区形势，决定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向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进攻，开创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策应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同时以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陕北地方红军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蒋系中央军和晋绥军，保卫陕甘苏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击陕南，协同陕南红七十四师，巩固与扩大鄂豫陕苏区，并吸引蒋军南下，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后因情况变化参加西征作战）。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下达西征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西方野战军的第1阶段任务是：夺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地区。20日前后，参战各部由现地出发，分二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经蟠龙、安塞进抵吴起镇（今吴旗）；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经永坪、蟠龙之间进抵新城堡；红八十一师、骑兵团及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是时，彭德怀的决心是：以红十五军团兵分两路首先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和安边，尔后向定边、盐池攻击，再视情况袭击灵武、金积或豫旺县城，伴

攻宁夏，以调动驻守庆阳至洪德城一带的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回援宁夏；红一军团则在运动中寻机歼灭第三十五师，并迅速夺占曲子、环县、洪德城等要点。

5月28日，红十五军团右翼队第七十三师袭占了宁条梁，左翼队第七十五师强攻安边未果。随后，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八师围困安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前进，并派一部兵力（骑兵团）前出到盐池、灵武地区侦察。红一军团则由吴起镇向元城镇、曲子镇方向攻击前进。宁夏系“两马”的老巢，红军进攻宁夏，顿使“两马”惊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部急速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遗防由东北军接替。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领导人，请其“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不要阻碍红军的进攻；一面电示彭德怀，要红一军团立即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上，相机攻占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指出，执行上述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

6月1日，红一军团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向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进抵曲子的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第一百零五旅旅长所率的特务连发动攻击，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该旅长冶成章率150余人投降；第四师于马岭附近击溃第三十五师1个营，进占阜城。2日，马鸿宾集中8个步（骑）兵营，向阜城反扑。3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突然向马部发起猛攻，战斗3小时，马部8个步（骑）兵营大部就歼，1 100余名官兵被俘虏。阜城战斗后，红一军团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并派1个团进占曲子西南的三岔；第一、第二两师继续北上，于4日攻占环县，5日攻占洪德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师，于4日攻占定边西南的洪柳沟，并准备打击马鸿逵的出援部队。为协调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东北军部队按中共的要求停止于庆阳、镇原一线，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6月5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继续兵分两路向西攻击，“消灭两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部署是：左路军红一军团以第四师控制阜城至洪德城一线，开展群众工作，并准备在红二十九军一部接防后，向三岔以南发展进攻，扩大占领区域；主力继续西征，攻占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并在上述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继续向西推进，攻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兵力进占同心城；第七十八师准备撤



回安边，西进红柳沟地区，向定边、盐池、金积方向游击，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暂留宁条梁、安边地区游击和做群众工作。西方野战军司令部率直属队进至洪德城附近。6 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之间地区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与苏联联系的战略枢纽，也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应在 7 月半以前完成初步赤化。据此，彭德怀于 10 日下令由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北路军（又称中路军），由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统一指挥，由陕南转兵北上，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要点，在东与老根据地连接，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边境的广大地区进行赤化工作，并准备以有力一部，消灭马部出援部队。

6 月 7 日，西方野战军各路开始行动。至 11 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先头部队第七十三师第二百一十九团进占了同心城，其主力进抵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红一军团主力于 13 日进抵七营、上新堡地区，第四师继续控制三岔地区。至此，西方野战军终于切断了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余部经七营、同心城大路撤退中宁、石空堡的退路，打破了“两马”收缩兵力加强宁夏腹地防守力量的企图。在此期间，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北路军已进抵宁条梁、安边附近地区；红二十九军一部亦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地区活动，以配合红一军团的行动。这样，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广大地区，并开展了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6 月 14 日，彭德怀确定西征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部署是：左路军红一军团主力控制七营、上新堡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三岔等要地。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攻占豫旺县城，尔后攻占韦州城，以一部兵力控制同心城、高崖子一线，并向海原、中宁方向游击侦察；第七十八师进占惠安堡，并向金积、灵武方向游击侦察，打击马鸿逵的出扰部队，以掩护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北路军主力夺占安边，以一部兵力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方向游击；另以 1 个小团在宁条梁、横山之间地区开展赤化工作。各路军根据上述部署，旋即开始行动。

6 月 16 日，北路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完成了对安边的

包围。是日2时许，暂归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乘定边守军不备，一举袭占了定边城，全歼城内守军。17日，北路军首长留第二十八军一部与第八十一师继续围攻安边，率主力西进定边，准备进占盐池。21日3时，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攻占盐池，歼灭马鸿逵骑兵2个连和民团200余人，缴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此后，北路军随以定边城为中心，展开工作，一边肃清残匪，一边扩大红军和征集资材；第七十八师和第八十一师夺占安边并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左路军红一军团第二师于20日进占七营，主力位于七营、八百户之间地区，防堵马鸿宾部北窜；同时在防区两侧地区展开群众工作。此后，马鸿宾部向西转移到海原、黑城一带，东北军一部接替七营以南的阵地防务。21日黄昏，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一部攻占同心城以南的王家团庄，全歼守寨民团，缴枪数十支，战马100余匹；27日2时，军团直属手枪团夜袭豫旺县城成功，歼灭守军2个连，俘守军营长以下280余人，缴长短枪180余支、战马150匹。尔后，红十五军团主力向韦州城攻击前进。韦州城是宁夏黄河以东地区的战略重镇，马鸿逵接韦州告急讯后，立刻派兵3个团（其中骑兵2个团）前往增援。7月5日，马鸿逵部第二十旅旅长马全良率3个步（骑）兵团另2个营的兵力由韦州城进犯豫旺县城，企图夺回该地。当马全良部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遭到红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有计划的抗击，马部死伤300余人，狼狈退回韦州城。战斗后，右路军主力即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大水坑、甜水堡、豫旺县城这一大片地区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北线，防守横山的国民党军高双成第八十六师，以1个团（骑兵1个营、步兵3个连）的兵力，于6月24日向安边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红军北路军首长当即决定：留一部兵力防守定边、盐池，主力回安边，准备打击高双成第八十六师援兵。7月13日晨，由横山西援的第八十六师所部进至安边附近，被围城红军击溃，退回堆子梁。在此前后，北路军曾再次攻击安边，均未奏效。根据彭德怀的决定，红二十八军停止围攻安边，撤至安边以南休整，并准备打击出扰之马、高部队；第七十八师集中于盐池，担任赤化工作；第八十一师集中于定边，担任赤化工作。至7月下旬，第七十八师调至豫旺县城，归属红十五军团建制；第八十一师调至甜水堡附近待命，盐池、定边西北防务由第二十八军接替。

在南线，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骑兵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师），在张学良赴南京期间，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第一百零



六、第一百零八、第一百二十师与骑兵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师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余部，自固原至安庆一线北犯。6月中旬至7月初，攻占了红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并继续向曲子推进。随后，何柱国直接指挥步（骑）兵4个师和第三十五师余部，集结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兵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

本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红军西征以来，为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一直采取忍让和避免与其决战的姿态，但何柱国却认为红军的克制态度是软弱，继续向北推进。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彭德怀，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制'（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以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多的忍耐性"。于是，彭德怀决心集中红一、红十五两军团主力，给予何柱国以有力打击。部署是：以红一军团第四师及第一师第十三团于曲子地区，阻击东北军第一百零六、第一百零八师北进；第一师主力和第二师集结于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待机出击，并以一部兵力保持同七营以南之东北军的接触；红十五军团集结于豫旺县城附近，待机出击。

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兵第六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攻击，被红二师一举击溃。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的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东北军遂暂时停止了进攻。

在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游击战争同进攻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西征行动。7月底，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行动胜利结束。

甘孜会师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方针，对湘鄂川黔苏区“围剿”，企图将红二、红六军团压缩并消灭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地区。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以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首先向南突破敌人搜水、玩水两道封锁线，进入湘中，然后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省石肝、镇远和黄平地区创建苏区。红十八师在斗争不利时，也向湘黔边境转移，同主力会合。转移前，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将地方部队组成第五、第十六师，分别编入红二、红六军团序列，使两军团各辖三个师，共17 000余人。

我主力转移后，留在苏区的红十八师，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同七个师又三个旅的敌人进行了一个月的艰苦战斗，于12月21日在龙山以南突出重围，进到黔江、酉阳地区，1936年1月11日到达江口，同主力胜利会合。

石阡、江口地区居民稀少，粮食困难，而敌人又从四面向我进逼。在此情况下，我军委分会改变在该地区创建苏区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争取在贵阳西北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苏区。1月2日，我军开始西进，次日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三师的封锁线后，即转兵向南，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以北击退敌99师的截击；接着西取洗马河，袭击龙里，前锋直逼贵阳。这时，敌主力全在我军东面和北面，贵阳敌人兵力薄弱，蒋介石急令第九十九师向贵阳收缩。同时调郝梦龄纵队向湘潭集中，准备南渡乌江截击我军。我军随即绕过贵阳．向贵阳西北急进，袭占修文、扎佐，造成经息烽急渡乌江之势，敌郝梦龄纵队慌忙在乌江北岸布防。我军转向西急进，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城，并按照预定计划，展开于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着手创建苏区，在20多天内，扩大红军五千多人。

经过四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得转入守势，进行



补充整顿。我军则仍拥有桑植出发时的实力；同时，盘县、兴义地区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亦好。我军准备在这一带创建苏区。

1936年3月30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接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电报，遂于31日率部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滇中急进。红二军团于4月6日攻占寻甸，8日抢占普渡河，红六军团经白石岩、羊街、可朗等地向普渡河等地前进。

我军进入云南后，蒋介石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共军”总司令，指挥李觉、郭妆栋、樊篙甫和孙渡四个纵队继续进行“追剿”。4月8日，我先头团刚渡过普渡河，敌孙渡纵队一个旅即赶到河边，封锁了渡口。企图待其他各路追军到达后，围歼我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为了粉碎敌人围歼我军的计划，红二军团第五、第六师于九日由可朗折回六嘎地区反击敌渡纵队。经一天激战，击退两个旅的进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接着，我两军团由普渡河南下富民以东，继而又转向西进，准备在丽江、石鼓一带北渡金沙江。

此时，龙云急令孙渡、李觉、樊眷甫三个纵队尾追，郭汝栋纵队从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向华坪、永北（今永胜）急进，先我控制金沙江北岸，企图前堵后追，将我军歼灭于金沙江南岸之鹤庆、丽江地区。

抢渡金沙江是决定全局成败的关键。为了迷惑敌人和争取我军稍事休整的时间，我军在富民以东和宣威东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谷物。群众兴高采烈，把没收土豪家的“宣威火腿”送去慰劳红军，改善伙食。龙云害怕我军围攻昆明，并在楚雄、玉溪一带创建苏区，急忙调兵遣将，加强昆明及其近郊的防务。乘敌恐慌之际，我军团首长一声令下，全军上下，万众一心，不顾敌机的骚扰和轰炸，向金沙江渡口急速前进。

我军兵分两路：左路红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祥云、宾川；右路红六军团连占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并于四月二十日在宾川同二军团会合。23日，我军占领鹤庆，继占丽江，直达金沙江边的石鼓镇，将追敌远远甩在后面。从25日至27[①]，我军在石鼓、巨甸两处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尾追之敌三个纵队赶到江边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控制”金沙江北岸之敌，也望风而逃之夭夭。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即沿玉龙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北进，30天到达中甸。5月5日，两军团分别经得荣、巴塘、自玉和定乡、稻城，向

甘孜前进。

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第一次过雪山，毫无经验。登山前，部队在中甸休息了好几天，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如，补充羊毛衣裤和酥油炒面，携带适量的白酒、辣椒和其他药物等。部队还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并讨论了过雪山时生活上应注意的事项。一登上雪山，就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从炎热的夏季突然转入了寒冷的冬季。山上风雪交加，使人站立不稳，寸步难行。越登高，空气越稀薄，氧气越缺少，呼吸越困难。向导在队伍前面走，稍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他的背影和足迹。稍有不慎，一脚踩空，就会跌翻到雪山陡坡之下，再也爬不上来。同志们在雪山上，一步一步攀登，一步一步前进，疲劳的程度也一步一步增加。炊事员同志们挑着沉重的伙食担子，背着大铁锅，行动就更加困难。由于环境恶劣，在雪山行军途中根本无法做饭。战士们行军时肚子饿了，唯一的办法是吃上一口随身携带的炒面，再就地抓一把积雪送进嘴里。这是过雪山的人“得天独厚”的快餐。即使这样，在艰难的雪山行军中也摆脱不了饥饿和疲劳的威胁。一般情况的行军，常常可以就地坐下“小休息”，在雪山行军则绝对不能。有的人因饥饿或疲劳而就地坐下，往往一坐就起不来，甚至躺在雪山上停止了呼吸。有几次，倒下的同志经过人工呼吸抢救过来了，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抢救无效。最好的办法是每人掌握一条手杖，无论多么疲劳或饥饿都坚持不坐下，宁愿把手杖和双腿形成三角架形的支架，支撑着身体站着稍稍喘息。这一经验迅速在部队中传播开来，因而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要战胜自然界的敌人，如同和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作战一样，主要依靠共产主义战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红军就是靠这种精神和互助友爱的阶级感情战胜了环境险恶的雪山草地。金沙江的恶浪和玉龙雪山的严寒没有阻挡住红二、六军团胜利前进的步伐，他们终于在 1936 年 7 月 2 日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后，奉中央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二、第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将红二军团第五师改编为第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役正在胜利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我党在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已取得



了一定成效，对其他各地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于1936年6月初发动了“两广事变”，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号，出兵湖南，反对蒋介石政府。蒋介石被迫将陕甘“剿共”主力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甘南地区敌人兵力比较薄弱。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连电当时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乘胡宗南部南调之机，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而张国焘则顽固坚持其错误路线，他虽然于6月6日被迫取消了他一手炮制的伪“中央”，但是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独树一帜，继续同党中央对抗。19日，党中央再次向张国焘指出，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

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采取各种手段，在二方面军中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妄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执行他的计划。张国焘的这些反党活动，遭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抵制和反对。当时有个人秉承张国焘的旨意，窜到红六军团鬼鬼祟祟地进行反党活动，被王震同志察觉。他立即派人把这位“说客”带到军团部。王震同志严肃地质问那个人的来历。那人支支吾吾，说不明白，最后说是“张主席”派他来联络的，想用“张主席”这块牌子来压人。王震同志又追问：这位“张主席”是谁？那人只好供认是张国焘。王震同志满腔怒火，忍无可忍，接连地紧逼追问那个“说客”：张国焘是哪个组织的主席？是谁选他当了主席？他派你来联络，为什么不到军团司令部或政治部来，而在下面乱窜？一连串的问题使那个“说客”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王震同志在斥责那位“说客”的同时，义正词严地谴责了张国焘的反党行径。

在此之前，张国焘曾将他主持印发的《干部必读》一书送给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人手一册。由于当地纸张困难，这个小册子是用经书的背面油印的。其中公然叫嚣“反对毛、周、张、博”等反中央的口号。我们一看到就十分反感，非常气愤。当王震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怒斥张国焘反党的时候，全军上下更是积极响应，群起而攻之。当时也有个别思想糊涂的人以埋怨的口气说：“王胡子又发脾气了。”而任弼时等同志则马上明确表态说：“王胡子这个脾气发得好！”这就充分肯定了王震同志的正确立场。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王震等同志的坚决斗争，

张国焘被迫接受了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8月5日到12日，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前进。第一纵队于9日抢占了天险腊子口，继占了大草滩、哈达铺，歼敌一千余人，并于26日攻占渭源。第二纵队于8月20日攻占挑州旧城，歼敌一个营，接着击退敌人马步芳部一个旅的进攻，攻占通渭。第三纵队经救济导、腊子口，于9月初进至哈达铺地区。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挑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八座县城和岷州、陇西、临挑、武山、礼县等县的广大地区。十月，同红一方面军先后在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全部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二方面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援下，从1935年春到1936年秋，先后转战在湘鄂川黔滇康甘等省，以坚决积极的行动，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此后，红二、红四方面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共同北上甘南，并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

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并作出军事部署：以1方面军二师附属骑兵第二团为左纵队，“经硝河城、常家集、隆静间出庄浪，相机袭占威胁秦安”，与先期占领界石铺的特别支队靠拢；以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出郭城驿，“向静宁方向继进，相机袭取之”。

会宁位于定西地区，北靠靖远，西连定西、榆中，南接通渭，东邻静宁，是二、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的必经之道。迅速攻占会宁，对于粉碎国民党军企图抢占该城以截断我三军会师通道的图谋，具有战略意义。

9月30日，红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小时，行程300多华里，以便抢在胡宗南部之前袭占会宁。骑兵团特别支队10月2日凌晨潜入会宁城，晨5时发起突然攻击，战斗一个多小时，占领了这个当时的战略重镇。七十三师随即进驻县城。同时在城外构筑工事准备迎敌。至此，红十五军团控制了豫旺、同心城、海原、打拉池、郭城驿、会宁地区，掌握了三军会师的枢纽。

10月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及骑兵团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一部会合。8日，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与抵达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一军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受到当地一方面军指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日晚，一、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举行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联欢大会。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一师师长陈赓，分别代表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致祝词。会上，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向红四方面军战友赠送了大批预先准备好的慰问品。

同日，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致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

泽东，报告一、四方面军在会宁联欢及部队行动部署。

毛泽东当天致电彭德怀谈张国焘目前态度和要彭同朱、张会面及相关事宜。电文说：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的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性），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为进一步达到统一团结，张闻天于10月16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请国际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会后，林育英即从保安启程，于10月19日到达同心城，会见二方面军领导人。11月上旬抵达关桥堡，会见朱德、张国焘，传达国际和中央的精神，谈了不少情况，并就军事部署进行了研究。按照行前毛泽东的谈话意见，林育英对张国焘诚恳地进行说服教育，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做细致的政治工作，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宣传加强团结的意义，讲解中央的决策。对消除隔阂、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终于于10月18日到达会宁老君铺，同红一方面军2师5团会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等率二军团一部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左纵队到达隆德县将台堡。10月23日，继二方面军总部和二军团在平峰镇、将台堡与1方面军会师后，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红二方面军还有1.1万余人。

至此，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这红军的三大主力在甘肃南部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标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以惊人的毅力，纵横10多个省，跨越万水千山，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部壮丽史诗。长征的胜利和长征中形成的伟大长征精神，是我们永远值得珍视的历史财富，给后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历史启示之一：坚持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重要观点，作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了出来。由于这时党还处在幼年，这条思想路线还未能成为全党的共识。1931年，正当中国革命形势逐步高涨之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的经验，推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和主张。1933年，当国民党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不懂军事的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不懂中国国情，不调查研究，不听取意见，只知照搬外国正规战争的经验，依靠地图瞎指挥。结果红军损失惨重，失去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以血的教训深刻说明，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会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后果。正是通过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比较，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长征的历史启示我们，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我们都要坚持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历史启示之二：共同的革命理想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红军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挫折，转移中虽然胜利冲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湘江血战使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到三万多人。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不仅要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敌机轮番轰炸下杀出生路，还要在时时饥寒交迫和极其严酷恶劣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面对革命重大挫折，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红军仍然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勇气和力量，是因为在战士胸中燃烧的是高于天的革命理想，这使他们能够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困难中看到希望，因而具有天大困难脚下踩的英雄气概。在红军撤离根据地的前夕，毛泽东就坚定地向大家指出，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加强革命信心。正是在这种革命必胜的信念支撑下，红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低谷的出现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暂时的失败不能改变

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明确而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内化而成的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这种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有了它，就会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也会有修正自身错误的勇气。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理想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灵魂，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如果失去了这一理想信念，工人阶级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历史启示之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是我们党和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

长征途中，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共产党内部还面临着克服错误的指导路线的严重斗争。在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之后，又发生了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尖锐斗争。在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一方面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南下的错误方向，另一方面又向党伸手要权，直至另立中央，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张国焘进行了规劝和争取工作，同他的分裂主义活动进行了反复的斗争。这时在张国焘所率左路军的朱德总司令，不顾身受种种限制和刁难，始终以大局为重，坚持原则，讲究斗争策略，尽最大可能说服和团结四方面军同志听从中央的北上方针。后来召开的延安会议在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时，采取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的反党严重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对张国焘也尽力给予团结和争取，并分配了工作。这次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体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

历史启示之四：红军在长征中表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深刻反映了党和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作风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顽强不屈的毅力，创造了诸如四渡赤水出奇兵、勇夺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战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红军的迷梦。而翻越变化无常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则集中显示了红军在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时所表现出的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是同崇高的理想信念相联系的。



《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制定和下达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后，中央军委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离不开下述条件：整个红军在大西北的集中和发展壮大；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巩固，并从秘密联系状态转为公开联合状态；扫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动势力，特别是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势力，建立红军和友军可靠战略后方；从宁夏和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打破日本割断中苏联系的企图；给蒋介石的“进剿”部队以有力打击，粉碎其“灭共”计划。在这些条件中，最关键的又是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打通苏联，红军才不致被限制在陕甘苏区这一仅有 40 万人口的“弹丸”之地，而能够放开手脚，跨黄河两岸发展，建立广阔的后方根据地，并保持便于机动回旋的战略退路，避免对日作战开始后陷于背腹受敌的不利境地。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不断取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藉以抵抗优势装备敌人的军事进攻，而这对缺乏武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一支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打通苏联，能极大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更加巩固红军与他们的联盟，活跃那些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力量，逼蒋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这些，就是当时的历史实际，是当时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战略企图，就是为了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完成从两个方向打通苏联的任务。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如芒在背。他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一直不安。这时他处理两广事件已经脱手，便赶紧调兵向西北急进，下令组织“通渭

会战”，并准备亲赴西安督战。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对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争取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残部”则予以收编。另一方面，强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逐步肢解，免留后患。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一、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10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二、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三、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四、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立）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五、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六、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11月10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七、11月10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规定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



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依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朱德、张国焘召集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传达中央的指示，明确规定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造船任务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负责。至此红四方面军西征的大幕开始拉开。

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渡黄河

严重的敌情和《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使红四方面军面临重大的考验。在优势敌人的围攻防堵面前，既要控制西兰通道在手，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以扇形运动防御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突击完成造船任务、选择渡河点，突破黄河天险，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将处于多面对敌，前后作战的艰难地位。一头失利，全局皆非，宁夏战役计划就有流产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深深感到，这是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

徐向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的企图是将红军压迫于渭水以北、黄河以东地区，聚而歼之，形势相当严重。四方面军两个拳头对敌。而部队又因连续行军作战，补给不足，减员较大，疲惫不堪；地形也不利，全是光山秃岭，不便大部队隐蔽和防御；黄河天险又障碍于前，要南阻敌攻、西渡黄河，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红军也具备若干有利条件：一是从各种情况和迹象判断，敌人尚未完全弄清红军会合的战略企图，若突然西渡黄河，进击宁南，出敌不意。二是向红军进攻的南敌主要是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部，他们虽属蒋之嫡系，但互存戒心，各保实力，联合作战时很难形成拳头，快速突进。红军争取渡河的机会是存在的。三是会宁会师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给了部队以有力鼓舞，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决心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完成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光荣使命。四是部队有强渡江河的经验，按现有技术力量，每天能造两三只木船；一方面军正帮助搜集木料、铁钉、工匠，渡河工具问题不难解决。五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挥，有一、二方面军的有力配合，还有东北军的暗地策应等，红军的作战不是孤立的。只要把任务向部队交代清楚，做好政治动员，恰当分配兵力，实现宁夏战役计划，有相当大的把握。

徐向前与陈昌浩确定了如下的具体部署：以三十军作为抢渡黄河的先头部队，立即开赴靖远附近，绝对秘密地隐蔽造船，选择渡河点，迅速完成渡河攻宁的一切工作；以四、五、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



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构筑工事，进行扇形运动防御，节节抗敌，尽量迟滞其前进时间；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为机动部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进，则以四、五军牵制敌之翼侧，以三十一军及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这一部署经军委批准后，红四方面军全军上下，层层发动，投入了迎击南敌、西渡黄河的紧张准备工作中。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国民党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军司令朱绍良颁布《剿匪计划纲要》，宣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徐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21日，敌总攻开始，次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剿灭共匪残余"，并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漫山遍野，密密层层，像一群群黄蚁，向红四方面军的前沿阵地华家岭、界石铺、马营、通渭、静宁一线冲击。西兰通道附近的宁静村庄和山岗，炮火连天，地动山摇。顶住南敌的进攻，是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先决条件。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和五军的战士们，平均每人仅有三五排子弹和两三枚马尾手榴弹，打退敌人的几次冲锋就消耗得差不多，最后只能同敌人肉搏。敌人一次次冲进红军的阵地，战士们一次次地用大刀、刺刀将敌人消灭，从敌人手里夺来武器、弹药，继续坚守。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在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鉴于敌人来势凶猛，多路突击，齐头并进，红军硬顶下去损失太大，徐向前遂下令四、五、三十一军边打边撤，逐步向会宁一带收缩，利用山丘扼守，尽力控制会宁至靖远的大道，寻机诱歼敌人。

这时，中央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会见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商讨宁夏战役部署。中央指出：三十军渡河以备足10只船为宜，原定20日渡河，是否推迟数日，依具体情况而定。2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分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

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于23日抵打拉池。彭德怀已先行到达。他根据中央的意图首先提出战役计划的要旨，朱德、张国焘表示完全同意。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当即命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跟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23日晚，李先念、程世才奉命率部队进入黄河岸边的丛林地带隐蔽集结，准备渡河。首先由程世才、熊厚发指挥二百六十三团的先遣连，从红咀

子渡口偷渡。

三十军的后续部队，一批批地渡过黄河。两岸的枪炮声、喊杀声、欢呼声划破沉寂的夜空。呈一线式配置的马家军河防阵地，一处突破，就像黄河决口似的，越扩越大，所谓的“突不破的防线”彻底崩塌。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在打拉池获悉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和徐向前、陈昌浩：“钳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之（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前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期间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地区和尽力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和扩大西兰大道以北广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目的。”具体要求：第一，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等一带地区要点，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和拦阻兰州方向北进之敌；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必要时协同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河东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的敌人。该掩护部队将来均必须渡河，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从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第二，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一带地区，准备渡河技术，从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或五佛寺渡河，并准备直取定远营。第三，二方面军接替一方面军之对南防御任务，控制海原、固原一线。

26 日凌晨，中央军委同意九军渡河。电称：“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据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九军继三十军跟进，五军担负警戒渡口和监视靖远守敌的任务。四军、三十一军继续阻击南敌。方面军总指挥部跟三十军、九军行动。

至 27 日拂晓，红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29 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部在河东作战，30 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当天，南线敌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控制靖远两岸船只及监视靖远守敌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一条山激战与《平（潘）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渡河后的我军，共21 800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一步，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10月27日，我前卫军三十军于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继而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将韩起禄第二旅一团人，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堡寨里。月底，九军亦进占一条山南的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马禄旅六百余人围在锁罕堡以北的堡寨里。五军驻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接着，三十军又一举攻克重要渡口五佛寺，消灭马鸿逵部一团人。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这时河东的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河东红军企图在海原、打拉池一线，诱敌深入，击敌一路，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尚未实现。10月30日，中央军委电示：“九军、三十军暂控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会见林育英后，来电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经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尚待通知。并指出河西部队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步青部；（2）河东海原战役的胜利；（3）弄清宁夏的地形、天候、自然条件。“我们估计5、9、33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冬衣、问明情况等准备工作，在胜利开展中去完成新任务。”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绝

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

11 月 3 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可留少部兵力扼守，便于机动。五日，朱、张电示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但这时，马步青、马步芳部，已向我军发起了疯狂反扑。

11 月 2 日，马步芳部由寺儿滩向我一条山阵地猛犯。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红三十军英勇抗击，将敌击退。3 日，敌又纠集三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向三十军阵地发起连续进攻。4 日，我打拉牌一线的九军，亦与敌一个骑兵旅及特务团、民团共五千余人，展开激战。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喊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子弹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击，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我军初次对付马家步骑兵的集团进攻，边打边摸索经验，从容应战。激战四天，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顿挫敌人的凶焰，与敌暂成对峙状态。我们的最大困难是少粮缺水，一条山那带产盐，水是咸的，越喝越渴。部队激战终日，找不到水喝，嘴唇干裂，喉咙生烟，实在难熬。

被围于锁罕堡附近的马禄旅六百余人，系马步青部。我们当时想利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马步青，孤立最反动的马步芳。经一再争取，被围的敌人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往凉州。我军遂网开一面，令其全部撤走。这件事多少也起了点作用。据说，不想受制于马步芳的马步青，为此曾亲临寺儿滩，想和红军秘密谈判，但因派出的代表被马步芳部击毙，未果。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6 日，我们制定了《平（番）



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这一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永泰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红凉山，攻取古浪；以5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永泰、红水前进，待三十军进据大靖、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部队出动的时间，预定在12、13号。上述情况和行动计划，我们向军委和红军总部作了报告。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

11 月 8 日，中央及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计划》。总的意图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三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分别从延长、延川地区和神木、府谷地区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继续逼蒋抗日，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则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但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徐向前、陈昌浩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11 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河西部队于 11 月 9 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第一纵队三十军和第三纵队五军居右翼，由一条山、吴家川向大靖前进；第二纵队九军和总部直属队居左翼，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徐向前、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王树声随九军行动。这时部队衣衫单薄褴褛，许多人赤脚穿着草鞋，武器弹药极端缺乏，在寒冷、饥渴、疲劳和风沙中同敌人拼搏，伤病员逐日增加。三十军进至大靖附近，守敌第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为争取时间，李先念率军绕道而行，包围了土门子，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投降。与此同时，左翼红九军亦进至干柴洼地区。11 日晨 7 时许，敌骑五师两个旅、100 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干柴洼猛扑。激战到晚，九军将敌击溃，主力进至横梁山地区，继续打击追堵之敌。

在大靖附近，徐向前、陈昌浩收到中央军委 11 月 11 日的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来电还征求意见：西路军单独



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陈昌浩召开了军政委员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徐向前在会上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新疆的必要性：一、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二、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三、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四、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

讨论中，大家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一致认为，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会议决定西进。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大靖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准备接通新疆、蒙古。决心在甘州、凉州、肃州、永昌、民勤地区创造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永昌。当即将这一意见报告了中央。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万，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15日，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前进。并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得到中央的明确电复，徐向前立即将部署作了调整，命令部队迅速西插。13日，9军进占古浪城，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当时，马步青就在凉州城内，兵力空虚，见西路军大队人马绕城行进，吓得连夜组织民团、商团登城点起无数的灯笼，虚张声势。后接到西路军派人送去的函件，知是借路打通抗日路线，只要不作对抗和追击，红军便无夺取凉州之意，才松了一口气，终日紧闭城门，作壁上观。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为全军开辟了西进的通道。随后，徐向前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40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此时，出人意料，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1/3，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古浪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南北两面临山，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城西是一道平川，直通凉州。王树声、孙玉清、陈海松根据这里的地形，以红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红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两面山头的制高点。16日拂晓，马元海指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向九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九军仓促应战，被

优势敌人夺去了城外的制高点，压进城内防守。该城城垣曾因地震毁坏，缺口甚多，极不利于坚守。经三昼夜血战，双方各损伤2 000余人，九军被迫突围。徐向前急令三十军派出部队接应。

古浪战斗的失利，使九军减员增至1/3，排以上干部伤亡极大。军参谋长陈伯稺、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部队元气严重挫伤。



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　在狭窄地带一线摆开

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11 月 19 日，中央电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 21 日，总指挥部移住永昌县城。22 日，我们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中间是条狭长的"弄堂"。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居民回汉杂处，对党和红军的主张多不了解。加之，马家军和民团，多系本乡本土的人员组成，红军是"异乡客"，短时间内很难打破民族隔阂与宗教观念，同当地群众融成一片。这带又是马步青的中心地盘，临近西宁，是"二马"必然拼死与我争夺的战略要地。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说，都不容我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

11 月 21 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行前，有情报说河东的毛炳文部已奉令开赴河西，增援"二马"，对付西路军。徐向前判断，"二马"是地方军阀，最怕蒋介石的部队借"剿共"的名义侵夺其地盘，他们为示强而拒毛，必将倾力寻西路军决战。根据这带的地形、给养、民情等条件，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迫不得已时应坚决放弃永昌、凉州，向敌力空虚的甘西地区进军，按原定的计划行事。这时，李先念向总指挥部报告，马家军以五个团的兵力向四十里铺的三十军阵地发起

猛攻，红军因子弹缺乏，全靠大刀、长矛拼杀，与敌激战3日，歼敌2 400余人，仍未能阻止敌人的攻势，坚持下去困难很大。徐向前同意三十军西撤一步，至永昌东南的六坝、八坝一带继续阻敌。另据五军军长董振堂报告，山丹地区也有敌人的骑兵活动。西路军不进不退，面临强敌前后夹击、分割包围的危险。

争取主动，摆脱困境，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行动方针。他指出：第一，马敌现虽伤亡5 000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第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即无生还。第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少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第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的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9军现有4 600人，步枪1 800支，每枪平均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 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 000人，步枪2 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二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第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5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担任城墙守备的任务，敌马彪部有3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央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陈昌浩也在电文上签字同意。

25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从11月22日至12月上旬，西路军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战斗。

一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22日，敌五个团向40里铺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堡寨，奋勇抗击。血战三天，最后出击，在野外与敌展开大规模白刃战，终于将敌击溃。战斗中我军共杀伤敌2 4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达700人以上。我伤亡500余人，二百六十七团一个连，全部拼光。



二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十军在40里铺战斗后撤至八坝，又遭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用山炮、迫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寨、房舍摧毁，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八百余具。

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12月初，敌向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我三十军八十八师在该地与敌激战一昼夜。后八十九师前往驰援，将敌击退，共毙伤敌600余人。

四是永昌之战。水磨关战斗后，敌接着调集约五个旅、四个民团的兵力，蜂拥而至永昌城外，进行围攻。我三十军一部及总部直属队据城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猛攻，杀伤敌两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五是山丹之战。与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以步、骑兵各一个旅和反动民团两个团，向山丹进攻。当敌刚刚逼近城郊，红五军即乘夜出击，给进入南关的马扑旅旅部及所属一个团以严重打击。次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以主力向东北方向的民团出击，将敌击溃。但因追击过远，途中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一场，损失数百人。此后，五军总结教训，固守山丹，终使马敌夺取该城的企图，未能得逞。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六千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西安事变爆发后　西路军奉命东进

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情势，向军委提出了八条紧急动议，主要内容是：

党必须用全力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实现全民武装抗日，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迅速与我作战；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蒙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质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武装的指挥；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促进张学良、杨虎诚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不久，徐向前、陈昌浩即接到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兵力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明确规定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为争取苏联的支援，巩固西安战略总后方，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于是，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移。

“西安事变”的风暴，也把河西马家军抛到了尴尬境地。宁夏的马鸿逵是有名的“滑马”，蒋介石被扣，吉凶未卜，他左不敢公开响应张、杨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右不敢配合何应钦的“讨伐”军出兵进攻红军和东北军，见人就痛哭流涕，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马步芳素以“野马”著称，与蒋介石早就有默契，他对张、杨的爱国行为暴跳如雷，拒不接受西路军提出的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不同驻守兰州的东北军于



学忠部缓和关系，而是一意孤行，与西路军和抗日力量为敌到底。马步青军权旁落，受制于马步芳，本来早已心怀不满，蒋介石被扣押后，见西路军来信主张谈判，共同抗日，内心不无波动，但慑于马步芳的威势，迟迟不敢表态。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东北军的主力亦向西安集中，准备会战。张学良考虑，胡宗南、毛炳文部有乘东北军主力向西安调动的机会，袭击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的可能，且河西四马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缺乏保证，因而向共产党建议，由陕甘红军出动打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兵力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此，中共中央曾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于学忠处补充子弹、被服，而后东渡黄河，策应河东。

西路军已根据军委主席团的先前电令，作了西进的部署和准备。这时又要考虑东进，军政委员会展开了争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按原计划西进，取得苏联接济后，再向东打。陈昌浩主张一部兵力东进，到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徐向前认为，目前马敌的主力正集中在东边，而西面则是敌人防堵比较薄弱的环节，西进最为有利。如果东进，势必与优势敌人决战，根据西路军目前的实力，很难有把握取胜。要战胜马敌，须电请中央由兰州友军派出一部兵力西进古浪一带接应。会议最后决定，将上述意见报请军委主席团酌定，同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24 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决定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5 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向前连夜调动队伍，准备东进击敌。

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西进

正当军委对西路军的行进方向尚在考虑和同友军协商之际，西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经周恩来努力，12 月 24 日，蒋介石答应“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接受张、杨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在他回南京后即派代表与中共直接谈判。中共中央考虑解决红军的驻地问题，是今后两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长远观点看，红军亟须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利于同苏联接通的区域，以便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完成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这个区域，自然是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和宁夏地带最为理想。留西路军控制甘西，至为必要，可为将来谈判驻地问题创造条件。25 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抵洛阳。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撤离永凉地带，继续西进。12 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1937 年 1 月上旬，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今蓼泉），就粮休整。五军主力驻高台，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临泽，九军驻沙和堡（今临泽），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三十军是当时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摆在东边负责掩护全军，阻击追敌。徐向前、陈昌浩计划部队稍作休整后，便继续西进取肃州、安西，力争短期内取得苏联的接济，恢复部队的元气。



西路军又奉命在临高建立根据地

但是，这时河东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和“审判”张学良，同时调集40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内战乌云，再次出现在陕甘上空。中共中央一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面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部署，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勿西进，留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7日、8日又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陈昌浩建议调四军、三十一军西进来援，与西路军共同夹击马步青和马步芳，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军委因四军、三十一军正在三原、淳化一线，策应友军，无法抽调，故电令西路军加强团结，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克服一切困难，独立完成任务。

徐向前、陈昌浩不了解河东的战略部署，对军委给予西路军的任务一再变动，提出了意见。张国焘即以个人名义发电给西路军领导人，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甚至批评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要求他们“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1月12日，敌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红九军、三十军，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入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董振堂指挥5军与高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他们把木箱、木柜等抬上城墙，装上土再浇水冻结，使城墙加宽加高，以利防守。由于该军原来只配有一部电台，置于临泽地区五军政委黄超处，故高台被围后，无法同外界电讯联系，取得兄弟部队的救援。为保住高台这个西路军的前进阵地，董振堂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无惧色。他号召5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刻，他挥舞着大刀

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引敌入城。五军被迫仓促应战，逐街逐屋，与敌争夺。经九小时血战，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 000多人壮烈牺牲，高台县城遂于24日晨沦入敌手。这时，西路军总部才从破译敌人的电讯中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徐向前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途中，遭敌优势骑兵的截击，血战一场后，红军骑兵师大部伤亡，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均献出了生命。

噩耗传来，徐向前、陈昌浩和西路军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极度悲愤之中。徐向前深深感到，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又像野火般地蔓延着。他面色阴沉，用异常坚定、严厉的口气通知各军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不得轻举妄动。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坚决执行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在临泽、高台地区坚持下去。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军部阵地，以另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总经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围攻，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激战三天后，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会同城外的五军一部，抵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亦撤离沙和堡。西路军的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屯庄里。

徐向前将兵力向倪家营子集中，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东南，分上、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是个人粮较丰的大自然村。南北长约16里，东西宽约3里~4里，靠南的屯庄与祁连山毗连。每年春去夏来，祁连山上的积雪消融，变成清澈明净的溪水流淌下来，滋润着这里的草木、庄稼、土地。这也正是家家户户积蓄用水的大好时节。每3家~5家人合有一个"涝池子"，直径20多米，深度2米左右，供人们积水终年食用。粮食以小米、糜子、红芋为主，因水源较充分，产量较高。每个屯庄的四周都用厚厚的黄土砌成高达2米~3米以上的围墙，方方正正，防御土匪、盗贼、野兽的袭击。大户人家的屯庄的院落，围墙修得更



加坚固、厚实，四角并筑有高高的望楼和碉堡，能看出好几里地远。屯庄多以主要人家的姓氏命名，如李家屯、赵家屯、雷家屯等。这些距离不等、星罗棋布的屯庄，使外地人乍一进来，就像掉进了不辨东西南北的八卦阵一样。西路军刚到时，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蔽，大都跑进山里“避难”，十屋九空，景象凄凉。经过一段时间，老乡们听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杀不烧不抢，才三五成群，陆续从深山老林里回来。西路军把各屯庄的群众组织起来，斗恶霸，分粮食，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地区武装。

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1 月 21 日，徐向前、陈昌浩决定率部东返。致电军委：“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达到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23 日，西路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全部到达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进至龙首堡，拟稍加休整，继续东进。当时除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袭外，最难办的是大批伤病员和妇女、小孩无法就地安置，都是南方人，留下会被敌人识破，遭杀害。随军行动，又影响部队的机动力。24 日徐、陈电告军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军委当即电复西路军：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28 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为便利作战计划，伤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战斗来完成东进”。同时，中央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家军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可停止东进。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大，兵力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军政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处境和行动方针，除陈昌浩外，一致支持徐向前的突围自救意见。最后，陈昌浩才勉强作出了突围的决定。

西路军突围进至威狄堡地区，又受敌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所谓“右倾逃跑”，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这就注定了它最后失败的命运。

许多指战员对于一会儿东开，一会儿西进，迷惑不解。徐向前判断：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敌人势必迅速合围和猛攻，以求短期内歼灭西路军。他号召部队作最困难的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粮食、用水，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在绝境中求胜利。同时，和陈昌浩数电党中央，请求火速派部队西进来援。

敌人的围攻又开始了。他们依仗众多的兵力，对西路军层层包围，多路突击。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已残破不堪，西路军指战员依仗断垣残壁坚守，伤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险恶。敌人的进攻，不仅限于前沿屯庄，而且往往直插纵深，对红军心脏地区和后方的屯庄，进行包围和突袭。廖家屯仍是徐向前和总指挥部的所在地，也屡遭敌人围攻，在最危急的时刻，徐向前上到房顶，指挥战斗。他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一房顶，指挥部队打击冲进屯庄的敌人。那矫健的身影，沉着威严的气概，激奋着指战员们英勇杀敌。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亦不可能。”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进攻，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经过七昼夜血战，陈昌浩眼看部队损伤惨重，待援又无希望，这才和徐向前一同下决心，下令再次突围，向祁连山转移。

但这时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已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3 月 27 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人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3 月 5 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12 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黄昏时分，徐向前带着西路军仅剩的 3 000 多人，边打边撤，13 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经一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 265 团和 267 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纷纷越过他的指挥位置，向祁连山上败走。

这时，陈昌浩正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确定的问题是：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西路军在此与十倍于我的敌马步芳部反复鏖战，血战四个多月，终因有

耗无补，归于失败。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中央分局与留守部队逐步转向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使本已危若累卵的中央苏区腹地，形势更加严峻。然而，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和留守的红军指战员，临危受命，义无反顾。1934 年 10 月 13 日，项英在瑞金县梅坑之马道口召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门留下来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对外则保密）。这些负责人大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34 年 10 月下旬，敌北路军得悉中央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后，即在其东路军协同下，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突进，于 10 月 26 日占领宁都县城。11 月 1 日敌东路军攻陷长汀县城。中央苏区斗争形势每况愈下。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 11 月 3 日致电项英，指示新的斗争方针："1. 一般的应放弃从正面的防御，而应利用敌人前进的迅速和筑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游击战争；2. 目前已无使用 24 师抗击李纵队之必要，而是灵活使用 24 师行动的方式主要的应是游击战争的方式，不过是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行动；3. 江西、闽赣和福建军区应在敌人复杂的封锁线外行动，江西军区在石城、宁都、兴国以北行动，闽赣军区在汀州东北地域，福建军区在汀州东南及西南地域行动；4. 现在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应由梅坑转移到宽田地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四师从东线撤至瑞金县境，并改变正面防御的作战方式，主要采取择机伏击、袭击等战术打击敌人。与此同时，中央分局等领导机关由瑞金梅坑迁移到雩都县宽田区的龙泉村和石含村（随后复迁黄龙井塘村），并确定以宽田为中心，坚守中革军委指定的瑞会雩宁边界的"三角地区"。为便于领导，中央分局还决定在驻地附近地区（包括瑞金、西江两县的部分地区）设立新的县治——瑞西县，隶属于中央分局。

国民党军乘中央苏区机关部队后撤之机，迅速推进，11 月 10 日占领红

都瑞金，17 日占领雩都县城，23 日占领会昌县城，在这之前，闽西地区的宁化、清流、归化也相继落入敌手。至此，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均告失陷，剩下的只是远离城镇的山区。

11 月中旬，蒋介石侦悉中央红军主力拟前往湘鄂西与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后，立即调集重兵对主力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同时严令其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加紧“清剿”。声言“竭泽而渔”、“铲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一时间阴霾密布，狼烟四起，疯狂的反革命风暴席卷中央苏区。这时，原先“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八个纵队数十万人，除薛岳、周浑元等纵队被抽调去追击主力红军外，大部分仍留下，继续“围剿”中央苏区。他们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尚存区域进逼。采取集中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配以堡垒封锁的办法，将中央苏区分割成若干小块，最后分区逐个“剿灭之”。在原中央苏区范围内，除国民党正规军外，还有力数众多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恶棍结成的“靖卫团”、“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反动武装。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配合国民党军进行“清剿”；以凶残的手段镇压苏区军民。用活埋、挖心、肢解、“点天灯”、“凌迟处死”等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施行阶级报复。同时采取欺骗伎俩，诱迫一些意志薄弱者自首、“自新”，企图从政治上瓦解革命力量。对上述严峻的局势，苏区一些领导人虽曾有所预料，并设想尽早转变斗争方式，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然而让中央苏区军民，一朝放弃曾引以为荣的“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在心理上是难于承受的。特别是中央分局为中共中央赋予的“保卫苏区”的任务所约束，加之分局对当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清醒地估计到当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绝不会根本放弃对苏区的进攻。同时过于乐观地估计红军主力远征湘西，将开创新局面，如中共中央 10 月 8 日“训令”所指出的那样，将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大部分吸引到湖南去，有利于中央苏区军民战胜敌人的进攻。据此，分局寄希望于配合主力红军回师反攻，恢复中央苏区，而没有适时地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当时分局领导还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城市和大的圩场，红军和游击队最低限度可以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基于这种估计，为了便于分散的各块苏区独立作战，分局决定积极建立和健全各地军分区和党的特委组织，加强各个作战分区的主力——独立团。因此，实际上忽略了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建设。在军事斗争和群众



斗争方式上，基本上沿袭原苏区的方式。虽然，放弃了同敌人死打硬拼的阵地战，但仍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把留下的大批干部及红二十四师等基干部队，集中在“三角地区”及其周围，作消极防御。而没有在这一带以进攻手段，消灭这一地区的地主武装，争取群众，造成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基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瑞金梅坑迁到雩都宽田地区时，形势已异常困迫。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和活动仍一如既往。中央分局还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等“中心宣传口号”。为此，不惜削弱地方游击队，组建独立团。并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编入主力部队，充实红二十四师。此外，还打算办军事学校、兵工厂等。一切依旧的形式，以图东山再起，重建一个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作为主观愿望，自然是好的，它反映了以项英为代表的革命者坚定的信念与雄心壮志。然而，这个构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因而是行不通的。

1934 年 12 月中旬，中央苏区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在北线和东线，敌从宁都到瑞金、会昌的碉堡封锁线已基本形成。严酷的现实，使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意识到再不能照老办法坚持下去了。为此，项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请求中央指示新的行动方针。在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仍为“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加之长征途中遭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自顾不暇，故迟迟未予复示。

为了摆脱被动，项英于 1934 年 12 月中下旬，召集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陈毅等人提出应迅速转变指导思想，采取新的行动方针，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清剿”的设想。经研究，分局决定放弃依赖主力胜利回师反攻的主意，提出了“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始注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但是由于受到认识的局限，特别是尚未接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未能彻底放弃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这次行动方针的转变，只是初步的而不是彻底的战略转变。为了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和寻机歼灭运动之敌，红二十四师和几个基干独立团，不断主动出击。但由于部队减员过多，新补充的兵员又多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伤病员，有的伤病尚未痊愈，被动员勉强出院后编入战斗部队，心理尚未调整过来，加之形势急剧恶化，影响士气，部队战斗力大为下降。因此，战斗每每失利。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洋陂战斗和牛岭战斗。再次证明，在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后，“大兵团作战”和“保卫苏区”的指导方针是行不通的。急剧恶化的局势已把

苏区军民推到了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中央分局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并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新的党中央以新的姿态投入领导工作。当接到项英和中央分局接连发来的紧急请示电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即行讨论，作出了“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于2月5日用“万万火急”电报，下达项英和中央分局：

“（1）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2）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3）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这是中共中央自突围转移后，就有关战略方针问题，给中央分局的一个最重要、最明确的电报指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分局立即决定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着手缩小机关，计划分散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党中央在13日的电报中，对中央分局的任务、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等重大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指示电首先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苏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认识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应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国民党无法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百万群众，将使蒋介石许多部队受到牵制。”关于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及具体部署问题，中央指示电明确指出：“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于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枪弹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



益而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决”。

中央指示电，还要求中央分局对中区周边地区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人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将给中区的斗争以极大的帮助。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但不应以庞大部队远出而应以相当部队依傍着中区配合发展。依野战军及红十军（团）的经验，如你们以大部队远出，是没有胜利保障的。”中央指示电，特别强调“彻底改变斗争方式”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指出“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突击运动及勉强使用纸币目前都不适宜了”。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方式，党中央要求中央分局给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极大的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能独立存在。因此，“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作为领导中枢的中央分局“手里应有一个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机关亦然”。此外，中共中央还就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和白区工作等，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中央分局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并设法建立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

中央分局遵照党中央指示，立即召集会议，研究落实措施。会议对中央苏区部队和党政机关工作的转移问题作了初步安排。随后，项英于2月19日和21日先后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和朱、周、张（闻天），报告中央分局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打算：部署部队主要分布于赣南与闽赣、赣粤边界的龙岩、上杭、武平、寻邬、安远、蕉岭等县，分局主要领导人率队辗转活动于赣南、闽西。

2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和中央分局，就分局执行党中央指示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其大意是：1. 深入思想动员，将行动任务与形势，向广大指战员解释清楚，并尽可能给部队以休整时间；2. 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均应取之于活动地区；3. 每一个部队不要拥挤很多的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告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博古、华夫（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及博古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书记处要求中央军区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并强调指出：“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这一电报指示，使中央分局领导明确了过去的一些原则是非，进一步增强了实现战略转变和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



项英陈毅领导艰苦斗争

1935年3月上旬末，中央苏区的各路突围队伍已全部离开雩南禾丰地区。这时原拟留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所率部队，承受敌人的压力越发加重，实在难于再坚持下去了。于是，项英、陈毅和贺昌决定率领随分局行动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穿越敌人会昌封锁线，向闽西长汀地区突围转移。

在地下党安排下，项、陈等夜行晓宿，几经辗转，于3月底胜利到达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蔡会文、陈丕显等也率领赣南军区突围的队伍前来会合。几路人马连同当地游击队及主力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伤病员合在一起，共约1 400余人，在项英、陈毅统一领导下，在赣粤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由油山转到北山后，在大庚县的长岭村召开了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听取了项英作的形势报告和陈毅作的根据新的形势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发言，批评了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出现的盲目乐观和悲观失望两种情绪。与会者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最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面临的处境，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同时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在赣粤边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并使整个工作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在指导思想上，以保存有生力量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游击主义，防止死打硬拼和消极隐蔽倾向。在斗争策略上，要求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学会在隐蔽条件下进行武装斗争。至此，中央分局最终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同时也标志着中央苏区的终结。在此前后，原中央苏区的另两个地区——闽赣边（汀瑞边）和闽西党组织，也实现了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战略转变，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开展斗争，在国民党军绝对优

势兵力的“围剿”“清剿”下，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状态，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后来即分别活动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八省范围内，逐步形成15支独立作战的红军和游击队。即：项英、陈毅和李乐天等领导，依托油山山区，活动在大庾、南雄、龙南等地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活动在龙岩、上杭、南靖等地的闽西红军第八、第九团和游击队；钟得胜、彭胜标等领导，依托大柏地山区，活动在瑞金、长汀、会昌等地的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关英、唐在刚等领导，依托鄣公山区，活动在德兴、婺源、浮梁等地的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粟裕、刘英等领导，活动在江山、衢州、温州等地的浙南红军挺进师；黄道等领导，依托武夷山区，活动在崇安、建瓯、政和等地的闽北红军独立师和游击队；叶飞等领导，依托太佬山区，活动在古田、福安、庆元等地的闽东红军独立师；谭余保等领导，依托武功山区，活动在永新、萍乡、茶陵等地的湘赣边红军独立团；彭林昌、蔡会文、周里等领导，活动在桂东、宜章、安仁等地的湘南红军游击队；高敬亭等领导，依托大别山区，活动在潜山、黄安、商城等地的鄂豫皖边红军第二十八军；张星江、王国华、周骏鸣等领导，依托天目山区，活动在确山、信阳、桐柏等地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傅秋涛、严图阁等领导，依托幕阜山区，活动在崇阳、修水、通城等地的湘鄂赣边红军第十六师；黄会聪等领导，活动在云霄、漳浦、诏安等的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和游击队；王于洁、刘突军等领导，活动在福清、莆田、仙游等地的闽中红军和游击队。以及冯白驹等领导，依托母瑞山区，活动在海南岛琼山、澄迈、崖县等地的琼崖红军游击队。

各地游击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以保存自己。在这个阶段，敌人首先集中力量摧毁地方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建立白色恐怖统治。然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围剿”、“清剿”游击队，编制保甲，实行连坐法，并从内部对游击队进行分化瓦解。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以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品等方法，企图困死游击队。由于各游击区的敌我情况有所不同，所以有的损失甚大，仅保存数量不大的骨干，有的却不仅巩固了部队，而且还有所发展。



游击勇士终成抗日先锋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在北方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之心不死，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破产后，又采取竭力削弱共产党的方针，妄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剿灭”南方红军击队。于地群众发布格杀令，声言“通匪者杀，窝匪者杀，见匪不报者杀，替匪送粮带路者杀，替匪宣传、煽动者杀，当匪者杀全家?”同时派遣叛徒、特务潜入游击根据地刺探情报，造谣惑众，挑拨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以图置红军游击队于死地。

在这个阶段，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和国民党推行的“北和南剿”作斗争，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的“清剿”，一方面又以民族利益为重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和平谈判。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与各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陆续停止对南方各游击区的进攻，胜利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后未，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为长江南北抗击日军侵略的主力。毛泽东高度评价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认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①。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393 页。

日本策划侵华阴谋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早在清朝末年，它就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还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并且组建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

为了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日本政府于1927年的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以及陆海军军部要员、殖民地长官和内阁各省大臣等。“东方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的“满蒙政策”，商讨如何阻止中国的统一，加快推进“大陆政策”的具体策略和步骤，维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会议确定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侵华总方针，分析了中国的形势，表示支持蒋介石、汪精卫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会议主张必要时派兵镇压中国革命势力，把东北三省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会议以首相田中义一的总结报告《对华政策纲领》作为结论。《纲领》明确的提出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侵华政策，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纲领》中充满了侵略、分裂、干涉中国的内容。指出，“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日本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①。于是，日本当局制造了旨在把中国东北和内



蒙古地区分离出去的“满蒙特殊论”，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理论根据。

会后，田中义一根据《纲领》的精神，商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并拟成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7月25日呈奏日本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地提出了实现日本“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奏折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奏折还明确提出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②]奏折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田中奏折》勾画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总蓝图。

为了贯彻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方针，同年8月日本又在大连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大连会议由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等人参加。会议要求扩大日本对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之权利；同时确定，如中国在东北三省自办铁路，凡与日本利益有冲突者，应予干涉，不许修建。

从明治维新到东方会议，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不断发展，日趋完备。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则把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增强了它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侵华政策的推行，导致了东北三省的沦陷。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军事占领、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政治统治，使全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险境，对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

这一时期的大陆政策的制定与日本当时复杂的国内情况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灾害冲击，经济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使得日本不得不加速对满蒙的侵略以转移国内视线，掠夺物资，缓和矛盾。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1级强烈地震。地震灾区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

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关东大地震将东京夷为平地，经济损失惨重、霍乱流行。这次强震是在战后经济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发生的，使得本来已经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20世纪20年代，日本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对近代天皇统治产生了巨大冲击，天皇制政权开始向帝国主义法西斯专政转变。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义一是一个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

20世纪前半叶是日本经济危机频发的历史阶段。1920年春，战后经济危机爆发。这次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银行实行救济性再贴现的灾区支票，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成为1927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这次金融危机使整个日本银行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又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机的深渊，使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更加急于变东北和内蒙古为其殖民地，并以此为跳板，南下侵占全中国，进而征服亚洲大陆，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摆脱复杂的困境。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加紧进行武装侵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部署。在加速准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中，寻衅闹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挑衅性质的事件，妄图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寻找借口，挑起战端。蓄意策划了济南惨案、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扩张行动。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制造了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济南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以此为前奏，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严重罪行。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对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人住宅、教会进行了烧杀抢劫，驻华日本官员遭到枪击，在领事馆避难的日侨被驱逐。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出兵山东，占领济南。1928年4月，亲英美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分编四个集团军，继续“北伐”，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于是，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田中内阁派遣第六师团5 000人在



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表面上要"保护帝国臣民"，实质上是命令日军对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实行军事占领。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军驻天津三个步兵中队于4月20日侵入济南，还公然在济南城里筑起了街垒。南京政府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之后，日军第六师团陆续在青岛登陆，第十一旅团开抵济南商埠，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盘踞济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宗昌弃城北逃。当北伐军开进济南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日本军国主义按照预谋向国民党北伐军驻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北伐军7 000余人缴械。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们寻衅闹事，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寇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仅在5月3日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1 000人以上。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践踏国际法准则，残杀了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及16名外交人员。日军于5月3日深夜包围并强行搜查了山东交涉署，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用日语表示抗议："我们是外交官，这里是非战斗单位，不许搜查。"日军却毫不理睬，将蔡公时捆绑起来，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割去。蔡公时坚持民族气节，怒斥日军暴行："日本人对我如同古代奴隶社会对待俘虏一样"，"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军大怒，又将他的舌头、眼睛挖去，并对其他人也百般摧残。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预谋和策划的，企图通过侵略活动达到三个目的：第一，阻止蒋介石军队北伐，反对中国统一，以便获取更大的权益；第二激人成变，挑起战争，实施对中国的军事占领；第三，围魏救赵，保住满蒙，次第实现"大陆政策"。济南惨案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占领和征服满蒙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为了实现大陆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又陆续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歪曲事实真相，借机煽动挑拨汉朝民族关系，从而策划导演的反华排华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奉行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以此作为蓄谋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一次预演，为其发动战争，制造了舆论准备。万宝山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驻长春的日本领事田代重德唆使朝鲜人擅自在无居住权的土地上毁坏中国农民良田、修建水渠、

开垦土地。

1931 年 5 月，汉奸郝永德以“专农稻田公司”经理的名义非法租用万宝山村附近的 500 垧土地，为期 10 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李升熏、李造和等人耕种。他们率领 200 多朝鲜族农民，未取得当地中国农民同意竟擅自开凿一条引伊通河水渠坝工程，占去大片良田，阻塞水上航运，种下引发洪水的隐患，引起中国农民强烈反对。受害农民呈请当地政府制止。长春政府未批准该工程，并且派人前往万宝山劝告停工，双方冲突甚烈。数百名受害的中国农民自发填平引水渠。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声称保护当地朝人，公然向当地农民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并且逮捕十余人。在日警的武力支持下，朝鲜族农民继续开渠并于 11 日正式通水 。

日本帝国主义以万宝山事件为契机，利用日本和朝鲜的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为日本侵略制造舆论，指使特务在朝鲜各地大肆煽动排华。朝鲜人采取报复行为，各地出现排华暴行。从仁川扩展到汉城、元山、新义、波及到平壤，许多华侨的房屋、商店被捣毁，华人惨遭杀害。

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访坐镇沈阳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保障万宝山朝鲜人生命财产安全；二、赔偿万宝山事件损失；三、要求朝鲜人在吉林的自由居住权；四、华方承认万宝山水田自来年种稻，日方官宪即退出现场。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1931 年 6 月 26 日，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了中村事件。中村事件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导火索。

1931 年 6 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洮南返回途中，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的苏鄂公爷府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



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②]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

然而，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特务活动不谈，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内阁会议也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日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以武力威胁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中村事件公开后，日本首先利用外交手腕，向中国方面蛮横地施加压力。日本驻沈阳领事向中国东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国方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罚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二，以中村事件为契机，日本调整了国内政策，建立朝野一致的对华侵略体系。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一致要求 陆军“武力政府满蒙”；第三，煽动国内民众复仇情绪，欺骗日本国民，为战争动员做准备。武力侵华，解决满蒙的叫嚷甚嚣尘上，把侵华战争的准备推进到最后阶段。

日本挑起的事端，旨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口实，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具体步骤。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扩张，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权益，使日本成为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在华权益的扩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它已不满足于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拥有中国，加紧了武装侵略的步伐，企图一举灭亡中国，使中国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注释：

①《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139～140页。

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77～378页。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28 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军阀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深感不安，6 月 1 日，芳泽曾密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但是遭到张作霖拒绝。

6 月 3 日凌晨 1 时，张作霖乘火车专列离开北京，4 日晨 5 时 30 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作霖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作霖因伤势严重，于上午 10 时去世，享年 55 岁。但这个消息被严密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未公布死讯。把张作霖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连夜返返回沈阳，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此前，日本关东军所曾策划并组织过暗杀张作霖。当时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关东军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 5 月 31 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

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相当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关东军希望借皇姑屯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然而此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实行的“东北易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和平统一。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矛盾重重，东北易帜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近半年左右时间的艰苦斗争。其中有日本势力对易帜的阻挠，也有国奉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双方从对峙到理解、妥协，直至易帜彻底实现，始终不变的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奉系集团贯彻和平统一的决心。所谓易帜，就是废除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张学良毅然易帜，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1928 年 4 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问题。尤其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后，张学良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

7 月 1 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转致敬意。7 月 10 日，张学良派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等四人到北平（此时北京已易名北平），即对新闻界声明：张学良早求统一。皇姑屯之变，益增爱国之热度，而赞成统一志愿，尤觉须急速实现。兹既举国一致易旗，东省自当不必坚持异议。不过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同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张学良在沈阳接见国民政府的代表刘光、张国礼时表示，易帜与实行三民主义毫无疑问。

日本担心东北三省易帜后，英美的侵略势力进入东北，影响他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对东北易帜进行了蛮横干涉。1928 年 7 月 16 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 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提出：第一，国民政府内部尚未统一，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圈内，对于东三省治安的维持上，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第二，张总司令前曾通知国民政府，希望先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但现在不经过此项手续，纵令只在形式上与国民政府合流，也会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不但秩序因此紊乱，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利的方针，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第三，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的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日本关东司令官村冈也对张学良发出警告。之后日本田中内阁又指派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葬礼的名义到沈阳。他连续四次与张学良密谈并提出威胁：国民政府内部有纠纷，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假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东三省的军政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携手。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帜，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有决心的，希望总司令能够了解，同时能下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处，日本政府愿全力相助。林权助也指出：事实上，日本政府已有决心，在东三省采取自由行动，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希望贵总司令速作决定。张学良顶住了压力，愤慨异常，他对手下人表示：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我也甘心。但他当时为了顾全大局，稳健行事，不给日本制造侵犯东北的借口，决定推迟易帜。随后，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了与林权助谈话以及日本内阁阻止东北易帜情形，并提出：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共愤，唯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是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延期三个月。

10 月 8 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此致电张学良，电文中指出：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1928 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可是，当时日本压力尚未减



轻，而东北内部亦不稳定，张学良易帜有心无力。张学良复电蒋介石：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现计算约定日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以三省同日实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12 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学良：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绝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13 日，张学良复电：承示亟速恢复交通与改悬国旗各事，莫不深表赞同。惜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总期实践前约，昭示国人。东三省易帜虽然延期，但东北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仍采取一致行动，进行易帜的舆论宣传，为实现统一做好准备。11 月中旬，张学良致驻北平代表赵志白亲笔信，其要旨为：第一，东北内部日见坚固，唯外交仍棘手，请将特殊情形介绍于国人，以免误会；第二，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誓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第三，绝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

12 月 14 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 1929 年 1 月 1 日元旦实行易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蒋介石电示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24 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 29 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电文还说明了旗式的尺寸。26 日，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各县知事，通知 29 日易帜一事，强调要绝对保密。

东北易帜大势所趋。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奉天省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国民政府也致电张学良对其易帜通电表示嘉慰，并谓：完成统一，捍卫边疆，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在奉天省府大礼堂里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张学

良于宣誓后发表演说，他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方（指日本）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结束，东北军诞生。从此，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在东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国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开始侵华的序幕。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1931 年 9 月 18 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当晚 22 时 20 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 7.5 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800 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爆炸同时，驻守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 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18 日 22 时 20 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



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二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营和第二师的第二十九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二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二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二十九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 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

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九一八事变是中日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日本实施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和东亚大陆，以与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计划的开始，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对中国来说，它是一次空前的危及民族生存的国难。它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社会，警醒了中华名族，催促它在与异族侵略的血战中走向解放和新生。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蒋介石积极"剿共"
坐视东北三省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主张应以"安内"为主，继续执行"剿共"政策，坐视东北三省沦陷。反映了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急剧变动时期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基本认识。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蒋介石于 1931 年 7 月 23 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旨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第二，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第三，不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完成统一，则不能攘外。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蒋介石首次提出了"安内攘外"的思想，其中心内容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侵略的形势下，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在四个月内即告沦陷。

在"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军队上，为了不至于和日本人闹僵，使自己手忙脚乱分身乏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于 8 月 16 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 16.5 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8 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指出：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

拖延方针。1931 年 9 月 6 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又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车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参谋长荣臻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神谷仙次郎在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 1.2 万人，而关东军用 650 人即以 1/20 的兵力，战斗 7 小时，就把它攻占了”。

沈阳城由内外城组成。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军政机关位于内城。外城西侧与商埠地以南是“满铁附属地”。在日军独立守备队进犯北大营的同时，其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对沈阳城也采取了进攻行动。9 月 19 日零时过后，第二十九联队从附属地进入商阜地，此时，商埠地的中国军警已经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因此，当日军进犯时大多逃避，只有南市场第一、二警察分局略作抵抗。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亦以机枪扫射。2 时许，南北市场，外城大、小西边门均被日军占领。3 时许，第二大队一部登上内城小西门城墙。此前，当日军进犯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以电话报告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其后，当日军进犯沈阳城时，军衡处长朱光沐、第七军长王以哲又以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令“仍不抵抗”。于是荣臻、朱光沐、王以哲，会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待镇静。因此，全沈阳城的军警对日军的进犯，无任何有组织的抵抗。

19 日凌晨 3 时以后，日军第二大队登上内城西南角城墙，并占领了西大门。至此完全控制了内城西城墙南北线。同时，第一大队也占领了内城西城墙北侧地区。19 日上午 5 时半，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主力以铁甲车开路，由小西门入城；6 时许，占领了东城墙南北线。城内中国军警奔散，日军张玲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机关。此时，第二十九联队长平田弘幸大佐，命令在小北门升起日本侵略军的战旗，沈阳城在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彻底沦陷。



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沈阳沦陷后，辽宁省的营口、安东、凤城等重镇也被日军侵占，东北军撤向锦州。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仍令不抵抗。身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均不准抵抗。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长春等地相继失守，日军侵入吉林，随后日军进犯哈尔滨。至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四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1 月 20 日，50 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 200 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1 月 24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 1 月 23 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1 月 28 日 23 时 30 分，日军海军陆战队 2 300 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 月 29 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 584 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 30 万册）均被炸毁。闸北多处燃烧。但日本陆战队夺占北站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1 月 31 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有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及海军陆战队 7 000 余人。

2 月 1 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往洛阳，

表示决不屈服（年底才迁回南京）。

2月初，一万多日军多次进攻吴淞，均被击退。2月13日，日军劲旅久留米混成旅团千余人，在蕴藻浜曹家桥偷渡成功后，在永安纱厂门前被中国重兵包围，又有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 600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

之后战事扩大，日军四易主帅，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由海军中将任，最后以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数度增兵后日方最后投入兵力超过三个师团七万人；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中国方面，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复出主理军事，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蒋再调正在江西围剿共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中国军队在国民支持下，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全面从前线后撤。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中国军队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淞沪事变”爆发后，为了集中力量进攻红军、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匆匆结束了淞沪抗战，并正式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此后，这项反动政策便成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明，他始终以为真正的威胁在内而不在外。他以“安内”为中心任务，“攘外”仅是其用以应付当时危局的口号和掩盖其“安内”图谋的一个幌子。他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他仍然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坚持其一贯的“剿共”、“反共”政策。其在各种场合反复说明，其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声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

其次，他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不成问题”的“皮肤小病”，对此仅略作应付。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对日本的威胁虽然在逐渐加深认识，如热河事变前夕，蒋开始认为日本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但反共的本性又掩盖和模糊了这种认识，他仍然叫嚷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



腹之患，不到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

蒋介石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反映了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本质。

首先，从阶级性上看，蒋介石保护的是极少数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保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他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他的危害小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是第一位的，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是第二位的，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这就是说，假如日本灭亡了中国，他还可以当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他的利益还可以得到保障，如果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推翻了，他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由此可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由其阶级性、由其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其次，从思想上看，蒋介石深受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尽管蒋介石曾经追随孙中山搞过民主、共和，但其内心深处却是封建专制主义，他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式的蒋家王朝，他对中国 20 多年的统治是封建专制统治，他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封建专制的遗风。在这种封建专制思想的驱使下，他绝对不允许他的“臣民”“犯上作乱”。他宁可把民族利益出卖给日本侵略者，也不允许中国人民对他有丝毫的反抗。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侵略者是“邻邦”不是“臣民”，即使有些“不轨”行为，也不会损害他蒋介石这个主子的“颜面”。所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在一定意义上是其封建专制思想作怪的表现。

第三，从个人经历上看，蒋介石多次到过日本，特别是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对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精神特别崇拜，具有很强的“亲日”倾向。他认为：我从前向慕日本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1927 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后，与他的老师长冈外史见面时，还写了“不负师教”四个字。就此而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浓厚的“亲日”倾向密切相关。

但是在民族危急的形势下，全国各阶层人民普遍的愿望是团结抗日，停止国民党的剿共政策，然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先全力扩大内战，扩大国内的分裂和对立，这样“攘外”就必然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所以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出笼，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其执行过程中，它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

和牵制，昭示了其必然破产的命运。

首先，蒋介石的“剿共”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英勇抗击，屡遭败绩。《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调集63万兵力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疯狂叫嚣：“这次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成功，誓当成仁”。但这次“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反击下，也没能逃脱失败的结局。《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积极组织第五次“围剿”。鉴于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士气低落的情况，蒋介石在江西专门设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向他们灌输反共和“效忠党国”的思想。蒋在7月18日的开学典礼上强调说：我们要剿共，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这其实是反共政策破产的自白。仅仅由于中共产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才使党和红军一时处于危急状态，这并不等于蒋介石“剿共”胜利。

其次，“攘外必先安内”受到日益高涨的全国各个阶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压力。工农大众强烈反对国民党的这一反动政策。1933年1月，南京、北平、天津的工人和华北的铁路工人分别举行集会，要求抗日；2月，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要求加紧抗日，同时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要求调集全国军队，抵抗日寇侵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公报》公开呼吁：当兹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残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国闻周报》也称：我们希望以对外“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强硬态度来对外。王造时写了《安内必先攘外》一文，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不满蒋的内战政策，积极组织抗日，如冯玉祥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些国民党爱国官兵不愿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如1931年12月董振堂、赵博生干脆率领一万余名国民党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这些都表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再次，“攘外必先安内”直接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南京政府“九一八”后的对日妥协政策不仅没有阻止日本人的侵略，相反更加助长了其侵略野心。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狂



妄的声明，明确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日本要排挤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实行对中国的独占。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所必然造成的后果。但这并没有引起南京政府的重视，相反，对日妥协还在继续。1934 年秋，蒋介石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他竭力说明中日双方必须合作，以便让他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和红军，同时他也告诉日本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也不允许日本无止境地侵占中国。由此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蒋介石继续奉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反动方针，终于导致了华北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次事变，不仅使国民政府尽失在冀察两省的主权，而且有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从而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蒋之间的矛盾也变得不可调和。对蒋介石来说，华北与东北不同，他认为：“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国丢失了富庶的东北，但对蒋介石来说，“不过从前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而已。而失去华北，则将使南京政府北方的屏障尽失，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华北五省物产丰富，是南京政府“政治、经济的命脉、血管”，为“维持全中国生存的最重要的支柱”，因此失去华北，也将使南京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受重大的损失。

蒋介石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逆历史潮流而动，错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结果导致日本侵略的不断深入和国土的大片沦丧。

中共发表宣言　号召积极抗日

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震惊了东北，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是实现其“大陆政策”、全面侵华的预演，也是后来持续14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端。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毅敏连夜起草了《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二天上午，街上的枪声还没有停止，中共满洲省委就秘密举行了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骤变的形势和应变措施。会议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强占东北一事，给中央写出报告，并决定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宣言》（以下简称宣言）。9月19日晚，刚刚油印出来的《宣言》出现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工厂、学校、店铺和老百姓的院子里。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侵略者血腥屠杀的危难时刻，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民族救亡的第一声呐喊。到10月份，以中、朝、日三种文字印发的《宣言》，传遍辽宁和东北的四面八方。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练而又深刻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抗日主张。《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揭露了日本占领东北的图谋之所以能够得逞的根源，“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宣言》提出的“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要发动游击战争”的重要理念，令人倍感振奋和鼓舞，对日后东北抗日武装的发展和抗日斗争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背景和主要原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向全党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加紧暂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争斗上去”。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要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同时还要组织各种各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 织，在各大城市中出版反帝日报，在国内重要 工厂特别日本工厂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活动，并且要注意作学生和士兵中的工作。《决 议》着重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 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决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痛斥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

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中共满洲省委于同日召开了全体会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23日制定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指出，要在当时已经进行抗日的军队中发起拒绝日军缴械、反对长官动摇、反对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斗争，要求利用可能的机会发动反日军队“与工农的斗争相配合，反抗日军的进攻”；如果这一目的不能达到，则组织士兵哗变，到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农村中去发动农民的斗争，“进行游击战争”。《决议》指示各地党团组织“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明确提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和士兵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反抗日寇进攻，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当时，在东北考察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党团书记罗登贤（不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事变发生后即与满洲省委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号召同志们要和东北人民一道，同生死、共患难，为解放东北奋斗到底。

9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 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说：全中国的民众们！日军侵入华北，造成了和居民的整批被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因为蒋介石、张学良等的不抵抗与投降，因为他们对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使中国士兵大批的死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国民党帮助日本更进一步的屠杀，同时他们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斗争与组织武装的义勇军。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4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来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响应这个号召，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中共积极发表宣言，揭露日军侵略行径和谴责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同时，还明确地提出坚持武装抗日的正确主张，号召广大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开展罢工、罢课、罢市和武装起义等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在中共的倡议下，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要求一致对外，积极抗日。朱庆澜代表全国灾黎致电蒋介石等军政要员及全国各团体，呼吁“举国团结，一体奋斗，同舟风雨，共济艰危”。同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领衔所部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沈克、马法五七将领及所部全体官兵发出号日通电，要求统一全国意志，集合全国实力一致抗日，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此耻”。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四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分别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愿率部抗日。9月21日，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陈诚率全体官兵致电蒋介石、张学良请缨抗日，表示“愿率所部与楼寇决一死战”“宁可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9月23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指出日本“无端



称兵，侵我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在眉睫”。呼吁全国上下应团结一致，共同御外。表示“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命”。10月1日，冯玉祥通电反对依靠国联，主张抗战。电文强调：“今外患紧急，间不容发，若候国联主张，试问中国数十年来深受帝国主义压迫之惨，国际公理究竟奚在？唯有团结民众，督促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雪无上之奇耻。本人誓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10月3日，何香凝自巴黎寄信给（申报），发表对日主张。她呼吁全国爱国士兵与民众团结起来，制止一切内争，共同救国。并表示马上回国，“作救护死伤之工作”。10月26日，著名教授王造时、沈钧儒等联合致书宁粤和平统一会议全体代表，提出抗日救国要求。王造时还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一书，提出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罗隆基、马相伯也都发表文章，提出立息内争、一致抗日的主张。

正是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宣言》感召下，辽宁各地党组织立即采取各种方式向群众进行宣传。从9月25日起，奉天（沈阳）、抚顺、锦州、大连、营口等城市的街头便出现了“同胞们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以及“发动游击战争”等大量的标语和传单。与此同时，辽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积极地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做反抗日本占领满洲的运动”的指示，领导群众开展了抗税、减租、抢粮，反抗日本资本家克扣工资、破坏生产等各种形式的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斗争。

被日军占领后的奉天，日本军警宪特遍布市内，乌云笼罩着血腥的恐怖气氛。疯狂的日军把城内各粮栈仅有的粮食掠走，供其扩大战争之用。针对这种情况，奉天兵工厂党支部组织工人于9月21日上午，将兵工厂粮栈存粮抢夺一空。随后，奉天火柴厂的工人也砸开了本厂粮仓，运光了粮食，并抢夺了日军从大连运来的军粮。为了启发群众觉悟，中共奉天特委向全市基层党支部散发了《告奉天工农劳苦群众书》，并领导了烟厂、纱厂、北宁铁路等地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行动，不仅给刚刚占据沈阳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锻炼了党员，培养了骨干，一些在斗争中表现英勇的工人加入了党组织，扩大了党的力量。

9月底，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向全市工人群众发出《敬告大连工友书》，

明确指出：日本公然以军队占领沈阳，南满和大连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全市人民必须与日本殖民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支持抗日运动。在党的号召和影响下，大连地区的抗日烽火很快燃烧起来。

辽宁其他地区的反日斗争也不断高涨。辽阳小堡农民大同盟以“穷人会”的名义散发传单，提出穷人要分粮、工人要工钱、士兵要饷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他们的这一举动，影响和感召了附近 20 多个村的群众，一场分粮运动在这个地区很快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辽宁东边道及辽北东丰、西安、海龙、清原等地的抗日斗争也不断爆发。

尽管最初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反日斗争规模不大，但它却庄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正立场，表示了辽宁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并进而迸发出抗战到底的巨大力量。

吉林、通化地区的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也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宣传与贯彻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南满，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召开会议，制定斗争纲领，号召群众起来开展抗日斗争。在吉林，中共吉林特支通过一些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中共满洲省委在提出抗日救国主张的同时，还对下属一些党组织进行了调整与加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吉林县委所属的石人沟、东响水河子党支部遭敌人破坏，基层组织缩小。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将吉林县委所属的五里河子特支等农村组织划归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在吉林市内建立了中共吉林特支，主要负责吉林省城工作。原吉林县委书记张玉珩调任省委驻吉林特派员，由文一平任特支书记，仍直属满洲省委领导。到 1932 年 2 月，吉林特支书记文一平也调离吉林，则将吉林特支改为支部，由李维民任支部书记，划归磐石中心县委领导。当年 11 月，中共满洲省委又根据巡视员杨靖宇的建议，将吉林支部改为特支，直属于满洲省委，李维民仍任书记。到 1933 年 3 月，满洲省委派巡视员张弓到吉林巡视，改组了特支，组成干事会，由李世超任书记。共青团吉林县委在 1931 年 10 月遭到破坏，基层组织瓦解，于 1932 年 10 月，又建立了团支部，1933 年 1 月改为特支，3 月又进行改组，组成特支干事会。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这些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极大地鼓舞了黑龙江人民的抗日斗志。在中共北满特委和哈尔滨市委的领导下，哈尔滨知识分



子、工人、市民于9月26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其它各校也纷纷成立了联合会、读书会。一些工厂、大中专学校，在中共北满特委的领导下，组建了“工人赤卫队”、“学生军”、“抗日救国义勇军学生大队”等抗日团体，并开展军训，准备杀敌。佳木斯市桦川中学爱国师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示威。码头工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拒绝为运往日本的大豆、煤炭装船。与此同时，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到抗日军队、农村中，去组织、领导抗日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抗日斗争。在广大农村，如珠河、木兰、方正、延寿、巴彦、阿城、双城、宁安等地都成立了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黑龙江大地到处掀起了抗日爱国斗争。

伪政权建立 溥仪屈驾执政

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此傀儡政权“领土”包括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当时国际上以日本为首的法西斯等国家或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主张中国东北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一分裂中国领土恶劣行径的傀儡政权。

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是蓄谋已久的。东北易帜后，日本感到自己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为维护和扩大日本的权益，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提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新政权的设想 。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 。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就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却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则建议成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根据这一方案，关东军以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大陆浪人，展开了所谓谋略性的策划。为确



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关东军当天午后还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其尽快把宣统帝“保护”起来。

关东军起草了题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意见书，它明确要求建立与中国本土脱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的独立国家 。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顾虑国际关系，反对关东军直接参与建立满洲政权的行动。木规首相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不得参与有关建立满洲政权的一切行动”，币原外相坚持“先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金谷参谋总长也指示部下，不得参与该项工作。10 月 6 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这里日本政府、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还没有打破华盛顿体制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中央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仍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方面准备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方面积极策划溥仪出逃。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可见日本树立新政权，是为巩固在中国战场的优势。

十月事件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快了制造新政权的步伐。11 月 11 日，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策划了废帝溥仪的“出逃”。12 月 15 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不仅是关东军促进满洲建立的的机构，而且是满洲帝国成立之前的“临时政权”。为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1932 年 1 月 9 日，统治部又改为特务部。

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觉得拼凑新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得到日本政府和军中央的一致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与军中央进行交涉。

当时板垣携往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他们计划建立的“满蒙中央政权”将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

其实，在板垣来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已制定了《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政府和军部就促进新政权成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该“纲要”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俄国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回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政策，应设置相应的统制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

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新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新政权的官员。日本关东军知道借中国人之手建立新政权既可以迎合国际舆论，履行国际义务；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的叛逆情绪。当然利用中国人还可以弥补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东北政权的残余敌对势力。

网罗失意官员，拼凑傀儡机构只是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很小的一步，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新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靠了日军。

关东军虽急于拼凑新政权，但他知道自己的势力仅限于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贸然让刚拼凑起来的新机构宣布独立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日本皇军采取了迂回策略，巧用“自治”美名，逐渐将势力向地方渗透。为推动各地的“自治”运动，关东军又于11月10日在奉天设立了“自治指导部”，出身于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和大雄峰会会员的自治指导员，便陆续前往各县拼凑伪自卫团，组建警察部队，以维持当地治安，拼凑新的地方组织，把持地方实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成立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



中国东北，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满洲，成立复国的方案。马占山曾经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抵抗日军，不久诈降，旋又起义。1932 年 2 月 16 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大满洲帝国，组建完全独立的新国家，自治当然无法满足其要求。为筹建省级政府，日本在满洲的各种势力一起动手，当策动地方实力派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后，日本便指使“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委员长袁金凯贴出布告，宣布辽宁省与张学良政权、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而在这之前，吉林省的组建工作就已完成，这是因为根据关东军参谋部 9 月 22 日制订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日本在吉林计划起用熙恰，而熙恰也急欲充当日本皇军的工具。满清皇族出身的熙恰不仅足智多谋，而且一心想要复辟爱新觉罗王朝。所以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深谋远虑的他便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9 月 22 日，关东军终于决定起用熙恰后，当日就派今田新太郎赴吉与熙恰联系，23 日，进军吉林市的第三师团长多门二郎、顾问大迫通贞便与今田一起策动熙恰出面组织伪吉林省政府，同日板垣还电令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27 日省政府的人事安排就绪，28 日熙恰宣布独立。为独揽大权，熙恰采用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日本关东军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让熙恰独立，关东军不仅给吉林省委派了最高顾问，而且还委派了主管财政、民政、实业、教育等部门的专职顾问 。吉林省的实权实际上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熙恰及他的同党们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

当然，关东军不会满足于仅仅组建省级政府，建立一个富有、强大、能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新国家才是他们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早就物色首脑人选。日本决定启用溥仪处理“满蒙问题”最早可追溯到 1929 年秋，当时日本军部分析，溥仪这时并无靠山；正好可以让溥仪来做皇帝；而且溥仪对满洲也一直念念不忘。当 1924 年 11 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将这位满清废帝赶出紫禁城时，日本就认定“奇货可居”，及时地向溥仪伸出援手。1924 年 11 月 29 日，溥仪便在罗振玉、郑孝胥、庄士敦等人的策划下，潜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25 年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又以“出洋”为名，

将其转至天津。溥仪在天津七年，日本对其“照顾”有加，簇拥在溥仪周围的除了大清朝皇室成员外，绝大多数是日本的各类高端人士。日本一方面在经济上和形式上用外国君主资格对待溥仪；一方面借分析中国形势，而溥仪也有复辟大清的雄心壮志。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也跃跃欲试。1931 年 10 月，溥仪在其家庭教师的策划下，向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写信，要求给予指导。关东军方面，9 月 22 日决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当天即电告天津日军，加强对溥仪的“保护”。与此同时，关东军又让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熙恰让罗振玉带给溥仪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请溥仪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先据东北，再回关内”。日本清楚，让皇族出身的熙恰邀请溥仪，似乎更顺理成章。

日本知道，拼凑新政权，必须是完全出自中国方面的行动。为达此目的，日本操纵中国人和征集民意齐头并用。但为确保中国属下和民意不出现丝毫出轨，从 2 月 10 日起，关东军又连续召开了 10 次幕僚会议，最终确定了满洲建国的详细步骤：1. 由奉吉黑三省的省长组成中央政务委员会，从事筹备工作。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恰、马占山任委员，熙恰兼任干事长；2. 由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正式独立；3. 政务委员会随时随地召开，但具体筹备工作在吉林进行；4. 具体筹备工作包括：“国号、国旗、宣言、人选及首都”；5. 在政务委员会就筹备事项作出决议后，交各省民意机关，请其认可；6. 各地通过请愿，推举出大总统；7. 政务委员会根据民意，建立中央政府；8. 大总统组织政府，发表宣言；9. 政务委员会应邀请内蒙、热河代表参与决议，使内蒙、热河迅速与新国家合流。

按照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安排，2 月 16 日下午 4 时，张、熙、马、臧拜会了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首的日本要人，晚 8 时起召开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著名的“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张、熙、马、臧外，还有板垣和秘书中岛。会议对外宣称讨论联省自治，并研究建立新帝国问题。为避免与事变前设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混同，他们决定将其改名为行政委员会；为扩大声势，他们还决定委员会发表宣言时，应增加汤玉麟、凌升、齐王等；为一气呵成建立新政权，他们还决定 17 日成立行政委员会，18 日发表宣言，并决定将新帝国的首都设于长春。17 日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决定 18 日午后 3 时，以张景惠的名义发表关东军草拟的《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布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2 月 20 日，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



会议，讨论伪国国体、国号、国旗等，关于国体，皇族出身的熙恰主张实行帝制，臧式毅则主张实行立宪民主制。

在召开张、熙、马、臧四巨头会议之前，关东军还组织了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根据计划要求，各级组织都要编制宣传运动大纲，组建特别宣传委员会，指导监督各团体的活动。而特别宣传最高委员会则由关东军司令部、各地特务机关、省政府日本人顾问、自治指导部、奉天市政府日本人顾问等组成。为扩大宣传效果，除利用报纸，广播外，他们还迫使商会、农会、宗教团体进行集体宣传。关于"民意"表达，关东军特别提醒，要分县、省、"全满"三级，而且规定县级不必要求建国，省级则可以比县级态度明朗，全满大会自然得出建设新国家的结论。关于宣传运动，关东军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各县团体中宣传动员；第二期各县召开大会或联合会，作出决议，选出代表；第三期，筹备召开全满大会，组织各类庆祝请愿活动。

准备工作就绪，关东军邀请溥仪执政。原本计划在2月18日发表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因关东军拿下哈尔滨的军事行动，被推迟到3月1日。"建国宣言"发表的当天中午，第一批代表六人前往旅顺"请驾"，溥仪假作"婉辞"，3月4日，32人组成的第二批代表团再次"请驾"，溥仪假惺惺地表示"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3月6日，溥仪在郑孝胥父子、罗振玉父子、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等人的陪同下，抵达汤岗子，在这里与张景惠等10名"迎接使"会合，然后一道乘车赴长。当列车停靠在公主岭时，又有熙恰、张海鹏等上车迎接。就在溥仪飘飘然幻想将来的时候，新京市的日满军警却倾巢出动，实行特别戒严。

1932年3月1日，"满洲帝国"宣告成立，溥仪在长春重新登上帝位。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在新京道尹衙门举行，多达15项的会议议程在25分钟之内便草草收场，郑孝胥代读的执政宣言也不足百字。本来按照关东军的计划，作为典礼的尾声，还有一场群众庆贺，可当时满洲的治安状况迫使庆贺活动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零星地进行。驻间岛的总领事向芳泽报告"衷心欢迎其成立者极少"，哈尔滨市举行的"庆祝晚餐会"，被邀请的外国领事，只有日本的长冈一人到会。日本通过与"满洲国"签署一系列的协议，全面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

至此，中国领土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政权，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和"满洲国"。此后近20年，以"满洲国"为根据地的日本与国民党、共产党三大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三国争霸"。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国一方面为谋求“英日同盟”的恢复，百般偏袒、讨好日本，另一方面为使国联从事变中脱身，千方百计地拉美国“合作”。而美国则遵循事变前与日方达成的秘密谅解，并力图使事变主导权掌控于币原外相之手。对事变处理的不同对策使英美两国在“九一八”事变时期始终处于一种“不合作”状态，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外交大臣西蒙在下院讨论对策时称：英国政府对日本只能用“友善”、“协和”的办法。对西蒙的主张，议员们皆表赞同。一位议员说：“不论英国单独或同别国一起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采取反对日本的立场，我自己承认实在看不出什么理由来”。当一个强国侵略一个弱国时，对侵略者表示“友善”，而不去谴责或采取行动加以制止，英国偏袒日本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英国政府在正式场合对日本的偏袒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一些驻外机构人员的言论及舆论宣传则是赤裸裸地为日本辩护了。1931 年 9 月 20 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莱在致外交部电文中露骨地称：“中国在东三省做得有些过分，处处削弱日本根据条约权利应享有的地位。”他还预言，“日本在东北侵略行动对英国在东北的利益会产生有利的后果”，并建议政府“趁中日两国有事之时将某些中英悬案获一完满解决”。英国一家报纸甚至称：“要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满足，除了日本所使用的方法外别无其他办法，所以日本的企图可以算是有根据的。”英国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中千方百计地偏袒、讨好日本，与当时英国欲恢复英日同盟以保远东利益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一度凭借强大的经济与海军实力将侵略魔爪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英帝国的辉煌渐成“明日黄花”。伴随着经济强国地位的衰落，英国的国防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也大为削弱。1931 年，英国空军在海外只有 250 架飞机，以致英海军大



臣张伯伦在同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近年来，海军已被极度削弱，而且一直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吃老本……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海军是没有能力履行它的职责的。"经济地位的日趋衰落与国防力量的日益下降，使英国再也无力以"坚船利炮"去拓展海外庞大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了，在距英国本土遥远而又有着很大经济利益的中国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华政策便由原来拓展在华势力转向维护在华已取得的权益。1930年1月，英国外交部在《英国对华政策备忘录》中称："我们的第一个考虑是保护我国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充分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企业投资。"然而，对如何有效地保护在华既得利益，英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鉴于此，执政的保守党便决定在远东采用传统的与日结盟、以保护在华权益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以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来换取日本对英国在华利益比较集中的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及华南的保护。1902年，英国为对付俄国的扩张曾采取联日制俄的方针，与日本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英日同盟由于英国的需要于1905年、1911年两度修订，1921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到期，英国虽想续订，但由于美国以战债向英国施压，英国只好放弃。对于英国立足于英日结盟的远东政策，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普拉特称：我们应当让日本了解"我们同日本的传统友谊和对日本的钦佩仍然是我们远东政策的主要动力之一……日本应当了解从日本的灾难中英国不能获得任何利益，而日本的繁荣却是英国政策的目标之一"。不仅如此，英国还欲趁远东多事之秋，排挤美国在华市场，扩大自己的权益（其时，美国对华贸易已跃居第二位，在华投资总额已近2亿美元，且仍有急剧增长之势，这是英国所不能坐视的）。

正是出于恢复英日同盟的考虑，英国在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上千方百计地讨好日本，为英日同盟的恢复作感情投资。正如1931年12月22日英外交部代理次长韦尔斯利在一份备忘录中称：英国"对满洲领土现状的关心同对保持与日本诚恳关系的关心相比，是极微小的"。不仅如此，1932年12月6日，英国代表西蒙在国联会议上还公开主张承认东北的"现实局面"。英国此举使日本大为高兴，称赞西蒙只用几句话在半小时之内，就把松冈四天来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无怪美国埋怨英国在东北问题上"只关心关税权利，不问满洲问题之完整"。

尽管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千方百计地讨好日本以图恢复"英日同盟"，但它同时又非毫无顾忌，因为它不能不考虑到国联因素。国联虽标榜

“增进国际互助”、“仲裁国际纠纷”、“防止战祸”、“保卫和平”，但实际上并非是“公理”、“正义”的化身，其实权操于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之手。一战后，尽管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龙头”地位为美国所取代，然而其恢复昔日大英帝国威风、称霸世界的野心依然存在，而作为世界性组织的国际联盟便成为英国企图继续充当世界领袖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工具，英国在国际事务处理中总是力图维护国联的威信不致损害。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国联盟约是一个严重的侵犯。事变发生后，中国寄希望于国联，将这一事件诉诸国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便成为检验国联是否公道的一块试金石，而这种考验对英国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事。倘国联依盟约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措施，英国将会因此得罪日本，从而影响英日同盟的恢复；倘若国联公然支持日本侵略者，那又将使国联威信扫地，从而影响英国在国际上的领袖地位。既要有利于国联威信之保持，又要增进与日本的友谊，以利英日同盟的恢复，这便是英国在处理“九一八”事变中的“两利之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并不关心谁是谁非，而是千方百计地宣扬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表现是如何“优秀”，主张将事变完全托付给以币原外相为首的政府来处理。事变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已经有了十年好公民的优异记录。币原仍然在职……显然我们不应该采取任何将给他的工作增添困难的步骤，因为毫无疑问我们成功地解决问题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他的身上。”美国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也主张：“应当设法增强币原男爵的实力。”9月22日，史汀生在得知日本政府9月19日内阁会议内容后照会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相信日本政府不扩大事件的方针，并称“我相信把事件交给日本外务省和币原外相去自由处理是适当的”。史汀生还致函国联秘书长，希望“请勿对日本过分使用压力，以免币原外相制止军人发生困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立即派调查团调查真相，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表示反对，并称“派调查团对制止军人行动不利”，芳泽这一理由正中美国的“软肋”。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遂向国联强调，派遣调查团“将会激起日本的民族情绪”，“将会使币原和日本政府中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只会对日本军队中的一些分子有利”。

美国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之所以如此倚重币原外相，关键原因就



在1931年9月17日史汀生与出渊胜次就日本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达成了秘密谅解（即《美日密约》）：“美国不与闻满洲事变，但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日本则对美在华利益表示理解。”同日，美国驻日大使福白斯在与币原外相会晤后也致电华盛顿称：“外相表示了友好的让步的态度，他说，首相、参谋长和他都同意不向锦州方面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且已发出这样的命令。”

美国在事变前与日本达成《美日密约》并非偶然。当时正处经济危机困扰中的胡佛总统希望通过“不与闻满洲事变”来换取日本将其军事行动限止在锦州以北，并借此获取日本对美国在华利益的保护。不仅如此，胡佛总统还指望日本在占领锦州以北的满蒙后北上进攻苏联，从而通过日苏冲突来束缚日本的手脚，使美国在远东权益不致因日本的“越轨”而遭到麻烦。胡佛称：日本卷进满洲“并非坏事”，因为中国和布尔什维克这两件事“就够他忙伙一阵子了”。也正因为此，事变发生后胡佛在许多场合总是以“共祸”为由替日本辩护：“假如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中国的秩序没有恢复，中国领土有一半已布尔什维克化并且与俄国合作……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假使他们公开地对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美国驻英大使道威斯甚至称：“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12]尽管美国在事变前与日本达成“不与闻满洲事变，但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的密约。但因“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而非日本政府所发动，因而在事变发生后千方百计地使币原外相掌控事变的处理权对美国来说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美日密约》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时期，英国为了恢复“英日同盟”，竭力偏袒、讨好日本。同时为了使由自己主宰的国联从事变中脱身，千方百计“拉美合作”。而美国本着在事变前与日本达成的《美日密约》，对事变采取了“不与闻满洲事变”之态度，并竭力维护日币原外相对事变的掌控权，以利《美日密约》的实施，致使英国“拉美合作”企图未能得逞。及至日机轰炸锦州，美国由于日方违背了《美日密约》的规定而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并积极寻求与英“合作对日”。然而，英国此时因见美国已介入事变，原先“拉美合作”热情顿消，美国拉英“合作”终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作为国联领袖的英国以及作为《九国公约》签字国且实力最强的美国理应采取共同行动制止日本侵略，以保远东之和平。然而，英美出于各自私利，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互相拆台。英美的“不合作”态度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军不到三个月便占领了东北，随后又将侵略锋芒直指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而向英美发难，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而英美双方在“九一八”事变中“同床异梦”的“不合作”经历也为他英国们以后在远东问题的处理上埋下了互相猜疑的种子。

1931 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占中国领土的第一步，同时这也暴露了日本将中国作为进攻苏联的跳板的战略意图。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承认：“占满洲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将那里作为蓄锐的扩张基地，不仅严重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已直接威到苏联的远东利益与安全。日本的扩张行动使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遭到了直接的、严重的损害，这就决定了苏联不可能对日本的行为坐视不管，势必要严重关注日本的走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事生的第二天，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向中方代表莫德通报了苏方收到的“关于满洲发生很严重事变”的电报内容，请莫德惠向他提供“有关这一事变的全部情报”。9 月 22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约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进一步了解事变情况。李维诺夫说：“满洲事变具有重要国际性质…事变也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苏联政府一面密切关注远东事变的进展和国际反应，一面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和日本表露自己不想介人事变的立场。

9 月 23 日，加拉罕与莫德惠讨论事变问题时说：“……中国完全可以放心地和自由地采取它在目前情况下认为需要采取的步骤。”后来，加拉罕再次对莫德惠指出：“我国的政策是警惕地注视事态发展并采取不干预态度。目前，这是唯一正确和可行的政策。”10 月 29 日，加拉罕邀见广田，同日，苏联驻哈尔滨代表总领事欧尔可哈访问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在这两个场合中，苏联外交代表都进一步明确宣布苏联政府对中日问题持“不干涉”立场。11 月初，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弗洛希洛夫元帅表示：“苏联政府对于满洲事务的态度是绝对不介人……自从危机发生以来，苏联甚至未向满洲边界地区调动一名士兵或一门大炮。”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不干涉”政策，其意图一是在告诉日本政府，苏联坚持不干场，日本没有任何理由进攻苏联；二是告诉中国政府，苏联的中立立场是不改变的，你不必对苏寻求公开支持，致使苏联陷入出了公难境地。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是和平外交原则，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反对日本的公然侵略行为，反而执意要采取“不干涉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苏联当时国内的情况来看。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生活必需品匮乏。苏联的军事实力因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是很强大。因此，苏联基于国内的具体国情，选择中立，以避免与日交锋，在远东边境保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争取时间和集中精力加快国内建设，增强国力。

其次，从日本方面来看。虽然“九一八”事变预示着北犯苏联的意图，但事变本身还只是损害到苏联的一些局部利益，比如中东铁路的运营受到影响。事变发生后，苏方就指出：“事变的极其严重性不能不使我们担忧，因为它是在直接靠近中东铁路的地方进行的，会直接影响到铁路的正常工作和铁路让渡地区的形势。”另外，日军对白俄匪帮的资助虽也损害到苏联的利益，但还不至于影响到苏日关系的大局，苏联也就没有必要介入这场发生在中国的事变。再者说，日本当时的近期目的还只是占领中国东北，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不仅不愿意恶化同苏联的关系，反而要缓和日苏关系。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也使苏联看到与日缓和的可能性。

再次，国际因素的推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上显然没有形成一个联合制止日本侵略中国的局面。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置身事外，对日姑息纵容。英法特别是英国，忙于应付德、意法西斯在欧洲造成的紧张局势，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美国同样也不希望同日本的关系复杂化，甚至还幻想借“九一八”事变挑起日苏战争，以缓和日美矛盾；国际联盟在英法把持下又受到美国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无意制裁日本。况且当时的中国，蒋介石奉行的是“绝对不抵抗”的消极妥协政策，这种情势使得苏联不可能单独冒险对日采取强硬政策，而是采取“不干涉主义”了。

第四，苏联当时是非战公约的参加国。该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同意解决各国间发生任何性质之争端纠纷，除用和平方法外，不得用其他方

法。”因此，履行凯洛格公约的规定，也是苏联不想介入中日冲突的原因之一。

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苏联也不例外。但维护本国利益的方法并不意味着要建立在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事实上，苏联在坚持奉行“不干涉主义同时，过多地寻求对日的妥协，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确保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使其“不干涉”政策偏离了它原来的轨道。苏联为对日妥协而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就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例子。1933 年 3 月 27 日，加拉罕与颜惠庆会谈时告诉颜，苏联将与“满洲国”互设领事馆。颜认为这种“事实上的关系就巩固了‘满洲国’的地位”。加拉罕却说：“我们采取这些步骤的出发点不是某一步骤能够巩固‘满洲国’的地位，而是根据维护同目前满洲现政权事实上的关系的实际需要。在满洲有我们的铁路，有我国数万公民，有我国五个领事馆，而除‘满洲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权可与之交谈和打交道。”这段话意思很明显就是苏联在“满洲国”有实际利益，为了这种利益就必须建立和维护同“满洲国”的关系，而不顾中国国家利益。

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政策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是苏联在当时的情况下应付复杂国际形势的一种斗争策略，它符合国与国相互关系的原则。然而，在执行这一政策的时候，苏联从其自身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并未完全公正地实行中立，而是表现出了对日本的偏袒，甚至是妥协，这就损害了中国的抗日斗争和民族利益。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苏联在实行“不干涉”的过程中虽然重点是争取苏日关系的改善，却仍给予中国抗日斗争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苏联驻中国东北领事馆的人员曾采取半官方、非正式的形式，援助中国军队的行动，这说明它还是站在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基本立场上的。因此，苏联的“不干涉”政策不能简单地与西方英美的“绥靖政策”混为一谈，更不能认为“不干涉”政策是对日本侵华的鼓励。随后来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苏联也结束“不干涉”政策，转而开始了大力援助中国军民抗日。



东北各省建立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影响下，自动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在其建立和斗争中，有些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属19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其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北军民奋起抗日（1931.9～1932.2）。“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先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初，曾任凤城县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此时，辽宁义勇军遍及各地。11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12月末，共编成22路共7万余人。

在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沈阳失陷后不久，在沈阳西部、兴城、北镇、黑山、康中、大虎山、锦西等地，义勇军纷纷抗敌，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1932年1月9日，驻锦西县城日军19师团混成38旅团骑兵27联队队长古贺传大郎奉命率部向县城西部一带进发，“围剿”义勇军。时任县长的汉奸张国

栋对古贺婉言劝阻：城外胡匪太多，不能出城。古贺狂妄声称：几十万东北军都望风披靡，几百个老百姓算得什么？是不堪一击的。于是率领步骑兵80余名，出城向西“扫荡”。9日上午10时半，古贺率队到达上坡子村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好的义勇军的攻击。正当古贺联队长被打得惊魂不定时，忽又闻告，锦西县城遭到袭击，于是慌忙率队往县城回窜。殊不知，回程中又进入义勇军的埋伏圈。经过激战，古贺当场毙命。这次战斗，义勇军共歼敌50余名、伤30余名，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七名。被关东军称为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所击败，是日本侵略者梦想不到的。此举大大提升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士气，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使总数达五万余人。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两万人。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万余人。同日，自卫军夺回被日本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二师团主力以外，还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四旅东进，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八旅北上增援，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于2月2日逼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自卫军第二十二旅与敌激战后被动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自卫军虽未扭转战局，但给予日军以重创。1932年9月12日，在冯占海的率领下，抗日义勇军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500余人。同年，王德林率义勇军三打敦化城，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 600余支，从1932年3月到10月，吉林各地抗日义勇军与日伪军大小战斗数百次，取得了许多重大战果，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士气。

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11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五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20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占山是这支抗日队伍的杰出领袖，虽然他一度动摇妥协，但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战史上，他领导的斗争给予日军以最为沉重的打击。其中他领导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

马占山原为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由于黑龙江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不在省会齐齐哈尔。为了镇定人心，统一全省的指挥，张学良于1931年10月10日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

10日中旬，马占山尚未到任，日伪军便向嫩江桥一带发动了一次进攻，妄图打开地军黑龙江 省的门户，江桥守军奋勇抗敌，击溃了来犯日伪军。为了防止敌人再度进犯，江桥驻军炸毁了嫩江桥。

10月22日，马占山发表了对日抵抗宣言：当以国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表达了其抗战决心。

10月24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致书马占山，要求马占山让出省城，接着又连续三次照会，威逼马占山立即修复江桥，否则将以武力解决。马占山也以强硬措辞驳斥日军无理要求，指出日军要求修桥，意在进攻便利，而江桥系中国主权，如日军对我存敌意或入侵我军阵地，则采取正当防御，即以武力抵抗。

关东军为了打开向黑龙江进犯的通道，决心拿下江桥。11月4日，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嫩江桥，马占山下令守军还击，致此，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爆发。11月4日中午，日军主力部队殿后，伪军张海鹏部当先，共4 000余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嫩江桥我军阵地发起进攻。驻江桥守军放敌入围，随后奋起反击，与敌展开白刃战，至晚8时，日军攻势遭挫后败退。次日拂晓3时，日伪军在大炮、飞机掩护下，又发起强攻，守桥驻军从正面给予痛击，敌军被迫再次撤退，日军死200余人，伪军死伤达700多人。11月6日战斗又在大兴附近打响。11月6日，日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此次，日军自为先锋，张海鹏伪军殿后，守桥官兵拼命杀敌，多次打退日伪军进攻，几次从敌人手中夺回失去的阵地。是役日伪军死伤甚重，江桥守军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再加上江桥、大兴等地，地处平原，防御工事尽被敌炮火摧毁，修补不及。因此，马占山于6日晚下令将主力撤至距江桥50华里外的三间房车站一带阻击敌人。

三间房是洮昂路（洮南至昂溪）的一个车站，北距齐齐哈尔70华里，

是保卫黑龙江省会的重要防线。马占山退守三间房后，立即重新布防，守军总兵力亦增至5 000余人。12、13、14日，日伪军对三间房发动了数次攻击均被击溃。11月17日，日军发动了总攻。在三间房这个狭小的阵地中，日军动用了飞机12架，大炮百余门，总兵力达7 000人在右。面对汹涌来犯之敌，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奋勇异常，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三间房阵地也几度异手。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情况下，马占山于18日晚下令各部队向齐齐哈尔撤退。13日上午9时许，日军集中大批主力于距省城15里处的榆树屯，以猛烈炮火向省城发动猛攻。晚5时，日军攻陷齐齐哈尔，历时16天的江桥抗战到此结束。

江桥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日本侵略军在这次战役中，投入大量精锐部队，其伤亡人数1 500余人，冻伤近千人。黑龙江省中国驻军在战斗中虽然也遭受了很大的牺牲，伤亡2 000余人，但他们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

马占山的江桥抗战，驰名中外，对东北各地义勇军的反日斗争影响很大；日军对马占山的平定工作也极为重视，从1931年12月中旬开始，先后两次派人对马占山劝降。遗憾的是，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马占山对当时复杂形势缺乏冷静、正确的认识，终于在1932年2月动摇变节，接受伪黑龙江省省长一职。但是，自从他就任黑龙江省省长之后，日本人对他进行了种种要挟和控制，再加上全国各界的舆论谴责，促使他觉醒，所以从3月末开始便暗作准备，决计出走，再度抗日。4月2日凌晨，马占山自带副官、卫士20余人乘汽车出城并于4月7日达到黑河，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举行出征誓师大会，从此，马占山又重新开始了其抗日征途。

4月间，马占山与吉林义勇军李杜、丁超取得联系，商定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4月18日、19两日，从日本调来的第十师到达哈尔滨，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义勇军的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义勇军的中心区——依兰。5月16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入依兰，马占山率部向上集、庆城、巴房等地移动，占领大青山一带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以图对敌作战。日军第十四师得知马占山部在庆城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于6月30日下令所属部队前往围歼。马占山率部在庆城一带，与优势之敌周旋。7月28日，马占山率所部在十七井子地方与敌骑兵遭遇，战至夜晚，伤亡百人，敌弃尸40余具退走。但义勇军少将参谋韩家麟等20余人被 冲散。翌日晨，又被日军发



党包围，全遭杀害。日军在尸体中见有一蓄短须身带马占山名章者，便认为马占山被击毙，并以此作为重大战果予以渲染。关东军还煞有介事地展出马占山的遗物以证明马占山已战死沙场。但是，令关东军没想到的是，一个多月后，马占山在龙门县城重新出现，并重整旗，率众继续与侵略者周旋。

1931 年 10 月，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来"。伦敦每日导报也撰文说："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

第二阶段，抗日斗争蓬勃发展（1932 年 3 月 ~ 10 月）。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 50 万。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 58 路、几十个支队约 25 万人。5 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 5 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 60 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葫芦岛市）、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8 月下旬，第二十一、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 15 万人。其中，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3 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4 月初，该部五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两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七万余人。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于 3 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六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 5 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八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 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三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10 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 103 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第三阶段，散而复聚，坚持战斗（1932 年 11 月 ~ 1940 年）。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 1932 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 20 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 14 万余人伤亡，4 万余人投降、被俘，6 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赴新疆；近 5 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 15 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 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 7 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 6 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 2 万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 5 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 1936 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另千余人战斗至 1938 年冬。吉林省义勇军 6 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另数千人战斗到 1940 年。黑龙江省义勇军 2 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三、第六军和改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少部分战至 1940 年。热河省义勇军 2 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继续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 1940 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 2 万余次，毙伤俘日军 5 万余人、伪军 6 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日伪军方报告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 1933 年 2 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 6 541 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 1 500 次，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每月平均 50 具。在义勇军失败的日军因此对义勇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不幸被俘的义勇军将士几乎都惨遭杀害。

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坚持东北抗战的主体

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到日本关东军残酷的镇压，领导东北抗日的重担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并动员城市工人大批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了创建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各反日游击队和在义勇军基础上组成的救国游击军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部队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与抗日义勇军一起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党领导的人民反日游击队的诞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在义勇军斗争失败后，党创建的游击队便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军事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具有反侵略传统的东北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当国民党军队奉命撤出东北时，东北各地各种名义的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便风起云涌地组织起来。这些武装有的是马占山、李壮、苏炳文等拒绝撤退的东北军组成；有的是由王德林、邓铁梅等部分军队和群众武装组成，有的则由各式各样的农民游击队、自卫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改编而成。东北抗日义勇军受到全国各界的热情支持，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周保中、李延禄、于洪仁等一批党员和爱国青年参加义勇军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动员铁路工人罢工，募捐钱财、被服，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从各方面支援这些部队的发展和作战；设在北平的、由著名人士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冯基平、车向忱等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多次派人到东北对这些部队进行联络、训练和改编；张学良也在暗中给予支持，使义勇军一度发展到30多万人。义勇军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在嫩江桥、富拉尔基等地给日军以

重创，在其他地区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1932 年一年中就袭击重要城市 30 余次，焚毁沈阳、哈尔滨机场，破坏抚顺煤矿发电厂，成为我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极为壮观的一幕。

但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统一的组织指挥，没有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部队本身组织涣散、成分复杂，各部队之间互存戒心，又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义勇军的战斗力，加之国民党政府拒绝援助，致使义勇军于 1933 年初大部为敌击败，许多领导人或逃或降，邓铁梅、苗可秀等英勇牺牲，只有极少数部队继续坚持斗争。1933 年 3 月热河沦陷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或瓦解，总人数由最盛时的 30 万人（也有 40 万之说）锐减到 7 万人左右。义勇军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延缓了日本侵华的进程。

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东北民众，建立抗日游击队。

从 1932 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一面组织支援抗日义勇军，一面派遣杨靖宇、杨林（毕士佛）、童长荣、王德泰等一批领导干部，深入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南满、东满、北满地区，发动各族人民组建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先后在磐石、海龙地区建立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在东满地区建立延吉、辉春、和龙、汪清游击队，在吉东（今黑龙江省东部松花江右岸）地区建立宁安、饶河游击队，在哈东建立珠河（今尚志）游击队，在松花江北建立巴彦、海伦、汤原游击队，党还掌握由救国军余部编成的抗日救国游击军、辽吉边区军，争取一些基础较好的山林队。这些游击武装，打退日伪军的多次进攻，攻占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歼敌数百人，初步建立了南满、东满、北满游击根据地。

从 1933 年春季开始，当抗日义勇军在日伪军进攻下纷纷失败时，党领导的游击队却多次粉碎敌人的“讨伐”，使部队不断发展，游击区不断扩大，战斗力日益提高，杨靖宇、李红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发展到 1 000 余人；童长荣、王德泰领导的东满游击队发展到 700 余人，周保中领导的辽吉边区军一部转战到绥芬河、宁安地区，联络抗日武装 1000 余人，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李延禄领导的游击军也在宁安、汪清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得到日军士兵伊田助男送来的 10 万发子弹的帮助。

据日伪官方报告，自“九一八”事变至 1933 年 2 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 6 541 名，平均每月讨伐 150 多次，阵亡官兵 73 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的，平均每月 50 具。这个数字显然是日伪当局缩小了的



统计，据周保中估计，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击毙总数就在2.5万人以上。

这以后，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力。

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满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决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从而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6军。

此外，活动于五常一带的"双龙队"自1935年春以来，经常与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共同抗击敌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县委和第三军的帮助下，将该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汪雅臣，所部800余人。

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发展到6 000余人，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四大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党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

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人民革命军。1933年1月，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要求省委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此作为党的总策略方针。同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检查过去"左"的关门主义错误，决定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广泛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争取党在游击战争中的领导权。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决定，南满游击队于1933年9月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此后，独立师转战于辽吉两省东部边界，打击敌人的"讨伐"部队，攻克三源浦，凉水河子等重要村镇。1934年4月，独立师联络附近20多支抗日武装，在濛江（今靖宇）那尔轰附近开会，通过抗日联合宣言，产生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此后，各抗日武装互相配合，在通化、临江、金川县境同日伪军激战多次，给敌人以严重打击。11月，独立师扩编为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军辖两个师，共1 600余人。

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2月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朱镇任师长，王德泰任政治委员。接着，独立师避开敌人"讨伐"部队主力，分兵向汪清、宁安、安图等地转移，开辟新区，先后攻克汪清大甸子、大沙厂子和安图县城等地，歼敌600余人。1935年5月，独立师扩编为第二军，王

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军辖4个团，共1 000余人。随后，第二军又联络附近的抗日武装，建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3月联络20多位义勇军首领，商定建立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并公推赵尚志为总司令。随后，珠河游击队改编为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哈东支队和联合军其他部队互相配合，先后在三岔河、五常城和哈尔滨至牡丹江铁路沿线打击敌人，歼敌数百人，开辟了道南、道北两块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政权，拥有1 000余人的青年义勇军和5 000余人的农民自卫队。1935年1月，哈东支队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第三军又联合谢文东的民众自卫军、李华堂的吉林自卫军和祁明山的明山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赵尚志被推选为联合军总指挥。

游击军于1933年6月由宁安、汪清地区北上，在密山会合亮山、金山、友山、常山、小白龙等山林队，约定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独立活动、协同作战，组成人民革命军，推选李延禄为负责人。随后，革命军主力第二团返回宁安，一部留在当地，会合密山游击队打击敌人，并一度攻破密山县城，缴枪130余支，筹措了大批物资。1934年11月，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

1935年5月，饶河游击队编入第四军，全军发展到1 600余人。在此期间，绥宁反日联合军也粉碎敌人的两次“讨伐”，1935年2月，同宁安反日游击队、革命军第二团合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军辖两个师，约1 000人。1936年1月，汤原游击队在第三、第四军的帮助下，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3年至1935年这段时间，党和游击队纠正了“左”的政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游击队发展成为6个军，共6 000余人，为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部队改编为抗日联军。1936年2月，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现有各部队全部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准备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便统一各部队的指挥。

根据上述决定，人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军于1936年春改称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两军各有3 000人，领导人不变。在粉碎敌人的“讨伐”中，



两军战斗力不断提高，第二军一次就在敦化寒葱沟歼敌500余人。同年6月，第一、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接着，第一路军为了打通同党中央和红军的联系，以第二军在原地坚持斗争，第一军由金川地区出发西征。6月下旬，第一军在本溪赛马集歼灭伪军邵本良部1 000余人，前进到岫岩以北地区，因部队伤亡过大，被迫东返，同年冬，又进行第二次西征，仍未达到目的。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二军先后取得抚松城、扫荡河、代马沟等战斗的胜利，歼敌700余人，并两次进入朝鲜作战，部队发展到6 000余人，军长王德泰在11月战斗中牺牲。王德泰是山东人，幼年随家人逃荒到东北，1932年参与创建东满游击队，是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牺牲时年仅28岁。

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后，以一部兵力坚持哈东游击区斗争，军部率两个团东征，活动于依兰、方正、通河、汤原地区，并在汤旺河建立后方基地。坚持哈东斗争的第二团遭敌重兵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治委员、著名女英雄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英勇牺牲。1936年夏，第三军开辟了木兰蒙古山游击区，部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共6 000余人。此后，为避开敌军“讨伐”，第三军军部率部分兵力，经铁力、海伦翻越小兴安岭，向黑龙江沿岸的逊河远征，当到达逊河时，兵力损失过半，被迫返回汤原地区。

在此期间，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称抗日联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反日同盟军第五军改称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宋一夫（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称抗日联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原第四军第二师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陈荣久任军长。各部队都在原游击区的基础上，扩大了活动区域，壮大了部队，粉碎了敌军“讨伐”。

除上述我党直接组织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抗日武装，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团结争取下，先后加入了抗日联军序列。这些部队是：原依兰土龙山民众自卫军改编的抗日联军第三军，谢文东（后投敌）任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

原吉林自卫军余部编成的抗日联军第九军，李华堂（后投敌）任军长，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原东北反满义勇军改编的抗日联军第十军，汪雅臣任军长；以金矿工人为基础组成的反日义勇军（原明山队）编成的抗日联军独立师（后扩编为第十一军），祁致中（祁明山）任师长，金正国任政治部

主任。到 1937 年 7 月，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 10 个军、1 个独立师，共 2 万余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游击队表现出它的特点：在政治上，它贯彻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纲领，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组织上，它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队员骨干开始时多数是党团员，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纪律性强，并能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在军事上，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反日游击队在初创阶段显露出来的特点，展示了它的广阔前途。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袭击，反日游击队人数一般较少，力量薄弱，并且分布不平衡，在行动上受到一些“左”的影响。因此，在初创时期，反日游击队还未能成为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的主要力量。其原因：东北反日游击队在初创阶段表现出来的不足，其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东北党组织缺乏创建和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特别是在“北方会议”后，“左”的影响尤为严重。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一部分。经过近六年曲折复杂的斗争，终于形成了相当多的部队，相当大的游击区，相当规模的斗争局面，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但是，东北游击区态势孤立，游击战争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各部队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同时，游击区域虽扩大到南起鸭绿江口，北至黑龙江畔，绵延千余公里，但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没有与之配合作战的地方武装，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游击战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运动的领导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党在东北没有武装力量。在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前，东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党组织。“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

1927 年 10 月 24 日，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三道街 48 号，由陈为人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 40 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会议并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

1928 年 9 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的。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31 年 9 月 19 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 年 9 月 21 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 3 000 余人成立

"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曾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

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调离领



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不利影响。

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成立以后，继续发展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一开始就作了错误的估计，否认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国内阶级矛盾正在暂时下降的客观现实，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把“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反蒋浪潮，看成是国民党总崩溃的到来。因此，他们武断地认为，革命力量已经发展到具备夺取中心城市的程度，相继作出了一系列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根据地的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普遍实行武装工农和政治总罢工，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

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曾受到党内从事实际斗争的许多同志的抵制。当时满洲省等一些北方白区省委，认为全国的革命发展很不平衡，不应一概而论，应该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所不同的政策策略。但是，临时中央认定这是北方各省委“右倾”，为了肃清这种“右倾”，推动北方各省工作的所谓“转变”，1932年6月24日，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满洲等省委负责人以及临时中央的张闻天、李竹声、康生等。会议听取了各省情况的汇报。满洲省组织部长何成湘着重汇报了满洲地区的特殊情况，认为满洲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伪满政权已成立，并且未经过像关内那样的大革命，针对关外不同于关内的特殊的、落后的情况，应采取特殊办法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博古代表临时中央作了会议总结。他从“左”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大肆指责北方各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竭力批判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甚至不顾各地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北、河南以至东北三省通过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会议最后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文件。

这些决议全面接受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北方党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指责和批判，并按其“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加以改造。

会议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内外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专政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对立。中国已经到了革命危机的阶段，革命危机是在日益增长与尖锐化起来。北方“特殊论”、“例外论”，“是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胡说”，是实际上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以掩盖自己富农路线的实质”，“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会议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会议过分夸大了革命力量，认为“在当前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上，优势是在红军与苏维埃方面的”，“并且必然地要用向敌人进攻的路线，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因此，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已经放在北方各省的工作议事日程之上。”满洲等北方各省党的工作一般的落后于群众积极性的增长，已经“成为极端危险的现象。为此，会议要求北方各省委，“加紧的准备组织工人阶级的反对资本家进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罢工斗争，”提高罢工的“革命化”、“政治化”，反对黄色工会，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和工会最主要的任务；要深入开展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的斗争，将一切的农民与灾民斗争，都迅速的转变到武装的斗争上去，发动革命的游击战争，并尽量的在游击队的积极行动之中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组织国民党士兵的革命兵变，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形成“兵变潮流”是党的“严重的任务，是北方党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北方会议”的召开和会议决议的贯彻，使北方各省党的工作纳入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轨道，使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心未能适应“九一八”以后向抗日斗争方向转变，在新抗日民族革命高潮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促进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因而对北方各省党的城乡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初期，由于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党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下未能迅速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反而孤立了自己，给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和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危害这种情况引起



东北地区广大党员干部的怀疑和不满，并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共产国际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都认识到，要想扭转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不利局面，必须改变以往的错误路线，制定出适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路线和策略。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这一策略，切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

为了贯彻这一总的策略方针，指示信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一是提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建立“民众革命军”（即后来的“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扩大群众的游击运动”；二是对义勇军、自卫军、红枪会等各种抗日武装进行了比较恰当的分析，按照它们的社会成分和组织领导的不同，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并具体规定了与他们联合的不同方式。三是提出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为了保证抗日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和保存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伴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一・二六指示信首先分析了东北地区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对东北人民在政治上采取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实行残酷掠夺，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一般的地主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对象，而变成了革命的同盟者，只有日本侵略者和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才是革命的对象。信中分析了东北地区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性质和作用。指出，东北各种抗日武装按其社会成分和政治影响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由原东北军军官组织的队伍，如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等；第二种是由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组成的义勇军，如王德林等；第三种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大刀红枪会自卫团等；第四种是我党领导的

游击队。其中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虽然目前还过于薄弱，但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今后完全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担负起驱逐日寇收复国土的重任。一·二六指示信的核心内容，是明确提出党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信中指出：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统一战线的参加者，不仅可以是工农，而且也可以是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资产阶级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核心是争取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做好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只有下层统一战线建立了，才能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在统一战线中，对各种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对第一种游击队，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其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党在他们中政治影响的程度来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此外，指示信还规定了领导工人斗争农民斗争以及对伪军对小资产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具体策略，虽然一·二六指示信还没有彻底摆脱“左”倾路线的思想束缚，在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上仍存在不足，但从总体上说，它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是正确的。它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基本符合东北地区特殊情况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一·二六指示信所确定的方针政策，为东北地区党组织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1933 年 4、5 月间，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5 月中旬，满洲省委在书记李实的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一·二六指示信》。5 月 15 日，会议作出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领导权的决议》。

此后，从 1933 年 9 月至 1936 年 1 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各地已建立的游击队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六 6 个军，进一步扩大了游击根据地，珠河（今尚志）、汤原等地还建立了县级抗日政权，人民革命军发展到 6 000 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东北三省



40余县。人民革命军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义勇军余部和反日山林队等其他抗日武装，在南满、北满、东满和吉东各地区建立起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团结各种抗日队伍，运用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主动地打击敌伪势力，极大地动摇了日伪在东北的殖民统治。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响应《宣言》的号召，积极准备组建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汤原、海伦游击队共同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表示“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

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与初期抗日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的高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余部、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产生和建立的。

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在组建过程中和组建之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善战和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忠诚，感召了各种抗日队伍纷纷向人民革命军靠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在成立军部之前，各自先以军的番号成立军下属的独立师。第一军独立师于1933年9月18日成立，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5 000余人；第二军第一独立师于1934年3月成立。1934年7月，独立师一部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 000余人；第三军在成立之前，于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第四军、第五军都是以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



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地联合军指挥部、总司令部和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各部由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

1935 年 5 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 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6 年 2 月 20 日，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从 1936 年 2 月开始至 1937 年 12 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二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 6 个军扩编到 11 个军，并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它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

在这 11 个军中，除第七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八、九、十、十一这 4 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根据《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从 1936 年 2 月至 1936 年 11 月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第五、第六、第七军。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平、周保中、夏云杰、陈荣久分任各军军长；此后，中共北满和吉东党组织又把谢文东所部“东北民众救国军”、李华堂所部“抗日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汪雅臣所部抗日军“双龙队”和祁致中所部“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号“明山队”），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谢文东、李华堂、汪雅臣、祁致中分任军长。到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共建11个军，约3万5千余人，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北70余县，形成了南满（包括东满）、吉东、北满四大游击区，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改组为三路军。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共满洲省委于1936年1月正式被撤销，之后陆续建立了南满、北满、吉东三个省委。根据省委撤销、各游击区独立自行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需要，在三个省委的领导下，三大游击区的抗联部队分区开展游击活动。在北满活动的抗联第三、四、六军以及谢文东、李华堂、汪雅臣、祁致中部，于1936年联合成立了“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赵尚志为总司令。各部队主要活动在今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1936年7月，在东、南满活动的抗联第一、第二军联合编成了抗联第一路军，以杨靖宇为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共6 000余人，归南满省委；1937年10月，在吉东和哈南活动的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联合编成了抗联第二路军，以周保中为总指挥，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归吉东省委；1939年5月，活动在北满的抗联部队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联合编成了抗联第三路军，以李兆麟为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1940年4月任），许亨植（李熙山、朝鲜国籍）任总参谋长，归北满临时省委。

1936年至1937年，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的年代。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已建成11个军，达30 000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抗联各军在辽、吉、黑广阔的原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威胁着日伪统治，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的主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是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结果，它扩大了抗日军队，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江桥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省进犯。那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经过洮（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嫩江桥。刚刚受任的黑龙



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不顾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以约3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11月4日，日军以满铁守备队进攻，被击退。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二师团投入作战。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与敌鏖战，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轮番猛攻，阵地失而复得，形成拉锯。12日，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因部队伤亡过大，后援无继而撤退。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省会迁至海伦。江桥抗战历时半个月，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次有力抵抗，马占山虽败犹荣，获得国人赞誉。

摩天岭战斗。1936年夏，一直在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南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得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并积极准备东出华北抗日的消息，十分兴奋，经过讨论，决定派第一路军第一师西征，进入辽宁省西部及热河省境内，以便与关内抗日力量沟通联系，特别是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好形势。1936年6月28日，第一师400余人从辽宁风城以东的和尚帽子一带出发，7月1日，乘隙越过安沈铁路（今丹东至沈阳铁路），进入岫岩山区，待机穿越南满铁路。但刚刚进入新区，缺乏群众基础，日军对南满铁路守备更加严密，几次试图越路，都未成功，日军守备队反而跟踪追击，不得已又于7月8日分批回师。7月15日，部队返回到安沈路本溪以南的摩天岭附近，日军仍在跟踪追击。于是，第一师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当尾追的日军连山关守备队第2中队进入大榆树沟时，突然发起攻击，当场击毙日军大队长今田大尉及日军30多人；下午，日军继续追击，又被击毙数十人。第一师也遭受较大损失，参谋长李敏焕在战斗中牺牲。杨靖宇亲自撰写《西征胜利歌》，颂扬摩天岭战斗，其中说，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胜利无算齐奏凯歌还。

绥远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热河得手后，进一步推行其征服满蒙的计划，向察哈尔、绥远（今均属内蒙古自治区）扩张。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收买上层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匪首王英等，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就任伪蒙古军总司令。5月，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由云王（云瑞旺楚克）任主席，德王为总裁，实际由德王把持，驻于张北、尚义、商都、百灵庙、大庙等地，由关东军派出大量军官担任顾问和指导官。1936年11月13日夜，伪蒙军三个旅开始由商都向红格尔图进犯，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对此早有警戒，一面命

守军顽强抵抗，一面调部队从外线包围敌人。伪蒙军在日军飞机掩护下连攻几天，都未得逞。

冰趟子战斗。1936 年冬，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大“讨伐”，抗联第三军军部和第一、第五师，在军长赵尚志率领下，由黑龙江省汤源县向铁力、海伦实行长距离转移，也叫西征。12 月，部队来到铁力县境内一处森林内，在伐木工人留下的木房里宿营休整。赵尚志决定在此设伏，打击追击的日军。这里有一眼山泉，泉水流下来，结成一大片高低不平的冰层，称为冰趟子。战士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用冰雪浇水，在木房周围砌成战壕或掩体，作为阵地，等待追兵。两天后，日军跟踪而来，遭到抗联战士的迎头痛击，双方在林海雪原里展开战斗。抗联战士以逸待劳，从容不迫，轮流作战，又轮流到木房内取暖；而日军却只能趴在雪地里，几次冲锋，因冰雪太大，不好运动，又无处可藏，只好被动挨打。

大盘道战斗。1937 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集结在牡丹江下游的刁翎一带。1 月下旬，据当地抗日救国会送来的情报，驻勃利县刁翎日军 300 多人将调往林口，向当地居民征用 200 个爬犁。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判断，如此庞大的爬犁阵，必定携带大量军用物资，行动笨重，是打伏击的好机会，当即决定在日军必经的大盘道上，打一次伏击。1 月 27 日夜，部队从徐家屯附近秘密出发，28 日凌晨进入阵地，以第二师第五团及警卫营占领大道两旁坡地，以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占领大盘道北山。这时，大地银装素裹，天上飘着雪花，抗联战士正好用雪来作伪装，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待着战斗的到来。中午，长长的爬犁阵开始出现，前面几张坐着警戒士兵，后面是大队，一个接着一个，进入了伏击圈。四周一片雪白，日军没有发现埋伏的迹象，漫不经心地抱着枪，东倒西歪地向前走着。突然，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两旁山坡上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日军被打得人喊马嘶，纷纷跌落，乱作一团，拥挤在公路上，以爬犁作掩护进行抵抗。激战到下午 4 时，360 多名日军官兵全部被歼，大批武器、弹药、粮食、军服、200 多个爬犁和 500 多匹骡马成了战利品。抗联战士在大盘道召开祝捷大会，动员群众更好地团结抗日，把日军强征的爬犁和马匹归还群众，然后向大顶子方向转移。

1938 年 1 月至 1939 年 10 月，这一时期是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时期。自 1937 年以来，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往东北增兵，关东军由 20 万猛增至 40 万。到 1938 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 8 个师团，并有伪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



日伪当局以强大的兵力对抗联部队进行连续不断地“讨伐”；同时极力强化它在城乡的法西斯统治。在城镇它们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摧毁抗日救国组织，严密控制人民活动；在农村它们加紧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分散居住的农户强行迁到它控制的“部落”中去，实行保甲制、连坐法；在抗日游击区它们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加紧经济封锁、政治诱降。同时，也加大军事讨伐力度。1937 年底，日军第四师团、第十师团全部和第八师团一部共 25 000 余人，配以伪军 20 000 人，对松花江下游地区（伪三江省）三江平原的抗联第二路军实行“讨伐”。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除留部分队伍在原地活动，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冲破敌人包围，到外线作战，开辟新游击区。1938 年 7 月，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开始西征，向五常、舒兰一带突进。但是在 7 月 31 日，时任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在西征途中携款叛变投敌，供出了我军西征计划，二路军西征虽打乱了敌人的重点“讨伐”部署，但部队损失严重，未能实现预期目的。与此同时，北满抗联部队的 4 个军（三、六、九、十一军，后来的第三路军）也于 1938 年 8 月开始实行远征，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嫩江流域的黑嫩平原挺进。北满抗日部队的远征，粉碎了敌人“聚歼”抗联部队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保存了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抗日游击区、组建第三路军奠定了基础。

北抗日联军于 1942 年 8 月 1 日，进入苏联境内。组成以周保中为旅长、张寿篯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一面集中整训，一面陆续派出小部队，返回祖国东北进行游击活动。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军大举反攻，迅速占领了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佳木斯等 70 余座大中城市和县镇，并在苏军配合下，摧毁敌伪势力，积极维护社会秩序。194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抗日联军为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

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 1939 年到 1940 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 1945 年 8 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8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 年 5 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东北抗日联军名义上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实际上和延安没有直接军事联系，是在苏联支持下的抗日队伍，越过中共直接受共产国际战略领导。游击队军服是模仿苏联红军军服。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反日军队的组成部分，是一支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它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奋起自卫，在长达 14 年之久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抗日怒潮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其灭亡中国罪恶企图的一个重要步骤。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又鲸吞热河，进攻山海关，把侵略势力扩充到长城脚下。民族危机以日本军队的炮火硝烟，中国人民的血泪屈辱和中国领土的大片沦丧，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奋起救亡，抵御侵略，捍卫民族的生存，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根本任务和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社会中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各个阶级、阶层、政党和团体，都在阐发着自己的主张。

像五四运动以来的许多次爱国运动一样，青年学生也在这次抗日爱国浪潮中起到了先锋队作用。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起，北平、上海、南京、天津、西安、武汉、长沙、广州、南昌、太原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举行游行集会，发表通电，并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反日救国十人团、日货检查团、抗日演讲所等抗日团体。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学生还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以督促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收复失地。

1931 年 9 月 26 日和 27 日，上海大学联代表团先后到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上海大学联遂决定增派学生赴南京请愿。28 日上午，南京中央大学 1 000 多名学生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请愿，并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随后，中央大学学生又前往国民政府，与先行到达南京的上海大学联请愿代表团、上海复旦大学 800 多名学生及南京金陵大学学生共计 2 000 多人，冒雨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蒋介石被迫出面接见，敷衍了几句后，就开始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横加指责“青年尤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①]29 日，上海交通、暨南、光华、同济、震旦等大学和中国公学、文化学院、同文书院、上海美专等 19 校 3 000 多名学生到达南京，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出面接见，请愿学生提出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武装学生、实行革命外交等要求。而蒋介石别有用心地对学生说“政府同人，

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与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懈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②]9月30日，上海大夏大学400多名学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仍毫无结果。此后，在学生请愿运动的影响下，其他各界民众抗日团体代表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

迫于各方压力，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表示“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③]第二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请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④]消息传出，各地青年学生立即发起一场“送蒋北上抗日”运动。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学联和中学联 、江苏省中学联等或组织请愿团到南京，或举行集会，敦促蒋介石迅速北上。刚刚成立的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倡议各地在24日上午7时同时举行全国学生对日作战示威大运动。

在“送蒋北上抗日” 运动中，上海学生的行动规模最大。11月21日，上海大学联决定由各学校自行组织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同日，上海各中学一万多名中学生召开全市中学生大会，会后举行游行。24日，上海暨南大学400多名学生抵达南京，至25日晨，又有1.3万余名学生陆续到达。26日上午10时，万余名上海青年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出见。随后，刚刚参加完南京各校抗日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欢送蒋总司令北上讨日大会的南京各校两万多学生及北平、杭州等地的学生代表也陆续赶来声援。学生们坚持要蒋介石亲自出见，但直到第二天下午1时，蒋介石才露面，并被迫承诺“三日之内出兵” 。然而，学生们随后得到的消息，不仅不是政府出兵抗日，反而是国民政府向国联建议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英美等列强共管。

各地青年学生闻讯后极为愤慨，决定组织示威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12月3日和4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共360多人分批抵达南京，于5日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当北大示威团走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前时，遭到军警的阻拦，30多名学生被打伤，185人被逮捕，是为“一二·五”事件。10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和请愿团到达南京。12日，请愿团到国民政府请愿，但毫无结果。15日举行游行示威，先去国民政府外交部，后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又有10多人受伤 ，5人被逮捕 。



12月9日，上海大学联和中学联召开声援北平学生的各校代表会议，国民党上海党部的特务大肆扰乱会场，并将参会的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代表捕去，是为“一二·九”事件。上海大学联即发动万余名学生包围市政府，迫使市长张群作出释放北大被捕同学的决定。13日，北平12校代表、济南14校代表、南京8校代表及上海大学联和中学联代表计45人在南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各地学生示威团联合办事处，筹备总示威。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上海、济南、南京、苏州等地学生三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学生队伍从中央大学出发，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反对政府摧残民众抗日运动”等口号。当游行队伍来到珍珠桥附近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时，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死30多人，伤100余人，另有许多学生被捕，史称“珍珠桥惨案”。18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又包围中央大学，强行押送各地学生离开南京。“珍珠桥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痛斥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暴行，而各地的青年学生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也没有屈服，继续坚持斗争。上海学生、工人及市民共10万余人为死难举行公祭大会，会后抬着烈士的灵柩进行示威游行。

工人阶级也站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大城市的工人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反日大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9月21日，上海邮务同人抗日救国会成立。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运日货。26日，上海日华、同兴、大康、裕丰等23家日商纱厂工人率先成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随后，上海许多工厂纷纷成立抗日团体，进行集会、罢工、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等活动。10月2日，上海工界举行代表大会、续织、针织、棉纺、邮务出版、码头工人等多个工会团体的500名代表参会。大会通过了“请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一致对日经济绝交”、“请政府给义勇军颁发军械”等项决议，并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略谓：“国家存亡，危在旦夕，我全市80万工友，悲愤之余，决心与国偕亡……钧府部诸公，身负党国之重任，岂愿为亡国之罪人，剑及履及，义无瞻顾，千秋功罪，惟诸公深思力图之。”⑤

上海邮务、针织、卷烟、造船、水电等工会代表70多人到南京请愿，代表全市80万工友向国民政府提出以武力收回失地、自动退出国联、给义勇军发枪械等要求。在北平，9月下旬，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成

立了邮电工人义勇军。10月18日，北平邮务、火车、自来水、电车等工会团体共同成立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并作出从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

12月2日，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代表30多人向张学良请愿，并表示如对日出兵，北平20万工人愿作前驱。在南京，10月3日，津浦铁路抗日会举行了市民大会和游行。5日，由20多个工界团体联合成立的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并发表告世界工人书，同时号召会员不买日货、不作日佣、不供给日本原料，呼吁政府救济从日商洋行退出的失业华工、及早出兵收复东北失地等。在天津，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举行反日罢工。16日，北宁铁路工会天津事务所工人组织了救国敢死队。13日，由电车、电灯、水业、津浦等工会发起成立了天津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除上述地区外，广州、青岛、济南、太原、汉口、长沙、重庆等城市的工人，都组织了抗日救国团体，并运用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和宣言、请愿、募集爱国捐款、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各地的商业界也迅速积极行动起来。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22日，上海国货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经济绝交，各工厂全部解聘日本技师。28日，上海市商会召开各行业会议，提出对日经济绝交，并规定，如再有对日私行买卖者，一经查明，即严行制裁。上海、南京等地还成立了日货检查委员会和惩戒奸商委员会，监督和促进抵制日货运动。全国商会也通电各地商会，急速成立商团，积极制造和推销国货。全国其他城市也纷纷开展对日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运动，从而给日本经济侵略以沉重打击。在上海的日本在华企业，除纺织厂外，日商经营的150余家大小工厂，几乎都处于休业状态。天津也有10多家日商企业停业。1931年11月3日的《上海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根据五年内日货输入中国的海关统计数据分析说，在中国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之后，日本至少损失三亿。另据1932年8月2日《申报》的一篇文章统计，日本的对华输出，1931年9月比1930年9月减少34.7%，10月比上年10月减少59.7%，11月比上年11月减68.8%，12月比上年12月减少63.8%。

其他各界也进行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国文化界素有反帝反封建的传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文化界人士也迅速行动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运



动。9月下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其主办的《文艺新闻》上发表《起来中国的大众》一文，号召文化界人士做“为正义为真理而斗争的文化前驱”。10月中旬，《文艺新闻》编辑部汇编出版了《血债》，集中揭露和控诉日军侵占东北所犯下的罪行。左联成员还在《申报》、《晨报》、《东方杂志》、《大众生活》、《申报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漫画，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2月9日，由胡愈之、傅东华、叶绍钧、周建人、丁玲、张天翼等人组织成立了文化界反帝抗日文化同盟。另外，左联还安排鲁迅、郁达夫、冯雪峰、丁玲、彭柏山等著名作家到各大学进行演讲，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一些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也纷纷面世，如鲁迅发表的《沉滓的泛起》、《“友邦惊诧”论》等文章，瞿秋白发表的通俗歌谣《东洋人出兵》，田汉创作的《乱钟》、《回春之曲》、《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剧本。

教育界许多学者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9月20日，北师大校长徐炳叔、北大校长蒋梦麟召集北平各公、私立大学校长，举行联席会议。11月间，北大政治系全体教授、法学院教职员会及北平农学院教职员抗日救国会、清华抗日会、华北学院等院校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痛愤国难全家绝食，特向张副司令请愿后，又赴京请愿。清华大学全体学生，以吴氏一门忠义，舍身救国，咸为感动，即组织请愿团，继吴氏之后，向政府请愿”⑥。12月，北平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致电中央地方各官长及全国将士呼吁“共筹实力御侮之策，化除党见，集中人才，一致抗日”⑦。

在上海，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多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迅速出兵抗战，收复失地。9月28日，上海各大学校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通电欧美各大学，揭露日军暴行。11月29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成立，即致电国民政府，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此外，蒲京、武汉、长沙、广州、厦门、济南等地教育界人士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督促政府对日作战，收复失地。

妇女界也行动起来。1931年9月23日，北平妇女召开紧急会议，会后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人，呼吁“诸公泯弃旧嫌，速息内争，一致团结，谋救国难”。10月初，由妇女救济会、妇女共鸣社、中华妇女节制会等发起成立了有2 000余人参加的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会，致电国民政

府，要求对日作战，同时号召全国妇女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看护队等。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妇女团体联合会、爱国女校师生抗日大会、中华女子参政会等妇女团体还致电国际妇女组织，呼请主持正义，制止日军暴行。10月17日，北平女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等人为负责人。12月3日，于凤至又发起成立了华北妇女救国会，于学忠夫人、顾维钧夫人、张学铭夫人等20多位知名妇女参加，开展募捐、抚慰抗日烈士及伤员家属等工作。各地妇女还纷纷组织义勇军。10月26日，南京成立妇女抗日义勇军，有300多人参加。上海也成立了女子救国义勇军，组织各界妇女进行战地救护知识培训。另外，天津、杭州、武汉、广州、西安等地妇女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组织伤兵救护团和妇女义勇军等抗日救亡活动。

素以远离尘世著称的宗教界人士也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北平佛教青年救国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略谓"僧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与此国难严重，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不容静坐蒲团，依然闭目吞禅"。"凡我僧界，迅下沉舟之决心，誓与楼奴一周旋，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宁作战场鬼，莫为亡国僧"[⑧]。

综上所述，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民族危机震撼了全国，巨大的民族灾难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中华民族空前地觉醒起来、团结起来，一个以各大城市为中心、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的、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浪潮迅速兴起。这场遍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对东北爱国军民抗日斗争的有力支援。同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爱国行动也向世人表明，中华民族是不甘屈服的。

注释：

①申报1931年9月29日。

②申报1931年9月30日。

③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0日。

④温济泽主编《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⑤《申报》，1931年11月3日。

⑥⑦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17页、第927页。

⑧郭大钧 张北根《勿忘"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中国共产党发出各种文件号召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推动国内抗日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代表了同时期民族觉醒的最高水平，中共在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万宝山与朝鲜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其显明的目的显然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出卖民族利益。”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①]

同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②]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1) 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政策；(2) 组织反帝大同盟；(3) 以传单标语的形式，散发党的主张；(4) 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和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

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③

9 月 21 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满洲，是实现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预定步骤，是为了以满洲为据点积极进攻中国内地，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决议强调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建立中朝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等组织，进行共同抗日斗争。会后，满洲省委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④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决议提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决议还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



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⑤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像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⑥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⑦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⑧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全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⑨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发表各种文件号召抗日，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



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军抗战，并先后派遣2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去工作，促进了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同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农兵等广大民众是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最可依赖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民众力量的这种正确认识和培养，为以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②⑤⑥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第433～440页，第442～448页，第449～453页，454～456页。

③《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④《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⑧⑨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第182～186页，第180～181页。

中共号召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在1931年7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8月16日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又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报不抵抗主义"，致使驻在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被迫退入山海关内。在短短的四个多月内，东北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蒋介石拱手送给了日本。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改为"满洲帝国"）。从此，东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为了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新基地，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进攻。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各阶层人民的支援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致使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强攻上海得手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2月进犯热河。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日军轻而易举占领省会承德，不久热河全省沦陷。接着，日军南下进犯长城各口，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重创日军。国民党政府坚持妥协投降政策，压制请缨杀敌的爱国官兵。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支援，奋战两个多月，终于失败。日军长驱直入，造成保卫平、津之势，华北危急。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还划定冀东为"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由于蒋介石的妥协卖国，致使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我国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迅速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抗日的旗帜，号召



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1 月 2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3 年 1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切实领导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并揭穿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实质和种种谎言，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于 1933 年 1 月 7 日，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宣言，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党的宣言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对国民党要求抗日的官兵起了鼓舞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吉鸿昌立刻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天津四处奔走，筹组抗日武装，准备在察哈尔发动抗日战争。吉鸿昌积极“向各方筹措军费，并把他的历年积蓄几罄所有，用作购置机械和官兵粮饷”。[①]很快地重集旧部，并以共产党派来的一批党员作为这支抗日武装的骨干。同时广泛招收爱国的工农群众、救亡学生，加以组织训练；武装当地自愿抗日民团，组成民众武装，利用“缴获之民枪及公安队枪等”“编成两团”[②]还收集了刚从关外退到察省无人过问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加以整顿，迅速地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抗日劲旅。

1933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民众抗日工作，又专门成立了前线委员会。党的关怀和支持使吉鸿昌如虎添翼，他多方努力，积极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按照预定的在察省发动抗日战争的总计划，他一面亲自组织抗日武装，一面派人联络西北军旧属方振武，促成方与冯玉祥合作。他还曾联络其他西北军旧部，颇有收获。就这样，一支由各党派各军联合而成的抗日救国大军在日益发展壮大。1933 年 5 月下旬，盘踞在察哈尔多伦的日伪军倾巢南侵，沽源失陷，察省形势万分危急，张家口军民各界感到奋起抵抗已刻不容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经各界代表集议，是月 26 日召开察哈尔民众御侮大会，大会宣告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冯玉祥就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前线总指挥。从此，我们可以说，民众抗日

同盟军在察哈尔高举义旗不仅集中表达了人民大众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吉鸿昌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抗日救国大愿，从此吉鸿昌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纵横驰骋在杀敌的战场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能够毁家纾难，舍命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化，这正是党的意志"。③

1933 年 6 月 20 日，吉鸿昌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无论是收复康保城之战，还是攻占宝昌、占源二城，他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机智。尤其是他亲自指挥和参加的光复察东重镇多伦的战斗，中外震惊，"藩海闻风，皆为振发。"④它使日军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遭列了第一次迎头痛击，他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精神。后来由于同盟军被蒋介石出卖，吉鸿昌回天津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不幸于 1932 年 11 月被捕，11 月 24 日就义前，他从容不迫，步入刑场，以大地为纸，用树枝作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虽然壮烈牺牲了，但是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 首民族抗日救亡的壮丽史诗将永远铭划在后人的记忆中。

在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辽宁省的邓铁梅等。他们英勇抗敌，给日本侵略者以相当的打击，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力量。1933 年初，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已发展为七支独立作战的队伍，随后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全国工人、学生和各界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上海、北平等全国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使以前少有的。9 月 24 日，上海 3.5 万码头工人举行抗日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并发给工人枪械，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9 月 28 日，南京上海学生 2 000 余人，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12 月，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学生 3 万余人，齐集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示威，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

1932 年 12 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共产党逮捕的爱国人士，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广大群众抗日民主运动推动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易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群众的抵制日货运动，主张对日“经济绝交”。

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领同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迫切要求抗日。1931 年 12 月，被调到江西攻打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多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1933 年 1 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其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十分敏感地意识到 19 路军如不愿“剿共”，必为蒋介石所消灭，如果服从蒋介石命令，不但官兵不愿意打，而且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又必为红军所消灭，“‘剿’他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我感到积极反共固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面对当前严重情况，保持十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⑤于是，他们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人，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并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

注释：

①傅二虞：《吉鸿昌走过的曲折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75 辑，第 177 页。

②陈长河、丁思泽：《吉鸿昌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转引自《历史档案》（京），1984 年第 4 期，第 119 页。

③胡华：《不朽的民族英雄吉鸿昌》转引自《河南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④李宗仁 1933 年 7 月 23 日贺克复多伦电，转引赵瑾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 174 页。

⑤《“福建事变”资料选编》，第 5 页。

共产国际七大确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所谓“第三时期”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一条完全错误的“左”倾宗派主义的指导路线 。在所谓“阶级对抗阶级”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在各个革命阶段都应注重打击中间的 、妥协的力量和政党，并且认定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的“孪生兄弟”和法西斯专政的“温和的一翼”，要求各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反对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它的左翼领袖，因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危险的敌人”。[①]共产国际无视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所谓“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摆脱法西斯的奴役”这种脱离广大中间阶层的左倾口号，甚至把是否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正的革命者与改良主义者的唯一标准，从而把大量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同盟者推向了敌人一边，使自己陷入一筹莫展的孤立境地。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严重局势下召开的。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正确分析了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的新形势，纠正了共产国际内部素来存在的“左 ”倾关门士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制定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策略方针。七大严肃而认真地总结 了列宁逝世以来，特别是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共产国际内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制定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的《法四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 、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重申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 、极弱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主要敌人，法西斯攫取政权，“并不是寻常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继承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公开的恐怖独裁—代替另



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资产阶级民主”。[②]七大的这个结论，把法西斯独裁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明确区分来，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法西斯的温和派”等错误观点和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反动政策都称为法西斯的糊涂观念，有利于利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切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法西斯匪帮。

基于上述对法西斯的本质认识，大会认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可能而且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过去，由于共产党人在政策上犯了错误以及其他原因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尤其是希特勒的上台。因此，为了反击法西斯，无产阶级必须以劳动者和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来对抗法西斯的进攻。首先必须实现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建立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大会批驳和抛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错误观点以及把“自下而上”的统一同“自上而下”的统一对立起来等一系列错误的策略方针和政策，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斗争中联合起来，不仅可以建立下层的统一的党外阶级机构，还可以建立两党上层联合机构，甚至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在每个国家建立统一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次，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广泛的、包括一切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阶级和阶层的人民阵线，甚至建立人民阵线政府。只要这个政府保正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得到实现，坚决同法西斯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就应当支持和参加这个政府以争取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转变到非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广泛的联合，这不只是意味着要克服以前的宗派主义错误，而且意味着共产国际新战略的一个贡大突破和进步，标志着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确立和新的战略转变的实现。为保证新政策的实行，大会适应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转变，在认其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国际执委会工作的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特殊情况解决本国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具体行动纲领和路线，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③]共产国际七大作出的关于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决定，对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七大路线的贯彻，无疑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转变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影响是促进和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使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走上了

基本健康发展的道路。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得到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七大赞同的《八一宣言》是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实现政策转变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宣言》突破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束缚，直接向各党、各派、各军队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或利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且提出了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及召集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农参加的“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的代表机关”，具体讨论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一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越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恳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④显然，《宣言》提出的全民族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了日益高涨的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思想。

共产国际实施政策转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之际，正是中共央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艰难的长征之时。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不仅使我党领导的军队难以开赴抗日救国的前线，而且连自身的存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尽快使党中央了解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指派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林育英（化名张浩）秘密回国，肩负重要使命的林育英从苏联出发进入外蒙古，继而又穿越戈壁沙漠，历尽艰难，首先到达了定边苏区，后经苏区赤卫队护送到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林育英的到来，不仅受到中共中央的热情欢迎，而且他带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当时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立即和他见了面，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胜利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从前线回来后，也马上会见了林育英同志。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参



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八一宣言》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禁令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中共出席七大代表张浩的到来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联系的恢复，使中共中央具体了解到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935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这是中共中央实质性政策转变的第一个重要文件，鲜明地接受和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明确宣布“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文件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重新修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⑤]12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开始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转变。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在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面前，“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绒头子蒋介石。”[⑥]《决议》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各项政策。12 月 27 日，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具体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路方针，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指出，鉴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欺骗民众的资格”，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上述情况表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恢复，促进和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开始了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伟大斗争。

注释：

①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2 册，第 429 页。

②参见《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42～43 页。

③转引自《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求实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23 页。

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 30～32 页。

⑤⑥《六大以来》(上)，第 727～728 页、第 736～737 页。

《抗日救国宣言》推动反蒋新高潮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阶段。东北沦陷后，蒋介石国民党又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公然要“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制造了“香河事变”、“冀东事变”。蒋介石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决定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机，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劫难。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威胁中国人民生存的最凶恶的敌人。反抗日本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已成为中国人民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执政的蒋介石国民党，不准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它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对国民党统治区革命人民实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处于枪林弹雨之中，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爱国志士，青年学生，遭监禁，被杀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申报》经理史量才，均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蒋介石政府以妨害中日邦交的罪名，判刑十四个月。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为了取媚日本侵略者，1935 年 6 月，蒋介石政府颁布了《敦睦邦交令》，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中央红军战胜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庄严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抗日救国宣言》发表后立即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响应。1935年12月6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受《抗日救国宣言》号召而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白色恐怖统治，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掀起了中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新高潮，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准备了有利的条件。1936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为反对国民党汉奸破坏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再宣言》中指出：“一二·九与一二·一六的抗日斗争，已经写下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光荣的一页，已经表示出中国人民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力量，给予日本强盗与国民党一切大小卖国汉奸以严重的打击，唤起了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拥护”。①刘少奇同志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②“一二·九”推动了全民族抗日高潮的早日到来。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③

《抗日救国宣言》和一二・九运动不仅唤起了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而且也推动国民党官兵及其政府向抗日的方面转移。1936年5月31日，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团结御侮、联共抗日的政策；1936年11月，国民党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抗击日、蒙伪军的进攻，收复百灵庙这一切，无不与"一二・九"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受《抗日救国宣言》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通过兵变敦促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反蒋抗日"达到了最高潮。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936年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事变的处理讨论相应对策。因事发仓促，在关于对南京的策略和对蒋的处置办法两大实质性问题方面，与会者争论激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同时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中国纪事》也曾记载毛泽东当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清算，才能为全中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红军的内战"。与会者大多数表示赞同毛的主张。与此相反张闻天则表示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认为"对妥协派（指的就是南京政府中蒋介石代表的一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明确提出了"两不、两争取"的策略原则。周恩来、博古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最后会议一方面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争取南京政府的方针，一方面保留了"除蒋"及"以西安为中心"的思路。15日中共就西安事变表态而公开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也反映了这次会议的初步方针。事实上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一行于15日即动身到事变发生地点了解情况，并把消息传送到陕北。在对事变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中共中央才放弃了"审蒋"主张，在18日制订了"保蒋安全"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张闻天于19日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事变的处理问题。此次会议上，中共内部意见一致，会后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正是会议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公开地、全面地阐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协助和调解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也由妥协投降逐步转为硬朗坚定。从1936年3月起，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采取了拖延和对抗的态度。同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不能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如果有人（指日本）强迫他签订，“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还在军事、外交、内政、财经、文教等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抗战。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成为国共两党再结联盟、共赴国难的基础。

注释：

①②③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第53页、第133页、第127～128页。

十项军事战略方针提出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十项方针，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侵略者。“八一宣言”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对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救国神圣事业提出的最具体的纲领性意见。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又重申了上述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①]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一）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



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做抗日军的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的口号及行动。

（二）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1936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

（三）猛烈扩大红军，1936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

（四）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

（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1. 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华中、南游击队壮大起来时，称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2. 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域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势。3. 地方党对于游击战争，在白区是唯一的指导者，在苏区是主要指导者。4. 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5. 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

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6. 游击队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地结合起来。7. 提高游击战术。8. 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9. 游击队是苏区的创造者。10. 使游击战争增加计划性。

(七)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注意如下的指导原则:1. 没有士兵的援助(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2. 士兵的援助是可能的(亡国奴境遇,饥寒交迫,不得休息)。3. 把运动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公开运动同秘密工作相结合。

(八)把蒙回两族(首先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九)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十)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②

毛泽东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④]

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⑤]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五项主张：1. 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2. 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3. 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4. 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5. 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⑥]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⑦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



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针。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存在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日战争实行正确的指导，而且实际上已使抗战受到不少失败和损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版，第 152～153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版，第 443～446 页。

③《新华日报》1937 年 3 月 26 日。

④⑥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74 第、页 275 页，第 292 页、第 293 页，第 321～122 页。

⑤《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2 期，1937 年 7 月 26 日出版。

抗日战争的基本原则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并将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视为我们的朋友。①

《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②述纲领不仅明确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的方针，以及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和解决抗日经费的具体办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来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 779名国内著名人士签名公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系统的提出对日作战原则如下：(一) 战略防御时：1. 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2. 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二) 战略进攻时：1. 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2. 反对冒险主义：(1) 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胜利是可能丧失的）。(2) 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3) 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4) 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反“东北路线”是错了的（1932年）。

(三) 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1. 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2. 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3. 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4. 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5.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6. 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7. 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8. 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

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9. 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10. 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③

193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这个战争会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

1937 年 7 月 7 日，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7 月 23 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指出：“日本是自维新后以官僚商业资本和军阀掠夺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内原料缺乏，先天不足；它的陆军是东亚最强大的，海军占世界第三位；它企图灭亡中国称霸东亚，必危及英法美在太平洋及中国之利益，必遭到这些国家的抵抗；同时它进行的侵略战争必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抗。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有广阔的领土，有丰富的资源；中国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及训练均不及敌人；中国抗战是抵抗侵略者的自卫战争，能团结与发挥全民族之一切人力财力；中国抗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阵线之一部，必能获得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首先是苏联的有力支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概括为：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第二，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它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中国方面：第一，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今日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



的符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中国的进步、正义战争能得到国际的广大援助。总的说，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的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就是中日战争四个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

中国共产党认为，由上述特点产生的战争规律是：（1）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2）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3）敌我力量变化将遵循这样的道路：在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将占领大片土地和一批大城市，但大片土地和大城市的丧失，不能决定胜败。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和转变的枢纽，大体要准备较长的时间，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在这一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将脱出优势，中国将大体走向反攻，进入第三阶段。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提案”在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状况后进一步指出：“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

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④]

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从预定的战略任务着眼，确定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和指导对日作战的作战原则。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博、林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红军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⑤]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



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也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造成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的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注释：

①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5页，第682页。

③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④《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打通苏联巩固发展苏区的三个步骤

中国和苏联有着太长的边界，正是这种便利的陆路连接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许多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要想方设法争取苏联的支持。中共最早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是1927年的4月份，当时因宁汉决裂，武汉政权在军事上开始陷入困难时期，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利用武汉军队继续北伐，占领平津并张家口，从西北接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从而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这一主张被一些人批评为“逃跑主义”。

土地革命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及苏联一直以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援助。由于当时革命根据地位于南方各省，而且被国民党分割包围。因此，共产国际及苏联领导人认为：为了使中国各革命根据地与红军获得迅速发展，除了资金的帮助外，还必须直接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红军被封锁在内地，没有出海口，不能从海路援助。相反，中苏相邻并有漫长的共同边界，完全可以依靠陆上援助。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围攻之下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转入四川，建立了川北根据地。共产国际对此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动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这一电报明显表明苏联与共产国际希望红军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直接获得他们的援助。1933年12月到1934年1月，新疆局势有了重大发展，新疆军阀盛世才在苏军协助下，打败了甘肃马仲英及伊犁张培元等军阀部队的进攻，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大大加强。这样，通过中国西北对中共及红军进行援助的设想开始具备了实施的可能。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在一份关于中国红军行动的报告中宣称：“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了”。[①]苏联国防部、



苏军情报部及共产国际联络局也联合成立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的援助问题。到1935年，苏联方面关于支持红军向西北发展，直接援助红军的战略计划已经初步形成。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红军与中共中央一路遭受敌军围追堵截，一直难以稳定下来建立新的根据地。直到1935年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开始向西北地区发展，1935年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随即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应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②]这表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打通苏联，取得外援的计划。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沙窝会议上，毛泽东着重强调：“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物质上能得到帮助。”[③]张闻天也在会上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④]中共中央认为单纯以取得国际援助为目的，而偏离内地西进是不可取的。需要在打通苏联的同时，在陕甘地区创建新苏区。然而，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率右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改变北上计划，要求南下。中共中央断然决定率左路军单独北上。

面对这一严重势态，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⑤]考虑到一方面军兵力不足，中共中央认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与国际的联系，整顿与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⑥]这样，中共中央修改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原定方案，开始全力准备实施“打通苏联”的计划。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到达哈达铺，中共中央意外地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苏区及红军的存在。这一消息，给处于艰难中的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带来了转机。9月2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渭县召开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10月底，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吴起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10月22日，毛泽东面对新局面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⑦]这表明，由于新根据地的获得，中共中央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如何巩固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问题上。而长征途中制订并一度准备实施

的“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则暂时被搁置起来。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暂时得到休整。但陕北并非一个理想的根据地。一方面陕北人口稀少，物产贫瘠，经济补给困难；另一方面，蒋介石不允许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并组织重兵计划围攻陕北苏区。这种严重局面使得中共中央仍然得把“打通苏联”作为考虑的重点。

1936 年 2 月 20 日，红军发起东征战役，进入山西。东征初期，战事一度进展顺利，中共中央在建立新根据地的同时，也开始规划进军绥远的计划。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精锐入晋驰援阎锡山，使得敌我兵力对比发生逆转。红军激战两个多月后，于 5 月初主动撤回陕北。东征的意义主要在于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东征期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还充分认识到了山西及华北在未来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在晋西会议上明确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但是由于红军兵力不足，难以在山西立足，原先制订的以创建新根据地的方式打通苏联的设想未能实现。

东征结束后，陕北局面再度紧张。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阎锡山及张、杨各部以重兵进攻陕北。严重的形势使得中共中央认识到：必须打通苏联，取得外援，彻底摆脱被动局面。纵观各方，西北各省地方军阀实力较弱，且号令不一，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实施西进计划，打破敌军包围圈。1936 年 5 月，红军主力西征，不到两个月，就占领了甘肃洪德周围及陕北三边的广大地区，开辟了大片新苏区。新苏区的获得，成为实施“打通苏联”计划的基础，红军主力开始接近中蒙边界。中共中央开始全力准备实施“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并围绕这一中心方针，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为减轻压力，集中兵力，中共中央大力开展了对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早在 4 月下旬，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已经成功。张学良明确表示准备联苏联共，共同抗日反蒋，并许诺 11 月发动反蒋行动。其次，由于一方面军兵力不足，中共中央多次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要求他们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陕甘，以全力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打通苏联”方针的实施，还必须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配合。8 月 25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出：“为了攻克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即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9 月上旬，共产国际与苏联领导人回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与甘肃地区的计划。……在占领宁夏之



后，我们将给你们以帮助。”根据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来电，9 月中旬，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

中共中央开始制订的计划是：红一方面军于 10 月底 11 月初攻宁夏南部，12 月渡黄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则控制西兰大道（西安—兰州的公路），阻止胡宗南北进，并于 12 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则在西兰大道以南积极活动，钳制敌军。然而，张国焘却另有想法，他不愿意与一方面军会攻宁夏，而一直坚持以红四方面军攻占甘西的计划。由于胡宗南部迅速北逼陕甘，中共中央只好改变原计划，同意张国焘率四方面军主力渡至黄河西岸，然后与一方面军隔河并进会攻宁夏。9 月 27 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表示将从外蒙提供援助，要求红军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并前伸至中蒙边界接取援助。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要》，夺取宁夏的行动拉开了帷幕。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制订了宁夏战役计划。次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与 9 军渡过黄河，宁夏战役开始。然而，形势很快变化。胡宗南部迅速北进，而张国焘在关键时刻命令黄河东岸的四方面军部队北撤避开胡宗南。胡宗南部队夺取了黄河渡口，切断了河西红军与主力部队的联系，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这样，酝酿已久的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宁夏战役的失利，使得中共中央与红军为“打通苏联”而进行的再次努力无果而终。

宁夏战役失利后，共产国际与苏联经考虑，将援助地点从外蒙改为新疆，于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红军占领甘肃西部，以便从新疆哈密接取物资，在接到共产国际新的计划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慎重考虑。首先，中共中央认为红军进军新疆付出的努力，要远大于进军宁夏的努力。穿越漫长而环境恶劣的河西走廊与沙漠，将使红军付出很大代价。更重要的是，宁夏战役的失利，使中共认识到单纯为了获取外援而进军西北边地，不仅会偏离中国内地中心地区，削弱政治上的影响力，而且在执行“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的过程中，红军作战方式更接近于运动战，这样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工作只能放在次要地位。红军兵力本来就不足，又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一旦不能获得外援，就会在敌军重兵围攻下陷入难以摆脱的被动局面。这样，中共中央重新作出了安排。首先，为继续执行“打通苏联”的方针，1936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路军偏师西进，接取外援。同时，由于敌军重兵围攻，对主力红军需要重新制订进军方向。11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中共中央已经作了最坏打算，一旦东出不利，则转战内地，进行新的长征。然而，

局面很快好转。11 月 17 日，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消灭胡宗南一个旅；11 月 21 日，红一方面军又获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个旅。这样，胡宗南部全线后撤，终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主力红军获得安定。接着，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以及准备对日作战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心，“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逐步被淡化和放弃。然而继续执行“打通苏联”方针的西路军却一再受挫。这样，持续近三年的“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以此而告终。

中共“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从酝酿、提出到最终放弃，前后近三年。在 1934 年～1937 年这一战略大转折时期，“打通苏联”始终是中共军事斗争的重要方面。首先，“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是在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根据地长期位于内地，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因此，中共长期希望能获得一个稳固的后方，以打破敌人的包围与封锁。因而中共才会在两年多内一直专注于“打通苏联”的努力，这在当时状况下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虽因多种原因的限制，这一战略方针未能实现，但意义却是深远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东北根据地的获得，使中共及人民军队不仅有了坚实的后方，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外援，从而加速了胜利进程。从而可以证明“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是符合中国革命斗争需要的。其次，国际援助是革命取得胜利与巩固胜利的重要条件。由于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势力十分强大，因而中国革命不仅有 国内敌人的压力，也面临国际敌人的压力。因此，中国革命需要取得外援，需要从共产国际与苏联获得一定的援助。“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实质上就是要以军事行动打通对外通道，获取外援的一种设想与努力。如果实现，将给中国革命以极大的推动。第三，中国革命要努力争取外援，但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中国革命要胜利，根本上是要制订正确的路线与政策，依靠自身努力打开局面，取得政治及军事上的主动权。有时过于专注“打通苏联”而忽视了陕北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不免陷于被动 。

注释：

①黄修荣：《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 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32 页。

②③⑤⑥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58 页，第 465 页，第 473 页，第 473 页，第 482 页。

④《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52 页。



瓦窑堡会议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于 1935 年，策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于日本。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汉奸制造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接着，又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地区政治、经济的日趋殖民地化，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同时，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三支红军主力会合的兵力已不足三万人，却被十多万敌军包围，形势十分险恶。

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方面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适时在政策和策略上作出了重大调整。1935 年 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部宣言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的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团结一致为抗日而奋斗。11 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12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爆

发了有一万多名学生参加的抗日示威游行，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学生也先后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一二·九”运动由学生界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各界，形成全国范围的爱国救亡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机日益成熟，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一条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以便更好地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然而自遵义会议以来，全党在政治上并未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彻底地清算。“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还浓厚地存在着，这就成为新形势下制定和贯彻新的政治策略的严重障碍。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制定了以《八一宣言》具体内容和政治主张为基础的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地提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略任务。就在瓦窑堡这个小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上博古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对国民党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引经据典地强调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难道我对老祖宗不忠!”他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鸟”，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他分析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同时着重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我们要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的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批判了博古的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确定了为扩大和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政策，通过了反映会议主要成果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当前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



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系”；“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开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主张以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和最高组织形式。《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调整了党的各项政策，以团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是“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危害性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号召全党与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以便在全党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确定了上层统战工作和下层统战工作相结合、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的工作方针，包括争取各界爱国领袖、争取地方实力派、直接做蒋介石的工作。瓦窑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增强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报告明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②]要求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充当发起人和坚强的台柱子，并且强调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办成了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两件大事：一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策，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二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和着力从思想上建党的大方

针。瓦窑堡会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党组织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推动全国迅速形成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瓦窑堡会议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迅速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轨道。民族危亡之际，能不能同执掌全国政权，拥有庞大政治资源、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国民党执政当局合作抗日，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形成的首要标志。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以是否抗日为判断标准，把蒋介石及其政府同汉奸、亲日派区别开来，积极向国民党呼吁合作抗日。并根据他们对抗日和内战态度、政策的变化，即坚持原则性又做出必要的让步。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特别是成功地做好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局面，通过对最初的“反蒋抗日”，到 1936 年夏“逼蒋抗日”，再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联蒋抗日”，这一系列的策略调整，不断推动蒋介石南京政府转向抗日，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标志，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参加的最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崭新局面，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展开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瓦窑堡会议的第一大历史性贡献。

瓦窑堡会议的第二大历史性贡献，是批判了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鲜明提出“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任务。特别值得一书的是，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鲜明地提出党的“两个先锋队”的性质，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由此引申到“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毛泽东语）。“两个先锋队”的定位、定性，真实、全面、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面貌和本质属性，丰富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扩大了党的代表性的外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同时，党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肩负着人民“求解放”、“求幸福”的希望。



党既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又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坚持了这一点，党才团结和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组成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那种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观点，是自己孤立自己、自己削弱自己的谬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从党的性质上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一系列的文件和决议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产业工人数量不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怎样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者们最感困惑的大课题。瓦窑堡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大课题，办法就是注意成分但不唯成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使党成为共产主义的大熔炉。瓦窑堡会议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这一历史主题，自觉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同民族斗争的关系，适时调整方针和政策，重新划分了敌、我、友的界限，提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回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对象、领导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具体方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彻底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没能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成功完成了党的策略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们党从容应对新形势的变化，组织全国民众，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正是坚持了这一重要的方针政策，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这次会议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

题，并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推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不断推进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时至今日，瓦窑堡会议确立的重大原则，对于调动“千千万万”，组织“浩浩荡荡”，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形式

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由于不同意苏维埃制度与土地革命而同意于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的存在，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而产生的地方割据状态，由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现在还只在中国一部分领土上胜利，此外，还由于汉奸卖国贼等民族反革命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严重性，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人民反日反卖国贼的方式，是多样的，参加斗争的分子的觉悟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放松一切机会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各种方式与各种程度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引导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阶段。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他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为了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迅速组织起来，为了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更广大的群众基础与武装力量，共产党的策略不是等待着那些自然发生的抗日人民团体与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存在了，才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而是指导自己的党员从各方面努力去推动一切爱国的分子，团体，阶层，阶级，党派，生产的与商业的，文化的与教育的，学生的与教员的，工农的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城市与乡村的，新式的与旧式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武装的等等力量，发起各种各样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团体（抗日会，抗日联合会等），组织各种各样反日反卖国贼的军队（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新的十九路军等），政权（县区市抗日政府，人民革命政府等），把这些团体，军队，政权，集合起来，加上苏维埃与红军的力

量，这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组成之后，在他的行动过程中，每日都要去发动新的团体，新的地方政府与新的军队。一面不断淘汰动摇叛变分子，一面不断涌进新的力量，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成为不是腐朽的，而是有朝气的，不是软弱的，而是有伟大战斗力量的政府与联军。对于有些地方因为党的力量的薄弱，所以没有经过党的推动与领导，或是因为离开苏区与红军较远，所以没有苏维埃与红军参加，而自动产生的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那里的党同样应积极的援助拥护与参加。这就是共产党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的工作路线。

因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他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这纲领如下：（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斗的过程中，求得这些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纲的实现。①

如果说，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抗日统一战线就会受到各种反革命实力的威逼利诱和破坏。1927 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



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②]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这里，主要的关键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

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

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改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因此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的运用广泛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错误，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事实证明，这样成分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除联邦共产党外，中国共产党站在光荣的先进的地位。

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



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不从积极的战斗需要出发，而从恐惧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地击破。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已经涌出和正在涌出无数的积极的分子与群众领袖，党的组织应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同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与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付干部与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活泼有生气地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不愿学习锻炼，不受指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着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他们以重要的工作。

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纽带，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当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压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斗争，牺牲农民夺

取土地，工人兵士贫民改良待遇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利益，去适合同盟者的部分利益，对同盟者惧怕使用言论批评的武器，惧怕率领群众逼迫同盟者走上革命的更高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1927 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目前的反对右倾，正是为得要顺利的克服“左”倾，彻底的击破关门主义，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的大胆的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使党不解在群众斗争的后面，使群众从争取日常的与切身的利益出发，提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位置。

注释：

①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百年以前，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但是，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又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有必要的。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军国主义不断膨胀的扩张野心，加之国内同它相呼应的卖国势力，使得它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因此，要战胜国内外敌人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特别需要统一战线。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自身力量有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更大量的是广大的中间阶级和阶层。无产阶级虽然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但自身力量薄弱，不把其他一切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争取过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异常强大，要求无产阶级把一切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反动势进行斗争。第三，敌人内部会存在多种矛盾，在特殊的时期内，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其中的一部分，既可以暂时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又可以分化、削弱敌人的力量，这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

由于中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暂时还比较弱小，只有团结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的力量才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策略思想。马克思、列宁都把争取同盟军放在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来加以思考和对待。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军。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

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①]

历史证明，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全国抗战，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所以能够持久不倒，全民族抗战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因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都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增强；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始终相信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在爱国主义精神支撑下，中华民族表现出了高度的奉献精神。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军人奔向杀敌的战场，为国奋战、为国牺牲。据统计 1937 年至 1945 年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伤 2 380 余万人。所有爱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及各阶层人士，他们都把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无私无畏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他们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对抗日战争以强有力的支持。在人力方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民族，只要是爱国的中华儿女纷纷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全国有 40 个民族的数百万青年奔向抗日战场。广大工农兵、知识分子、爱国华侨汇集在抗战的前线．这种来源于强烈的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情感而爆发的爱国热潮，成为中国持久战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在财力方面，各族人民更是奋勇争先。从西部边陲的新疆、西藏、青海等各族人民到内地的各民族人民都踊跃地为抗日而捐赠大量的钱物，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海外华侨更是毁家纾难，抗战期间，共捐款达 12.3 亿元，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在物力方面，全国广泛开展了捐献飞机、车辆、药品、衣物等活动，仅新疆地区 1943 年捐飞机 144 架，拉卜楞藏区所捐财物可购飞机 30 架，美国旧金山华侨一次捐飞机 40 架，美洲华侨还捐救护车 200 辆，菲律宾华侨捐凡士林 500 万磅，连巴达维亚的华侨也捐奎宁丸多达一亿粒。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是建立在各民族的强烈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之上的，更是建立在爱国主义情感之上。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人民才能相互团结、相互配合，一致对外，共同反对和抗争自己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人民才凝聚、形成了伟大的抗战动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首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抗日，是抗日的主力军。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积



极反抗的。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反日浪潮，都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另外，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积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发起的一二·九运动，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其次，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会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又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少，他们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9年以来，民族资产阶级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民族资产阶级的营垒不是统一的、固定的，在一定情况下这一堡垒也会起变化。例如，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阶级利益的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就曾经同红军打过死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

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就更会使民族资产阶级的营垒发生进一步的破裂。1926 年和 1927 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 1933 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 19 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在 1931 年 12 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的革命者。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论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么，1924 年至 1927 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的来说，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②]

最后，即使是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他们也在不断分化，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决定的，即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的。当斗争向着日本帝国主义时，英美系的大资产阶级为了确保其主子的利益不受损失而被迫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用的。

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这一侵略行为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我们必须把阶级矛盾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将民族矛盾抬升到主要的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人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以极大的努



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召开，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赞同，他们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示“整个的民族利益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益之上”，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在对日政策上，“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共的督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 1937 年 9 月 22 日向全国公开发表了共产党于 7 月 15 日递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制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诺言：愿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宣言》光明磊落，其坚持抗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精神受到各方面的称赞。蒋介石于 9 月 23 日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至此，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645 页。

②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

用“人民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口号

“工农共和国”的口号的提出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工人和农民都得着了一些利益，但还不是工农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只是应该“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①]1926年11月随着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共产国际执委认为“中国的革命过程，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之一部分”。因此，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国家”[②]。这一提法随后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得到广泛使用。1927年4月，蒋介石“分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认为当时的武汉政府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义上是革命的政府，因此，中国共产党还不宜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但不久，汪精卫也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党的任务与口号也相应有了改变。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才能履行这一任务”[③]。秋收暴动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规定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把二大提出的工农联盟组织苏维埃的目标直接提上了议事日程。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公告，号召全体党员为建立苏维埃的中国而奋斗。193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同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且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规定：中国苏维埃政府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至此，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正式提出。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这完全是一个工农专政的国家，不仅官僚、地主在国家中没有地位，而且资本家、富农在国家中也没有地位。这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是相背的，因而带有“左”的色彩。这种“左”的思想无疑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的错误有关，但也受到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1929 年以前，苏联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1929 年底，由于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对富农转而采取消灭的政策，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和其他农具转交集体农庄。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诞生于 1929 年之后，所以它的一下政策不能不受到苏联的影响。

“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中国工农阶级争取自身的解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到全中国所有爱国同胞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提出的“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已经不能顺应当时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就在这次会议上，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在当时情况下建立以“人民共和国”为口号的最广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有着他的特殊意义和可行性，那就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已经在中国的许多

地方胜利了，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力量，可以抵制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威逼利诱，并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到领导作用，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抵抗势力强大的敌人，这同 1925 年至 1927 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完全不相同的。自 1927 年以来的九年时间里，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胜利，使得新的反帝高潮得到了基本的力量，使得全国人民有了靠望，有了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手里争取自由解放与独立的活榜样，使得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固基础与根据地，保证了在新的大革命中能够坚持下去与走向彻底胜利，使得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了中心支柱。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民共和国”与“工农共和国”的区别就在于：(1) 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扩大阶级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的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2) 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放宽了对资本家和富农的政策，人民共和国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不过，人民共和国与工农共和国也还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它依然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为基本群众的国家。

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 80% ~90%。“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彻底战胜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



中国 80% ~90% 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④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愿意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愿意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切为帝国主义及中国反革命所打击的城乡小资本工商业，苏维埃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所及去保护他们，苏维埃老早就废除了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宣布了有利于一切小生产者的统一累进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白军官长（不分官级）士兵，凡愿反日反卖国贼者，都有受苏维埃优待的权利。一切被国民党卖国政府所排斥裁遣的失业军人，苏维埃红军愿意给以工作。即使同红军作战者，一经解除武装，不问官兵，一律优待。其负伤者，一律医治。一切白军官兵愿意在红军服务忠心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者，苏维埃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红军向全国愿意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与武装队伍提议，共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不问何种武装部队，苏维埃及红军愿与他们订立抗日讨卖国贼的协定，如过去苏维埃红军与 19 路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一样。但过去红

军没有能够及时的用实力直接帮助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也没有积极要求），击破蒋介石对福建的进攻，这是不对的。今后对一切抗日讨卖国贼之友军，必须尽可能的给予以实力的援助，直至直接配合作战。要达到反对共同敌人的目的，苏维埃红军不但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同盟的友军之胜利与发展。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么，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使得全国人民明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告，称赞他们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蒋介石辈虽然久已叛变革命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全民族爱国人民却继承了太平天国以来的英勇事业，决心挽救中国于危亡，而致之于富强隆盛之域。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胜利之日，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于奴隶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



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1 页。

②《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626 页。

③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82 页。

④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了实现领导权的基本途径，即：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应起到先进模范作用；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这样，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基本完成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武力灭亡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式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它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①]。由于统一战线内各个阶级对待抗日和民主问题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

其次，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里，国共两党各种拥有独立的政权和军队，但双方力量不平衡。国民党操作着中央政权和大部分地方政权，拥有几百万的正规军，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在势力上处于优势地位。代表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具有政治上的优势，而且已经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党。拥有一支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强的人民军队。由于双方势力的不平衡，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上，必然受到国民党的限制和反对。

再次，国共两党在根本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又遇到一个共同的敌人，一道担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双方实行有条件的合作。然而，这种合作实质上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两党对



立中的合作。两党除了抗日以外事实上没有其他的共同点。两党没有一个共同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没有一个为两党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治政策。”[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长期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政策，不给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以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国民党把同其他党派的合作，视为他对其他党派的“接纳”，并未完全放弃反共和对日妥协的方针。国民党甚至在庐山高级将领训练班上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③]

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④]

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仅关系着抗战能否取得彻底胜利，也关系着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苏区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报告中回顾第一次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能够完成。”同样，“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还从原则上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行动口号，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必须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共产党要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联盟，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发展和巩固这种联盟。第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全党在思想政治上高度的一致性和纪律上的严格性。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主要内容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它们既有各自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政治领导解决方向、道路问题，是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根本，没有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就没有归宿，组织领导就没有方向；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灵魂，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基础，没有思想领导，就无法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是服务于政治领导的，但它是实现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保证，如果忽视了党的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就不可能落

实，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无法实现。所以，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是坚持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就是对统一战线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统一战线首先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合，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都有各自的政治主张、政治纲领，由于其主张、纲领的基本点是一致的，才形成了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各不相同，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奋斗目标，全国人民思想不统一，方向不明确，就无法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领导，主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并把各同盟者的行动统一到党的政治路线上来。参加同一战线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思想信仰各不相同，不可能强求在思想认识上的完全一致。在思想和理论方面的任何强制，都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思想领导的重要环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影响各同盟者的思想，使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使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领导得到巩固和加强。在要不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问题上，必须警惕“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思想，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对统一战线的组织领主要是通过党和各级党组织、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组织人民群众贯彻和落实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来实现的。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内分别对统一战线发挥着组织领导作用。统一战线的重大方针、政策，由党中央决定，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各级组织，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我们党依靠在统一战线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自觉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各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赢得统一战线中各方面的信任和拥护。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体表现为在统一战线中要起骨干作用、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启发、影响党外人士，使他们理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相信和拥护党的领导，为革命和建设服务。

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呢？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



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他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这是要紧的），是不够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48 年 1 月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2）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⑤]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实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首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⑥]这就是在坚持统一战线、不破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个独立自主的方针，给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规定了一个民主的原则，给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也给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同时，独立自主原则也代表了中间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引导他们同顽固派进行争取民主和合法地位的斗争，帮助他们从斗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这为我们抵抗顽固派的独裁统治，保有自己的革命成果，巩固和扩大统

一战线，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方针。又联合，又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解决矛盾，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团结前进，这是我党领导统一战线、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般原则。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这是由中国革命中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决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对于他们革命性方面，实行联合的政策，而对于他们妥协性的一面，则必须进行斗争。但由于他们不掌握政权和武装，反动性不大，斗争的方式主要是批评和教育。而对于被迫参加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具有反革命的一面，又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对他们的斗争则是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政治批判直至武装斗争，这样才能抵制其反动政策，缩小其反共反人民的范围。毛泽东同志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关于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毛泽东同志阐述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基础。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基础就是坚持两个联盟。第一是坚持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第二是坚持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同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和特定时期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其中第一个联盟是最为重要的，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因为实现了这个联盟，就实现了占全国人口 90% 以上的人民的联盟，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这个统一战线中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强大巩固的工农联盟，也就没有革命的彻底胜利。第二个联盟是非基本的联盟，但是它对于统一战线而言，又是不可缺少的联盟。因为在通常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中间的多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是保持中立态度，如果工人阶级争取到与他们的合作，或是至少使之保持中立态度，就有利于争取其他的中间势力，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等顽固势力。统一战线中的这两个联盟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这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充分发动和加强工农联盟，使之成为统一战线的坚强有力的战斗基础，才有可能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特定时期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才有可



能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只有尽可能的扩大第二个联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

注释：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36页，第337页，第362页，第361页。

⑤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⑥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05页。

中共在新方针的指导下继续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于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从国内看，"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1936年1月2日，周恩来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说：现在一切抗日斗争．都应有共产党在那里领导；就在没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也应发动和推动民族战争；无论哪一条战线上，都要无孔不入地去做工作。他还谈到：考虑到中国地区广大，社会经济和革命发展又不平衡，党在有些地区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地区还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党生活，因 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指导工作。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红军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党的干部大多随红军行动。"中国红军不仅成为革命的领导与组织者，而且是党组织的恢复者。"报告强调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要求改变对成分的机械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在长期斗争中选择干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国共两党军队进行了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八路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防御日军的全面进攻，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



场的作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仅仅建立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维护和巩固是关系着全民族能否坚持抗战到底的这个至关重大问题。但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面对日本的政治诱降和美英的劝降，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蒋介石在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同时，着手打击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从1938年9月到1944年3月，先后共动用190万军队，制造反共摩擦约2 500余次。尤其是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深刻地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党以大局为重的正确措置，使极度危急的国内时局得以扭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先后三次反共高潮，既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危机，同时也削弱了自身的抗战意志和力量，甚至造成了中条山战役的惨败。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

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国民党是执政的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而且审时度势地提出了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政策、策略，既维护了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保持了自身的独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完全意义的反抗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所表现的全民族战争的整体性、正义性，及其超出战争自身而促成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刻社会性，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及其他革命运动无法比拟的。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形成发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政策，就成为取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理论支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胜利的一大法宝，在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中起到了不朽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了坚实条件。其一，中共抗日武装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战略攻势，促进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没有形成统一、坚决、有效的抵抗，造成了丧师失地，溃不成军的残败局面。日军则利用南北战场的战略配合，迅速进兵，很快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为了挫败日军的侵略嚣张气焰，收复失地，中共抗日武装采取了敌进我退，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迅速挺进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仅几年的时间，中共抗日武装就在华北、华中广大敌后区，建立起了十几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把敌后变成了歼敌的主战场。大量消灭和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敌人的战略计划，迫使敌人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攻势，调集兵力巩固后方。这样，抗日战争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其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中共抗日武装经过长期的战火洗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已经掌握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战场上的主动权，逐步改变了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赢来了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1944年初，中共中央就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抓住时机主动向敌人发动攻势作战。在局部反攻作战中，共计毙伤俘日伪军47万余人，解放县城77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 200万。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也发展到90多万人，民兵有200多万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全国大反攻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局部反攻和大量歼敌，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作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巨大的物质保障。敌后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在于能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把敌后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真正建设成为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因此，它必须坚决执行为全国各抗日党派所共同拥护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它在各种政策上，必须是既顾及这一党派、这一阶级，又顾及那一党派、那一阶级。这样在各党派、各阶级拥护下的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巩固和发展，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持。其一，三三制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政权组成人员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种三三制政权既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为基础，又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和一切赞成抗日民主的人士，孤立了顽固派。其二，减租减息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通过减租较普遍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使他们增强了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同时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根据地农民纷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生产逐年增长，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为了在权力机构上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参议会系统相一致，将工农兵代表会议转变为参议会。参议会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成员一般采取选举与聘请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它保证了革命根据地政治权力的正确行使，从而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性。正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实行了上述正确的方针政策，因此吸引了各阶级阶层的民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抗日根据地人口达到5 000万人以上，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全国各地共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拥有人口近1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寇短期内灭亡中国的梦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调动全民族一切积极因素，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团结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群众基础。其一，积极支持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1939 年 9 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七个有关民主宪政提案。1940 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共派的专政”①，从而为全国的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1941 年 3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1942 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至此形成了三党三派，其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民盟与共产党密切配合，在坚持抗日，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二，广泛团结知识分子。抗战初，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等人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在重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出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戏剧艺社，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从而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发展了民主进步力量。其三，加强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团结和合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中共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抗日战争中，为深明大义，为民族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转为抵抗，对共产党由剿灭转为联合。共产党也由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国内政策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国共两党也有了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政治合作。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政府军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平津、松沪、忻口、徐州和武汉等战役，其中台儿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



战，一方面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1 500余次，歼敌5万余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日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抗击着60%的侵华日军和90%的伪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全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抗日局面。从而坚决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历史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也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抗击外来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充分说明，在历史长河中铸成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奋起、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91页。

“华北事变”《何梅协定》

所谓华北事变，是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其内容应包括“河北事件”及《何梅协定》；“张北事件”及《秦土协定》；“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些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华北地区，故称华北事变。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用四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连接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1933年3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所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二十九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 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二十九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二十九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不是取决于最强大的环节，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虽然二十九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使日军未能越雷池半步，但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然后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签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冀东。

《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使北方的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从此，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



省全部暴露在虎口之下了。《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为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好名，而实际上就是想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的议题，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

1934 年 4 月 17 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1) 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2) 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3) 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4) 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天羽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 年 1 月 4 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重视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进了侵略步伐。

1935 年 2 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①]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5 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其目的是为分离和蚕食华北。

1935 年 1 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逼迫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1935 年 5 月 2 日，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策划下，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资助的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天津日本租界内被刺身亡。1935 年 5 月 3 日凌晨，另一个与日本有关系的天津《振报》社长兼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亦在日租界内被刺杀。日本指责此系国民党所为，是排日行为，向国民政府北平分会施加压力。日本军方以此为借口，又提出“孙永勤义勇军”问题，向中国政府寻衅，以图攫取华北，挑起了所谓的“河北事变”。5 月 4 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

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1935 年 5 月 29 日，已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放出话来，称二人之死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日本战败后，酒井隆供认二人之死是其策划的）。6 月 10 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与此同时，1935 年 5 月 15 日，在热河南部活动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受到日本军的追击退入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区”，日本指责中方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于 5 月 29 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20 日，关东军越过长城，消灭了这支抗日武装。这就是所谓“河北事件”。日本利用这一事件，在武力恫吓下，强迫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各种要求，国民党政府概为应允。国民党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但是，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退让和承诺并不满足，逼使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以便作为凭据。

1935 年 6 月 9 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就胡、白被杀事件，向何应钦递交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并限期实行。要求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以上机构都是蒋介石为加强对华北的控制而设，阻碍了日本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而实行“自治”的阴谋，因此为日军嫉恨。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并罢免对日本态度强硬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

事关重大，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并在此后第 13 天，分四次与酒井隆当面交涉。1935 年 6 月 10 日，何应钦第四次与酒井隆面谈协商此事时，酒井隆又使出流氓无赖的手段，他把鞋子脱掉，放到谈判桌上，然后盘腿坐在椅子上，并不时地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按照日方拟订的条约签字。何应钦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于 6 月 13 日回了南京，但日方如影随形。终于，经与日方秘密会商，何应钦于 1935 年 7 月 6 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 6 月 9 日“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梅津美治郎、何应钦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何梅协定》全文如下：



〔1〕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2〕何应钦复函〔1935年7月6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何梅协定的主要影响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它的出现在整个华北事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完全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吞灭华北的阴谋，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何梅协定是日方以备忘录的形式，何应钦以承诺通知书的形式达成的妥协，是事实上存在并全部履行了卖国协定。日本侵略者既得到了何应钦履行的全部承诺的实惠，又有梅津通告酒井送达何应钦的备忘录及何应钦的打字通知为凭，作为进一步要挟之工具。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政府接二连三地与日本签订出卖主权的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上午为西安事变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说：东北沦亡，时逾

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在河北事件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1935 年 5 月 30 日，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6 月 11 日，日本方面以此为借口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 月 27 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这样，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哲元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宋哲元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但是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紧锣密鼓地策动阎锡山、韩复榘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0 月 20 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10 月 22 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 月 11 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



防赤委员会委员长，限20日前宣布。日本侵略者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11月25日，土肥原见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转而先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同时继续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忌惮于日本的威胁。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哲元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日本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日本资本逐步控制了华北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和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华北的部分农村也逐渐变成日本的植棉区。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日本单独经营的公司迅速增加，不少工厂、矿山百年城中日联营的企业。日本商人还大规模的武装走私，使日货泛滥于中国市场，对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封建经济的束缚下，处境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东北和华北的特殊处境，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日本的经济掠夺，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1932年以后，民族工商业逐渐走向衰败。1934年至1936年间，上海新设工厂为76家，而旧厂因不景气改组的竟为839家，还有238家歇业。全国纱厂拥有的纱锭数，1935年虽比1932年略有增加，但开工率很低。许多工厂商店陷于破产、半破产状态。天津北洋等六家纱厂有四家落入日本资本家手里。上海、天津、青岛三个最大的棉纺织中心，1936年日资纱厂都已取得超过

民族资本工厂的优势地位。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的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 年 8 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 1936 年 9 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最后，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了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

注释：

①蒋介石 1935 年 2 月 14 日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谈话。



一二·九运动爆发 各界人士声援

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整个华北形势危在旦夕。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自然最强烈，尤其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1935 年的 12 月 9 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1935 年夏末秋初，随着日寇大军进关，热河、察哈尔、长城各口的失陷，《塘沽协定》，《天羽声明》，《何梅协定》，《敦睦邦交令》，《取缔一切抗日救国团体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特别是国民党宪兵三团进驻北平大镇压、大屠杀，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中国人民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王明起草《八一宣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宣言在莫斯科和巴黎发表，并迅速传回国内，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当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 30 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 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北平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天津 10 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于 11 月 1 日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杀戮安国青年的罪行，并积极准备举行抗日请愿活动。1935 年 11 月 13 日，“北平学联筹备会”在燕京大学学生第二食堂召开。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1 月 18 日，由燕京大学、艺文中学、女一中为发起人，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陈絜草拟了《学联成立宣言》。随着日寇汉奸的得寸进尺，蒋介石国民党的退让，北平已乌烟瘴气。

日军飞机低空在北平上空示威，坦克车在大街上东冲西撞。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的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章平静的书桌了！"[①]1935 年 12 月初，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通过决议，并由平津十五校联签，在 12 月 6 日向全国发布了《北平各校通电》，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号召今日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

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 12 月 9 日成立，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在这紧急时刻，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抗日救国请愿游行。12 月 7 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

12 月 9 日，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宋黎等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爱国学生数千人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 10 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

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 12 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请愿不成，群情激愤，游行指挥



部当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向学生们身上喷射，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两边夹击过来。游行队伍被打散。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 30 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12 月 10 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在罢课中，各校学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

一二·九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增强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这个爱国风暴迅速波及全国。

海内海外广泛声援一二·九运动的迅速发展，赢得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形成了全民抗日的新局面。

从 12 月 11 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武汉、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请愿集会和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许多地方的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也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部分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

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于12月18日发表谈话指出："平、津、京、沪、粤各地数十万学生举行壮烈的罢课示威游行，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无耻卖国所激起的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这种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不能灭的精神，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些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深深的表示无限的同情与敬意。"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为声援全国各地的学生救国运动，举行集会。苏区学生联合会发出了支持各地学运的通电。

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了。广州6 000多铁路工人，上海邮电工人和沪杭铁路工人，先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号召组织工人救国会，与全国各界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总工会、上海文化界、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北平妇女界救国会都先后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讨伐伪组织，停止内战，武装民众、抗日出兵。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

许多爱国的知名人士，在中华民族危难当头的局势下，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再也不能表示沉默了，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宣言说：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包围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鲁迅先生在上海亲切会见了北京学联代表邹鲁风，询问了北平学生两次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1935年12月18日至19日夜，鲁迅先生写了《"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热情地答赞了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的英勇精神和广大民众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同时指出了这次运动的必然性，"石在，



火种是不会绝的。”

早在1935年9月份刚开学的时候，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学生执委会主席黄华等人就以“燕京大学同学”的署名，给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人宋庆龄写信求援。询问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边缘，而国内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处于极低潮，这时全国人民特别是抗日志士面对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应该怎么办？信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打字成正式文件，由斯诺托住在他家的史沫特莱去上海带给宋庆龄。不到10天，宋庆龄回信给斯诺，转黄华。宋庆龄的回信是用英文写的。开端用“Dear Students”（亲爱的同学们）：她赞扬了同学们的爱国精神，斥责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她指出：处于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她号召：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宋庆龄是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人的身份写此信的。实际上，在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宋庆龄就是中共中央在白区的代言人。她的英文回信，大大鼓励了黄华、陈絜等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骨干。他们趁热打铁，先后召开了七次燕京大学同学全体大会，并以宋庆龄的来信为指针，于1935年10月20日召开大会决议，由研究生、“社联”成员高名凯起草了《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经平津另九校联签，形成《平津十校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于1935年11月1日向全国发表。

宋庆龄密切注视着北平局势的发展，一二·九之后，她立即公开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她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作为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费用。汇款请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转交给北平学联负责人姚依林。她同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沈兹九等人所领导的上海救国会，一直与学生运动密切配合，坚持斗争。

著名国学大师、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先生从苏州打电报给宋哲元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公开表示对一二·九运动的支持。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国际友人也积极参加了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活动。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史沫特莱，以及路易·艾黎、马海德、汉斯·希伯等人，积极收集和编印一二·九运动进展情况的报道，通过各种渠道，把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后来，旅沪国际友人组织了“中国人民三友社”，发表宣言说：“我们的目的在参加这个斗争。因为这个斗争已经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和反对战争的主要关键了。”

一些具有爱国良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也渐渐同情和支持爱国学生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兼新一军中将总参议、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受杨虎城将军的委托，由甘肃经北平、到南京。续范亭以老国民党员和西北地区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向国民政府呼吁，团结一切力量，抵御日寇进攻。沿途续范亭亲眼目睹蒋介石集团丧权辱国，腐化堕落，对日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爱国群众的种种不齿作为。到南京后，他几次求见国府最高当局及中央要员，均被拒绝，最后好不容易见到了汪精卫，希望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并激昂请缨。但这个亲日派首脑反而说他夸大事实。到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续范亭看到的却只是歌舞升平和追官逐利的现象，大会临近结束，他们仍对抗日救国毫不提及。他悲愤至极，由此绝望，决定以死来唤起更多的同胞警醒。当朋友们建议到中山陵前去“哭陵”时，他慨然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只有用热血才能把这些败类冲到人类行列之外！对续范亭的这句话，朋友们当时皆未领会其意。

12 月 26 日，清晨，续范亭穿着整齐，叫了车疾驶到中山陵园，便在孙中山先生灵堂内剖腹明志。续范亭先生在其绝命诗中写道：“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表达了他徒有爱国之心，却不能征战沙场、保国卫民的悲愤和痛楚。至下午续范亭仍未归，朋友们回想起来感到不好，忙赶往中山陵总理灵堂，发现续范亭腹部已被自己剖开一个大口，人已昏迷在血泊中，大家忙把他抬到医院抢救。此事顿时轰动南京城，国民党政府开始时禁止报道，上海报界却抢先发了消息，而后，中央社才被迫登出“中将续范亭因忧国忧民，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杀”的消息，却仍不提要求抗日一事。国内民间团体的慰问信件和电报，如同雪片飞来。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张学良等高级将领也赶到医院看望。续范亭经抢救脱险后，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又赴杭州疗养。此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的材料，思想产生了重大变化，决心要以推动停止内战的方式而不再用血谏来促进抗战。续范亭血染中山陵的爱国之举，虽打击了投降派气焰，激励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国府当局没有改弦易辙，终于导致了第二年发生更大的事件——西安事变。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还飞跃群山，越过大洋，传遍了全世界，极大地振奋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人，获悉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他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而欢



庆。吴玉章等人发出电函致全国学生："诸君奋起救国，闻讯感奋，望坚持到底，促进全国工农商学大团结，一致抗日救亡。海外同胞誓为后盾。"接着，他们主办的《救国时报》刊载了大量的由国内寄去的有关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文件、照片，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特别得到了欧洲各国人民和侨胞的同情和支持。

太平洋彼岸的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得悉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后，当即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政府媚日卖国，要求组织国防政府，积极抗日。旅德华侨反帝大同盟也发出给全国各学校学生的电函，对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倍加赞扬。东南亚各地的侨胞纷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华侨青年受到一二·九运动的鼓舞，纷纷回到祖国，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学生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学生的支持。国际学生联合会向全世界学生发出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苏联、美国、英国、西班牙、埃及、印度等国的青年学生组织或个人纷纷打来电报，积极声援中国学生的伟大斗争。由北平学生点燃的抗日救国烈火，滚滚燃烧，已成燎原之势，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遏止，中国新的一次革命运动高潮到来了。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样，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成了推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的起点。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14 页。

“一二·一六”大游行
各地学生纷纷声援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政权特殊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大批学生，更激怒了人民与学生群众，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一二·九”之后，各学校爱国学生罢课斗争的热潮，便席卷了整个北平城。北平市临委的谷景生、彭涛、周小秀和李常青在一起，又开始酝酿发更大规模的斗争。

从12月10日起，为了使罢课斗争有明确的方向，以学联名义首先发布了一个《宣传大纲》。提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内战和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联合全国民众，结成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接着，北平各大中学校也联合发表了罢课宣言，呼吁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这样，北平学生的罢课斗争便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在罢课中，北平市临委又指示学联，要积极抓好学生们的组织建设。这是因为在“一二·九”之前，一些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等组织普遍不健全，不少学校的党团组织基本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广大学生还处在散漫无组织状态中。根据学联的要求，“一二·九”之后许多学校都纷纷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从而，使各校参加救亡活动的人数迅速扩大。随着学生的救亡工作的蓬勃开展，各校地下党团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加强和壮大。一些学校建立了党团支部，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这就为下一步举行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12月11日宋哲元派军警分驻各大学校门，严禁学生出校游行示威。13日北平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称：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请愿及罢课的目的已经达到，望同学们即日恢复学业。北平市长秦德纯邀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茶话会，力劝学生即日复课，“勿作轨外行动”，“顾及华北



现在环境，勿因言语引起对外纠纷”。北平市政府与各大学当局宣布，自16日起学生一律上课，如有违反，严惩不贷。虽然校方和国民党当局一致劝导，但是当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后，北平学联还是决定在这一天联合全市数十学校学生再次举行大游行请愿运动，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旋即，北平学联在临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研究和制定了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战斗部署和行动路线。具体是：城内各学校一律早上七时出发，城外各学校相应提前行动，分别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然后进前门，经天安门，向东单行进，再到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并成立了示威游行指挥部，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15日，各学校学生接到通知后，立即秘密召开学生大会作传达动员，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吸取一二·九游行队伍被阻止于城外的教训，两校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先遣队，于15日夜时提前进了城，分散住在东北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12月15日晚，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委托彭涛前去联络学联主席郭明秋、秘书姚依林以及北京大学的黄敬文、中国大学的董毓华等人，在王府井长安饭店佯装打牌，再次召开会议，认真检查了示威游行行动计划和行动的准备情况。虽然国民党当局方面早有戒备，但各校学生于清晨就分别出校到预定地点结合，所以形成了一万余名学生大游行的局面。当时北平城内外交通断绝数日，全市抗日情绪激荡，成为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学生运动的壮举。

12月16日清晨，北平古城再次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北平学生们举行了的“一二·一六游行”，这次游行规模更大，参加的人更广泛，组织的更周密。由于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市内各大重要路段沿街军警戒备森严，但是各校学生都是在凌晨接到集合的号令，所以地方政府事先都没有得到消息，等到学生出动之后，才仓皇中分路增加警备力量。但是因为国民党当局不知道学生出动的路线，他们猜测学生必定前往外交大楼，所以，他们将大量的警备力量布置在王府井左右，将水龙盘绕王府井大街西端及东单一带。同时市政府左右均设岗卫，公安局戒备尤其森严。因为这个位置南面是前门，北面是天安门，都是平时学生集合的地方。所以公安局附近的警卫，三五步就设一岗。凡是行人向和平门、前门方向张望的，都加以盘查。行人三五成群的，也都被驱散。西河沿一带，是外城学生必经之路，所以也加以特别警备，警车队等都是荷枪实弹。东交民巷要道，也安排有警卫，对三五

成群的学生窃窃私语地都立即赶散。同时由西单至长安街同时到王府井等路线，均有救火机及公安队汽车巡视警备。另外还有二十九军290团及91团两团官兵，全副武装，在街市上巡逻，而且迫击炮及机关枪均随行。

示威游行的队伍按照北平市临委的部署，分为四个大队：城内第一队由东北大学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第四大队为城外各学校，由清华大学率领；参加的学生总计约一万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十六日清晨，各学校学生们的采用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的包围和阻拦，然后再化零为整。有的则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游击方式越过军警的封锁线，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游行示威中，许多学生遭到军警的皮鞭、棍棒的毒打或水龙头的射击，不少人被捕。但游行队伍已具有了“一二·九“斗争的经验，学生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到了集合地点，在天桥举行了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

北大学生冲出校门后，城内的学生，东城由北大领导，全校学生八百余人，于早晨八点先在一二三四五多斋集齐，由交通队分发宣传品，一齐出发，声势浩大。只有西斋第一队最先走出校门，执旗的三位同学，被警察捕去。当时因为大队学生还没有到齐，所以没有办法及时援救。后来大队学生由景山东街前往第三院时，中途遇到多名警察，他们用二架水龙放水喷向学生前队。当时大队学生中纠察队身先士卒，冲向警察队伍，最终将警察手中水龙夺下。于是学生们得以冲过，到第三院门前重新集合游行队伍，整队继续前进。路经中法大学、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市立高商、市立高职，每到一校门前，即高呼欢迎该校同学参加。但是，即便这样，只有各个学校那些已经外出的学生，临时才可以加入队伍中游行，其他尚且留在学校的学生，因警察临时在校门内上锁，不许外出，所以能冲出来的人很少。当北大学生大队经过沙滩大街直奔南池子时，沿途高喊各种口号，并散放传单，欢迎民众自由参加游行。沿途虽然偶尔有岗警拦阻，但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当青年学生游行至南池子中间时，突然有大批警察及保安队，一面用两架水龙放水喷击学生，一面用铁棍及指挥刀与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学生们虽赤手空拳，但亦毫不示弱。学生纠察队奋勇当先上前夺抢警察手中大刀，其余学生一起向前拥与警察肉搏，结果最终将水龙夺下。这场争夺警察与学生双方都有受伤，随后学生继续南行，并高呼胜利口号，欢迎民众自由参加爱国运动。出南池子向西行进，进入西长安街经过前军分会门前时，又与大批



军警发生冲突。警察由于两次失败于学生，因此这次迎击更加激烈，大刀铁棍无情的砍向学生。这次学生被击伤十余人，最终因为军警密布，不能突出重围，不得已游行队伍向东折回，出前门与师大等校队伍集合。

清华大学学生与燕京大学学生在北平西郊外准备汇合进城。反动当局早有戒备，在公路上设铁丝网路障，密布武装军警，禁止通行，清华大学学生队伍与军警交涉，并进行宣传，军警坚持上级命令，不准通过。清华学生留一小部分继续与拦路军警周旋交涉，大部分学生陆续退进清华校门。武装军警以为清华学生已经放弃进城示威游行企图，其实大批清华学生，悄悄由校墙边平绥铁路踏铁轨枕木向西直门小车站挺进。当学生们到达西直门时，西直门已经关闭，不准学生队伍进城。学生先遣自行车队员报告东便门仍然大开，部分队伍赶去东便门又吃闭门羹。当时又有信息说阜城门虽然关闭，但西便门仍然大开。学生队伍悄悄赶到西便门，军警仓促关门，不准进城，但西便门旁铁路进城有栅栏门，虽也关闭，学生队伍人多力大，强行闯开，队伍涌进城内，向正阳门挺进。当队伍中段走过宣武门，还未到正阳门时，忽闻枪声大作，街上行人受惊，秩序大乱，向西奔退，都说正阳门军警开枪了。游行队伍受阻，有点不知所措，幸经领队高呼："游行队伍到宣武门集合开会，不要散!"

上午11时左右，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上，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八个决议案。

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学生们手挽手，由天桥向前门进发，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并向道旁市民和行人散发大量传单。市民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同情，有的自动加入了游击队伍，有的给学生们送来开水和食物。这时，爱国学生再次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

当游行队伍到前门时，遇到军警、宪兵的拦截，他们鸣枪威胁，不准队伍入城。在这种情况下，游行指挥部当即决定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卖国外交，不得任意逮捕或屠杀学生等九项议案。大会还决定，要求进城继续示威游行。于是派代表与军警多次交涉，军警只准少部

分学生由前门进城。其余大部分则分别从和平门和宣武门进城。北平当局害怕庞大的游行队伍采取激烈行动，不得不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并调动全城军警应付学生。游行队伍从前门到宣武门，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保安队的摩托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若干年来从未关过的前门城门，这天关上了半扇，宣武门完全关闭。在学生们到达和平门和宣武门时，城门关闭且有军警持枪把守。到下午四五点，宣武门内外的游行队伍隔城门汇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口号声在城门内外此起彼应。军警在宣武门内外连成一片，将游行队伍包围住。宣武门大门虽然已被军警关闭，阻止在外城学生队伍与内城学生汇合，但是军警仓促关门未上门槛，因此城门下有一道狭缝。当时清华队伍中陆璀（女）同学，体形纤小，她把棉大衣一脱，爬进城门，抢夺门栓，准备打开城门，放队伍进城，被军警抓获殴打，并擒在城墙上方示众。墙下学生队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陆璀。墙上军警则以学生队伍先解散退走为条件，相持不下，直至深夜。

到晚上9时许，聚集在宣武门外的学生已饥寒交迫，但仍坚持斗争。这时传来消息“冀察政务委员会”慑于内城外城学生示威运动声势，决定声明延期。宣武门军警慑于墙下庞大队伍声势，把陆璀释放回到队伍中来。时已深夜，黄敬登上城楼，号召学生有秩序地撤离。大家虽然饥寒交迫，但仍然斗志昂扬，认为游行目的基本上达到，明白表达了我们反对当局不抵抗日本侵略，搞华北特殊化的政策。突然，埋伏在四周胡同里的军警熄灭路灯，挥舞着皮鞭、棍棒冲向爱国学生，前堵后截，对还未撤退完的学生们进行追打，大打出手，造成“一二·一六”血案，又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这一天战斗中，全市学生被捕30余人，殴伤400余名。

在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不但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迫使“冀察政务”不得不延期成立，也极大地宣传和发动了北平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士。之后，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天津：当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在第二天传到天津时，群情振奋，南开大学等校当即宣布罢课，表示声援。12 月 18 日，天津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召开全市学生大会，通过了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派代表慰问北平学生、要求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提案，并决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宣布从 19 日起全市各校总罢课。

上海：12 月 12 日，上海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马相伯等 283 人发表《救国运动宣言》，热情支持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同时，复旦大学发出通电，对北平爱国学生表示“万分同情，并以绝大决心，为诸君后盾，誓死反对任何破坏国家统一之企图。”14 日，各大学学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爱国运动和爱国言论。19 日，复旦大学等学校的 800 多名学生游行，在经过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人的住宅时，愤怒的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杀死汉奸！”的口号。24 日，3 000 多人冲上火车赴南京示威请愿。反动当局派出大批武装部队，在无锡截住火车，用暴力把学生押解回沪。

南京：12 月 12 日，南京各中等学校学生自治协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响应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反对“华北自治”。18 日、19 日，南京学生两万多人，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这时，北平学联派出学生代表来到南京，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介绍了北平一二·九运动情况，得到了南京爱国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22 日下午，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爱国学生的正义要求，并电慰北平各校学生，发表宣言，吁请各界一致支持。

武汉：12 月 12 日，武汉中等以上 40 余校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对华北时局表示了保卫祖国领土、反对伪自治的态度，致电北平学生“继续奋斗，誓与北平共存亡”，“武汉学生誓为后盾。”17 日，武汉 53 所学校的 120 多位学生代表再次开会，正式成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决定在 20 日举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20 日至 23 日武汉爱国学生多次举行示威集会和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卖国贼！”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

开封：12 月 23 日、24 日，河南大学等大中学校一万多名学生，连日举行游行示威，支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提出严惩北平屠杀爱国学生的凶手等要求。27 日，一万多名学生准备集体赴南京请愿，受到反动军警的阻拦，学生们忍无可忍，开始了为期四昼夜的卧轨请愿，使贯

穿全国东西的陇海路中断，在广大群众中赢得了支持，产生了深远政治影响。

广州：一二・九的消息传来，广州学生积极响应。12月11日，广州学生召开了抗日大会，12日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要求，迅速通电全国，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南京政府卖国政策。后来，他们以进步力量为中心，组成了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会。

杭州：12月10日，上海报道一二・九的报纸传到杭州，浙江大学理、工、农三个学院的同学当即集会讨论，深夜里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联合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万多人，在11日中午正式举行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听到北平一二・一六的消息后，杭州学生发起去南京请愿，占领火车站一整天，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向学生公开道歉。

西安：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西安进步学生收到了北平寄来的宣传品。12月16日，由西安师范、西安二中等校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冲上街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事后，各个学校很快建立了学生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如同上述各地一样，济南、青岛、南宁、长沙、安庆、厦门、梧州、南昌、成都、桂林、太原、扬州、徐州、重庆、宜昌、张家口、宁波、常州……，几乎全国各省市的学生都发出通电宣言，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香港的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也开展了募捐和宣传活动，并发表了救国宣言，成立了救国会。抗日救国，是全国人心之所向，任何人想要逆历史潮流而动，都是办不到的。由于北平爱国学生点燃的抗日火炬，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发展成为势不可挡的全国规模的伟大抗日爱国运动了。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结束之后，北平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既恐慌又憎恨，妄图一举扑灭。于是，当局一方面下令学校提前放假，迫使学生各自回家，不能再集中。同时还下令学校派代表到南京聆训，企图拉拢部分学生，妄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断定两次游行示威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绝不可能是学生自发的活动，一定是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领导。决定派出大批特务，再次破坏北平地下党组织。

针对这个局势，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成员彭涛，省特派员李常青，立即召开了紧急碰头会，研究了国民党可能采取的行动，如何防止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及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等问题。会后，市临委指示彭涛连夜召开



学联成员会议，进一步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第二天，谷景生秘密与学联主席郭明秋在中山公园接头后，听取了学联开会讨论的情况，并向郭明秋交代当前要做的三件事：一是要继续组织学生罢课，反对提前放假，反对派代表对南京聆训；二是派代表到上海，向各界介绍北平学生运动情况，以扩大运动的影响，寻求全国的支持；三是收集在游行示威中受伤学生的血衣，举行展览大会。并组织各界同胞慰问受伤学生，以此揭露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之后，在北平市临时委和学联的领导下，爱国学生运动一直方兴未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然而，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此刻却严峻地提到了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面前。这些年轻的领导者们开始讨论着、思索着。就在这时，也就是在1935年底，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学生运动已有了极大发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士兵的斗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举行后不久，12月20日，中共共青团中央向全国爱国学生也发出号召：爱国学生们，要使我们的运动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必须要与国内广大民众的斗争相结合，帮助他们，唤醒他们，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这些精神，像灯塔一样给当时的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成员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根据共产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北平市临委成员及时召开会议决定，北平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学联联合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由董毓华、宋黎、江明（姜文斌）担任总指挥，彭涛为党团书记，带领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团的学生们到农村后，看到了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听到农民血泪控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民众中蕴藏着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许多人由此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很快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民先队的产生于壮大，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运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各地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1935 年 12 月平津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1936 年 1 月又成立了华北学生联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学生运动开始走上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爱国学生“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到民间去！”1936 年 1 月初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河北农村，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1 月下旬，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在京（南京）沪铁路沿线的农村，用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在沿途各地组织了农民救国会、民众救国会。广州、徐州、济南等地学生，也先后到农村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各地学生到农村去进行宣传，不但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带给了广大农民，也使青年学生从农民那里受到教育，得到锻炼。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 年 2 月，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镇压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逮捕爱国学生。本月，仅北平被捕者就达二百余人。3 月，河北高中一学生惨死狱中，消息传出后，北平学生于 31 日举行了抬棺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有 50 余人当场被捕。5 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学生运动进一步与社会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以“防共”为名大量增兵华北，并在古北口等地筑炮台。5 月 28 日，天津学生和工人举行示威。6 月 13 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罢课，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天津、北平学生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示威游行迅速扩大到全国，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掀起了一二·九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怒潮。

三三一抬棺游行，是 1936 年 3 月北平学生举行的一次抗议国民党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斗争。一二·九运动后，面对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国



民党政府开始实行高压政策。许多爱国学生被捕，大批进步学生被开除，不少爱国教授被解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产生了“左”倾急躁情绪。3 月 9 日，被捕的北平十七中学郭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消息传出，爱国学生纷纷要求学联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3 月 31 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郭清大会，1 300 多学生骨干参加了追悼会。国民党当局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报告后，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到会学生群情激愤，有人提出抬棺游行，多数人同意，从后墙拆开一个缺口冲出，由北池子向南池子抬棺游行。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大批军警冲散，许多学生受伤，54 人被捕。被捕学生经多方营救，多数陆续出狱。北大校长蒋梦麟乘机宣布将被捕学生开除，并停止北大学生会一切活动。其他学校的学生会和救亡团体也遭到了破坏。这次斗争虽然是英勇的，但却是失策的冒险行动，使学校中的进步力量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使学生爱国运动退到了很大困难。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始纠正这种“左”倾错误。

1936 年 5 月天津学生为抗日救亡举行了“五二八”示威游行。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发展的基础上，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学联“十一大”期间，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响应全世界学联的声援，同时追悼一二九被军警逮捕后惨死在狱中的北平学生郭清，在中共天津市委组织下，天津各校学生 5 月 23 日–5 月 25 日全市学生罢课三天。随后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增兵。学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全市游行示威。5 月 28 日晨，男女中学在天津市学联统一组织下，集合队伍走上街头，参加全市大示威。提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猖狂走私”、“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在市东南角交通要衢处召开万人市民群众大会。继北区学校代表法商学院学生朱纪章演讲后，学生吴祖贻代表南区学生发表了《抨击国民党政府媚外政策和华北时局的演变》的演说，会场上市民义愤填膺，振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学生把华北危亡的形势和 1936 年夏日军屠杀天津工人的惨状，向天津和全国人民作了有力宣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次游行示威是成功的，唤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团结了军警，扩大了影响，达到了反日示威的目的，使天津市和全国的抗日救 亡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

1936 年 6 月北平学生为抗日救国而举行六一三示威。1936 年 6 月，在中华全国学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共北方局决定由天津学生发动一次

游行示威，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天津学生“五二八”示威之后，6 月 13 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并在鼓楼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天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等议案。在天津“五二八”和北平“六一三”示威之后，上海、广州、南京、广西等地的青年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起而响应，掀起了一二·九运动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

宋哲元当时是华北的头号实力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两项要职，掌握着北平、天津及河北、察哈尔的军政大权。1935 年 12 月，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三省后，加快了侵占华北、吞并中国的行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平津地区爱国学生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以宋哲元为首的国民党冀察当局仍然对日妥协求和，抱定“不战不降不硬不软”的宗旨。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横冲直撞、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宋哲元的统治，迫使他不得不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和前途。他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曾经表示：“若日军仍增兵占领华北，必将与二十九军将士实行抗日”，“在二十九军内部，不乏在喜峰口参加过抗日救国的爱国将士”。加之宋哲元身处北平，对学生抗日救国活动耳闻目睹，这种情绪对宋哲元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具有比较强烈的抗日情绪。“五二八”、“六一三”学生抗日大示威，对宋哲元也是强大的压力。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曾要求二十九军镇压天津学生运动，但宋哲元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并发表讲话说：“平津学生游行事件，日方表示颇为严重，实则学生尚无轨外行动，不便取缔”。这表明宋哲元的立场有所变化，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

当时，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和学联通过多种形式向二十九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6 年 6 月 2 日，北平学联派师大、平大、东大、镜湖、大同等五校学生代表到南苑二十九军兵营请愿，向二十九军的尹副官长递送了请愿书。在谈话中，学生代表指出：现在平津的情势是万分危急，已经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实在也是二十九军的生死关头。为今之计，只有全力奋战才有生路。为了国土的完整，为了二十九军的安全，人民一致拥护二十九军继续以往的抗日精神，抗战到底。尹副官长对学生代表说：二十九军对学生运动极为同情，每见同学们示威的英勇，深自惭愧。现在华北危亡日甚，我们对于爱国学生的行为更表同情，我们真愿与爱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们站在一条战线上，齐心用力的干一下。日本若一定



逼我们南撤，我们必与之一战，我们是国家的军人，我们誓死保卫平津，决与平津共存亡！学生代表表示民众决以全力支持二十九军继续抗日，无论在精神方面，或物质方面，中央不接济也不要紧，只要抗日，民众一定一致的帮助，拥护到底。

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走到西单北槐里胡同时，意外地遇到了宋哲元的小汽车。学生们于是一拥而上，递给宋哲元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宋哲元看后，微笑而去并让学生们到景山集合。当天下午，宋哲元派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他表示：二十九军一定本着光荣的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响应全国民众的要求，和一切不要作亡国奴的人们合作，担负起解放民族的重大责任。这时，会场弥漫着激动欢快的气氛，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首救国歌曲。

北平各校学生还积极参加二十九军在西苑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官兵交朋友。学联指派了爱国学生去军中做球类教练，教唱歌，或与二十九军官兵联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剧，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1937年4月，中共领导下的天津学联成立了一个“通信剧团”，每周一、二到附近农村和军营中演出爱国剧目。他们多次给二十九军演出，深受官兵欢迎。此外，学生们还多次与二十九军开展联欢会、交谈会、演讲会，并与之开展篮球赛、足球赛等联谊活动。1936年9月18日，正当各校学生沉痛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时候，驻防丰台的二十九军一个连士兵与日军发生冲突。9月20日，学联动员了数万群众，向穿越北平城的二十九军官兵夹道欢呼，称颂其抗日举动。学联派代表见宋哲元，宋表示：“绝不作汉奸”。同年11月，二十九军先后在北平红山口和河北固安举行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参观团去慰劳参观。演习后，学生和士兵交谈，并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等口号。接着举行献旗典礼，北平学生团体向二十九军赠送锦旗，上书“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等字。清华大学学生把绣着“国家长城”四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二十九军。宋哲元接过锦旗，十分高兴地连声说“好！好！”二十九军全体官兵表示，要维护领土主权，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

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扩大起来。12月1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再次发表宣言，提出八项救亡主张：（一）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公布过去的外交经过；（二）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

族统一战线；（三）停止一切内战；（四）武装全国民众；（五）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六）罢免并惩办一切卖国的亲敌的官吏；（七）对敌经济绝交，全国恢复抵制仇货；（八）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紧接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也正式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表示对任何压迫，无所畏惧，呼吁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1936 年 2 月，国民党中宣部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把爱国救亡运动说成是“共产党阴谋”，借以威吓各界爱国人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一文，严词批驳国民党中宣部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恶意攻击，要求国民党政府“纠正自己的谬误”，“转变”“亡国灭种的政策”。

妇女界也奋起了。1935 年 12 月，上海妇女界成立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全国妇女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并举行游行示威。

1936 年 2 月，上海大公纱厂日本监工打死中国工人，上海工人立即举行了反日示威和罢工。这次斗争推动了已经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1 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至 12 月，先后参加罢工的共 26 个厂，四万五千余人。为了响应上海工人的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三万多人，在 12 月宣布总罢工。上海、青岛工人的大罢工，带有浓厚的抗日性质，并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融成一体。

在全国各抗日阶级、阶层、团体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基础上，193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 20 余省市 60 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七十余人。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 40 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 14 人为常务委员。大会宣言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说：“我们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取领导权，不替任何党派争取正统，而只是要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我们要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独立性，而决不愿帮助任何党派去攻击任何党派。自然，对于任何当局对敌人的妥协，我们是要反对的，是要严重抗争的。”宣言指出：国民党中央当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主张，大会“在原则上完全赞成”。但大会认为国民党“一面主张精诚团



结，而一面又主张暂置外侮于不顾，先以内战手段排除异己"；尤其最近颁布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不但丝毫没有表示放弃一党专政，反而想进一步在立法上巩固一党专政的基础，加紧对异己势力的压迫。"这种褊狭的、意气用事的见解和带有权术意味的手段，和精诚二字是背道而驰。"宣言向各党各派建议：（一）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的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性文章。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绝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全国各党各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可以有不同主张"，"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互相宽容是联合战线的第一要义"。"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他们指出：（一）蒋介石"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应该赶快设法，作抗日救国的真正准备"。希望蒋介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这三件事做到后，"内"不必"安"而自"安"。随后更希望蒋介石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二）同情西南当局出兵北上抗日的宣言，但希望西南当局"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当局对立的态度"，并在自己直接统治的区域内"使人民有抗日言论及行动的绝对自由"。（三）希望华北当局"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不再逮捕殴打抗日的民众"。（四）希望"握着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五）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那些足以削弱

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纠正”“共产党里面的左倾幼稚青年的个别行动”和“宗派主义包办方式”。（六）希望一般大众了解，目前我们民族的大敌只有一个，我们只有把这共同的大敌打败以后，才能彻底解决一般民众的生活问题。所以在目前，我们“只有暂时忍耐些，迁就些，避免为了我们内部的纷争，削弱抗日救亡的力量”。民众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

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纷纷成立，救亡刊物也大量地涌现出来。据统计，全国救亡刊物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虽有国民党政府的查禁和扣压，但每期发售量达 15 万份以上，创国民党统治区刊物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创建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的一个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左翼革命青年组织。

1935年12月9日和16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大示威。这两次示威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北平的学生运动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如同历次的学生运动一样，在一两次示威以后，群众的情绪就渐渐地低落下来，队伍也开始分化。而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则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种情况表明，学生运动需要核心，没有领导核心，要使学生运动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等同志几次在文章中向学生运动领导人提出成立领导核心组织的建议。

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以团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的宣言》，谆谆地告诫学生们：不要犯关门主义的错误，要“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党中央的号召，给学生运动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深入民间，宣传抗日，发动群众。12月23日前后，天津学联代表到北平慰问同学。12月26日平津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并着手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参加过“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的清华、燕京、中法、朝阳、辅仁等大学的部分同学都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规模达五百人左右。团内有党的组织，其领导者董毓华、宋黎、江明、彭涛等都是共产党员。

平津学生的南下宣传团分四个团，一团由北大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当团长，二团由东大、师大、中大、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法商学院担任，三团由清华、燕大、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部领导是黄华，吴承明等；四团是由天津的大中学校

组成。宣传团分三路，于 1936 年 1 月初始，徒步数百里，冲破反动派设下的重重障碍，至 1 月下旬结束宣传活动。

平津学生在南下宣传中取得了重要收获。他们了解到中国农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这使他们更加同情农民，更加厌恶痛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同时他们也看到：农民拥护学生的爱国主张，反对军警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认识到学生与农民有着共同的敌人。学生们还看到，农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当他们接受了革命道理后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决心和力量，则是知识分子难以比拼的。于是，学生们逐渐抛弃、轻视工农、轻视劳动的观念，下决心与工农相结合，全心全意地为工农服务。基于这种思想感情的转变，学生们要求建立先进青年的革命组织的愿望更为强烈和迫切了。

2 月 1 日，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便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代表大会，商讨新建组织的名称和宗旨。经讨论决定，新建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追求民族解放为一切工作的宗旨。2 月 16 日，“民先”发表宣言，宣布自己的斗争纲领是：（一）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三）成立各界救国会；（四）铲除汉奸卖国贼；（五）打倒傀儡政府；（六）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充作抗日军费；（七）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八）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众共谋解放。民先总队部的机关报命名为《民先队报》，主要内容是报导各地救亡运动的情况，发布民先总队部的文件，宣传民先队的政治主张。由于印刷所和经费的种种困难，刊期不固定，报名也时常改变。最初用《民族解放》等比较“红”的报名，常被国民党邮检机关检查没收，后来改用《一周间》、《我们的生活》等比较灰色的报名，并采取分散寄发的方法，或者夹在宣传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等刊物中邮寄，一般都能发行出去，有的还能寄到巴黎、里昂和东京去，形成一个广泛庞大的通讯网。

“民先”的显著特点是将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仅总队部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还规定：“民先”的各级组织除了接受上级组织领导外，也要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分队以上干部的选举也是在党支部领导之下进行的。

建队之初，全市“民先”共有五个区队、26 个分队，队员三百余人，全部是参加南下宣传的学生。1936 年 5 月 17 日总队部召开“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在统一战线条件下如何争取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问题。这次



会议对“民先”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年暑假，“民先”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1936年7月30日，北平市公安局呈北平市政府文：据密探报称：查得民族解放先锋队，系共党外层组织，于去年一二·一六运动以后，扩大宣传团返平时成立。目的为吸收坚决分子入党，并实习军事训练，近又利用暑期在香山一带举行露营，实习游击战争，其基础分子多为大、中各校学生。学生以外，闻尚有少数工人及市民参加。北平队在6月间有1 300余人，现在约达2 000余人。谨将其组织系统及暑期工作大纲一并呈送。等情。据此，复查工作大纲文意虽标榜救亡工作，实际以此号召群众，内中系共党操纵，其第三项组织工作栏内有：“我们在此暑假期内首先要把天津、上海、广州、……十一地的民先建立起来”及“与爱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学教员取得联系”又“在工农小市民间设法开展组织”。

这时不仅川内各大城市，就是法国的巴黎、里昂，日本的东京都有了“民先”的组织与活动。同年8月为了适应当时的具体情况，总队部发出《关于改造组织的决定》。这时“民先”已经从五个区队扩大为九个区队，队员达到1 200余人。1937年2月，“民先”在北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全国24个单位的代表参加。会议就建立全国一致的纲领、统一的组织系统以及工作方针等问题作出了决议。这时队员发展到六、七千人。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6年2月1日，由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成立。1937年7月民先队发展到2万多人。抗战爆发后，总队部由北平先后移驻太原、武汉、延安，大批民先队员走上抗日前线。中华名族解放先锋队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时期。

第一时期，从建立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民先”的中心任务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加强队员自身政治、军事方面的学习。“民先”主动放弃了诸如游行、罢课等斗争形式，而经常以露营、爬山、集体行军、游击战演习、组织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活动。这样“民先”就成了引导知识青年参加实际斗争，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的学校。1936年7月，北平市公安局是北平市政府文中提到：共党市委领导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近．来在平积极活动，在师大、北大各有支部现已有会员四百余人，均分散在各校及报贩中。近发表第二次宣言，内容：联合各党派各社团一致形成有力之“反日阵线”等项。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先”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

对宋哲元以及二十九军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工作，使宋哲元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所转变，几次向学生表示愿意抗日。这样就改变了学生与冀察当局、学生与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为“民先”的下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基础。1936年10月，北平70余名大学教授和讲师发表抗日宣言。“民先”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北平学联”发动支持宣言的签名运动。结果签名的群众达到十万余人，不仅宣传了抗日，而且和教授、讲师等社会人士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

第二时期，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民先”的中心任务是为实现全民抗战而斗争。在这期间，“民先”和“学联”发动了多次赈灾运动，发动群众募捐，赈济被日寇演习蹂确的郊区农民等活动以及为支援绥远抗战而发动的“万件棉衣运动”，都是根据这个中心任务组织的。抗战需要军队，当时的北平驻军是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所以“民先”就把对二十九军的工作确定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他们采取的工作方式有三种：第一，是通过赛球、联欢、教唱歌等方式接近二十几军广人官兵，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第二是参加军训，在军训中和二十九军官兵交朋友，并在交往中宣传抗日。第三是参加学兵队，通过学兵队进行工作。1937年2月，二十九军在南苑创办学兵队。“民先”派遣队员参加学兵队，准备拿起武器走上抗日战场。他们在学兵队内进行了抗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当然，在“卢沟桥事变”中，二十九军能不畏强敌、奋起抵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党通过“民先”所做的大量工作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时期，即在“卢沟桥事变”以后。该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其成员及广大青年支援抗战，奔赴抗战第一线。抗战爆发的第三天，“民先”就和“学联”等抗日团体一道去宛平慰问二十九军。当他们在慰问中了解到部队修建防御工事急需麻袋的时候，就立即通过“学联”发起了“万条麻袋运动”，很快就征集了堆积如山的麻袋，保证了部队的需要。“民先”还向冀察当局建议成立动员委员会，在青年中建立总指挥部以便发动一切力量保卫平津，可惜这一建议没有被接受。北平失陷以后，遵照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一些“民先”队员从西直门的水道钻出城来，组织了著名的平西游击队。后来，打得日寇城门昼闭、一日数惊的第五支队的指战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民先”队员。

在发动平郊游击战的同时，一批又一批的“民先”队员走向华北其他各敌后战场。据《新华日报》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经“民先”介绍到解放区的革命青年即达七千余人。所以，当时流传一句话，即在华北，“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民先，”。“民先队”员，组织学唱《民先队队歌》，在村镇写抗战标语，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等抗敌群众团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先”总部从北平撤至太原，太原失陷后撤至临汾，继而又撤至西安。1938 年 4 月 1 日，“民先”总部在西安召集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各地登记的队员达到三万余人。之后不久，为了保卫武汉，总部又撤到武汉。不料正在人们废寝忘食地为保卫武汉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却在 8 月 20 日以整理和登记民众团体为名，下令解散“民先”等三个革命团体。为此，中共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于 21 日发表社论，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提出抗议。从那以后，“民先”总部虽然解散了，但不少地方组织仍在坚持斗争。一部分进入解放区的组织和队员，后来都加入了。总部设在延安的中华青年救国会，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优良传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同人民大众相结合。只有这样，学生运动才能做到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和行动才能更符合人民人众的心愿，才能产生出持久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刘少奇前往华北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当时，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实现党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领导，1935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河北省委为基础，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规定在指导整个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辖区内党的工作时用河北省名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存在过多个北方局。1924 年 12 月 7 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上，决定成立“常设性”、“享有全权”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李大钊任书记、谭平山为副书记。北方局负责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满洲等地党的工作。1925 年初即撤销。1927 年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9 月初，中央北方局在北京成立，书记王荷波，秘书长蔡和森，委员有彭述之、张昆弟、刘国庄、杨善南。负责领导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的党组织。9 月下旬，北方局从北京迁驻天津。10 月 18 日王荷波在北京被捕，不久牺牲。由蔡和森主持北方局工作。11 月 11 日，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重设北方局。1930 年 8 月，由顺直省委改组而重建北方局，统辖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太行分局、晋绥分局等华北各战略区的党组织。书记贺昌，组织部长阮啸仙，宣传部长余泽鸿，秘书长陈复，军委书记张兆丰。1933 年 3 月孔原任书记。1935 年 6 月初，中共北方局改组。改组后，由中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工作，高文华任书记，柯庆施负责军事和组织工作，李大章负责宣传和联系外地工作。北方局领导河北省委、陕北特委、内蒙特委和河南、山西、山东等



省的一些地方组织。李大章兼任天津市委书记，王学明任北平市工委书记。11 月，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北平市工委，由省委特派员李常青直接领导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1936 年 3 月，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担任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林枫任秘书长。1938 年 5 月杨尚昆接任书记，1942 年 7 月杨尚昆去延安后，彭德怀代理书记，1943 年 9 月彭德怀去延安，邓小平代理书记。抗战开始后，北方局积极领导华北各地党组织，支持和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45 年 8 月 20 日，改称晋冀鲁豫中央局，北方局正式撤销。

瓦窑堡会议后，为实现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加强对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1935 年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前委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有机战争的领导，大胆的运动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既是为加强北方局工作，也是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此，北方和天津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当时，尽管通过遵义会议在红军和苏区纠正了王明路线，但是在华北地区，由于和中央联系不便，却转变迟缓。在华北白区工作中，虽然有一些同志坚持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但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左"倾路线仍占统治地位。在组织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打倒一切，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

1936 年 2、3 月份间，刘少奇来津。他遵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阐明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要转变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他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要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

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刘少奇对于这种“左”倾错误做法，积极纠正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予正确的指导。

例如，1936 年 3 月 31 日，北平学联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单股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是先进分子脱离广大青年采取的冒险行动，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这次行动，使许多原来没有暴露身份的学生干部被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共产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有地消耗掉了。

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 4 月 5 日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同志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的批评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起了很大作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和部分教授与学生的对立的情绪，打破了学生的孤军苦斗的状况。根据刘少奇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一致救亡的指示，各校学生提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学生会为此组织了形势多样的活动。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1936 年春成立于北平，以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各个方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半公开组织。后来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华北“各救”重心由北平转到天津，在冀东地区和河北省的许多县城建立了分会，还建立了华北各地的学生救国会。接着，1936 年 6 月 1 日，由华北这些团体发起，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团体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为理事。当时，在华北“各救”中，党的力量十分活跃。共产党员王仲华（代表“青救”）、赵观民（代表“工救”）、张志清（代表“妇救”）、李运昌（代表“各救”冀东分会）等同志，在“各救”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共产党经过各界救国会、学生会等办了几十个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并组织了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等。共产党通过这些非常适合形势发展需要的组织形式，发动群众请愿、罢



工、游行、示威，进行宣传鼓动，宣传了党的政策和在群众中的影响。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争取国民党上层及其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也积极地开展起来。在天津，争取了粤桂系的代表刘绍襄，大学教授马漆廷赵飞克，电报局局长王若僖（国民党）等参加了“各救”。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原来镇压过“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刘少奇等人分析，在日寇进逼，全国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8 月 14 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派朱则民、刘昭等同志打入宋哲元的部队，加紧对中上层军官的联络和争取工作。还派了一些人，对石友三、万福麟的部队做工作。平津学联开展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北平学联诚恳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同时学生们还同驻留在华北的东北军进行座谈、联欢等活动。

通过“各救”不断派群众代表对华北的各个军队进行慰问和宣传鼓动。当绥远国民党军队对日抗战以后，“各救”进行了募捐支援，派代表到绥远百灵庙进行了慰问。这些工作，对于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尤其是二十九军转向抗日，在尔后的卢沟桥事变时揭开全面抗战的序幕，起了重大的作用。

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适时地提出党在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准备与积聚力量，为武装保卫平津、华北而战。刘少奇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

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刘少奇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同志，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敬同志，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共产党内的认识，从开始主持北方局工作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先后以陶尚行、吕文、莫文华、KV、胡服等笔名在《自由评论》等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等 30 多篇理论文章、报告及通讯，从政治、思想上廓清并清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全面总结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刘少奇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内外的政治认识，使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1936 年 4 月 10 日，刘少奇以 K. V. 的化名在北方局的秘密刊物《火线报》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深刻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共产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在白区工作中否认保存和聚积革命力量的必要，否认保存和巩固党是基本的任务。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要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要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推动这个矛盾的爆发。要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力量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要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

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自以为最“革命”，一切不合作，结果孤立了自己，反而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还表现在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不懂得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去进行；秘密工作的范围又应尽可能使之缩小，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来进行。二者必须在人员上、工作方式上严格区别开来。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他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再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阻碍党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刘少奇在《火线》上发表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对统一战线作了系统的说明。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驳斥了共产党内怀疑和反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错误观点，具体论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与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总任务和总政策的关系、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抗日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强调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长期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特别要注意反对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思想。

刘少奇一方面统一党内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以陶尚行的名义，公开写文章给国家社会党机关报《自由评论》，答复张东荪讨论共产党新政策的文章。刘少奇的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解释了党以统一战线为中心的各项新政策，驳斥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共产党的各种错误批评，在党内党外均起了极大的作用。在宣传统一战线的同时，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统一战线的实际组织工作。当时，有被派到北方局工作的马辉之等，有被派到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楚离等，在北方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界救国联合会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

同月，刘少奇根据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撰写《白区职工运动的纲领》，阐述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策略任务，不是脱离群众，实行冒险的进攻，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第二，要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共产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

作，必须特别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第三，在强调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时，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对于党已经掌握的黄色工会，亦不应该立即将它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为赤色工会。第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公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

刘少奇的这些文章和他写的党内文件，确实是八·七会议以来无数革命先烈在白区工作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从思想理论、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上对党在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清算。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这些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不仅写了一系列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文章，而且及时地对华北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使党内多数同志在对党的策略路线的认识上，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正确配合上，在如何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以及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的问题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除发表文章以指导华北党组织的工作外，还经常与张闻天书信往来，探讨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1936年7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张闻天，汇报北方局的工作，并派人携带信件回保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张闻天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非常重视，并对汇报信中提出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同时用中央书记处指示信（即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信》）和洛甫致胡服（刘少奇）个人信件两种方式给予答复和具体指导。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根据刘少奇的指导，当时充分而适当地利用了一些党员个人的合法身份，参加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尽管党是秘密的，却通过这些党员，深入到了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各阶层取得广泛的联系，进入了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机关和刊物。这样，就使得一些团体成为开展斗争的支点和堡垒；使党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团结、带领群众前进；同时，由于使党员和党的组织尽可能隐蔽到各种群众团体和机关中，也



减少了被敌人破坏的危险。党在公开团体的掩护下，秘密地发展了党的组织。这样，共产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防止了共产党受到破坏。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根本改变了“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状况。

刘少奇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活动，使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划分和适当的配合，使共产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之中，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全民抗战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36 年 8 月 5 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对北方局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信中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恢复整顿各地党组织

在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同时，刘少奇还从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进行华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

他首先对北方局进行了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调到北方局工作。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北方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并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到人员分别设立。改组后的北方局领导河北、山西、山东、绥远、河南、内蒙垦区党的工作。

与此同时，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1936 年 4、5 月间，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6 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任命李铁夫为天津市委书记。在中共京东特委的帮助下，1936 年夏秋之间，唐山市工作委员会成立，9 月改归河北省委领导。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在此期间，北方局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五千多名。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此外，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黄敬等一批干部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1936 年 9 月，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12 月，建立广州市委和香港工作委员会。



其次，为一大批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统治时期受到错误打击和处理的干部予以平反。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北方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至1936年底，党员数量已发展到5 000人左右。其中，天津党员数量由年初的30人左右增加到400余人，在许多工厂、部分大中学校和一些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支部，为进一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北方党组织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加强，天津和整个北方地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策略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在党的领导下，天津民众救国会、天津工人救国会、天津农民救国会、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天津市各界救国会，形成了一个包括全市各阶级、各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中共天津市委还发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游行，并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前，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都设在上海。到了1934年，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撤退到苏区，江苏省委以及所属区委、支部几乎全部遭到破坏。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有城市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到国统区各重要省市恢复重建党的领导机构，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国共合作抗日新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任务。

1935年2、3月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潘汉年、陈云先后辗转到达上海后，因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难以立足，于是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前往苏联。为了同经历几次大破坏以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个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

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等40余人

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救国会活动异常活跃，群众性集会、游行和日资纱厂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非常尖锐。由于被破坏后的上海地下党和中央失去联系已将近两年，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冯雪峰向宋庆龄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还就以后地下党和她的联络问题征求意见。然后冯雪峰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开展当地党的工作是其重要任务之一。1936 年 9、10 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年底，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党的组织。自 1936 年春以后，"救国会"的活动在地下党领导和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及时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工作开展得更广泛、活跃和得力。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不幸病逝。宋庆龄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委托，以对鲁迅无比深厚的战斗情谊，全力主持了鲁迅的丧事。根据宋庆龄的意见，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来办；通过悼念鲁迅活动进一步发动群众，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去。在公开吊唁的三天里，上海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前来瞻仰鲁迅的遗容。在送葬时，宋庆龄、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群众队伍约有两里多路长。鲁迅的灵柩上，复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绸旗，人们高唱着："……呵，导师，呵同志，你活在我们心里"的悲壮挽歌。鲁迅的葬礼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战斗性的爱国活动，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11 月中旬，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 70 周年的活动。宋庆龄在她的纪念词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说：在目前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提法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精神，即中共在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重大转变。这对救国会以后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1 月 22 日深夜，上海国民党警方会同租界巡捕非法拘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他们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



良，就是举国震惊的“七君子”事件。在恐怖气氛中，宋庆龄以救国会执委的身份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她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她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等的领导和配合下，宋庆龄带领救国会很快掀起了一个国内外援救“七君子”的运动。一些国民党政界、军界高级人士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了十万人签名运动。李宗仁、白崇禧发出营救电报，张学良飞赴洛阳请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这对半个多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张学良、杨虎城为解决西安事变所提出的八项建议，其中之一“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七君子”，蒋介石当时同意了，但过后又违背其诺言，罗织了“十大罪状”开庭审讯七君子。宋庆龄忍无可忍，在1937年6月27日和何香凝等12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他们自请入狱，要求和七君子同“罪”。7月5日，宋庆龄带领救国会的胡子婴、胡愈之等12人，提着箱子，带着雨伞前往苏州要求高等法院收押。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掀起入狱运动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敢公开镇压，无可奈何，在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宋庆龄代表民族精神的“怒吼”，使反动势力为之慑服。她的崇高威望和斗争策略，使蒋介石几度策划暗害她的阴谋没有实现。

1935年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重建。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先后派人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工作。从此，陕西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受中央直接领导。随后，云南、广西及福建厦门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或恢复。

这一时期，有的地区虽未恢复和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发的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随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领导干部。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决定上报中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从北平的国民党监狱中，将王若飞、薄一波等一大批长期坚持斗争的党的领导骨干营救出狱。这些干部随即被派往华北各地领导革命斗争，从而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

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1936 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8 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 月，刘少奇和北方局听取薄一波关于山西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赴山西，与薄一波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 月 22 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 1935 年 7 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的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到 1936 年 12 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刘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在北方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



学联和“民先队”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热潮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学生联合会为扩大全国学生抗日救国组织，于1937年6月派杨蕴清从北平到贵阳负责筹组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贵州学联），得到了贵州中共党员和学生的大力支持，经过近一个月的筹组，1937年7月2日召开了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委会，成立了贵州学联，选举了主席和负责组织、宣传、联络的成员。之后，又在贵阳师范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女子中学、省立高级中学和省立贵阳中学等五所学校建立了学联支部，均分别由中共党员任支部负责人，各支部下设若干小组，以各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和读书会会员为骨干，利用学生自治会为活动阵地，通过各学联小组去联络进步学生开展活动。

贵州学联成立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再次掀起抗日救亡浪潮，贵州学联迅速行动，在各校采取办墙报、成立抗日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举行示威游行等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贵州学联为指导各校的抗日救国活动，还秘密创办了《贵州学联》会刊，发表了《告同学书》，号召全省学生在民族危机之时，挺身而出，组织起来，掀起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除在学生中组织开展活动外，贵州学联还动员进步学生参加到由文艺界人士发起组织的“贵阳文艺抗敌救国会”这一团体当中去，使该团体的进步人士在人数上占了优势，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掌握该会领导权、利用其倒行逆施的企图。

1938年初，贵州学联利用国民党贵州当局组织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的机会，组织学生在寒假期间到城乡、到民众中去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由于学联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不少中共党员和学联负责人被推选分别担任了各校工作团的团长及干事，实际掌握了工作团的领导权。

1938 年 1 月 18 日，各校工作团在省民众教育馆联合举行“省会各中学扩大抗敌宣传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同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歌咏队演唱等，晚上还举办了话剧表演，连续三天演出了《九·一八以来》、《血洒卢沟桥》、《打鬼子去》等剧目，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称赞。

寒假开始后，各校分团即按计划组织学生奔赴农村，深入乡间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向他们进行抗战宣传，还开展了张贴标语、调查研究、表演话剧、演唱抗日歌曲等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各工作团返回贵阳后，又联合在贵阳城区进行宣传，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称赞和支持，一些进步教师、作家、音乐家也直接参加了学生们的活动，用他们的特长配合学生的抗日宣传。

由于学联的活动影响不断扩大，遂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力图予以扼杀。1938 年 2 月 19 日，工作团为举行联合公演，正组织成员在省民众教育馆排练话剧时，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将工作团分团长于蕴、王拭、聂奇慧五人诱骗到县党部予以逮捕，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在民众教育馆排练的人全部包围，逮捕了李德邦、饶元祚、方为策五人，随后又在贵阳青岩逮捕了周树楹，这样，一天之内国民党当局共逮捕了七名学联领导成员，制造了震惊全省的“学联事件”（或谓“二·一九事件”）。2 月 21 日，贵州反动当局通过侦查，又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成员黄大陆、李策和机要员严金姓 3 人。

事件发生后，中共贵州省工委和社会进步人士进行了积极的营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冯玉祥等也出面与有关方面交涉，贵州当局才不得已于 3 月 4 日释放了于蕴、聂奇慧等 6 人，但仍以种种罪名和借口将黄大陆、李策、严金姓、王拭继续监禁，并于皖南事变后将他们秘密杀害。

“二·一九事件”后，贵州学联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全省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和斗争精神并未被扑灭，他们迎着逆流，前仆后继，继续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青年为扩大统一战线，在中共长江中央局积极领导下，于 1938 年 3 月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学联二大）。它的召开标志着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青年运动中的重大胜利。



早在 1936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以北平学联为基础团结了 16 个中心城市的 20 万学生，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学联。学联的成立对推动全国学运的开展，加强与世界“青联”和“学联”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但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推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仅半年时间，日军侵占我华北和沪、宁、杭地带，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而国民党的党、政、军重要机关和各方要人都来到武汉，在野的各党派领袖，各界知名人士云集武汉。此时武汉成了实际上的首都。在武汉，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各种救亡社团，在统一战线号召下，如雨后春笋，逐渐蓬勃发展。为了组织群众、发动青年，中共长江局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团结青年抗日，这就是学联二大召开的根本原因。

1938 年 2 月 9 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筹委会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全国各地学生组织派代表到汉口参加全国学联二大。在中共长江局青委和湖北省青委的具体领导下，大会筹委会根据党提出的“这一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指示，确定了学生的中心任务：“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抗战。”大会宗旨是：统一青年意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学联二大的具体任务是：“（一）建立广泛的全国学生统一组织——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二）与世界学生及我国留学生取得更进一步的联络，扩大国际反侵略运动，巩固和平阵线”。

根据党中央关于“在一切青年组织内必须组织共产党支部及党团，有系统的发展共产党员”的决定，党在中国学生救国联国合会中成立了党团。通过学联组织中的共产党员贯彻党的主张，发挥模范作用，团结青年学生，从而保证党对学联的领导，保证青年学生抗日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至此，中国青年学生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日救国运动中，不仅学联领导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发挥重要的抗战作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指挥青年学生积极发挥作用，推动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先进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在战斗中

组织得更加严密，斗争得更加坚决英勇，成为华北和全国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民先队成立后，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全国各地发展组织，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

1936 年 2 月，“民先”在北平宣布成立，其组织活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贵阳、武汉、山东的一些地方也相继建立“民先”地方队部。

1938 年学联“二·一九”事件后，贵阳的抗日救亡活动暂时受到影响。为了团结广大民众，联合各阶层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 年 2 月，武汉“民先”总部派中共党员张益珊到贵阳开展工作。张益珊到贵阳后，通过黄齐生介绍结识了李良康、饶元柞、凌毓俊等人，着手创建贵阳“民先”组织。3 月，中共贵州省工委在贵阳市大马槽 9 号（今都司路）召开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派一部分党员以群众身份加入“民先”，同时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民先”组织和活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公开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8 年 4 月，“民先”贵阳地方队部正式成立。张益珊任队长、凌毓俊任副队长、李良康任干事，队部设在丁家祠堂（今贵阳冠生园所在地）。队部下设区队和分队。分队是以各校或各工作部门为单位建立，由几个分队组成区队。贵阳高中、女师、男师、女中四个分队组成一个区队，饶元柞任区队长、李德邦任副区队长。贵阳中学分队和邮电分队组成一个区队，方为策任区队长。

“民先”在贵阳的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参加者非常踊跃，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到 6 月底，“民先”队员发展到 300 余人。与此同时，中共党员乔光鉴与进步教师顾诗灵、严林心等人，在湄潭中学秘密建立“民先”湄潭地方委员会，先后发展了 40 余人。中共党员田伯平在沿河组织建立了“民先”沿河分队；中共党员杨斌毅在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谢速航的支持和中共党员李运亨的帮助下，组建了“民先”安顺县队部，队员发展到 100 多人；“民先”队员、贵阳中学学生尹克询与郎岱的刘定华共同组建了“民先”郎岱县队部。

各地“民先”组织及其广大“民先”队员，怀着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是印发传单，宣传抗战，宣传“民先”的性质、任务和特点。二是学习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演练杀敌本领，听游击战争问题报告。三是组织队员参加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会等抗日文艺团体，演出话剧、教唱抗战歌曲。四是举办小型图书馆，



组织队员和青年学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救亡理论，传播爱国主义思想。五是举办时事政治报告会。另外，还组织了讲演比赛、歌咏比赛、篮球比赛等活动以发动更多青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民先"组织在贵州的建立及其活动，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为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对贵州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设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先"在华北虽然已为一般人所熟知，在华中、华南一带却似乎还没有普遍地被认识。因此，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提出"我们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成立武汉队部，集中力量，开紧急动员大会，积极动员起来；响应当局的号召，成立救护队等各种战时工作队；在武汉成立五个突击队，以失业工友为对象，开展动员民众工作。"

"民先"在武汉创建初期的工作是推动华北救亡工作，促进统一战线，加紧队员们的政治军事的自我教育，经常举行集体行军，游击演习，大规模座谈会等等。"民先"成为青年们参加实际斗争，接受集体教育的组织。

1936年山东的民先队也相继建立。4月，参加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烟台学生吕其思联合李丙令、穆林、林江在山东烟台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民先队组织。不久，济南、青岛、潍县、聊城、枣庄等地相继建立了民先队组织。这一时期的民先队员全部是进步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各地的民先组织大都与北平民先总队部发生了联系，直属北平民先总队部的领导。但是全省各地的民先队组织缺乏统一的领导。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流亡学生来到山东，受中共北方局和北平民先总队部的指示，1937年8月，民先总队负责人李昌在济南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建立民先山东省队部，孙陶林任队长，江明任组织委员，武衡任宣传委员。全省各地的民先组织开始加强了联系。这样就使山东全省各地的民先队组织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山东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

"民先"的队伍飞速地壮大起来，暑假给了"民先"一个扩大组织的机会。许多队员把他的家乡作为斗争的分野，积极展开了"民先"的组织，在全国的各大城市里，都建立起了"民先"的队部。甚至在国外的巴黎、里昂、东京，也有了"民先"的队员。

1937年2月，"民先"在北平召开了到有24单位代表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建立了全国一致的纲领，统一的组织系统，并确定了工作的

方针：实现青年统一战线，以充实整个的民族统一战线；打破救亡运动的不平衡，开展乡村救亡工作；负担起文化运动的任务来；准备武装抗战；在一年之内发展队员到五万人（当时已从三百多人发展到六七千人）。

大会以后，虽然没有什么大规模行动，“民先”的工作是更深入了，一切工作都以准备武装抗战为中心。而客观的形势证明了他们的工作方针的正确，民族解放战争的号炮终于在卢沟桥畔响了起来。

神圣的抗战开始了，“民先”的队员都以无比的英勇投身于这次抗战的洪流中。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的第三天，“民先”就和“学联”等团体出发到宛平县慰劳军队，发起募集一万只麻袋运动帮助抗战。当时它还向冀、察当局建议成立动员委员会，在青年群众中成立总指挥部，发动一切力量保卫平津。

虽然敌人占据了北平，“民先”对敌人的答复不断的战斗。一部分“民先”队员爬出城墙去组织游击队。赵侗所部的第二纵队的基本干部，就都是“民先”队员。震动全国的攻打北平监狱，也正是“民先”队员的英勇业绩。

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展，“民先”队员的足迹也遍印于全国。他们到处积极开展救亡工作，帮助当地救亡团体，各地有许多有力的团体，都是在“民先”的帮助下树立起来的。

“民先”在斗争中诞生，也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在 1938 年 4 月间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根据不确实的统计，它已发展到三万多人，而且以农民占半数。其中西北的部队有一万多人，都是在敌人的后方从事艰辛的武装斗争。在陕甘宁青的西北部队有八、九千人，在开辟落后地区的工作。

在北方，一提起“民先”，人们脑海里就会浮起一个勇敢坚强的游击队的形象。这不是没有缘由的。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3 月这几个月间，经“民先”介绍到各区游击队的有七千人。活跃于太行山一带的游击队，其基本干部也大都为“民先”队员。在华北，差不多有游击队的地方，必定有“民先”。而在各部队里当下级干部，在艰苦奋斗的“民先”队员，更不知有多少。

经过长期的斗争，民先队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要深入群众，非得创造许多活泼的工作方式不可。我们曾利用拜兄弟等旧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成效。至于在农村妇女中工作，则更得利用落后的甚至迷信的观念。一个有趣



的例子：我们叫每户人家都出一点面，一点米，把这些米面糅合了起来，然后再分给各家，叫他们做了东西吃，说是吃了可以打日本，同时教他们唱：'十家面，八家米，开水锅里煮日本；你吃手，我吃腿，剩下脑壳给狗啃。'这已经包含了一种集体行动的意味，然后逐渐教他们唱歌等等，把他们组织起来。不过最要紧的是顾到民众的生活上的要求。在山西某处，一个'民先'队员因为替农民向县政府借得了80块钱的信用借款，就深得农民的信仰。而在一个月零十天的功夫中，发展队员至一千多人。"

民先队继承良好的传统，在中共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同时也有坚强的战斗力，有不怕牺牲的优秀干部，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位一体”抗日局面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整个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沦陷的严峻形势，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团结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首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宣言，它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愿望。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给东北地区党组织发出指示信，要求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对敌。5月，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接受中央指示信的决议，明确强调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在东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实践，打开了东北抗战的局面，凝聚了东北的抗战力量，牵制了日本向关内入侵的步伐。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1935年华北事变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公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



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八一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这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形势，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确分析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一方面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首先在西北地区实现了抗日力量的联合，形成了西北团结抗战的局面。

红军抵达大西北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他们的指挥者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为。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忱，为了把他们迅速拉上抗日的轨道，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过后，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写好了三封信，交给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带走。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后，在一天晚上派人把汪锋接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把汪锋接到西客厅谈话。汪锋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杨虎城也问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是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第一次接触。毛泽东在信中向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他与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光大。汪锋三次和杨虎城会谈，做了很好的沟通。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中共派到西北军做联络工作。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1936年5月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从此以后，西北军乱放空枪假打红军，应付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同年8月，毛泽东再次给杨虎城写信，希望他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中共派张文彬作为驻西北军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委任他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加强。

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的家乡已被日军侵占，他们的亲属当着亡国奴，他们天天指望着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是，蒋介石不肯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调到西北“剿共”。热河沦陷后，替蒋介石背黑锅的张学良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召他回国，给他安了个“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头衔，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完成“剿共”任务后，就可以北上抗日，打

回老家，收复东北。可是，东北军完成不了“剿共”的任务。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

东北军第六百一十九团团长高福源，自从做了俘虏，生活便有了新的意义，以至于名垂史册。他被俘的地方是榆林桥，将他捕获的是徐海东指挥的红军第十五军团。高福源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攻打红军完全是被迫的。他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想有所作为。因此他征求了红军首长李克农的同意，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高福源在1936年1月离开瓦窑堡，经过延安，到达甘泉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把高福源接到了洛川，同时密电把高福源回来的消息报告了张学良。其实张学良很愿意和红军联络，第二天就飞抵洛川。

高福源和张学良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高福源，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去见张学良。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驾飞机到洛川找李克农谈判。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月9日黄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由高福源作前导，在延安城内一所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刘鼎和王以哲也参加了会见。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了张学良。他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毛泽东等40多位红军将领写信给蒋介石及西北的国民党将领，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一定和他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至此，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史称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介石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西安事变

随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裂痕越来越深。

1936年8月，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纪念周活动时，杨虎城邀请中共党员宋黎作报告。几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躲在会场角落里，断定宋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散会后，他们跟踪宋黎，进入东大街上的西北饭店，记下他的房号，还查到和他同住一房的是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省党部就在同一条街上，很快接到了报告，马上通过专用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密令逮捕宋黎和马绍周，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想借这件事敲打一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也想从被捕者口中获取线索，深入调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

8月29日，张学良听到特务竟敢抓他身边的大员，非常生气，立刻派关副官前往西北饭店查看。不料，关副官刚走进宋黎的房间，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押到省党部。张学良不假思索，马上派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带着卫队开车赶到端履门，把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见宋黎受伤，又接到报告，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抓到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解南京。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命令刘多荃的一个团，从王曲跑步进城，又命令孙鸣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和进城的部队一起围抄省党部。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鸣九率领卫队营冲进大门，救出了正在受刑的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和档案。其中有许多密电稿，是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可靠，以及西安民众亲共抗日的情况，还有一份黑名单，列的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甚至还有邵力子的黑材料。此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两广事变”刚刚平息，蒋介石还来不及部署对付西北的军事，所以只好暂时忍住，对张学良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这次事件直接打击了蒋系特务的气焰，但同时也为西安事



变埋下了伏笔。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后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 月 12 日晨 5 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南京中央于当晚 11 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 月 12 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 月 13 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12 月 16 日，中央在劝阻张学良无效，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 月 17 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 月 22 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随后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瑞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



“宁抗日，勿死敌手！”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 月 24 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的反对，最后是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12 月 25 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2 月 26 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 17 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点。这次事件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侵华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喜爱，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西安事变后国内外的反应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事变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调动军队，撤掉张学良所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线，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查示威，准备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始终，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学良、杨虎城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平息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的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出现了紧张、复杂的局面。在国内，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政府之间严重对立，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在国际上，如何解决这一触目惊心的事件也成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关注的焦点，引起了重大的国际反响。

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极其展惊，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重视。在事变的处理上力主和平解决，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一面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

以便对付日本。长期以来，在对华投资和贸易占重要地位的美、英两国，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反对日益崛起且有重新瓜分世界强烈要求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尤其是与对中国实施武力侵略、露骨地要把英美资本排挤出中国的日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美、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两国报刊公开责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西安事变发生后，美、英舆论界时刻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为避免事态扩大，给日本侵吞中国以可乘之机，两国驻华使节秉承各国政府的旨意迅速介入此事，力争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和缓。

12 月 14 日（华盛顿星报）发表社论声明美国各方正“注视日本之秘密活动”。12 月 15 日，美驻华大使詹森会见国民党外交部长张群，声称奉本国政府的训令，表示对西安事变的极大关切，同时主张“中国局面和平”。因为在他们看来，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核心也不过要求抗日，是完全可以“妥协”的。同时，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中国在任何代价之下，均需要和平”。英国（泰晤士报》说得更明确：“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①，还认为：“只要南京能够充分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他便不妨在政策上面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②

与此同时，美、英大使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频繁接触，他们代表两国政府的要求，十分赞同南京政府内宋美龄等人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并分别向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③。随后积极策划作过孙中山、张学良顾问，此时已改任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端纳以调停使者的身份出面活动。因此，端纳的西安之行“表面上虽是出于宋美龄的央请，实际上却是本着英、美旨意行事的”。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端纳进入西安后，凭借着他与众不同的特殊身份和不凡的游说能力，在充分了解并及时向南京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张、杨发动事变意图后，继续周旋于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晓以利害，耐心开导，终于使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张、蒋矛盾由紧张渐趋缓和，能够心平气和地谈论抗日问题，为最终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一块基石。随后，端纳又于 12 月 20 日和 12 月 22 日先后两次陪同宋子文和宋美龄飞赴西安，终于促成了西安三方面与宋氏兄妹的和平谈判。

在此期间，美、英于经济上也给蒋介石政府以极大的支持，英国汇丰银



行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使事变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不至于因经济混乱引发更大的政治、军事危机。

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于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企图寻机扩大侵华战争的日本法西斯来说，是一个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好机会，正如日本《朝日新闻》报所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实在是可喜的现象”[④]。因此，在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日本表现出了与美、英截然相反的态度，主张武力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日本驻华使馆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至13日清晨，会议还在进行。日本政府内阁连星期日都顾不得休息，接连举行会议，积极策划侵华新阴谋。14日日本陆军省匆忙炮制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叫嚷“帝国仍然坚持既定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力求其实现”，“照张学良的起兵声明来看，往往会造成对日空气恶化，恐怕会侵害帝国的侨民和权益。在这种形势下，应做好准备，可以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的手段”[⑤]。这个文件充分说明，日本企图“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⑥]为此，12月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做出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

12月16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明令讨伐张学良，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在潼关前线开始进攻，并于当日派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间，死伤居民数百人，时西安因降大雪，气候不利飞行轰炸，才幸免于难。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讨伐”行动，日本政府极力表示支持，企图利用讨伐张、杨，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为了玩弄这个阴谋，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同日，伪蒙古军政府傀儡政府德王秉承日本人旨意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拥护中央，停止进攻绥东，并愿意合作反共，讨伐张、杨。

当事变出现和平解决的端倪后，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依旧态度强硬，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

置之不理。另外，日本还勾结希特勒支持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共组卖国政府，汪精卫接到电报，喜出望外，不顾枪伤未愈，兼程回国。只是轮船未抵国境，事变已和平解决，阴谋未能得逞。

至此，日寇借西安事变制造混乱、趁机灭亡中国的用心已昭然若揭，世人共晓。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出卖国家和民族权益的企图都是难以得逞的。正因为如此，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日本侵华阴谋的败露，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集团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宋美龄正是抓住本企图借西安事变加快侵华步伐这一致命要害，积极奔走，强烈呼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性。宋美龄的活动，使何应钦等主战派在行动上不得不有所收敛，最后被迫同意进行和平试探。主和派除了在南京据理力争外，还极力劝说远在西安的蒋介石妥协。就将由此可见，日本极力主张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险恶用心暴露以后，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反过来却使局势向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反过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骤变深表关切。苏联政府迅即介入，在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解决事变的立场上，共产国际与苏联的立场大体一致。

12 月 13 日，即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苏联电台迅速播发了（真理报》、(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由于对事变事态发展的极端关注和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焦虑，以至于在未弄清事变真相的情况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和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匆忙于 14 日发表社论，社论误认为西安事变是“为日本所策动”的分裂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事件，“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甚至斥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联系，扣押蒋介石是受日本煽动，反对南京政府，破坏人民抗日运动的叛逆行为。为了表明不支持西安事变，16 日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说：“自张学良离东北后，苏联与其毫无关系”，“并努力使蒋介石返回南京重新执政”。19 日苏联驻中国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以相同的内容，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苏联政府自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有极明确之态度，叛党张学良之行为，徒是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在处理事变的态度上，苏联政府惟恐事变处理不当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以可乘之机，并危及远东和平。因此事变后不久便表示对蒋介石的被扣“极表同情”，并主张用和平方法“早日解决”西



安事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不容置疑的态度，给实际上受其控制的共产国际以直接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与共产国际处于上下级关系的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迅速实施。虽然苏联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的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中共中央有电报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有电报给中共中央”。就事变的性质和解决事变的方针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商榷和指导。首先，在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上，中共中央的态度应该说是十分明朗的，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等的革命行动，并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紧急报告，陈述看法。而受制于苏联的共产国际则不同意中共的观点，《国际通讯》著文斥责张学良等发动“兵谏”是背叛南京政府的“叛徒”、“强盗”行为，是亲日派策划的阴谋。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的立场是相同的，与中共中央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如何妥善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对此，共产国际一直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曾于1936年7月向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党要依靠民众的意志系统地为进行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强烈地要求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政策。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曾发文判断：“我们还没有完全可靠的消息说明中共所持的立场，但了解中共的政治路线，大概中共正在提出这样的主张，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⑦

共产国际的指示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实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起了坚定决心的作用和加速剂的作用。12月25日，蒋介石终于许诺同意接受“停止内战”、“联红坑日”等主张和要求，初步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当日下午，蒋介石由张学良陪送飞往洛阳，次日返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圆满的和平解决，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转向抗战的历史转变。

注释:

①③《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 年出版，第 66 ~ 73 页。

②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年出版，第 144 ~ 145 页。

④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40 页。

⑤《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使略史料选编》第 207 页。

⑥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中正书局，1975 年版。

⑦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51 页。



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当时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亲日派卖国投降的阴谋，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内战，实行联合抗日的政策，建立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必要前提，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迎来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中共发动各种势力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当天，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得知这一突发事件后，既感到震惊，又不大敢相信。当晚，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请他证实"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诛之"，即杀也。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对蒋介石，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与会者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爱国性质和革命意义，认为中共对这次事变的态度

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赞成和支持；但是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发出的声音并不尽相同。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主张“把蒋介石除掉”。遵义会议以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事变爆发后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他在会上没有赞同“审蒋”、“除蒋”主张，明确表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成立与南京对立的政权组织，“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可以说，张闻天的这些思想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会议的总结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在政府问题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但会议的基调仍是“审蒋”、“除蒋”。

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12 月 13 日在报道西安事变爆发消息时就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6 日，该报第二版刊登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的“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显然其目的是激发人们对蒋的愤恨，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审蒋”、“除蒋”。

12 月 19 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便正式确定下来。张闻天指出：“在六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地显现出来。12 月 19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 12 月 13 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显著不同，在于中共中央决策层经过对形势的观察，意见已趋向于一致，于是便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和平调停”事变的决策。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后，接连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的应变设想，期望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与支持。在 12 日 24 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报告中共的应变设想外，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可出人预料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反对西安事变，说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12 月 14 日发表评论，攻击张学良，说他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并无中生有地把张学良与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联系在一起。12 月 16 日，共产国际经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主要领导



人磋商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指出："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并提出四项条件，要中共以此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反映苏联与共产国际立场的《真理报》、《消息报》评论很快传入中国，对中共中央确定方针政策有所启发、帮助。

12 月 19 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经过六天对形势的观察，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认为，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发展有黑暗的方面（如南京把注意力集中在蒋被扣押上，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一切抗日要求置之不问，并派兵讨伐西安），也有光明的方面（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扩大抗日力量）。他指出，西安事变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对我们不利，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内战延长与否，既要看国内力量，也要看国际舆论。我们的方针是消弭内战，不使内战延长。

博古的发言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和各个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作了分析。他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表示小资产阶级转到抗日方面来；两广事变，特别是最近西安事变的爆发，更明显地表示出资产阶级已转到抗日方面来。博古指出，在当前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各种力量都在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张学良、杨虎城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公开举起来作为西安事变的旗帜，在此情势下，只要党的策略正确，就可以使西安事变成为发动全国抗日的起点。博古同样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发动大规模内战，二是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反对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前途，反对转为内战的前途，因为内战是中华民族的致命伤，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

张闻天的发言更为全面和明确。他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进行和平调解的方针等问题都作了深刻阐述。关于事变的发展前途，他认为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之扩大"，然而日、德是企图尽量这方面的扩大，因为"这是两个阵营"。关于处理方针，张闻天强调：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同时提出

"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并且说："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关于党的立场，张闻天针对前几天党在对蒋策略上的动摇和反复，郑重而又明确地说：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对的"。他公开批评13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审蒋"主张，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是不妥的"。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张闻天在19日会议上的讲话同13日会议上的讲话比较，精神贯通一致，态度更为鲜明。特别是他把对蒋介石的处置同全国抗日这个大局联系起来，因之态度更为坚决，主张始终如一。为了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哪些方针？张闻天指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学良、杨虎城，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学良、杨虎城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时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①

毛泽东在给这次会议作总结时，集思广益，对有关事变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深刻和明确的阐述。他指出，西安事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还要取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说它实际上是抗日起义。毛泽东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争取这些中间派。面对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双方应实行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用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他在全面分析国内外诸多因素后，满怀信心地预言：现在有争取和平、结束内战的可能。因为反对内战的国内外力量是强大的，而主张内战的只有日本、汉奸和利用战争做生意的人。他接着指出：我们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力争结束内战。

毛泽东在作总结时，把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与12月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电"做了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他称赞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是更为进步的方针。



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之后，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英明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及时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向党内发出指示，说明党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使全党迅速统一了思想。12 月 15 日，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19 日再次通电，向南京及西安双方提出和平解决的四项具体建议。这两封电报，大大地支持了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应西安方面请求，红军主力也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径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确保事变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

中共代表团于 12 月 16 日乘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就在这一天，何应钦竟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宣布了“讨逆令”，明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同时，西安方面，却在摩拳擦掌，等候公审蒋介石，处决这个卖国残民的元凶，以泄压抑数年的胸中积愤。由于事变的爆发极其突然，东北军、十七路军部队内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大部分中下层军官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义举，也有一小部分军官的情绪是动摇的。与此同时，南京方面在事变发生后，派遣大批特务、汉奸浪人西安进行所谓策反，使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一部分人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发生动摇，乃至公开叛变，投降南京。此外，事变之后，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各地方实力派都有代表到西安联络，有的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有的要两面派，妄图坐收渔人之利；有的从中挑拨、煽动杀蒋。与此同时，南京“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所有这些构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肩负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率领代表团来到西安，为实施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对于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张学良毫无迟疑地表示赞同。杨虎城出于对蒋本质的认识，对释蒋却更为犹豫。周恩来出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崇高精神和析理入微的言辞，终于说服杨虎城。这样，张学良、杨虎城都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24 日，周恩来与蒋介石面对面谈判，使蒋介石接受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之计；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等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反遭扣留
各方纷纷准备营救

西安事变结束后，围绕政治善后问题，周恩来和张学良却发生了分歧。为了防止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乃至红军的报复，张学良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独自承受兵谏的政治后果，坚决主张亲自送蒋回宁。东北军将领们当然群起反对。东北军将领在多次哭劝无效后，求助于张学良一向赞不绝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专门找到张学良说，“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但是“亲送大可不必”。但张学良表面不置可否，内心早就下定亲自送蒋回宁的决心。

1936 年 12 月 25 日，为防止周恩来的阻止，张学良没有通知中共代表团就随蒋介石上了飞机，去了南京，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对此，中共和周恩来长期都引以为憾。张学良一生高举爱国旗帜，自己却付出了被软禁长达半个世纪的代价。对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都以感激之情给予高度的评价。早在第一次肤施会谈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曾赞扬张学良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次有决心抗日的将军”，“不顾一切地关心中国民族的前途。”西安事变后，中共更是盛赞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未能随张学良 1936 年圣诞节释放蒋介石并亲送返宁，负荆请罪而告结束。蒋返京后不数日，即设军事法庭，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旋蒋请准国民政府予以特赦，惟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蒋扣张不放，弃义背信，引起西安之“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及群众莫大愤怒，使西安事变之善后演变成释放张学良的问题。当时西安群情激昂，“三位一体”甚至决定如蒋不放张回陕一行则不惜一战。而蒋介石即抱定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之准备，不为所动，如西安不肯就范，按其计划不能和平解决只有诉诸武力一途，双方僵持不下，剑拔弩张，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蒋介石于 1 月 9 日提出甲、乙两案，甲案基本内容：（一）东北军移驻



甘肃；（二）17 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四）中央军 12 团进驻潼关至咸阳一线。乙案：（一）东北军调驻安徽；（二）17 路军调甘肃；（三）红军仍回陕北；（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蒋派张学良亲信王化一、吴瀚焘携两案飞西安促东北军抉择其一。其实甲案系陪衬，蒋属意东北军接受乙案。张学良则盼东北军接受甲案，三军得以靠拢，西北团结局面尚可维持，不致被各个击破，而其个人返陕有望。

南京和西安谈判的焦点立即转为张学良的释放问题。此时中共的立场至为重要，红军已按蒋被释放前之计划开入关中。周恩来于 1 月 10 日致张学良函中说："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次日，周恩来写信给蒋慷慨陈词："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尽撤入陕甘之兵、释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

南京和西安谈判的焦点立即转为张学良的释放问题。此时中共的立场至为重要，红军已按蒋被释放前之计划开入关中。周恩来于 1 月 10 日致张学良函中说："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次日，周写信给蒋慷慨陈词："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尽撤入陕甘之兵、释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

1937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15 日，杨接张学良 13 日函称："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坚拒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16 日，三方面会议决定：持和平方针；联络各方共同向即将召开之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改变国策；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再决定派员去溪口见蒋。

1 月 17 日，西安代表李志刚（西北军）、鲍文越（东北军）到溪口见蒋介石。蒋告李、鲍："张汉卿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西安方面必须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鲍对蒋失望，立返西安。李向蒋报告"西安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

他们要打仗。”蒋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李立即携蒋致杨虎城函返西安。23 日李再来奉化见蒋。蒋又说：如果要战，很短的时间就能消灭他们。限西安于 24 日前答复并派代表至潼关与顾祝同谈判注：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身历记》，第 34、48 页。杨于 23 日复电，随即派代表赴潼关。这样谈判遂移至潼关。但无论巨细，谈判与备战皆听命于蒋。1 月 20 日，蒋致电何应钦、刘峙，对东西两路的军事部署，“暂时敷衍”谈判等作了具体的安排注：总统府：《统一时期西安事变》第 31 册，第 107 页。潼关谈判于 26 日开始，谈判只讨论军事问题。政治问题，蒋允留待三中全会解决。至 30 日，谈判已大致就绪。西安接受甲案，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潼关谈判进展的消息传到西安后，东北军少壮派异常不满，因为无论是甲案或乙案，张学良是回不来了。两周以前，对和战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与少壮派的分裂已极明显。东北军、西北军少壮派联合一起，坚持反对在张学良未被释放前和平解决。其中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三人顿为东北军少壮派的领袖。他们在基层干部中由下而上地发起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一战；他们认为高级将领，尤其是王以哲军长，放弃营救有取代张之动机。

1937 年 1 月 27 日晚，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等 50 余人向周恩来请愿，坚主张回来后再撤兵，要红军支持。周解释道：我们坚持，蒋一定不放，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张更回不来了，会造成混乱的局面，团结抗日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只要我们“三位一体”坚持下去，迟早张会回来的。少壮派未为所动，苗剑秋连哭带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下边哭边请红军出兵。周无奈，才答复去红军司令部商量一下。

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于 30 日赶往红军司令部，与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开会商定：只要东北军、17 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并电呈中央。后接毛泽东、朱德等回电：“我们与张、杨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当晚周赶回西安转告杨虎城及少壮派军官。

在此期间，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 40 余人在渭南开会。王以哲因病缺席，由董英斌代替主持。首由何柱国发言，报告潼关谈判进行情形并力主和平解决，争取张学良释放。立遭应德田反击，并坚主不放张学良，即与中央军拼死一战。这一主张得到多数与会者响应，当场签名，无一人拒签，于是战争



便成为决议。

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认为，与中央军一战则掀起内战，不但无胜利的把握，更有违“兵谏”的初衷，可能更难获得张的释放。遂派机接于学忠由兰州来西安，因为名义上东北军由于领导。31 日晚在王以哲寓舍开会。与会者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旁听者有应德田等人，由杨任主席。会议推翻渭南会议主战的决议，一致同意主和，先撤兵后救张。应德田等未在会上提出抗议。

在此期间，西安谣言甚多，局势紧张。1937 年 2 月 1 日晚，街上已贴出“除奸”的标语。2 月 2 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于文俊连长率队闯入王宅，开枪杀死王以哲。何柱国事先至杨虎城公馆躲避而幸免。当日被杀者还有“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及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等。同日，西北军交通处长黄念堂亦被杀害。

周恩来在此极端困难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努力推动国共双方合作抗日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震动，使他感到对内反共打内战，对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讨论、制定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1937年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现上述五项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城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的全局出发，在对红军和根据地保持绝对领导权的前提下，对国民党作出的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以利于组成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地反对日本帝目主义的侵略。这份电报，是中共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赞同，他们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保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尽管蒋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变，然而西安事变毕竟深刻影响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表示如果领土



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一战”。蒋介石也在声明中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在蒋介石的言论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

不论怎么说，总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战——虽然还有个前提，即“超过忍耐限度”。这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一大成果，一大贡献，一大胜利。至于如何对待共产党，争论益发白热化。大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仍希冀“根绝赤祸”，而“赤祸”当然指的是中共。不过，细细推敲这《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可以发觉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这一决议案，提出了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军队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组织。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对于这曲里拐弯的四条，周恩来后来作了绝妙的解释：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延安的石窑洞里读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以为大体上是有进步的。毛泽东在3月6日致任弼时的电报中写道：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另外，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内部文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写得更明确：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指责我们，但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可以进行谈判，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

确定。

为了敦促蒋介石旅行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在1937年1月间的邀请，派代表直接通国民党进行谈判。在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距延安40多华里处的甘泉县北之劳山处曾遇劫车事件。周恩来的卡车，正是从谷底驶来。猛然间，从左边射来密集的枪弹，枪声震撼着山谷。据周恩来的同行者孔石泉回忆，枪弹首先击中了司机的大腿。“吱”的一声，卡车急刹车。这下子，卡车成了枪林弹雨的中心。约莫二三百人，从前、后、左三个方向射来枪弹。显然，他们早已居高临下在此等候。周恩来的卡车进入了他们的“口袋”——伏击圈。审问了俘虏，这才水落石出。原来，那是当地的一股土匪，企图拦车劫财。他们既不知道车上坐的是周恩来，也与蒋介石无关。虽然遇险，经历了一番浴血奋战，周恩来毫不在意，要求西安方面派飞机来，他于翌日再登旅程。翌日，一架飞机自西安来。周恩来在延安登上飞机，直飞西安。

国共双方在红军改编，边区政府地位等问题上不断商谈，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1933年1月，榆关失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宣布，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工农红军愿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红军长征途中，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华北，中华民族十分危急之时。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的希望，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立即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任务。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并于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从中国实际出发，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决议》指出要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对当前主要敌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

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又适时调整其政策。1936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主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和南京谈判”的条件，认为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它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逼蒋抗日”的方针，力主和平解决，主动作出“放蒋”决策，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不仅如此，在内战危机迫在眉睫，西安形势十分险峻的时刻，中共中央派张闻天于 1 月 27 日亲自秘密到达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和彭德怀、王稼祥共商解决内战危机的办法。当西安方面和战之争更为激烈，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朱德又提出以“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终于保持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2 月 10 日发出《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停止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其目的在于促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确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但仍然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这就决定了从重开谈判到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必然要经过很多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从 1937 年 2 月 9 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持续了半年时间，经历了五个主要回合。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张闻天则自始至终指导着谈判的进行。当 8 月周恩



来、朱德、博古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轮谈判时，正值813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大势所趋，蒋介石只得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潮流，作出让步。国共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根据国共双方商定，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准备举国抗战的阶段跨入了实行举国抗战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国共合作谈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在取消名义、接受改编和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保持了共产党对红军和苏区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自觉地、主动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公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全国的、群众性的党。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原因和宝贵的经验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不惜捐弃前仇，放弃红军、苏区名义，接受改编，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同时在统一战线中又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置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不仅使国民党、蒋介石溶共限共的政策归于失败，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击退其制造的反共高潮，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将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幼稚，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它能够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自觉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这是国共合作得以成立、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在实际斗争中认清最主要的敌人和最主要的联合对手，实行策略转变。首先是把打击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都在统

一战线范围以内，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关键意义的对蒋方针上，中共中央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采纳张学良的建议，确认其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联合的主要对手。中共对蒋方针即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蒋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客观形势的变化直接威胁其代表的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利益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转变其政策，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某种情势下甚至还采取一定的主动，作出一定的让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是在维护民族根本利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基础之上国共双方互动的结果。

第四，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物质基础。红军东征取得胜利，又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同时，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在西北形成一股巨大的共同抗日的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各派各军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所有这些，都是蒋氏不得不将共产党作为主要谈判对手，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五，紧跟形势发展，抓住时局变化带来的有利时机，在正确认识其性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向抗日的方向发展，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第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合作，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党内矛盾，及时纠正认识的不足和偏差，调整党的策略方针，在克服矛盾、解决分歧、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使党和人民武装在对日军作战的不断胜利中巩固和壮大。

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不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光辉的一页。它昭示所有炎黄子孙，发扬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共同合作的优良传统，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的振兴而团结奋斗。



苏区和白区两个会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抗日做准备

西安事变后，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两党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重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64人。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以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对日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毛泽东在会上还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要争取更多的群众，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结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团结问题。

关于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而应当“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他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他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1937 年 5、6 月间的白区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它最引人注目的是：会议期间及其前后，刘少奇对以往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且指出，它是“八七”会议以后、包括六届四中全会以来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在党的全国性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它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会上发生异常激烈的争论，反对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反映出党内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的认识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个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成为日后延安整风的重要先导。

刘少奇所以在此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严重的挑战性问题，是他多年来在白区工作实践中长期思考的结果，也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处在转折关键时刻的实际需要。

因此，刘少奇接连在 1937 年的 2 月 20 日、2 月 25 日、2 月 26 日、3 月 4 日，从天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四封长信。

他在信中十分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十二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



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足见刘少奇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已经不是日常工作性质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刘少奇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这样说仍还不够，他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的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这已经越出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及到对党的十年历史，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了。

当然，刘少奇这时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算旧账，仍在纠正当前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写道：“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政策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他还指出这些“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刘少奇在华中地区印发他给张闻天的第四封信（也就是《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时，加写了一个附注：“这封信是我在五年前在天津秘密工作时写给洛甫同志的一封秘密信。当时地区很小，红军亦不大，党的秘密工作问题，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工作与发展的极重要的问题，故向中央写这封信，想中央在得到这封信后对白区秘密工作有个指示，以帮助秘密工作的转变，并接受我在十年来关于秘密工作中的一些观点。

刘少奇给张闻天的这四封信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写下的。只要把这四封信连贯起来仔细地读一下，不难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尖锐地系统地批判党内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且指出它是长期存在的“错误的恶劣的传统”，是很自然的

事情。第二，对这些问题，在党内还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因此，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在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呢？他提出：（一）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二）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地分开；（三）在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内的民主；（四）不要在思想斗争中随便打击同志，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意见，应用说服、讨论的方法去消除；（五）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六）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应该建立党团；（七）把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结合起来，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八）宣传工作应该彻底转变；（九）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刘少奇号召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才能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刘少奇尖锐地指出白区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传统，是完全正确的，对冲破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某些顽症是十分有益的。但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同一般党员和干部不怕牺牲的艰苦斗争，虽有联系、又有区别。对前者应该严肃地批评，对后者应该热情地赞扬并给以积极的引导。报告的缺点在于没有把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在集中批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同时，没有对后者给予应有的肯定，这就使不少代表误以为这个报告是在"抹煞一切"，于是连"说'左'倾冒险是历史传统"这个作为报告主题的正确看法也不能接受，甚至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

会议上的争论发展到这样地步，已很难继续开下去，只能暂时休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这次政治局会议，从6月1日开始，到4日结束，连续开了四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是更深刻的争论。白区工作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以往北方工作的评价上，可以说还是局部性的问题。而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总的路线是否正确，是不是存在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传统这个全局性的问题上。由于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



会选举的，许多人对过去这些年内路线的评价十分敏感。这个问题以前还没有这样尖锐地提出来过，而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这就使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争论表现得格外尖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党的领导核心内部出现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迟早要发生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从6月6日至10日继续举行白区工作会议。这是会议的第二阶段。

6月6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先说明了对刘少奇报告的看法，在总的方面把这个报告肯定下来："这个报告是很重要的。他是一个做实际工作多年的同志，他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懂得辩证法。他过去与中央有过争论，很多地方是对的。中央解决他的问题，过去有些是不对的。他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中有些不圆满的地方，我的发言要加以说明。"张闻天的报告分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我们过去十年来政策的清算，二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三是华北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他在报告中说："一般的说来，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还是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而关门主义却障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同刘少奇的看法显然有共同的地方。他又说："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在刘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这更是对刘少奇报告的直接肯定。但他在报告中避开不谈"左"倾错误在党内是一种传统。而在前面所引的"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那句话中，又在"今天"两字下特意加了重点号，似乎在提示只有在需要"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的"今天"，它才成为"党内的主要的危险"。他报告中说："我党过去所犯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他还把关门主义和盲动冒险主义区分开来，说道："关门主义在我们党内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虽是同盲动冒险主义有着同一的社会根源，有着相互的联系，但不等于盲动冒险主义。"可以感觉到张闻天同毛泽东、刘少奇对问题的认识这时仍存在微妙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历史地形成的，在当时也许只能解决到这个程度，但毕竟比过去已经前进了一步。

张闻天报告后，会议对他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展开争论，这是很正常的，是党内民主的表现。现在，会议已到结束阶段。张闻天是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做这个报告的，讨论中没有人再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6月9日，张闻天对关门主义问题作了补充

说明。他说："关门主义的实质是以领导党的方式领导群众"。又说："关门主义是倾向，不是传统"。朱德就军事问题做了发言。刘少奇在当天和10日对会议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很久，每个同志都充分发言，表示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可歌可泣的精神。会议采取了民主精神，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提供了很多好的意见和经验。所以，这次会议是圆满地成功了，是今后工作的武器。他对自己报告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说：我的报告着重地批评了过去关门主义的传统，但只批评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好像我否认了过去一切，并且对各个时期的历史没有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他说：我的目标是利用华北经验说全国，可是华北同志反而不满，这是我没有估计到这次会议到会的主要是华北同志。但对会上有些对他所作的不正确的批评，刘少奇也表明了态度，说："有同志批评（我）是站在右批评左，否认过去成绩，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批评是不妥当的。""同时，我还没有检查过去十年工作，只说到关门主义问题，并不是否认过去一切。"会议结束时，张闻天提议："基本上赞成我的报告与少奇同志的结论，付表决。"全体一致通过。

白区工作会议闭幕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刘少奇说："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已解决了，今天解决具体问题。"毛泽东谈了宣传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仍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北方局。

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刘少奇和许多代表还没有离开延安，由于日本侵略军发动武装进攻，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了。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党的全盘工作必须作出新的部署。刘少奇在几年后写道："在延安的会议开过后，日本帝国主义已不让中国再有进行抗战的准备时间，即于7月7日在卢沟桥开炮了。从此全国进入抗战，形势又有极大的转变。会议所讨论的东西完全没有来得及执行。"